目　录

1 英译者序

1 美国版导言

1 **第一部分　犹太人对现代经济生活的贡献**

3 第一章　引言

8 第二章　16 世纪以来经济生活中心的转移

16 第三章　国际贸易的加速发展

20 第四章　现代殖民地的创建

34 第五章　现代国家的创建

42 第六章　商业在经济生活中的主导地位

79 第七章　资本主义观点在经济生活中的发展

107 **第二部分　犹太人的现代资本主义才能**

109 第八章　问题

111 第九章　何为资本主义企业家

117 第十章　犹太人现代资本主义才能的客观环境

132 第十一章　犹太宗教在经济生活中的重要性

175 第十二章　犹太特性

195 **第三部分　犹太天赋的起源**

197 第十三章　种族问题

226 第十四章　犹太民族的变迁

245 注释
286 索引

313 译后记 犹太人与资本主义：一个尚待破解的谜题

第一部分
犹太人对现代经济生活的贡献

第一章　引　言

27

对于某个群体参与某种特定经济组织的程度，可以使用两种可能的方法予以考察。一种是统计学的方法；另一种可称为起源学的方法。

我们努力借助第一种研究方法，以确定参与某些经济活动的实际人数，即与某个特定国家建立了贸易关系，或者创建了某种特定工业的那些人，然后通过我们所感兴趣群体的人员数目，来计算其所占的比例。毫无疑问，统计学方法具有许多优点。如果我们能通过实在的数字，说明外国人或犹太人在某个商业领域的所有从业者中占到50%或75%，那么他们在这个领域中的相对重要性，立刻就变得相当清晰了。如果有关人员的具体数目以及其他或许更重要的经济因素（如已付资本额、商品产量、营业额等）的统计数据是现成的，相关情况尤其会显得一目了然。因此，在针对我们所指定的问题上，采用统计学方法是有用的。但同时明显的是，仅凭这种方法本身，不足以彻底解决问题。首先，即使是最完整的统计资料，也不可能告诉我们所有的事情；而且，我们试图寻找的最重要的方面，往往被遗漏了。至于重要的个体对经济乃至对一切人类生活产生的有力影响，统计数据通常无法给予回答，这些影响所产生的后果远远超出了其直接环境的限制。它们对任何一种发展之一般趋势的实际重要性要比任何一组统计数据所能揭示的大得多。因此，必须用其他方法来补充统计学的方法。

28

不仅如此，由于缺乏材料的缘故，人们不能经常使用统计学方法。确实很幸运的是，我们有着从事工业与贸易人员数据的记录，

这显示了他们与其余人群之间的对比关系。但从大的范围来说，这种统计学研究方法，只是在现代以及未来才真正是可能的。即便如此，调查起来也困难重重。然而，通过仔细检查各种资料，包括犹太社团对其成员所做的估算，我们将会取得丰硕成果。我希望本书能有助于推动此类研究的开展，就目前而言，只有维也纳的西格蒙德·迈尔(Sigmund Mayr)的探索才是真正有用的。

因此，我已提及的另一种方法(起源学)必须拿来补充统计学的方法。这种方法是什么？我们希望发现一个群体(即犹太人)在多大程度上已经影响或者正在影响现代经济生活的形态与发展；也就是说，去发现他们在特质方面或者我上文所说的功能方面的重要性。做到此点的最好办法，就是去探查现代经济生活的某些标志性特征是否由犹太人赋予其最初形式的；即是说，某种独特的组织形式最初是否由犹太人引入，或者如今被普遍视为根本的某些著名商业原则是否为犹太精神的特殊表达。这必然要求将经济发展因素的历史，追溯至其最初的起源。换言之，我们必须研究现代资本主义制度的童年时期，或至少要去研究它获得现代形式的那个时期。还不能仅仅研究童年时期，其整个历史也必须予以通盘考虑。因为在整个历史进程中，一直到今天，新的因素不断
29 进入资本主义结构之中，其特征也不断发生变化。无论哪里出现了这种情况，我们的目标必须是找出它们受到谁的影响。而这往往并不容易，有时甚至是不可能的；因此，学者必须借助于科学的想象。

还有一点不容忽视。在许多情况下，为经济生活奠定基本思想或为之带来革新的人，并非总是这些思想或革新的发明者(就此词最狭义的内涵而言)。人们经常断言，犹太人没有创新能力；非犹太人独自完成了技术发明与经济发现，而犹太人则通常能够聪明地利用其他人的思想。我完全不同意这种流行观点。我们能在技术科学领域里找到犹太发明者，也肯定能在经济领域里找到，而后者正是我试图在本书中揭示的。即使我们上述那个断言属实，它也不能反驳这点，即犹太人赋予经济生活的某些方面以他们的独

特特征。在经济世界中，与其说是发明者重要，不如说是发明的应用者重要；与其说是提出构想（比如分期付款制度）的人重要，不如说是将它应用于日常生活中的人重要。

在进入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犹太人在建立现代资本主义制度中的作用——之前，必须提及另一个重要方面。在专门研究这个问题时，犹太人的影响可能显得比他们的实际影响来得大。这触及本项研究的一个本质，即这整个问题只是从一种视角来观察的。如果我们探寻机械发明对现代经济生活的影响，同样的本质也适用：在一部专著中，这种影响容易显得比其实际影响来得大。尽管这点显而易见，但我还是要提一下，以免有人说我对犹太人起的作用夸大其词。毫无疑问，无数其他原因也成就了我们今天所见到的这种经济体制。如果没有犹太人，就像如果没有美洲大陆及其白银宝藏的发现、没有技术科学上的机械发明、没有现代欧洲国家的人种特征及其兴衰变迁那样，资本主义也将无从说起。 30

在资本主义的漫长故事中，犹太人的影响仅仅构成其中的一章。关于它对其他部分的相对重要性，我将在我的《现代资本主义》新版中予以说明，我希望它不久就能问世。

我相信，这种防止产生误解的说明，有助于普通读者正确理解犹太人对现代经济生活的影响。但它必须与另一方面结合起来。如果说我们一方面要留有余地，以免我们的研究使犹太人在经济事务中占的比重显得过大，那么，另一方面也要看到，犹太人的贡献很多时候甚至比我们相信的还要大。由于并非所有材料都能利用，我们的研究只能探讨这个问题的一部分。今天有谁能够确切地知道到底是哪个人或哪些群体创立了这个或那个行业，建立了这些或那些商业部门，首先采用了这种或那种商业原则？如果我们能够确切找出这些开创者的名字，那么更深一层的问题就是，他们是否为犹太人？

犹太人是指那些持有犹太信仰的民族成员。我无需补充说明的是，尽管在这个定义中我有意不提种族特征，但它也包括那些从其宗教共同体中退出的犹太人以及这些人的后裔，因为从历史上

看，这些人仍然是犹太人。必须牢记这点，因为当我们在确定犹太人对现代经济生活的影响时，一再以基督徒身份出现的一些人实际上是犹太人。他们或他们的父辈接受了洗礼，仅此而已。每个时代都有许多犹太人改变信仰，这个假设并非牵强附会。在中世纪的最初时期，在7、8世纪的意大利以及同一时期的西班牙与墨洛温(Merovingian)王国中，我们就听说过许多这样的例子；从那时起到现在，我们发现他们存在于所有基督教国家之中。实际上，在19世纪最后三分之一时间里，大规模的受洗活动不断发生。但我
31 们只有过去二三十年的可靠数据，因此我倾向于怀疑雅各·福摩尔的断言，即上世纪20年代末的柏林有半数犹太人改信基督教。[1]同样不可能的是慕尼黑的拉比维尔纳(Werner)博士的观点，他在最近的一篇论文中提到，总共有12万名柏林犹太人接受了洗礼。而我们所拥有的最可靠数据均与之相悖。根据这些数据，直到19世纪90年代，叛教才开始大规模兴起；即便到那时，每年最高的百分比也从未超过1.28%(在1905年)，而年均百分比仅为1%(自1895年以来)。尽管如此，1873年至1906年间，柏林犹太人改信基督教的人不在少数，其总数可以精确为1869名。[2]

奥地利犹太人中间的叛教趋势更为猛烈，维也纳犹太人尤其如此。目前，这座城市每年有五六百人放弃他们的信仰。从1868年至1903年，不下9085名犹太人放弃了他们的信仰。这一过程发展迅猛；自1868年至1879年，平均每年在每1200名犹太人中有一人受洗；自1880年至1889年，每420—430人中有一名；而在1890年至1903年，则达到了每260—270人中就有一名。[3]

但就对我们时代经济发展的影响而言，叛教的犹太人并非难以估计的唯一群体。其他的群体也难以估计。我指的不是那些嫁入基督徒家庭的犹太女人，尽管不再是犹太人，至少名义上不是了，但她们肯定保留了犹太特性。我指的是那些在历史上发挥了重要作用的秘密犹太人，我们在每个世纪都可以遇到这群人。在某些时期，他们构成犹太民族的很大一部分。但他们冒充非犹太人冒充得如此好，以致同时代人将他们看作基督徒或穆斯林。例如，我

们得知，15 与 16 世纪法国南部的犹太人最初来自西班牙和葡萄牙（下面这种说法适用于各地的马兰诺）："他们践行着天主教教义的所有外在形式；教堂登记簿上记录了他们的出生、结婚及死亡，他 32
们接受了洗礼、婚礼及终敷礼等圣事。一些人甚至接受神职，成了司祭。"[4] 这就难怪在商业交易、工业活动及其他记录中，他们没有以犹太人的身份出现。甚至在今天，一些历史学家仍以钦佩的语气来称赞西班牙或葡萄牙"移民"的有益影响。秘密犹太人非常巧妙地掩饰住他们的种族起源，以致犹太史专家们至今不能确定某一家族是不是犹太人。[5] 对于那些采用基督徒名字的家族，这种不确定性就更大了。17 世纪的新教难民中必定有大量犹太人。一般的理由就能证明这个假设，而当我们考虑到胡格诺派中出现的众多犹太名字时，这种可能性确实更大了。[6]

最后，我们的调查无法考虑那些在 1848 年之前积极参与当时经济生活却不为当局所知的犹太人。因为法律禁止犹太人从事某些职业。因此，为了规避法律，他们不得不要么用某种虚假的基督徒身份打掩护，要么将自己置于一个享有"特权"的犹太人的保护下，要么被迫求助于其他一些计谋。可靠的权威认为，在许多城市当中，秘密过着这种生活的犹太人必定为数巨大。比如，在 19 世纪 40 年代，根据稳妥的估计，维也纳有不少于 1.2 万名犹太人。当时的纺织业批发贸易已经由犹太人操纵，犹太店铺充斥着整个市中心。然而，1845 年官方的商人名单仅在附录中罗列了 63 名犹太人的名字，他们被称为"可接纳的犹太商人"，政府只允许他们从事有限几种商品的贸易。[7]

说说这些就够了。我的观点是，由于众多不同的原因，我们能发现的犹太人的数量要比实际存在的少。因此，读者应当牢记，犹 33
太人对现代经济生活结构的贡献，必然显得要比实际情况小。

我们现在就来说明他们的这种贡献。

34

第二章　16世纪以来经济生活中心的转移

现代经济生活发展中一个最重要的事实是，经济活动中心从南欧国家（诸如意大利、西班牙和葡萄牙以及南德意志的一些地区）移向西北欧国家（诸如荷兰、法国、英国及北德意志地区）。在此过程中，荷兰的突然崛起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而这又成为英法经济发展的潜在动力。整个17世纪，西北欧国家理性的投机商以及务实的政治家们只有一个目标：在商业、工业、航运及殖民等方面仿效荷兰。

针对这一众所周知的事实，历史学家们做了荒谬不堪的解释。比如，有人认为，美洲的发现与通往东印度新航路的开辟，导致了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及南德意志城邦的经济衰落；它还造成了黎凡特商业交易额的减少，从而削弱了依赖于此的意大利商业城市的地位。但这种解释并不能令人满意。首先，在整个17、18世纪，黎凡特的商业仍维持了优势地位，而且这一时期法国南部沿海城市以及汉堡的繁荣，皆与之息息相关。其次，包括威尼斯在内的许多意大利城市，在16世纪仍广泛参与了黎凡特贸易，而这些城
35 市直到17世纪才完全丧失其重要性。有些难以理解的是，那些直到15世纪仍领先的国家——意大利、西班牙及葡萄牙——为什么会因为与美洲及东印度的新商业关系而蒙受损失；或者这些国家为什么会因为其地理位置而处于劣势，尤其是与法国、英国及荷兰的地理位置相比较的话。就好像从热那亚到美洲或西印度群岛的路程与从阿姆斯特丹、伦敦或汉堡出发到美洲或西印度的路程不

是同一条路似的，就好像西班牙与葡萄牙的港口不是距离新大陆最近似的！——要知道这些新大陆以前可是由意大利人与葡萄牙人发现，并且是由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占据的！

另一个常见的理由同样难以置信。据称，西北欧国家是强大而统一的，而德意志及意大利则四分五裂，因此前者能够占据比后者更有利的地位。在此我们不免要问，难道 16 世纪强大的威尼斯是一个比 17 世纪的荷兰更弱小的国家？难道西班牙菲利普二世的帝国在权力及声望方面没有超出同一时期的其他国家？而且，为什么尽管德意志处于政治混乱之中，但其城市如汉堡及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却在 17、18 世纪获得了高度发展，而英法则鲜有城市能够与之匹敌？

这里无法全面研究这个问题。它是由多种因素造成的。但从问题本身来看，我认为有一种可能性不应被忽略，需要最认真的考虑，尽管据我所知它从未被人思考过。我们能否将经济中心从南欧到北欧的转移与犹太人的流浪联系起来？这个设想使得那一时期至今仍笼罩于半黑暗状态中的事件立刻豁然开朗。犹太人的流 36
浪与定居和不同民族与国家的经济变迁是两大并行的事件，令人惊奇的是，此前竟没有人注意到这点。以色列人如同太阳一般掠过欧洲上空：他们到来，万物复苏；他们离去，万物凋零。犹太民族自 15 世纪以来命运变迁的简要历史将会支持这种论点。

首先要提及的具有世界意义的重大事件是犹太人被驱逐出西班牙（1492 年）与葡萄牙（1495 及 1497 年）。绝不应忘记的是，在哥伦布从帕洛斯（Palos）起航去探索美洲大陆（1492 年 8 月 3 日）的前一天，据说有 30 万犹太人被迫从西班牙迁徙到纳瓦尔[①]、法国、葡萄牙及东方。也不应忘记的是，在瓦斯科·达伽马探寻并发现通往东印度的海上通道的几年里，犹太人正被驱逐出比利牛斯半岛的其他部分。[1]

---

① 中世纪巴斯克人在比利牛斯半岛西部建立的国家，位于西班牙东北部和法国西南部。——中译者注

由于命运的作弄，这两大具有同等重要意义的事件——新大陆的开辟与犹太人分布地点的巨变——竟然如此一致。犹太人被逐出比利牛斯半岛，但这并没有彻底终结那里犹太人的历史。无数留下的犹太人成了伪基督徒（马兰诺），只是在菲利普二世以后，宗教裁判所才变得越来越残酷，逼迫这些犹太人离开他们的出生地。[2] 在接下来几个世纪中，尤其在16世纪末，西班牙及葡萄牙的犹太人定居到其他国家。正是在这个时期，比利牛斯半岛经济发展的厄运被注定了。

自15世纪始，德国商业城市科隆（1424—1425年）、奥格斯堡（1439—1440年）、斯特拉斯堡（1438年）、埃尔福特（1458年）、纽伦堡（1498—1499年）、乌尔姆（1499年）、累根斯堡（1519年）等地先后开展了驱逐犹太人的运动。

37 在16世纪，意大利许多城市中的犹太人也遭受了同样的命运。他们被从西西里（1492年）、那不勒斯（1540—1541年）、热那亚及威尼斯（1550年）等地逐出。在这里，经济衰退与犹太移民在时间上也是一致的。

另一方面，有时颇难预料的是，这些难民逃往的国家和城市的经济重要性得到了提升，这种现象肯定要追溯至西班牙犹太人在当地的首次出现。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莱戈恩，[3] 它是16世纪意大利鲜有的几个获得经济繁荣的城市之一。它成为大多数前往意大利的犹太难民的目的地。在德国，汉堡与法兰克福[4] 接纳了犹太移民。值得注意的是，18世纪有位漫游了全德的目光敏锐的旅行家，曾发现帝国原有的商业城市，如乌尔姆、纽伦堡、奥格斯堡、美因茨以及科隆均已衰落，而仅有的两个得以维持往昔繁荣并日渐壮大的城市就是法兰克福与汉堡。[5]

在17、18世纪的法国，新兴的城市有马赛、波尔多、鲁昂——它们同时也是犹太流亡者的避难地。[6]

众所周知，荷兰于16世纪末突然崛起（从资本主义的意义上说）。1593年，首批葡萄牙马兰诺定居于阿姆斯特丹，不久，他们的人数迅速增加。阿姆斯特丹第一座犹太会堂于1598年投入使

用。到 17 世纪中叶，许多荷兰城市出现了犹太社团。18 世纪初，阿姆斯特丹的犹太人约有 2400 名。[7] 但甚至早在 17 世纪中期，犹太人的思想影响就已经很显著了，国际法学家和政治哲学家们将古代的希伯来联邦奉为荷兰宪法应予仿效的典范。[8] 而犹太人自己则把当时的阿姆斯特丹称为雄伟的新耶路撒冷。[9]

许多来自西属尼德兰尤其是安特卫普的荷兰移民，是被西班牙 38
逐出的。而根据 1532 与 1539 年发布的公告，伪基督徒被禁止继续留在安特卫普，但实际上并未生效。这项禁令在 1550 年重新颁布，这次只是针对那些居住未满六年的伪基督徒。但它仍然形同虚设："秘密犹太人的数量正在逐日增多。"他们积极参与尼德兰争取自由的斗争，其结果是他们被迫迁移到更北部的省份。[10] 在安特卫普成为世界商业中心及金融市场的短暂时期，也正是马兰诺到来并离去的期间，这个事实引人注目。[11]

英国的情况也大致类似。这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即资本主义的发展，[12] 与犹太人的涌入如影随形，而这些犹太人主要来自西班牙与葡萄牙。[13]

以前人们认为，从爱德华一世将犹太人逐出（1290 年）到他们在克伦威尔统治时期（1654—1656 年）或多或少被官方允许返回，英国在这期间没有犹太人。但对英国犹太史最有发言权的学者们现在认为，这是一个误解。实际上，英国一直有犹太人，但直到 16 世纪数量才开始增多。在伊丽莎白统治时期，许多犹太人受到女王接见；而女王自己也喜爱希伯来研究，乐意与犹太人交往。她的私人医生罗德里戈·洛佩斯就是犹太人，莎士比亚正是以他为原型塑造了夏洛克。后来，众所周知，由于玛拿西·本·以色列的努力，犹太人获得了不受限制的居住权。他们的数量由于移民不断涌入而增加，18 世纪以后，英国又接受了来自德国的犹太人。据《英国犹太志》（*Anglia Judaica*）作者的说法，到 1738 年，仅伦敦一地就有 6000 名犹太人。[14]

尽管如此，犹太移民与许多国家经济变迁的巧合，并不必然证 39
明犹太人前往或离开某个国家就是该国兴盛或衰败的唯一原因。

如果那样说的话，无异于是根据“发生于其后者必然是其结果”这种谬误论证。而后来的历史学家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也不是决定性的，所以我不打算列举他们的任何观点来支撑我的论点。[15]但我认为，当时人的观点总应予以重视。我将向读者介绍一些此类观点，因为往往一个词语就能说明他们所处时代的状况。

1550 年，威尼斯参议院决定驱逐马兰诺，并禁止与他们有商业往来。由于需要与犹太人做生意以维持生计，城里的基督徒商人便宣称，这会毁了他们，他们很可能会与犹太人一道离开威尼斯。犹太人控制了西班牙的羊毛、丝绸、染料、糖、胡椒、印度香料和珠宝贸易。整个出口贸易的很大一部分由犹太人从事，他们为威尼斯人供货，并从货物的出售中提取佣金；他们同时还是证券经纪人。[16]

在英国，克伦威尔是犹太人的保护人，但他这样做完全是出于经济考虑。他认为需要犹太富商，来增进本国金融与商业的繁荣。犹太人能为政府带来财力支持，他不会对这种实用性视而不见。[17]

与克伦威尔一样，17 世纪法国伟大的政治家柯尔贝尔[①]也同情犹太人。在我看来颇为重要的是，这两位强化了现代欧洲国家的组织者，都敏锐察觉到犹太人对一国经济（即资本主义）发展的合适作用。在一份颁给朗格多克省（Longuedoc）省长的法令中，柯尔贝尔指出，马赛从犹太人的商业能力中获益匪浅。[18]对于那些犹太人发挥着重要作用的法国著名贸易中心而言，当地居民无需被告
40 知这点；他们从自身经历中就能领会到，因此他们使出浑身解数，让犹太人留在自己的城市内。我们反反复复听到对犹太人的溢美之词，出自波尔多居民之口的尤其多。1675 年，一伙雇佣军抢劫了波尔多，许多犹太富人打算离开。市议会害怕了，其成员提供的报告值得在此引述：“葡萄牙人占据了整个街道，做的是大买卖，他们现在要求得到过境通行证。他们与那些从事大宗贸易的外国人决

① 柯尔贝尔（Jean-Baptiste Colbert，1619—1683），法国路易十四的主要臣僚，欧洲重商主义政策的最著名倡导者。——中译者注

定离开；实际上，他们中最富有的加斯帕尔·冈萨雷斯与阿尔瓦雷斯已经离开了。我们非常害怕商业会因此完全停滞。”[19]几年后，朗格多克的副省长将这种情形总结为：“没有他们（犹太人），波尔多及全省的贸易都将不可避免地走向毁灭。”[20]

我们已经看到，这些来自伊比利亚半岛的难民，在16世纪如何涌向安特卫普这个西属尼德兰的商业中心。在这个世纪中叶的1549年7月17日，皇帝颁布了一条收回犹太人特权的敕令。于是，市长、治安官以及城中的执政官，向阿拉斯的主教递交了一份请愿书，其中陈述了执行这项敕令的重重困难。他们指出，这些葡萄牙人是大商人，他们从出生地带来了巨额财富，并维持着广泛的贸易。“我们必须牢记，”他们继续说道，“安特卫普正在不断壮大，但要实现商业自主，仍需很长时间。而现在，这座城市的毁灭必将导致这个国家的毁灭，所有这些在驱逐犹太人之前必须给予谨慎考虑。”实际上，市长尼古拉斯·范登·梅伦更关切这一问题。为了保护新基督徒的利益，当尼德兰的摄政官、匈牙利的玛丽女王莅临鲁普勒蒙德时，他去拜访了女王。他告诉女王，这项敕令完全有 41
损于整个城市的利益，所以安特卫普的当政者没有公布这条帝国敕令。[21]然而，他的努力以失败告终，正如我们看到的，犹太人离开了安特卫普，前往阿姆斯特丹。

由于犹太人离去，安特卫普失去了昔日的繁华。只是到了17世纪，人们才意识到他们对物质繁荣作出的巨大贡献。1653年，当地组织了一个委员会，考虑应否准予犹太人进入安特卫普，委员会对此表述如下：“至于公共利益可能会担心与害怕的种种不便，即他们（犹太人）将把全部贸易据为己有，他们将犯下无数的欺诈并设下无数的骗局，以及他们将通过高利贷吞没许多天主教徒的财产，我们对此持不同意见，我们认为他们会大大突破现有的贸易限制，他们从事的贸易所带来的利润将有益于整个国家，国家能获得更多的金银。”[22]

17世纪的荷兰则无需此种劝告，因为他们充分感受到犹太人给他们带来的利益。玛拿西·本·以色列一离开阿姆斯特丹，前

往英国执行著名的使命，荷兰政府就变得焦虑不安；为了防止荷兰犹太人移居英国，荷兰政府指示其驻伦敦大使纽珀特去探听玛拿西的意图。他报告（1655 年 12 月）说一切正常，没有必要担心："玛拿西·本·以色列来看过我，并向我保证，他此行不想为荷兰犹太人谋取任何东西，只不过想帮助那些在西班牙及葡萄牙宗教裁判所受审的犹太人。"[23]

汉堡的情况也是如此。在 17 世纪，犹太人变得日益重要，以致
42 人们认为他们对于汉堡的繁荣必不可少。有一次，参议院请求允许建立犹太会堂，因为他们担心要不然犹太人就会离开汉堡，届时整个城市将有沦落为村庄的危险。[24]还有一次，在 1697 年，有人一提议驱逐犹太人，商人们就恳请参议院提供帮助，以防止汉堡的商业急剧恶化。[25]此外，在 1733 年，一份现存于参议院档案馆的特别报告中这样记载着："犹太人几乎完全控制了证券经纪、珠宝和穗带的贸易以及某些布料的加工，并且人数超过了我们。在过去，没有必要去识别他们，但现在他们的数量与日俱增。无论在大商人阶层、制造商还是在日用品供应商中，犹太人统统占据了重要位置。他们令人讨厌，却又不可或缺。"[26]在上述犹太人起突出作用的行业中，我们还必须加入海上保险经纪这一行。[27]

当时的人有太多的看法，但这些还不足以提供一种彻底的证据。我们必须依据这些事实形成自己的判断，因此我们的首要目标是必须找出这些事实。这意味着，我们必须从原始材料中去寻找自 15 世纪末以来，即犹太历史与欧洲总体经济发展趋同的时期，犹太人对创建现代经济生活所作的贡献。这样，我们将能明确说出犹太人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经济生活中心的转移。

我的观点是——请允许我先亮出自己的观点——犹太人的重要性是双重的。一方面，他们影响了现代资本主义的外在形式；另一方面，他们又表达了现代资本主义的内在精神。在第一个论题中，犹太人在赋予经济关系以国际面貌（这种面貌今天看得很明显），在促进作为资本主义框架的现代国家的形成，并最终在赋予资本主义组织以其独有的特征（这又是通过发明推动今日商业生

活运转的众多细节并通过合作来完善其他细节而实现的）这些方面作出了不小的贡献。在第二个论题中，犹太人的重要性非常巨大，其首要原因在于，他们将现代精神赋予了经济生活；他们抓住了资本主义的本质概念，使之获得了最充分的发展。 43

我们将依次考虑这些要点，以便获得关于这个问题的正确看法。我们的目的不过是提一两个问题，然后试着给出答案。我们仅仅想促使读者思索。这里提出的因果关系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有事实根据，将留待以后搜集了充足材料的研究来判断。

44

第三章　国际贸易的加速发展

自从经济活动的中心转移后，欧洲的商业也发生了变化，而这很大程度上归因于犹太人。如果只考虑他们经手的商品的数量，他们的地位也是独特的。正如我已说过的，精确的统计数据几乎不存在；然而，通过专门研究获得的一些数据将是有用的。据我了解，目前这方面仅有少量材料，但其价值怎么高估都不过分。

看起来有可能的是，甚至在犹太人得到正式许可进入英国之前，即在17世纪前半叶，他们经手的贸易额已占到整个王国的十二分之一。[1] 遗憾的是，我们不知道这种计算的依据是什么，但它离事实不会很远，这可以从伦敦商人的一份请愿声明中看出。该声明讨论了犹太人应否缴纳对外国人征收的进口税。请愿者们指出，如果豁免犹太人的这项纳税义务，那么国王每年将损失一万英镑。[2]

我们充分了解到犹太人在莱比锡集市上所占的贸易份额，[3] 由于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它是德意志的商业中心，我们便有了一个衡量其发展深度与广度的标准。此外，不仅仅包括德国，周围一两个邻国，尤其是波希米亚与波兰，也可列入考察范围。自17世纪末以来，我们发现，犹太人在集市上所占的份额越来越大，研究这些数据的所有专家一致认为，犹太人对莱比锡集市极其重要。[4]

45　只是到了1756年的复活节集市以后，我们才能比较犹太商人与基督徒商人的数量，因为正是从那时起，档案馆才有了关于后者的统计数据。犹太人参加莱比锡集市的平均数量如下：

1675—1680	416	1767—1769	995

1681—1690	489	1770—1779	1652
1691—1700	834	1780—1789	1073
1701—1710	854	1790—1799	1473
1711—1720	769	1800—1809	3370
1721—1730	899	1810—1819	4896
1731—1740	874	1820—1829	3747
1741—1748	708	1830—1839	6444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到17世纪末、18世纪以及19世纪初，犹太人出现了快速增长。

如果我们看看1766至1839年间的情况，就可以发现，每年平均有3185名犹太人与13005名基督徒参加集市，即犹太人占24.49%，几乎为基督徒商人总数的四分之一。实际上，在某些年份，例如1810至1820年间，犹太参与者占其同行总数的三分之一（4896名犹太人与14366名基督徒）。这是很重要的，而且无需强调的是，这个表中所给的数据极有可能被低估了。

犹太人在一国商业中所占的份额，有时可以通过间接方式确定。比如，我们知道17世纪汉堡同西班牙、葡萄牙及荷兰的贸易，几乎完全掌控在犹太人手中。[5] 大约20%的航运货物离开汉堡运往伊比利亚半岛，而30%运往荷兰。[6]

再举一例。在18世纪法国商业中，黎凡特贸易是最重要的一个分支。当时一位权威告诉我们，犹太人已将之完全控制——“买 46
主、卖主、中间人、证券经纪人及代理人等统统是犹太人。”[7]

在16、17世纪甚至远至18世纪，黎凡特的贸易以及经由西班牙、葡萄牙进行的贸易，构成世界贸易的中流砥柱。仅从数量上讲，上面的概述就能证明，犹太人在促进国际交往的发展中是多么卓越。仍在西班牙时，犹太人便已控制了黎凡特贸易的大部分，犹太人的办事处与仓库在黎凡特港口随处可见。许多西班牙犹太人在遭到驱逐后，前往东方定居，另一些则沿途北上。因此，黎凡特贸易不知不觉地渗入北方各民族之中。荷兰尤其可以看到这种影响：荷兰发展成具有世界影响力的贸易国家。可以这么说，随着犹

太办事处在各地的建立，贸易网络随之发展壮大，这张网络一方面撒得越来越远，另一方面又把人们彼此联系得越来越近。[8] 当西半球——很大程度上由于犹太人的影响——被卷入世界商业之中时，这个情况变得尤为明显。在下文谈到犹太人在殖民地创建中起的作用时，我们将深入探讨这个问题。

为了弄清楚犹太人对现代商业扩展所作的贡献，我们还得发现他们主要从事哪些商品的贸易。贸易的质量要比数量更为重要。正是由于其贸易特征，犹太人得以局部变革了旧有的商业形式，从而促进了今日商业形式的出现。

在此，我们遇到一个显著事实：很长一段时期内，犹太人实际上垄断着奢侈品贸易，而这种贸易在17、18世纪对贵族们的时尚
47 界而言至关重要。那么，犹太人主要从事哪些商品的贸易？首饰、宝石、珍珠及丝绸。[9] 从事金银首饰贸易，是因为它们在贵金属市场中始终重要；从事珍珠宝石贸易，是因为它们是由新大陆（尤其是巴西）的首批定居者发现；而从事丝绸贸易，则是由于它们与东方贸易中心的古老联系。

此外，在大宗出口贸易中，犹太人几乎占到全部或至少一大部分。而且，我认为可以合理地宣称，犹太人首次把现代商业的主要商品放到了世界市场上。除了小麦、羊毛、亚麻等农产品，以及后来的用蒸馏法制成的烈酒以外，他们在整个18世纪尤其从事了纺织品贸易，纺织品是资本主义工业生产迅速发展的产物；[10] 此外，他们还从事了首次成为国际贸易商品的殖民地产品，诸如蔗糖与烟草。我几乎不怀疑，一旦提笔去写近现代商业史，必然会在有关大型贸易的部分经常碰到犹太商人。我碰巧注意到的一些材料足以证明这一断言的真实性。[11]

犹太人对经济生活发展最深远也最具革命性的影响，或许在于他们从事了新商品的贸易，而为了生产这些商品需要用新方法代替旧方法。这类商品包括棉花、[12] 外国制造的棉织品、靛青等等。[13] 经营这些商品在当时被看作“败兴之举”，因此一位德国作家曾讥讽犹太人从事“不爱国的贸易”，[14] 或者“那种极少雇佣德国劳动力，

但在很大程度上只依靠国内消费的犹太贸易”[15]。

“犹太贸易”另一个让后来所有的商业纷纷效仿的重要特征是，商品种类多种多样。1740 年，蒙彼利埃的商人曾抱怨来自犹太商人的竞争，市政长官这样回答他们，如果基督徒也有犹太人那些 48
种类繁多的商品，顾客自然乐于像光顾犹太竞争者那样光顾他们。[16]关于莱比锡集市上的犹太人，我们听到了同样的评价：“犹太商人对集市贸易产生了有益影响，因为他们的采购极其多样。因此，犹太人使得贸易多边化，并推动工业（尤其是家庭工业）朝多元化方向发展。确实，在许多集市上，犹太人由于采购广泛，而成为市场的主宰。”[17]

但在我看来，资本主义初期“犹太贸易”最重要的特征在于，犹太商人在那些可以获得大量现款供应的地区拥有霸权地位，这种地位要么是他们直接获得的，要么是取道西班牙、葡萄牙而获得的。我指的是新发现的中南美洲盛产金银的国家。我们一再发现有记录表明犹太人把那里的现款带回国。[18]理性的投机者与务实的政治家们都非常清楚，这是一切资本主义发展的源泉。既然亚当·斯密学说的迷雾已经消散，我们也认识到了同样的道理。在很大程度上，现代经济生活的建立意味着需要获得贵金属，而此项工作没有人干得比犹太商人更成功。这就将我们引入下一章的主题——犹太人在殖民扩张中的作用。

第四章　现代殖民地的创建

49

我们直到今天才开始意识到，殖民扩张是现代资本主义发展中一股不小的力量。本章目的在于说明，犹太人在殖民扩张中所起的作用，即使不算是最有决定性的，也无论如何是最显著的。

犹太人热衷于殖民开拓，乃是出自天性；尤其当最后的避难所西班牙变得不再好客时，他们觉得新世界——尽管它只是披上新外衣的旧世界——要比任性的旧欧洲能给他们带来更多幸福的希望。这同样适用于一切殖民活动，无论在东半球、西半球或南半球。在东印度，可能早在中世纪就有了许多犹太定居者，[1]1498 年以后，欧洲诸国开始占领这片有着古老文明之地，犹太人作为欧洲霸权的支柱受到欢迎，但他们实际上是作为贸易先锋来到这里的。尽管尚无确切的证据，但很有可能的是，葡萄牙与荷兰的船队，必然将众多犹太移民载入了它们各自的印度属地。无论如何，犹太人广泛参与了荷兰所有的殖民活动，包括那些在东方开展的殖民活动。我们得知，犹太人是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大股东。[2] 而且公司的总督叫库恩（Cohn 或 Coen），此人“即使没有帮助荷兰在爪哇建立政权，但无疑为加强荷兰在那里的势力多有贡献”[3]。此外，看看那些荷兰殖民地总督的肖像，就可发现库恩并非他们中唯一的犹太人，[4]公司的董事也多为犹太人；[5] 总之，几乎找不到完全没有犹太人的殖民活动。[6]

50

在英国成为印度的主人后，犹太人对印度经济发展的贡献有多大，我们对此尚不清楚。然而，有相当充分的材料证明，犹太人参与了英国在南非及澳大利亚殖民地的创建活动。毫无疑问，在这

些地区(尤其是开普殖民地),几乎全部经济发展皆可归因于犹太人。在19世纪二三十年代,便雅悯·诺登与西缅·马克斯来到南非,他们的工作是"用工业唤醒几乎整个开普殖民地的腹地"。尤利乌斯·莫森索尔和其兄弟阿道夫与詹姆斯创立了羊毛、兽皮及马海毛贸易。亚伦与但以理·德帕斯垄断了捕鲸业;约珥·梅耶斯开始了鸵鸟养殖业。霍普顿的利莱恩菲尔德开采了第一批钻石。[7]在其他南非殖民地,犹太人也占据了类似的重要位置,尤其是在德兰士瓦,据说今天的5万南非犹太人中有一半在此定居。[8]澳大利亚的情况也差不多,那里的第一位批发商是蒙特费奥雷。因此,"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犹太人控制了英国殖民地航运业的大部分",这看来并非夸大其词。[9]

但犹太人对殖民开拓产生影响的真正范围,特别是在早期资本主义时代,主要集中在西半球。只要研究原始材料,必定会得出一个含义丰富的结论:美洲边境上遍布着犹太人。从美洲被发现的第一天起,它就对欧洲经济生活乃至整个欧洲文明产生了巨大影响;因此,犹太人在美洲世界的发展中起的作用,是现代发展一个至关重要的部分。所以,哪怕读者会感到厌倦,我也要较充分地论述这个主题。[10]

美洲的发现与犹太人的关系,是以一种非同寻常的方式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这就好像新世界是由于他们的帮助并只是为了他们而出现似的,就好像哥伦布与其他人都是以色列的常务董事似的。 51
有鉴于此,以过去为荣的犹太人,在最近的研究中提出了他们与美洲发现的关联。[11]这些研究表明,正是犹太学者的科学知识完善了航海技术,才使得跨洋航行成为可能。1473年,萨拉曼卡大学的数学与天文学教授亚伯拉罕·扎克托,完成了他的天文学图表《万年历》。在这些图表的基础上,另外两位犹太人,即葡萄牙约翰二世的宫廷天文学家与医生约瑟·韦库胡以及数学家摩西(与两名基督徒学者合作)发明了航海星盘,这是一种可以依据太阳的高度来测量船舶与赤道之间距离的设备。约瑟还进一步将他老师的《万年历》翻译成拉丁语与西班牙语。

因此，犹太人提供的科学为哥伦布的航行铺平了道路。同样不可或缺的金钱也来自相同的地方，至少哥伦布的头两次航行是如此。就第一次航行而言，哥伦布获得了路易·德·桑坦格尔的贷款，后者担任着国王顾问；哥伦布在航行中写的头两封信就是寄给探险的资助人桑坦格尔以及阿拉贡的财政大臣加百列·桑赫格的，后者是一个马兰诺。第二次航行也是靠犹太人的金钱完成的，但这次绝非出于他们的自愿。犹太人自 1492 年被逐出西班牙后，被迫留下了大量财产；费迪南德将之充入国库，并用其中一部分资助了哥伦布的航行。

不仅如此，哥伦布的同伴之中还有许多犹太人，第一个登上美洲土地的欧洲人是一位犹太人——路易·德·托雷斯。最新的研究似乎确认了这一点。[12]

但最令人吃惊的是，哥伦布本人现在也被认为有可能是犹太
52 人。不管有没有用，我还是给出这条准确性无法保证的材料。在马德里地理协会的一次会议上，以研究哥伦布著称的学者唐·塞尔索·加西亚·德拉列加在其论文中宣称，克里斯托博·科龙（Christobal Colon，这不是哥伦布）是西班牙人，他母亲那一脉有犹太血统。他引用了加利西亚省蓬特韦德拉（Pontevedra）镇的档案，以此说明科龙家族在 1428 至 1528 年间曾居住在那里，他们中间有人取了基督徒的名字，而这些名字又与哥伦布这位西班牙海军上将的亲戚中流行的名字是一致的。科龙家族与丰泰罗沙家族有过通婚。后者毫无疑问是犹太人，或者他们不久前才皈依了基督教，克里斯托博的母亲叫苏珊娜·丰泰罗沙。加利西亚省爆发骚乱后，美洲发现者的父母从西班牙迁往意大利。这些事实又为唐·塞尔索的其他材料所充实：哥伦布的著述中明显运用了希伯来文献的典故，同时哥伦布最早的肖像表明他有一张犹太人面孔。这些使唐·塞尔索进一步相信哥伦布是犹太人。

新世界的大门一旦对欧洲人洞开，大批犹太人便蜂拥而入。我们已经看到，美洲的发现与西班牙犹太人的无家可归发生在同一年，在 15 世纪末 16 世纪初这段时期，成千上万的犹太人被迫到处

流浪，此时欧洲的犹太人族群就仿佛是被棍棒捅过的蚁丘。因此，毫不奇怪，他们中的大部分奔向了前途光明的新世界。美洲的首批商人是犹太人。美洲的首批工业机构也由犹太人创立。早在1492年，葡萄牙犹太人就已定居圣托马斯岛，成为那里的首批大种植园主；他们开办了许多制糖厂，雇佣了近3000名黑人。[13]南美洲一被发现，犹太移民便蜂拥而至，以致乔安娜女王在1511年认为有必要采取措施，加以遏制。[14]然而她的努力无济于事，因为犹太人的数量继续猛增，最后在1577年5月21日，禁止犹太人移居西班牙殖民地的法律正式废除。

53

要完全公正地看待作为殖民地工商业创建者的犹太人在南美持续不断的活动，值得看看一两个殖民地的财富状况。

犹太人在美洲殖民地上的历史以及殖民地本身的历史，都能以1654年犹太人被逐出巴西为标志，划分为两个阶段。

前面已提及，1492年犹太人在圣托马斯岛建立了制糖业。至1550年，该岛制糖业的繁荣已达到顶点。这里共有60家带有制糖作坊与精炼厂的大种植园，每年生产出15万厄罗伯[①]的糖，这可以从他们缴纳给国王的十分之一产量中推算出来。[15]

犹太人后来将制糖业从圣托马斯岛——或许是从马德拉岛[16]（他们曾在这里长期从事蔗糖贸易）——转移到了美洲最大的殖民地巴西。由于制糖业的发展带来了国内财富的增加，巴西进入了它的第一个繁荣期。在早年，巴西居民基本上由犹太人及罪犯组成，每年会有两船这样的人从葡萄牙运到这里。[17]犹太人迅速成为统治阶层，“不少最富有的巴西商人是新基督徒”。[18]首位总督就是犹太出身，正是他规范了殖民地管理。可以不夸张地说，正是在卓有才干的托梅·德·索萨于1549年被派到这里担任总督后，葡萄牙的新属地才真正开始兴盛起来。[19]尽管如此，直到1642年荷兰取得巴西的所有权后，随着荷兰犹太富人涌入，这块殖民地的繁荣才达到鼎盛。就在1642年，许多美洲犹太人联合起来，在巴西建

① 厄罗伯(arrobe)，西班牙旧重量单位，约合15公斤。——中译者注

54 立了一个侨民社团，起码有 600 名有影响的荷兰犹太人加入其中。[20]到 17 世纪中叶，所有的大型制糖种植园皆为犹太人拥有，[21]当时的旅客报道了他们的财富和多种多样的活动。尼尔霍夫于 1640 至 1649 年在巴西旅行，他这样评价他们：[22]“不在（荷兰西印度）公司供职的巴西自由民当中，犹太人的人数最可观，他们从荷兰移民而来。他们从事的贸易比别人都大；他们购买了制糖作坊，并在累西腓建造了豪宅。他们都是商人，如果能对他们的贸易适当限制的话，将对荷属巴西具有重要意义。”同样，我们在 F. 皮雷亚迪的《游记》中读到：[23]“在那些土地上生活了九至十年之后，犹太人获得的收益不可思议，因为他们全都满载而归。”

犹太人对种植园发展所产生的支配性影响，要比荷兰对巴西的统治来得持久；尽管发生了 1654 年的驱犹运动，[24]这种影响却一直持续到 18 世纪前半叶。[25]有一次，“里约热内卢众多最有影响的犹太商人落入宗教裁判所之手，如此多的种植园立即陷入瘫痪，以致巴伊亚省的生产及贸易，直至经过很长时间后，才从这次打击中复苏”。后来，1768 年 3 月 2 日的一项法令要求销毁所有包括新基督徒名单的登记簿，1773 年 3 月 25 日的一项法律赋予新基督徒与传统的天主教徒完全平等的市民地位。显然，在 1654 年葡萄牙人重新获得对巴西的所有权之后，众多秘密犹太人仍然在那里维持了他们的显赫地位，也正是他们为这个国家带来了繁荣的制糖业与宝石贸易。

此外，1654 年在美洲犹太史的编年中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因
55 为在那一年，许多巴西犹太人定居在美洲的其他地方，由此导致了经济重心的转移。

这个变化既特别有利于西印度群岛上的一两个重要岛屿，也有利于邻近的沿海地区；随着犹太人涌入，这些地方于 17 世纪走向繁荣。巴巴多斯岛就是个恰当例子，来此定居者几乎全是犹太人。[26]1627 年，英国开始统治这个岛屿；1641 年引入了甘蔗种植业，七年后开始了蔗糖出口。但这里的制糖业难以维持，因为蔗糖质量太差，其定价连偿付送往英国的运费都不够。后来，从巴西放

逐而来的“荷兰人”引进了精炼工艺，又把蔗糖干燥及结晶的技术传给当地人，制糖业才得以改进。结果，巴巴多斯岛的蔗糖出口量实现了飞跃。1661 年，查理二世授予 13 个种植园主准男爵爵位，他每年能从该岛获得一万英镑的收入。大约到了 1676 年，岛上的制糖业已蓬勃发展，每年有不下 400 艘船来此运走原糖，而每艘船可运 180 吨。

1664 年，托马斯·莫迪福特将制糖业从巴巴多斯岛引入牙买加，[27]牙买加很快富裕起来。早在 1656 年，即英国从西班牙手中夺得牙买加的那年，岛上只有 3 个小型精炼厂；但到 1670 年，已有 75 个制糖作坊，它们中的许多产量已达 2000 英担。至 1700 年，蔗糖已成为牙买加的主要出口商品和主要财富源泉。1671 年，殖民地的英国商人请愿，要求驱逐犹太人，这相当清楚地表明，后者对牙买加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然而，政府却鼓励更多的犹太人前来定居，拒绝接受请愿的总督这样说，[28]“他以为没有其他臣民可以比犹太人与荷兰人更能让国王陛下获利：他们拥有大量的货物与 56
广阔的通信。”因此，犹太人没有被逐出牙买加，反而“成为英属殖民地的第一批商人”。[29]在 18 世纪，他们缴纳了该岛全部的税款，几乎完全控制了工商业。

在其他英属殖民地中，犹太人对苏里南情有独钟。[30]自 1644 年以来，犹太人一直定居在那里，并享有许多特权——“鉴于我们发现希伯来民族……已经……证明他们有用并对殖民地有益。”1677 年，苏里南归荷兰统治后，他们保留了特权地位。至 17 世纪末，犹太人与其他定居者的比例是一比三。1730 年，他们拥有 344 家甘蔗种植园中的 115 家。

犹太人在英国与荷兰殖民地的情况，也见于更重要的法国殖民地那里，如马提尼克岛、瓜德罗普岛以及圣多明各岛。[31]在这些地方，蔗糖也是财富的源泉；与其他地区一样，犹太人也控制着这里的蔗糖业，是主要的蔗糖商。

1655 年，便雅悯·达·科斯塔在马提尼克岛建立了第一个大种植园及精炼厂，此前，他与 900 名犹太人及 1100 名奴隶一同从

巴西逃到这里。

圣多明各岛早在1587年就引进了制糖业，但直到来自巴西的“荷兰”难民在那里定居后，才获得了一定程度的成功。

在所有这些情况中，我们不能对这个事实视而不见：在殖民制度（和随之而来的现代资本主义）扎根于美洲的那些关键世纪里，蔗糖生产是整个殖民地经济的支柱，这当然是在不考虑巴西的银矿、金矿及宝石开采业的情况下说的。实际上，要准确描绘那几个世纪的蔗糖加工和销售的巨大意义，是有点困难的。巴黎贸易委员会（1701年）毫不夸张地记录了它的看法，“法国航运业的繁荣，
57 要归功于产糖岛屿的商业，并且只有通过它，海军才得以维持和增强。”我们必须牢记，犹太人几乎垄断了整个蔗糖贸易；其在法国的分支又特别为波尔多富有的加迪斯家族所控制。[32]

犹太人在中南美洲打拼出来的地位是强有力的。然而，在17世纪末，英属北美殖民地与西印度群岛建立商业关系后，这种地位甚至变得更强大了。如同我们即将看到的，北美大陆的存在，靠的就是这种密切的商业关系，而犹太商人再次为实现这种关系提供了帮助。接下来，我们应当开始考虑在美国从其最初起源到后来发展过程中的犹太因素。诸种犹太因素再次联合起来，这才最终塑造出美国的经济形式。由于这一观点与（至少在欧洲）被普遍接受的观点完全相反，故这个问题必须予以充分的考虑。

乍看起来，北美经济体系的发展恰恰没有依靠犹太人。一旦我声称现代资本主义只不过多多少少是犹太精神的表达，常常就会有人告诉我，美国的历史是一个反证。美国佬吹嘘他们的繁荣不靠犹太人。一位美国作家——马克·吐温，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曾颇为详尽地考虑过为什么犹太人没有在美国起到重大作用，他给出的理由是，就算不比犹太人更聪明，美国人至少与他们一样“聪明”。（顺便说一下，苏格兰人也是这么看自己的。）在今天该国的工业巨子、知名投机商、托拉斯巨头中，我们确实看不到大量犹太人的名字。然而，我仍坚信美国充满了犹太精神（或许更甚于任何其他国家）。许多人承认这点，尤其是那些最能对这个问题

加以判断的人。因此，几年前，在庆祝首批犹太人定居美国250周 58
年的盛典上，罗斯福总统给组委会发去一封贺信。他在信中提到，这是他首次在任期内写这种信，但该事件的重要性使他愿意破例。犹太人当时遭受的迫害，令他感到有迫切义务去强调他们作为公民的优秀品质，自从这些具有犹太信仰与种族的人们来到这个国家以后，他们已发展出了这种品质。在提到犹太人对美国的贡献时，他的措辞切中肯綮："犹太人参与了这个国家的创建。"[33]在同一场合，前总统克利夫兰评价道："我认为，可以稳妥地说，在对当今美国精神(Americanism)直接或间接的塑造与引导上，恐怕极少有其他民族能够更具影响。"[34]

犹太人的影响体现在何处？首先，参与美国商业生活的犹太人数量绝非像第一眼看上去的那么少。人们往往设想，随便历数六位家喻户晓的著名亿万富翁，无论男女，都数不到犹太人，因此美国的资本主义必然缺乏犹太因素，但这种想法是错误的。其一，即便是在大的托拉斯中，有的就是受犹太人直接控制管理的。比如，冶铁托拉斯是由古根海姆家族创立的，它在1904年代表了一个拥有2.01亿美元的名义资本的联合体。又如，在烟草托拉斯(5亿美元)、沥青托拉斯、电信托拉斯等等之中，犹太人也占支配地位。[35]还有，犹太人拥有许多大型银行，因此他们对美国的经济生活有着不小的控制。比如，目标是要合并所有美国铁路的哈里曼系统(Harriman system)，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纽约著名的银行库恩·洛 59
布公司支持的。西部的犹太人影响尤其大，加利福尼亚州在很大程度上是他们创造的。在建州之初，犹太人以作为法官、国会议员、州长、市长，当然还有商人而声名显赫。这一地区比较著名的商业家族有：旧金山的塞利格曼兄弟——威廉、亨利、耶西与詹姆斯；萨克拉门托的路易斯·斯洛斯与里维斯·格斯尔(他们在那里创建了阿拉斯加商业公司)；洛杉矶的赫尔曼与纽马克。在淘金热时期，犹太人是加利福尼亚与东部各州及欧洲之间的中间人。那时候的重要交易由这些人从事：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代理人便雅悯·戴维森，罗得岛的阿尔伯特·普列斯特，巴尔的摩的阿尔伯

特·戴尔，创建了巴黎、伦敦和旧金山拉扎尔·弗雷尔国际银行的拉扎尔三兄弟，塞利格曼家族，格莱泽家族，沃姆泽家族。莫里兹·弗里德兰德尔是主要的“小麦大王”之一。阿道弗·苏特罗开采了卡姆斯托克矿藏。即便在今天，犹太人对大部分银行业的控制也不亚于他们对一般工业的控制。因此，我们可以提到西格蒙特·格林鲍姆与理查德·阿尔特舒尔的伦敦、巴黎和美国银行；菲利普·N. 利连索尔与伊格纳齐·斯坦哈特的盎格鲁—加利福尼亚银行；内华达银行；联合信托公司；洛杉矶农商银行；约翰·罗森菲尔德对煤田的控制；继承哈德逊湾公司的阿拉斯加商业公司；北美商业公司，以及许多其他公司。[36]

无疑，在最近几十年，进入美国各州的众多犹太移民一定对美国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产生了重大影响。今天的纽约有一百多万犹太人，而大量移民迄今尚未从事过任何资本主义职业。如果美国的情况继续沿着上一代的原有道路发展，如果各族群的移民统
60 计数字与出生比例维持不变，我们可以想象，五十或一百年以后，美国将只有斯拉夫人、黑人和犹太人居住，而犹太人自然会占据经济领导地位。

这些只是与本书无关的未来设想，我们主要关注的是过去及现在的情况。应当承认，犹太人在过去与现在的美国生活中已占据了显著位置；而且可能要比第一眼看上去的更为显著。我与有资格对这一主题发表见解的其他许多人一样，都认为他们影响巨大，但这种影响不能仅仅通过犹太人的数量而得到充分解释。我所强调的那种特别影响，可以用一系列复杂的理由予以解释。

正因为如此，我不急于过分强调这样一个虽说极其重要的事实，即美国犹太人事实上控制着许多重要的商业分支；实际上，即便说他们垄断着它们也不为过，至少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情况就是如此。只要看看小麦（特别是西部的）、香烟、棉花贸易，我们立即能发现，谁要是能在这三大行业中占统治地位，就必然会在整个国家的经济活动中起主导作用。尽管如此，我不想详尽阐述这个事实，因为我觉得犹太人对于美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远不止于此。

犹太人就像挂毯中的金线那样，贯穿在美国经济史的整个结构之中；由于他们复杂精细的奇思妙想，美国经济史从一开始就获得了一种独特的模式。

自从资本主义精神在新世界的海岸、森林和草原上第一次加速发展以来，犹太人就从未缺席过；1655 年通常被视为犹太人崭露头角的年代。[37]在那一年，从已经属于葡萄牙的巴西来了一船犹太移民，船停靠在哈德逊河上，这些乘客渴望获得许可，在荷属西印度 61
公司在那里建立的殖民地登陆。但他们不是卑微的恳求者。他们是作为在很大程度上参与了殖民地创建的一个种族的成员来的，殖民地总督被迫承认了他们的权利。当船舶抵达时，新阿姆斯特丹正由斯图文森统治，他对犹太人并不友好，如果按照他自己的意向办，他会当着这些新来者的面关上大门。但在 1655 年 3 月 26 日，他收到了来自阿姆斯特丹的公司总部写给他的一封信，信中要求他允许犹太人在公司治下的殖民地定居并开展贸易，“也因为他们已把大量资本投资于公司股份中了”。[38]不久，他们建起了通往长岛、奥尔巴尼、罗得岛与费城的道路。

接下来，他们多方面的活动开始了，正是由于犹太人，殖民地才能维持其存在。众所周知，多亏一系列有利的形势，英属北美殖民地逐步获得了一定的权力与力量，并最终走向完全的独立，今天的美国这个实体才成为可能。在这种优势地位的创建过程中，犹太人是其中第一批也是最热心的劳动者。

我所想的不是这个明显的事实，即殖民地只有在个别富有的犹太公司的帮助下才能取得独立，而这些公司奠定了新共和国的经济基础。如果没有犹太人提供军用物资和必不可少的军费，美国恐怕不可能取得完全的独立。但是，犹太人在这方面取得的成就并非源自美国特定的情况。这是在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历史中屡见不鲜的普遍现象，我们在讨论更广泛的问题时会公正地描述相关事例。

我想的不是上面这个事实；而是犹太人为北美殖民地提供的一 62
种特殊服务，一种只为美洲大陆提供的服务——它实际上成就了美

国。我指的是这个简单事实，即犹太人在17、18世纪从事的贸易，是殖民地经济体系赖以生存的血液。众所周知，英国强迫其殖民地从母国购买所需的一切制成品。因此，殖民地贸易通常出现逆差，而金钱源源不断的外流势必导致国家财政枯竭。但仍有一股溪流将贵金属带入这个国家，正是犹太人通过与中南美洲贸易，而将这股溪流引入了美国。英属殖民地的犹太人与西印度群岛、巴西维持着活跃的商业关系，这有利于他们所在的殖民地获得贸易平衡。南美开采的黄金因而被源源不断地运至北美，从而帮助北美的经济体系维持健康状况。[39]

面对这个事实，美国的存在应归功于犹太人的说法，难道不是不无理由的吗？如果此说能够成立，那么，对“犹太人的影响成就了今日美国”的这种说法还需要多说什么吗？不妨这么说，我们所谓的美国精神恰恰就是经过提炼的犹太精神。

但美国文化怎么会如此充满了犹太性？答案颇简单——因为第一批定居者当中很早就普遍混杂了犹太因素。我们多少可以将殖民过程勾勒如下。一群下定决心的男女——比方说20户——走进荒野去开始新生活。19户备有犁耙与镰刀，他们砍伐树木、翻耕土壤，过上了农耕生活。第20户开了一家商店，为同伴提供一些
63 从土地上得不到的生活必需品，并定然时常在他们门口兜售。不久，这第20户开始以分配其他19户从土地上收获的产品为业。也正是他们最有可能拥有现金，因而能在其他人需要时提供借贷。通常，该商店另设有一种农业贷款作为副业，可能还拥有一种买卖土地的职能。所以，通过第20户的活动，北美农民首次接触到旧世界的货币与信贷体制。因此，生产与交换的整个过程从一开始就使用了现代模式。这种方法立即传遍了所有村庄。因此可以说，美国经济生活从一开始就渗透着资本主义精神。那么谁应对此负责？每个村庄的第20户。不用说，这第20户总是犹太家庭，他们要么在最初就加入到一群定居者之中，要么很快将这些定居者从其农庄上找了出来。

这就是我设想的美国经济发展的概况。今后探讨这个主题的

作者可以添加更充分的细节；我自己只遇到为数不多的几个。但它们在特征上如此相似，以致不能视之为孤证。我们只能认为它们是典型的。而且不只我一个人持这种观点，例如，加利福尼亚州州长帕代尔在1905年说："他（犹太人）是数千个繁荣社团的主要金融家。他有魄力、有闯劲。"[40]

让我引述一些我遇到的几个例证。1785年，亚伯拉罕·摩迪凯定居于亚拉巴马州。"他在克里克人边界（Line Creek）以西两公里处建立了一所贸易站，与印第安人大做贸易，他用其货物交换驱虫草、山胡桃木、胡桃油和各种毛皮。"[41]奥尔巴尼的情况与之类似。"早在1661年，当它还是一个很小的贸易站时，一位名叫阿塞·利未（Asser Levi或Leevi）的犹太商人便已成为那里的房地产所有者。"[42]芝加哥的情况也一样。第一座砖制房屋由犹太人本尼迪克特·舒伯特建造，他还是芝加哥第一个商业裁缝，而另一个犹太人菲利普·纽伯格则首次引进了烟草业。[43]在肯塔基州，我们听说早在1816年就有了一个犹太定居者；那一年，合众国银行在列克星顿开办了一家分行，一个于1808年来到此地的所罗门先生当上了出纳员。[44]在马里兰州[45]、密歇根州[46]、俄亥俄州[47]及宾夕法尼亚州[48]，都有记录表明犹太商人属于最早的定居者，尽管人们对他们的活动一无所知。

64

另一方面，人们对得克萨斯州的犹太人了解很多，他们是那里的资本主义先锋。例如雅各·德·科尔多瓦"是美国1856年以前最大的土地勘定者"。科尔多瓦的土地代理机构很快不仅名闻得克萨斯州，而且闻名于纽约、费城与巴尔的摩，因为这些地方居住着得克萨斯州大片土地的拥有者。此外，莫里斯·科普勒于1863年成为得克萨斯国立银行的行长。亨利·卡斯特罗是位移民代理人，"在1843至1846年间，卡斯特罗为得克萨斯州引入了五千多名移民……用27艘船把他们运来，这些人主要来自莱茵河畔的省份……他养了这些移民整整一年，为他们提供奶牛、农具、种子、药品，总之把他们需要的一切给了他们"[49]。

有时，同一家族的分支散布于不同的州，这使得最大成功地开

展生意成为可能。或许这方面最好的例子是塞利格曼家族的历史。这个家族有八个兄弟(即巴伐利亚州拜尔斯多夫的大卫·塞利格曼的儿子们),他们开创的公司如今在美国所有最重要的中心都有分支。他们的事迹始于1837年约瑟夫·塞利格曼抵达美国,他的另外两个兄弟于1839年抵达美国,第三个兄弟则在两年后到达。第四个兄弟一开始在兰开斯特镇经营服装,不久就搬往亚拉巴马的塞尔玛。从这里开始,他们在另外三个城市开了三家分店。1848年,从德国又来了两个兄弟,第六个兄弟则北上。1850年,耶
65 西·塞利格曼在旧金山第一座砖制房屋中开了一家商店。七年后,这个家族在服装业外又发展了银行业。1862年,塞利格曼兄弟在纽约、旧金山、伦敦、巴黎以及法兰克福都有生意。[50]

同样在南部各州,犹太人在农业定居者中间也扮演了商人角色。[51]在这里(正如在中南美洲一样),我们可以发现他们很早就已成为大种植园主。实际上,在南卡罗莱纳州,"犹太人的土地"与"大种植园"是同义词。[52]正是在南方,摩西·林多作为首批从事靛青生产的人而闻名。

举出这些例子肯定够了。我们认为它们能够证明我们的基本观点,而犹太移民自美国建立以来便源源不断地涌入的这个事实也支持了这个观点。的确,没有确切数据可以表明犹太人口在移民总数中所占的比例,但我们发现的种种一般迹象却无疑表明,美国一直以来必定有大量犹太人。

必须牢记,在最早时候,殖民地人数很少,而且分散。新阿姆斯特丹的定居者不满一千。[53]因此,一旦一船犹太人从巴西来此定居,这里的光景便与先前大不相同,所以我们应该高度评价犹太人对于整个地区的影响。[54]再举一个例子。当佐治亚建起第一个定居点时,定居者中有四十个犹太人。这个数目可能不起眼,但一旦我们考虑到该殖民地匮乏的人口,犹太人的影响则想必很大。同样,萨凡纳在1733年只是一个小商业中心,但已有12户犹太家庭定居那里了。[55]

众所周知,美国很早就成为德国与波兰犹太移民的目的地。因

此，我们得知，“1825 至 1850 年间，在波森贫穷的犹太家庭中，几乎每个家庭至少有一个儿子（多数情况下是最有能力且最为进取的）漂洋过海，逃离那方狭小而压抑的故土”[56]。因此，我们不会因为相当多的犹太士兵（7243 名）[57]参加了美国内战而感到惊讶；我们应当倾向于认为，将 19 世纪中叶的美国犹太人口估算为 30 万（其中 3 万人居住在纽约）[58]，实在是非常适中的。① 66

① 这种估算并没有得到近期研究的支持。目前认为，在 1850 年时，美国犹太人口只有 5 万，占美国总人口的 0.22%；直到 1880 年，美国犹太人口的上限才达到 30 万，占美国总人口的 0.60%。参见乔纳森·D. 萨纳：《美国犹太教史》，胡浩译，郑州：大象出版社，2009 年，第 319 页。——中译者注

67

第五章　现代国家的创建

现代殖民体制的发展与现代国家的奠基，是两个互相依存的现象。没了其中一个，另一个也就无法想象；现代资本主义的诞生与两者都息息相关。因此，为了发现一种历史因素在资本主义发展中的重要性，就有必要揭示这种因素在殖民体制与现代国家的创建中发挥了何种作用，以及这种作用的大小。我们在前一章考察了犹太人与殖民体制的关系；本章将考察他们同现代国家的关系。

乍看之下，犹太人这个“没有国家”(stateless)的民族似乎最不可能对现代国家的创建产生影响。我们这方面能想到的政治家——查理五世、路易十一、黎塞留、马扎然、柯尔贝尔、克伦威尔、普鲁士的弗里德里希·威廉及弗里德里希大帝——没有一个是犹太人。[1] 然而，一旦谈到这些现代政治家与统治者，我们很难不去想犹太人：这就好像一谈浮士德就会想到梅菲斯特一般。犹太人与这些统治者并肩跨越了历史学家们所谓的现代时期。在我看来，这种联合是资本主义兴起的象征，因此也是现代国家崛起的象征。在大多数国家中，统治者充当了保护人的角色，即保护犹太人不受国家的三个阶层(即神职人员、贵族和市民)与行会——这些是前资本主义的势力——的迫害。这是为什么？因为他们的利益与他们的同情不存在冲突。犹太人体现了现代资本主义，统治者与这种力量结盟，乃是为了确立或维护自身的地位。因此，一谈及犹太人在现代国家创建中的作用，我所想到的，与其说是他们作为组织者的直接影响，不如说是他们在此过
68 程中的间接合作。我所想到的，是犹太人为正在崛起的国家提供了维持其生存与发展所必需的物质财富。我所想到的，是犹太人以两

种方式支持着每个国家的军队，而这些军队正是新兴国家赖以存在的堡垒。这两种方式是：一方面，犹太人在战争时期为军队供应武器、军需与粮食；另一方面，除军事目的以外，他们还为宫廷与政府的一般需要提供金钱。在整个16、17、18世纪，无论作为军队的供应者，还是作为君主们寻求财政支持的富人，犹太人都影响最大。犹太人的这种地位，对现代国家的发展有着最重要的意义。没有必要详细阐述这点；我们要做的是举出实例来证明它。在此，我们同样无法一一列举所有可能的例子。我们只能指示门径，以俟后续研究。

犹太供应商

尽管能在1492年以前的西班牙找到犹太人充当军事承包商的无数例子，但我将不提这个时期，因为它不在目前考虑范围之内。我们将限定在其后几个世纪，而这首先从英国开始。

在17、18世纪，犹太人已作为军事供应商而闻名。在共和国时期，最著名的军事承包商是“伟大的犹太人”安东尼奥·费尔南德斯·卡瓦哈尔，他于1630至1635年间的某个时刻来到伦敦，旋即成为当地最为杰出的商人之一。1649年，他成为受枢密院委托、专为军队供应粮食的伦敦五大商人之一。[2] 据说，他每年为英国输入价值10万英镑的白银。在随后时期里，尤其在威廉三世的战争期间，所罗门·梅迪纳爵士（“犹太人梅迪纳”[the Jew Medina]）被 69
称为“伟大的承包商”，他因表现出众而获封爵士，成为首位获此殊荣的公开信仰犹太教的犹太人。[3]

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期间，情况也是如此；犹太人这时仍是主要的军事承包商。[4]1716年，斯特拉斯堡的犹太人撤销了为路易十四的军队提供情报与军需的服务。[5] 实际上，路易十四的军事承包总管，是个名叫雅各·沃姆斯（Jacob Worms）的犹太人；[6] 在18世纪，犹太人在此项工作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突出。1727年，梅斯[①]的犹太人在六周之内，为这个城市带来了2000匹马作为食物，

① 梅斯（Metz），系法国东北部城市。——中译者注

另外又带来5000多匹战马。[7] 丰特努瓦战役的胜利者、萨克森的莫里斯陆军元帅曾表示，他的军队只有在犹太人充当军事承包商时，才获得了最好的供应。[8] 在最后两位路易皇帝当政期间，最著名的犹太军事承包商是瑟夫·比尔，其入籍证明记载着："……1770与1771年间在阿尔萨斯发生的战争中，他找到机会，热忱为我们的军队及国家服务。"[9]

同样，在18世纪，波尔多的加迪斯家族获得了国际声望。亚伯拉罕·加迪斯在魁北克建立了一些大仓库，为那里的法国军队服务。[10]在革命政府、督政府及拿破仑战争期间，犹太人一直充当军事供应商。[11]这方面，1795年在巴黎街头出现的一份公告具有重要意义。当时巴黎出现了饥荒，犹太人为感激革命赋予他们的权利，运进了大批粮食。公告作者说道，"他们只靠自己，就成功完成了这项事业，这多亏了他们的商业关系，而他们的市民同胞因此受益良多"[12]。另一起类似的事例来自德累斯顿。1720年，宫廷犹太人约纳斯·迈耶通过提供大量谷物（编年史家说有4万蒲式耳），将整个城市从饥饿之中拯救出来。[13]

70 在整个德意志地区，犹太人很早便成了军事承包商。让我们列举其中几位。比如16世纪的以撒·迈耶。1537年，红衣主教阿尔布雷希特鉴于时局之危险，将迈耶接纳为哈尔伯施塔特的市民，并嘱咐他"为我们的修道院供应精良的武器与盔甲"。又如约塞尔曼·冯·罗塞姆，他因为向军队提供钱财与军需，而于1548年获得御赐保护信。1546年的一份记录表明，波希米亚的犹太人为军队提供了长大衣与毛毯。[14]1633年，一位名为拉撒路的波希米亚犹太人收到一份官方声明，说他"亲自或者花钱为帝国军队取得了有价值的情报，并以向军队供应大量弹药与衣服为业"[15]。大选帝侯也因军事需要而求助于犹太人，莱曼·贡珀茨与所罗门·埃利亚斯是其大炮、火药等的承包商。[16]还能找到许多其他人：撒母耳·尤利乌斯在选帝侯萨克森的弗里德里希·奥古斯都当政期间承包了战马；著名的莫德尔家族于17、18世纪在安斯巴赫公爵领地充当了宫廷供应商和军事承包商。[17]总之，正如当时一位作家言简意赅

说的那样："所有承包商都是犹太人，所有犹太人都是承包商。"[18]

在这一点上，奥地利与德国、法国、英国并无不同。在利奥波德皇帝统治时期，获许重新定居在维也纳（1670 年）的犹太富人——奥本海默家族、韦特海默家族、迈耶·赫舍尔等等——都是军事承包商。[19]我们在奥地利统治下的所有地区看到了同样的现象。[20]最后，我们必须提及在美国革命与内战中为美军提供军需品的犹太军事承包商。[21]

犹太金融家

许多历史学家已探讨过这个主题，我们对各个时代犹太史的这个方面是基本熟悉的。因此没有必要对这个问题详加探讨，只需 71
列举一些众所周知的事实便够了。

我们发现，早在中世纪，各地的税收、盐矿以及王室领地，是转包给犹太人的；犹太人还担任王室的财务官与放债者，这在比利牛斯半岛当然最常见，在当地的犹太富人中，阿尔摩克阿拉菲家族（the Almoxarife）与伦德罗斯家族（the Rendeiros）常常被挑出来从事此职。但本书并不特别关注这段时期，因此我不打算提及任何名字，读者可以去看与这个主题有关的一般性文献。[22]

然而，正是在现代，也就是我们今天所知道的国家兴起的时代，作为君主们财政顾问的犹太人才产生了强大影响。以荷兰为例，尽管原则上禁止犹太人为王室服务，但他们很快就占据了重要的位置。比如摩西·马查多，他是威廉三世的宠臣；比如德尔蒙特家族，这个家族出了许多大使（舍恩伯格勋爵［Lords of Schoonenberg］）；又如 1688 年贷给威廉 200 万盾的富有的苏阿索等人。[23]

荷兰犹太金融集团（*haute finance*）的影响不仅仅局限在尼德兰境内，因为这个国家在 17、18 世纪仿佛是座宝库，欧洲所有缺钱花的君主都从中提款。平托家族、德尔蒙特家族、布埃诺·德·梅斯基塔、弗朗西斯·梅尔斯及许多其他人，事实上就是那个时期北欧的主要金融家。[24]

其次，犹太人也广泛控制着此时英国的财政。[25]长期国会[①]的货币需求，让犹太富人第一次有了在英国定居的动力。早在克伦威尔接纳他们之前，富有的秘密犹太人，尤其是来自西班牙与葡萄牙的这些人，便通过阿姆斯特丹移居到了英国：1643 年，这支移民队伍变得异常庞大。他们的聚会处位于葡萄牙大使安东尼奥·德·
72 索萨在伦敦的宅邸，索萨本人就是马兰诺。他们中间的佼佼者是上文提及的安东尼奥·费尔南德斯·卡瓦哈尔，无论作为军队承包商还是金融家，他都堪称伟大。正是他为共和国提供了大量资金。在斯图亚特王朝后期，特别是查理二世统治时期，这个侨民小群体进一步扩大。查理二世的葡萄牙新娘布拉干萨的凯瑟琳的随员中就有许多富有的犹太人，其中包括阿姆斯特丹的葡萄牙银行家达·席尔瓦兄弟，他们受委托而运输并管理王后的嫁妆。[26]同一时期与他们一起来到英国的，还有来自西班牙和葡萄牙的门德斯家族及达·科斯塔家族，两家以门德斯·达·科斯塔之名实现了联合。

大约同一时期，阿什肯纳兹（德国）犹太人开始来到这个国家。总体而言，这些人的财富无法与其塞法尔迪（西班牙）同胞相比，但他们也有自己的资本家巨头，便雅悯·利未即是一例。

在威廉三世统治时期，他们的数量仍在不断增加，这时宫廷与犹太富人之间的联系得到了加强。上文已提到所罗门·梅迪纳爵士，他作为国王的银行家与国王一起从荷兰来到英国，与他同行的还有苏阿索家族，这是另一个财阀家族。在安妮女王统治时期，英国最杰出的金融家之一是玛拿西·洛佩斯。在南海泡沫事件[②]爆发时，犹太人作为一个整体，已成为这个国家最强大的金融力量。他们避开了事件爆发前的狂热投机，从而保全了自己的财富。因此，当政府发行一笔土地税的贷款时，犹太人占据了其中的四分之

① 长期国会（Long Parliament），英王查理一世的最后一届国会，在空位时期（1649—1660 年）一直合法存在。——中译者注

② 指英国 1720 年由于南海公司倒闭而引起的一次财政危机。——中译者注

一。在这个关键时期，主要的犹太家族是吉迪恩家族，其代表桑普森·吉迪恩(1699—1762)成了“政府的委托顾问”、沃波尔的朋友、“国家信贷的支柱”。1745 年出现了经济恐慌，桑普森筹集了 170 万英镑的贷款以援助政府。他去世后，其影响力被弗朗西斯与约瑟夫·萨尔瓦多的公司继承，他们将这种影响力一直维持到 19 世 73
纪初，此后，金融界的领导地位便由罗斯柴尔德家族继承了。

法国的情况也类似。相关例子很多，其中一个是撒母耳·伯纳德，他在路易十四统治的后半期及路易十五统治的整个时期拥有重要地位。我们发现，路易十四常与这位犹太富人一起在御花园散步，“他唯一的价值”，在一位讽刺作家看来，[27]“就在于他像绳索支撑着受绞刑的人那样支撑着国家”。伯纳德为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筹措了资金；又为法国候选人争夺波兰王位提供了帮助；还在所有理财问题上给统治者提供了建议。因此，德·当若侯爵在其信中[28]将他说成是“当前欧洲最伟大的银行家”，这很可能并不夸张。在法国，犹太人也在很大程度上参与了南海泡沫爆发后法国东印度公司的重组活动。[29]然而，直到 19 世纪，他们才在法国金融界获得了真正的领导地位，这方面重要的名字有罗斯柴尔德家族、赫尔本家族、富尔德家族、瑟夫贝尔家族、杜邦家族、戈德肖家族、达朗贝尔家族、佩雷尔家族等等。有可能的是，17、18 世纪还有许多上面没有提到的犹太人也是法国活跃的金融家，但由于犹太人受到严重排斥，他们成了秘密犹太人；因此，我们没有关于他们的充分信息。

在德国与奥地利，犹太人在金融领域的影响更容易察觉，这要归功于那个聪明的发明——“宫廷犹太人”。尽管这些国家的法律禁止犹太人在其疆界内定居，但君主与统治者们仍在宫廷中留了许多享有“特权”的犹太人。根据格雷兹的研究，[30]“宫廷犹太人”是由德意志的君主们在三十年战争期间引入的。即使如此，一个毫无疑问的事实是：整个 17、18 世纪，几乎所有德意志邦国都拥有宫廷犹太人，而国家的财政正是依赖于他们的支持。

可以举一些例子说明。在 17 世纪，[31]我们在皇宫里发现了格 74
茨的约瑟·平科尔勒、格拉迪斯卡的摩西与雅各·马尔堡、的里雅

斯特的文图拉·帕伦特、布拉格的雅各·巴塞维·巴奇巴·施米勒，施米勒因为忠心耿耿而被费迪南德皇帝封为贵族，获得冯·特鲁恩伯格的头衔。在利奥波德一世统治时期，我们发现了受人尊敬的奥本海默家族，国务大臣路德维希对他们有过一个评价。[32]在说完犹太人是那些最重要事件的决定者之后，他继续说道："1690年，犹太人奥本海默不但在欧洲而且在全世界的商人与银行家中间遐迩闻名。"同一地区与之齐名的，尚有宫廷供应商沃尔夫·施莱辛格，他与莱维·辛茨海姆一道，为国家筹集了不止一笔巨额贷款。奥地利女王玛丽娅·特蕾莎也曾利用施莱辛格和其他人的效劳，特别是韦特海默家族、阿恩施泰因家族和埃希科勒家族。实际上，一个多世纪以来的维也纳宫廷银行家都是犹太人。[33]我们可以通过以下这个事实衡量他们的经济影响，当反犹暴乱在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爆发后，地方当局认为，为了信贷的利益而要求帝国政府出面干预并保护法兰克福犹太人，是明智之举，因为他们与其在维也纳的同胞有着密切的贸易关系。[34]

德意志较小邦国的宫廷也不例外。"各宫廷对奢侈品的需求在不断增长，它们之间还互相攀比，鉴于通讯交流绝非易事，在诸商业中心拥有熟练的代理人就变得非常必要。"因此，梅克伦堡的公爵们就在汉堡有这样的代理人；在法兰克福，摩西·埃尔肯于1700年为维尔茨堡的约翰·菲利普主教效劳。这种活动为犹太人开辟了新渠道：有进取心的经销商为贵妇们带来了珠宝，为宫廷内侍提供了制服，为大厨供应了山珍海味。他们自然也很乐意洽谈贷款。[35]法兰克福与汉堡有大批犹太人口，这里就有许多这样的金融
75 代理人，为住得远的当政君主服务。除已经提到的，我们还可举出葡萄牙犹太人但以理·阿本苏尔，他于1711年死于汉堡。他是波兰国王在那个城市的常驻公使，波兰王室的多笔贷款就多亏了他。[36]这些代理人中的一些，经常光顾那些向他们借钱的宫廷，因而成为"宫廷犹太人"。弗里德里希·奥古斯都于1694年成为萨克森选帝侯，他有许多宫廷犹太人，如汉诺威的勒夫曼·贝伦茨、汉堡的J. 迈耶、哈尔贝施塔特的贝伦德·莱曼（他为选举波兰国王预

先垫付了账款）等人。[37]在汉诺威，贝伦德家族再次成为宫廷供应总管及国库代理人；[38]莫德尔家族、弗伦克尔家族、拿单家族在安斯巴赫公爵领地也扮演了类似的角色。在横跨莱茵河中上游的巴拉丁领地（Palatinate），我们遇见勒姆特·穆瓦斯和迈克尔·迈，他们于1719年偿付了选帝侯欠皇帝的250万盾；[39]最后，在拜罗伊特的马格拉夫特有拜尔斯多夫家族。[40]

更有名的或许是勃兰登堡—普鲁士统治者的宫廷犹太人：约阿希姆二世统治时的利波尔德；弗里德里希三世统治时的贡珀茨与约斯特·利伯曼；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统治时的法伊特；弗里德里希二世统治时的以法莲、摩西、以撒与但以理·埃特茨格。在所有德意志宫廷犹太人中，苏斯·奥本海默最著名，也可作为这些人的典型，他是维腾堡的查理·亚历山大的宫廷犹太人。[41]

最后不能不提的是，在18世纪，尤其是在革命战争期间，犹太人作为金融家在美国扮演了并非无关紧要的角色。海姆·萨洛蒙[42]与佐治亚州的米尼家族和科恩家族地位相当，[43]但他们中最突出的是罗伯特·莫里斯，他是美国革命中出类拔萃的金融家。[44]

接下来的发展更加特别。虽然几个世纪以来（特别是在对现代国家的发展尤为关键的17、18两个世纪）犹太人与统治者进行了私人金融交易，但在接下来的19世纪中（甚至在已经提到的两个世纪中），公共信贷体制逐渐呈现出新的形式。这迫使大资本家的主导地位越来越削弱，其地位被越来越多的各类债权人取代了。随着现代短期贷款方式的演进，公共信贷可以说被“民主化”了，其结果便是不再需要宫廷犹太人了。但犹太人自己也大大促进了这种新型借贷体制的发展，所以他们自己也为消除他们对金融家的垄断作出了贡献。在这样做的时候，他们比以前在更大程度上参与了现代国家的创建。 76

公共信贷体制的转变，只是一个巨大变化的一部分，而这个变化逐渐影响了整个经济生活，犹太人同样在很大程度上参与了这场质变。现在，让我们全面考虑这种变化。

77

第六章　商业在经济生活中的主导地位

众所周知，现代社会中的证券交易所越来越成为一切经济活动的中心。随着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这成了大势所趋，在此过程中出现了三个显著的阶段。首先是信用从私人事务转变成一种非私人关系，它以证券的形式出现。在第二个阶段，这些证券开始流动，即在市场上买进卖出。最后一个阶段则是旨在创造这些证券业务之形成。

在所有这些阶段中，犹太人及其创造性天赋都随处可见。我们甚至可以进一步说，恰恰是由于这种犹太精神，这些现代经济生活的种种特征才得以形成。

证券的起源[1]

证券代表着个人债务的标准化。[2]我们可以从这种意义上论及“标准化”：当一种关系由起初的私人层面转向非私人层面；人们之前彼此之间直接发生关系，而现在则通过制度来实现。举一两个例子将会使我们的意思变得清楚。过去由人力从事的工作，现在被机器取代，这就是劳动的标准化。在古代，战争的胜利取决于将军指挥过程中出众的个人能动性；而现在，胜利属于那些最能熟练运用多年积累的经验并使用复杂战略战术的领袖，属于那些拥有最先进的武器并能够为其士兵提供最有效组织的给养的人。我们
78 可以说，这就是战争的“标准化”。一旦既直接接触雇员又直接接触顾客的公司主管为董事会所取代，而董事会之下有一大群按计

划开展工作的行政人员，那么企业也就标准化了，企业活动由此差不多变成了一个自动的过程。

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某个特定阶段，信用开始标准化；也就是说，以前债务源于两个彼此认识的个体之间的协议，现在则是在制度的基础上被重新组合，相关人员彼此之间可能完全不认识。这一新型关系的形式是流通票据，不论是汇票、证券、纸币或按揭契据，仔细对它们一一分析，将会确证这点。

在一张汇票提到的三个人中，指定的汇票受益人（收款人）或者——如果没有提及名字的话——持票者可能与另外两人并不很熟悉；他可能与填写汇票的人（开票人）没有直接的商业关系，然而这份凭据却建立起了前者对后者一般性与非私人的权利。[3]

证券使所有人有权参与某公司的资本与利润，而不必和该公司有直接的私人接触。他可能从未见过此项交易发生的场所，一旦他将其证券转让给其他人，他也就转让出了他的参与权。

纸币亦如此。持有人有权要求发行纸币的银行付款，尽管他自己实际上可能没有在银行存过一分钱。

因此，一切信用票据皆是如此：一边是个人或者公司（借款人），一边是未知的群体（我们所谓的“公众”）即贷款人，两者之间非私人的关系就这样建立起来了。

在这种信用机制的创建过程中，犹太人发挥了何种作用？即使我们已充分叙述了犹太人在许多地方早期经济史中的地位，但要 79
通过文献证据来展示这一点，仍是十分困难或不可能的。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对于解决这个问题有着重要价值，但不幸的是，它迄今为止被严重忽略了。我指的是中世纪最后几个世纪比利牛斯半岛的货币史与银行史，但即使这段历史可以任由我们支配，这一问题仍将难以回答。我们必须记住，经济组织的起源与法律制度的起源一样，都不能仅仅凭借文献证据而被发现。经济生活中的任何组织形式或发展趋势，都不能追溯至某一特定的日期甚至某个特定的年份。它完全是个发展问题，经济史家所能做的，往往是揭示在某个特定时期内，这种或那种特征在商业生活中出

现了，这种或那种组织主导了一切经济活动。即便要实现这个目标，我们掌握的极有限的材料也不够用。历史学家将不得不求助于他所感兴趣的特定群体的通史。

举例来说，我们不能仅仅通过利用碰巧得到的几张中世纪汇票，就来书写汇票的历史。此类文件确实有助于补充或纠正一般的理论。但我们必须首先形成一般的理论。让我们举一个相关例证。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人们认为最古老的汇票是由犹太人西蒙·鲁本斯于1207年开出的。但并不能就此而充分断定，犹太人是这种信用票据的创始人。[4] 最近又发现了比这更早的一些汇票，它们由非犹太人开出，但这也不足以证明，犹太人就不是汇票的创始人。我们能否知道在佛罗伦萨或布鲁日[①]究竟流通着几千张汇票，我们如何确定是哪群人发行了它们？然而，我们确实知道，犹
80 太人占据了整个中世纪的货币交易，他们居住在欧洲各地，彼此之间交流不断。依据这些事实，我们差不多可以得出这个结论："作为国际贸易的中间人，犹太人大规模使用了外汇机制，它传统上流行于地中海国家，后来又扩展至其他地区。"[5]

不言而喻，这种推理方法需要慎之又慎。然而，由此却可以得出有用的结论。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犹太人参与了某些经济策略与机制的扩展，这得到许多文献记录的佐证。在众多其他事例中，我们只能考虑这样一些，即它们可以证明，在某个特定时间和某个特定地点，犹太人必定因为某种特殊原因而使用了当时流行的某种经济组织形式。

带着这个原则，我们就来探寻一两种信用票据的起源。

1. 汇票

我们最关心的，不仅仅是汇票的早期历史，更是现代可以背书转让的汇票的历史。一般认为，在17世纪以前，汇票的背书就已获得充分发展；首次在法律上对这种背书制度的完全认可，出现在荷兰（1651年1月24日阿姆斯特丹的公告）。[6] 现在我们要论述的

① 布鲁日（Bruges），今属比利时，原为佛兰德早期诸伯爵的首府。——中译者注

是，17 世纪荷兰货币与信贷体制的所有发展，或多或少都受了犹太人的影响。一些专家将可背书转让的汇票的起源追溯至威尼斯，因为当地 1593 年 12 月 14 日的一项法律宣布这是非法的。[7] 由于威尼斯的全部证券经纪在 16 世纪几乎由犹太人完全控制，因此可以相当确定，犹太人肯定在威尼斯首先使用了可背书转让的流通汇票。1550 年，在威尼斯基督徒商人的一份请愿书中（上文已经提及），有关犹太人汇票业务的段落如下：[8] 81

> 我们也像他们那样从事兑换，因为他们不断地向我们汇款……将现金送来，以便通过我们的交易所将之兑换成里昂、佛兰德以及世界其他地区的货币；或者，我们甚至为了方便他们，而为他们购买丝质布料与其他商品，从中抽取我们惯常的佣金。
>
> 这些佛罗伦萨犹太居民的情况，也适用于同样来自西班牙与葡萄牙的其他犹太商人，这些人逗留在佛兰德、里昂、罗马、那不勒斯、西西里和其他地区，他们尽力与我们做生意，不仅从事兑换活动，而且将佛兰德的货物运到这里，出售来自西西里的谷物，并购入其他货物以运往其他国家。

汇票的背书看来在 16 世纪热那亚的集市上获得了进一步发展。我们要问，谁是那个世纪处处可见的“热那亚人”，他们尤其出没于著名的贝桑松集市，支配了当地的货币市场？谁又突然显现出非凡的商业才能，并推动了迄今未知的抵消国际债务的新方法的发展？热那亚那些古老而富有的家族，确实是西班牙王室及其他贫困君主们的主要债权人。但是，认为格里马尔迪家族、斯皮诺拉家族、莱尔卡拉家族的后代展示了这种非凡商业才能，从而赋予 16 世纪热那亚的商业活动以独特的特征；认为这些老资格的显贵会游荡在贝桑松或者其他集市上，甚或一直有规律地把他们的代理人定期派到这些集市来——这些在我眼里都是没有很好理由的 82
假设。能否解释是犹太人给热那亚衰老的经济体注入了新鲜血

液？我们知道，[9]从西班牙逃出来的犹太人曾在热那亚登陆，其中有些定居者变成了基督徒，剩下的则被热那亚附近一个小镇诺维(Novi)所接纳，而诺维的犹太人和热那亚有生意往来；我们还知道，新来者“绝大多数是聪明的犹太工匠、资本家、医生”，从到来至1550年的短短时间内，他们在热那亚非常不受欢迎，以致引起了市民们的仇恨；最后我们也知道，热那亚的银行家与西班牙诸城市的犹太(或马兰诺)银行世家——例如塞维利亚的主要银行家埃斯皮诺萨家族——之间往来频繁。[10]

2. 证券(股票与股份)

在14世纪[11]的热那亚公共债务(Genoa Maones)、圣乔治银行(Casa di San Giorgio，1407年)以及17世纪的重要贸易公司中，商业公司的资本被划分成许多部分，资本家承担有限的责任，在此种情况下，我们有充分理由谈论证券。但如果强调的是信用关系的标准化，那么我们直到18世纪才发现股份企业和证券的事例。这是因为早期对股份企业的出资，从未丧失私人特征。意大利山脉中充满了其创始者的个性。就热那亚公共债务而言，私人因素与金融因素一样重要；在热那亚的圣乔治银行，有关家族谨守这项原则，即每个人都有权指导银行的事务。贸易公司也有同样强烈的私人因素。比如在英属东印度公司，直到1650年，才允许将股份转让给陌生人，但后者必须成为公司成员。

在所有早期的事例中，证券的额度不等而多样。因此，私人关
83 系便清晰地显露出来。在一些公司，除非得到所有其他成员的同意，股份根本不能转让。事实上，证券只是成员身份的一种凭证，在整个18世纪，此类以某个人名义发行的证券占据了主流。[12]即使有将证券从一个人转让给另一人的自由(如荷兰东印度公司)，这个过程仍充满了无数的障碍与困难。[13]

因此，在18世纪之前，不存在现代形式的证券。如果有人现在问起犹太人对这种现代信用形式扩展有何贡献，答案再明显不过了。在持股人和其所参与的公司之间，以前仅仅是纯粹的私人关系，但在过去一百五十年或者二百年间，犹太人大大促成了这种关

系的标准化。然而，必须承认，我无法用直接证据来支撑这个论点。但相关证据虽然间接，却颇有决定性。犹太人是伟大的投机商，而投机势必要替代证券，因为证券持有者是指定好的，投机则没有这类限制。故略加反思就可发现，犹太人必定对证券的标准化产生了不小影响。在某些情况下，甚至可以证明，正是投机才使得证券的面额从不等转向等额。荷兰东印度公司就是个恰当例子。它起初发行的股份，面额各种各样；后来则只发行 3000 弗罗林的股份。[14]

3. 纸币

关于纸币首次使用的确切时间，有许多不同的观点。依我看来，这里还是要强调标准化。任何银行家首次在没有提到某笔特别存款的情况下发行钞票，一种新型的信用票据——现代纸币——便诞生了。在此之前很久，纸币就已存在，[15]但它们写有存款者的名字，表明是他的钱。[16]我认为，私人性质的纸币变成一般性的（非 84
私人的）纸币，极有可能始于 15 世纪之初的威尼斯。那时已有记录表明，银行开始使用书面允诺，来偿付和预支寄存在它们那里的金额。早在 1421 年，威尼斯市参议院的一项法令便认定，以此种单据进行交易为违法。[17]1400 年，建立银行的首个许可证颁给了两个犹太人，而他们取得的巨大成功令贵族们纷纷效尤。[18]问题在于，这两个犹太人能否被视为现代（非私人的）纸币的先驱？

但是，或许没有哪个公司引进过这种新型纸币。它的存在可能是为了满足某些地方的需要。尽管如此，如果我们将城市——最早的银行正是在这里获得高度完善的——作为其起源地，肯定还是适当的。依此来看，威尼斯自然当之无愧。威尼斯此时是座犹太人的城市，而这正是让我们感兴趣的。根据 1152 年的一份名单，威尼斯那时至少有 1300 名犹太人。[19]到 16 世纪，他们的数量大约为 6000 人；犹太制造商雇佣了 4000 名基督徒工人。[20]这些数据当然没什么科学价值，但它们却表明，威尼斯犹太人的数量肯定很多。从其他史料中，我们可以得知他们的一些活动。我们在最重要的银行家中发现了犹太人——最有影响的家族之一是利帕曼家族；正

如上文已经注意到的，威尼斯的基督徒商人在1550年提到，如果禁止他们与马兰诺贸易，他们也会迁出威尼斯。

马兰诺尚在西班牙时，或许就已创立了银行业，这是有可能的。尽管许多作者讨论过这一问题，我们还是没有令人满意的证据。[21]极有可能的是，在采取反对他们的措施之时（16世纪），犹太
85 人就已是比利牛斯半岛的主要银行家。如果真是如此，犹太人此前已从事银行业的假设不也是合理的吗？

而且，在17世纪各地建立的银行中，犹太人都充当着突出而积极的角色。他们参与了那一时期三大银行——阿姆斯特丹银行、英格兰银行与汉堡银行——的创立。但这三大银行没有一家的起源纯粹是由于商业因素，因此我不打算强调它们与犹太人关联的重要性。尽管如此，这些事实却是有趣的，因此我要说的是，犹太人在创立阿姆斯特丹银行时获得的经验，对1619年汉堡银行的创建很有用。不下40个犹太家族在这个新公司中持有股份。至于英格兰银行，研究其历史的最新权威[22]也赞同这个提议：它是由来自荷兰的犹太移民创立的。

4．公债[23]

最早发行的公债，仅由某些放债个体经营；很久之后，它们才变成“普通的”票据。举个例子，在奥地利，直到1761年《债权法》颁布后，债券才附有息票，持票人才有权收取利息。[24]而在此之前，债券的性质是一种私人协议；国王或国库是某些放债者的债务人。[25]

很难估计犹太人对公共信贷的“标准化”到底起了多大作用。但也有很多确凿的例证：威廉三世的顾问是犹太人；德意志诸邦国公共借贷的创立效仿了荷兰模式，而这极有可能受到荷兰犹太人的影响，正如前文所示，他们是德意志、奥地利各地的主要银行家。一般说来，18世纪的荷兰犹太人与欧洲金融最密切相关。[26]

86 至于私人借款债券或抵押契据，我们很少知道它们的历史，因此几乎无法在此估算犹太人的直接影响。但从间接意义上说，犹太人很可能是这些信用票据尤其是抵押契据的创始者。有记录表

明，自18世纪中叶以来，荷兰银行家把钱预先垫付给殖民地的种植园主，为其种植园担保。此类抵押契据在证券交易所中如同公债一样进行买卖。处理这些事务的银行家称为“信使”(*correspondentie*)或者“谈判经理”(*Directeurs van de negotiatie*)，而这些票据本身叫“债券”(*obligatie*)。在18世纪70年代经济暴跌之前，有价值不少于1亿盾的单据在流通。[27]

必须承认，我并未发现任何证据提到犹太银行家参与了这些投机。然而，即便是对18世纪荷兰货币市场了解最少的人，也不会怀疑犹太人必定对此种商业很感兴趣。在当时的荷兰，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正如下文要表明的)是，与放债——尤其是与股票、股份及投机——相关的任何事情，都带有犹太特色。这个结论又由于这个事实而显得更有说服力，即大多数银行抵押业务是通过苏里南殖民地[①]而开展的。在已经提及的价值1亿盾抵押契据中，有6000万来自苏里南。正如上文所述，苏里南是最典型的犹太殖民地。苏里南与其母国的信用关系是由非犹太机构维持的可能性几乎不存在。

这些就是有关犹太人在现代信用票据发展中的作用的一些“原始材料”。总数并不多，需要后续研究加以增补。但我还是认为，相关证据足以让我们得出这个结论：犹太人为现代信用的标准化作出了不小贡献。如果我们思考一下标准化得以产生或至少是变 87
得便利的方式，这种印象就会加深。我指的是这些信用票据的法律形式，这极有可能源自犹太人。

关于信用票据的起源，法定票据(legal documents)史的专家们尚未达成一致意见。[28]但在我看来，将它们的现代形式归于犹太人的影响，是很有道理的。我们应当记住，这种票据首先在商人中间使用，而他们之中的犹太因素并非无关紧要。这种日渐流行的形式获得了司法裁决的认可并最终载入成文法，大概是在荷兰首先出现的。

---

① 苏里南殖民地即荷属圭亚那。——中译者注

唯一的问题是，我们能否从拉比法中推导出现代信用票据？我认为能。

首先，《圣经》与《塔木德》中能找到信用票据。《圣经》中的有关段落在《多比传》第4章20节，第5章1、2、3节，第9章1、5节。

在《塔木德》中的最著名段落如下（*Baba Bathra*，172）："在拉比胡纳的法庭上曾出示过这样一份文件：'本人某甲，是某乙的儿子，曾向你借了一笔钱。'拉比胡纳判决如下：'向你'可以理解为'向流散地领袖甚或是向国王本人。'"

其次，在后来的犹太律法以及犹太商业实践中，信用票据相当普遍。就实践而言，没有必要找出专门的证据；至于理论，让我提及一些讨论过这个问题的拉比。[29]

最重要的是拉本努·亚设（Rabbenu Asher，1250—1327），他在其《答问》（*Responsa*，lxviii. 6，8）中曾提及流通票据。"如果甲将钱转给乙与丙，并在其单据上记下'应付给持有人乙与丙'，那么必须因此而支付。"拉比约瑟·卡罗也在其《裁决的胸兜》（*Choshen Mishpat*）[①]中写道，"如果单据无记名，但上面指示'支付给持有人'，那么谁持有单据，谁就接受支付。"（lxi. 10；另见 l.；lxi. 4，10；lxxi. 23）拉比萨巴泰·柯亨在《祭司之唇》中也持有同样观点（*Shach*，l. 7；lxxi. 54）。

88 第三，犹太人在经商过程中，很可能在拉比法之外独立发展出了一种信用票据形式，它的措辞是非私人与一般性的。我指的是"幔利"（*Mamre/Mamram/Mamran*）。[30]这种单据据说首次出现于16世纪甚至更早的波兰犹太人之中。它有固定形式，但在担保人姓名一栏，有时也在涉及的数额一栏留有空白。毫无疑问，这种流通了三个世纪的单据十分流行，甚至也在基督徒与犹太人之间流通。作为证据，其价值在于它们已经具备了现代证券的所有特征：（1）持有人通过背书使单据得以流通；（2）没有提及债务人与债权

① 《裁决的胸兜》（*Choshen Mishpat*），为约瑟·卡罗所编犹太法典《布就筵席》的第四部分，有关财产及其责任、损害等方面的法规。——校注

人之间的私人关系；(3)债务人不会请求背书或转让的证明；(4)如果债务人偿还债务时没有出具此前发给他的“幔利”，那么可以认为他并未真正偿还债务；最后，(5)单据的撤销几乎与今天一样——如果单据遗失或被盗，单据持有人应通知债务人；要在犹太会堂贴出一个为期四周的公告以广而告之，票据持有人应在此期间主动前来作证；四周后若无情况，债权人就有权要求债务人付款。

第四，在许多重要法律实践的发展过程中，犹太人的影响看来很大。下面举一些例子。

(1) 在16世纪，欧洲不同地区流通着姓名一栏为空白的信用票据。它们的起源是什么？它们是否有可能源自犹太商业圈，是出于对“幔利”模式的模仿？它们在尼德兰[31]、法国[32]与意大利[33]随处可见。在尼德兰，它们出现于16世纪初安特卫普的集市上，也正是这个时期犹太人开始在其中变得突出。1536年的一项法令明 89
确规定：“在安特卫普集市上用于商品支付的期票，可以不经特别许可而转让给第三者。”从其措辞来看，通过接收票据来支付货物的实践是一种新形式。这些票据是什么类型的单据？它们会不会是基督徒的“幔利”？在一个世纪后的意大利，犹太人越多的地方，这种票据就越流行。我指的是第一张著名的“公开”票据，它由米兰的犹太票据经纪人吉迪蒂发行。这张票据面额500斯库多[①]，在威尼斯的马库斯·施图登德鲁斯的私人要求下，由约翰·巴普蒂斯特·格尔马努斯于诺维的下一个交易日按他接受到的价值偿付。施图登德鲁斯将票据交给博洛尼亚的德·扎尼奥尼兄弟，“上面有他的签名，最后还留有足够填写金额的空白，以及德·扎尼奥尼兄弟指定的收款人姓名。”这个事件的记录者如此评价：[34]“如果没有某个可供仿效的模范，意大利的金融交换很难想到使用这种便利形式。这个模范被发现于法国，不记名债券自17世纪以来就已在那里普遍流通。”问题立刻出现了——这种单据是如何在法国

① 斯库多(scudi)，19世纪以前的意大利银币单位。——中译者注

产生的？荷兰的例子能否予以解释？甚至在意大利这也可能是受马兰诺的影响——威尼斯的施图登德鲁斯(?)与米兰的吉迪蒂！

(2) 1582 年的安特卫普习惯法，对现代信用票据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它首次承认了票据持有人有权在法庭上起诉。[35]这个概念迅速从安特卫普传播至荷兰——实际上，其速度与来自比利时的犹太难民在荷兰定居一样迅速。[36]

(3) 德意志地区首个采纳信用票据的邦国是萨克森。1747 年，一个名叫比朔普菲尔德的投机商，向财政大臣提出一项公债计划，而比朔普菲尔德当时正与荷兰犹太人交往。[37]而且，1757 年 9
90 月 20 日的一项法令，禁止荷兰犹太人对萨克森政府的股票进行投机。由于萨克森王室与波兰王室之间的关联，这一切都指向犹太人的影响——一方面是荷兰犹太人，另一方面是波兰犹太人。其影响是如此巨大，以致一位专家得出这个明确结论："幔利"已成为信用票据的模型。[38]

(4) 在需要填入持有人姓名的单据中，我们必须包括海上保险单。据记载，亚历山大里亚的犹太商人，率先使用了诸如"*o qual si voglia altera persona*"("或给任何其他想要的人")、"*et quaevis alia persona*"("和任何其他人")及"*sive quamlibet aliam personam*"("或任何其他人")这类套语。[39]

为什么亚历山大里亚的犹太商人采用这种法律形式？这个问题的答案极其重要，尤其是因为我相信我们所寻找的原因内在于犹太人的生活状况之中。

(5) 这导致了我的第五个思考。为信用票据设定一个恰当法律形式的做法，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犹太人的利益，甚至在某些方面仅是为了犹太人的利益而为。是什么原因驱使亚历山大里亚的犹太商人向持有人开立保险单？这是基于对其货物命运的担忧。犹太船只冒着被基督徒海盗与天主教君主舰队俘获的危险，因为一旦被捕获，犹太人与土耳其人的货物将被他们视为合法的战利品。因此，亚历山大里亚的犹太商人在保险单中填写一些虚假的基督徒名字，如保罗、斯奇皮奥或其他任意写的名字，当货物抵达

后，凭借其保险单中的“持有人”套语来接受货物。

在整个中世纪，同样的原因是多么频繁地驱使着犹太人！他们是多么频繁地努力采取一些策略，以便隐藏这个事实：他们就是从远方运来的金钱或商品的接受者。很自然地，对于那种允许“持有人”索要单据所赋予的权利的法律形式，他们一概欢迎。一旦某个地区的犹太人遭受猛烈迫害，这种方法就使得财富转移成为可能。 91
它使犹太人可以在任何他们想要的地方存钱，而不论何时面临危险，他们都能够通过一些虚假的代理人，或者通过不留痕迹地变换以前财产的所有权来转移它。[40]看起来令人费解的是，尽管整个中世纪犹太人在短期内被剥夺了“所有”财产，但他们很快又富起来。依照我们的提示，这个问题很容易解释。实际上，犹太人从未被罚没“所有”财产；当国王的压榨过于严厉时，他们就将大部分财富转移到了一个虚假的所有人手中。

后来，当犹太人开始从事证券与商品投机时（这点我们将在下文看到），可以设想他们会扩展票据这种形式（尤其是证券）的用途。[41]很显然，如果一大笔贷款由大量相对较小份额的捐助人认购，不记名债券将会提供各种便利。[42]

一位拉比的评论决定性地证明了这一点。在拉比萨巴泰·柯亨的评注中有一段十分典型的内容。他说：“如果债务人还债时没有获取收据，那么债券购买人可以向债务人请求损失赔偿，原因是由于交易没有公开，这种做法对以此类信用票据进行的交易是有害的。实际上，对于由拉比引进以扩展商业的各种信用票据（*Shetarot*），拉本努·亚设及其学派没有发表任何观点。这是由于转让的困难，使得以此类信用票据进行的交易并不普遍。但权威们只考虑到私人契约。就不记名债券而言，它在目前（17 世纪）的流通要比商品广泛得多。人们应当遵守拉比们为了扩展商业而制定的所有法令。”

（6）在此我们又触及一个重要问题。我认为，如果我们考察有 92
关不记名债券及类似信用票据的全部犹太律法，就会发现——这也是我的第六点——这种证券源自犹太律法的最深层精神，但它们却

与日耳曼法及罗马法的精神格格不入。

众所周知，罗马人的债务概念是严格私人性质的。[43]“债务”(*obligatio*)是特定人们之间的契约。因此，债权人不能将其权利转让给其他人，除非是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事实上，在后来的罗马法中，对代理与转让理论的解释开始自由起来，然而这个问题的根本即私人关系仍未改变。

在日耳曼法中，契约同样是私人性质的；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比罗马法的规定更加私人化。在这一点上，日耳曼法的规定十分明确：债务人仅有向最初保证过的债权人偿还债务的义务。转移债权是不被允许的——英国法律的这一规定一直持续到1873年。只有当罗马法在德国获得强烈认可后，债权的转让才开始流行起来。它采取的形式是“不记名债券”——这是非私人信用关系的体现。

无可否认，一切“不记名”工具之下的法律概念——它代表着每个后继持有人的有效权利——不论在古代世界还是在中世纪，都没有获得充分发展，[44]但这并没有考虑犹太人的律法。犹太律法无疑精通非私人的信用关系。[45]它的根本原则是，可以向未指定的有关者设定责任，即你可以与任何人交易。让我们更加仔细地考察这个原则。

犹太律法并无与责任有关的条款，它只有“债务”(*Chov*)与“需求”(*Tvia*)的概念。它们之间各不相同。需求和承诺必须与一些
93 具体事物相关，而这为获得的象征性行为所证明。因此，对于需求的转让或者通过代理人达成协议，不存在法律障碍。因而没有必要对受让人加以限定，当事人通过获得某些商品而为人知晓。实际上，权利是针对物而非针对人的。只有在维持私人关系时，持有人才对其所有物负责。由此，责任的概念可能针对某些特定个体，也可能针对整个人类。因此，责任的转让仅受单据转让的影响。

奥尔巴赫的观点说明了许多问题。与罗马法和日耳曼法相比，犹太律法在这方面更抽象。犹太律法能够设想一个非私人的、“标

准化”的法律关系。某种信用单据——例如现代不记名债券——可能源自犹太律法系统，这并非是过分的假设。因此，为支持我的假说而举的所有外部原因，都可以由被称为“内在”的原因予以证明。

那么，这个假说是什么？它就是现代不记名债券的起源主要是受犹太人的影响。

证券的买进与卖出

1. 一部规范交易法典的演进

从现代证券中可以看到，它是经济生活具有商业特征的最清楚的表达。证券是用来流通的，如果不进行买卖，就发挥不出它们的真正用途。当然，可以这么强调，存放在安全保险柜中的许多证券为其持有人带来了收益；对其持有人而言，证券是达到某种目的的手段，而不是进行交易的商品。对此存在着许多争议。不流通的证券事实上并非证券，期票[①]同样可以替代它。证券的典型特征就 94
是方便买卖。

如果容易转手是证券的真正存在理由，那么便利这项活动的一切事情都极为重要，因而最重要的是要有一部合适的法典。它在何时是合适的？即当它使得两个自然人之间或者一个自然人与一件商品之间的关系发生可能的迅速变化之时。

在每件商品往往由同一个体所持续拥有的社会中，法律将努力确定人与物之间的各种关系。另一方面，如果某群人依赖于对商品的持续获得而存在，那么法律体制将保证商品交易的进行。

在现代社会中，高度组织化的交流体制，尤其是各种债券与信用票据的交易，便利了旧法律关系的废除，以及新法律关系的产生。然而，这却有悖于罗马法与日耳曼法的精神，因为这两者均为商品转手设置了障碍。实际上，在这两种体制之下，任何不严格依

① 期票，一种短期信用票据，包括一个书面的协议，由出票人书面承诺即期或在某一将来的日期向持票人支付一定金额。它们通常是可协商的，并且可以通过担保品抵押得到保障。期票从中世纪起开始在欧洲使用。——中译者注

照法律而被剥夺掉所有权的人，均可以向现持有人重新要求所有权，而无需支付任何补偿，即使其诚意获得了确认。另一方面，在现代法律中，只有在原所有人支付给现持有人其购买时所付的价钱时，原所有人才能重新取得所有权，即原所有人不对现持有人作出补偿是不可能的。

如果真是如此，与旧体制格格不入的原则如何得以进入现代法律之中？答案是它极有可能源自犹太法典，在犹太法典中，有利于交易的法律已经是旧体制中必不可少的部分。

在《塔木德》中，我们看到物品的现持有人已受到保护，不为原所有人追索。我们在《密释纳》(*Baba Kama*，114*b* 与 115*a*)中读
95 到，“如果任何人在住所被盗后，发现其书本与家具为其他人拥有，那么后者必须宣誓，声明他为购买这些物品支付了多少钱，而原所有人在支付这些钱后，可以重新取得对这些物品的所有权。但如果未发生盗窃，则无需这道程序，因为此时便假定原所有人将这些物品售予了另一人，而现持有人购买了它们”。因此，在任何情况下，现持有人都获得了赔偿；在某些特定情况下，他可以不费周折地保留所有物。的确，《革马拉》对本段中的讨论并无定论，但一般来说结论都一样：现持有人必定得到“市场的保护”，而原所有人必须向他付钱。

因而，《塔木德》对待交易的态度是友好的，犹太人在整个中世纪都采纳了这点。但事实不止于此——这正是问题的重点所在——在有关犹太人的案件中，他们很早就成功地使基督徒法庭承认了这项原则。许多世纪以来，犹太人制定了一项规范取得动产的特别条款；在 1090 年国王亨利四世对施派尔(Speyers)犹太人发布的一条“特权令”中，这一条款首次获得了官方承认。“如果某件物品被盗，”我们在其中读到，“并发现其为一位犹太人拥有，而这位犹太人宣称他购买了这件物品；那么，就让他依照其律法起誓他为它支付了多少钱，如果原所有人支付了这个价钱，犹太人就要将此物返还给原所有人。”不仅在德意志地区，其他地方[46](法国大约在 12 世纪中期)也可见到这项针对犹太人的特殊

法令。[47]

2. 证券交易所

说了这些之后，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为信用票据建立一个适当的市场，而证券交易所满足了这一目的。由于在那里进行买卖的商品都是所有权的非人格体现，这种交易就摆脱了它的私人特征。实际上，这是证券交易所区别于其他市场的一个特征。商业活动 96
的基础，不再是商人基于私人经验对同行作出值不值得信赖的判断，而是对信用的一般的、抽象的估价，是“证券交易所的意见”(*ditta di Borsa*)。价格的形成不再取决于交易中两三个商人的讨价还价，而是取决于一个机械的过程，它代表着无数单位的平均值。[48]

至于证券交易所的历史(从最广义上讲)，可以分为两个时期：(1)16 世纪初至 18 世纪末，是其形成和发展期；(2)自 19 世纪至今，证券交易所主宰着一切经济活动。

如今广受认可的是，证券交易所的起源很可能与证券经纪人联系在一起。[49]16、17 世纪率先出现的著名交易所，之前皆以从事活跃的证券交易著称。

对我们而言重要的是，证券交易所刚刚形成之时，犹太人几乎就已经完全垄断了证券经纪业。实际上，在许多城市，这个行业都被视为一种犹太行业。我们在威尼斯已经看到这种情况。[50]阿姆斯特丹也是如此，尽管我们必须补充道，犹太人的这种才能直到 17 世纪末才开始被提及。[51]然而，尽管如此，我认为我们仍有把握假设，犹太人此前已经是卓有影响的证券经纪人。

在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我们听到了同样的情况。早在 16 世纪，当时一个人[52]提及来到当地集市的犹太人，他们的存在“并非装饰性的，而是十分重要的，尤其在票据贴现业方面”。而且，1685 年，法兰克福的基督徒商人抱怨犹太人占据了整个证券经纪业。[53]最后，辜黎柯·冯·哈梅因在其《自传》中提及她家的朋友们经营证券，“这在犹太人中间是件稀松平常之事”。[54] 97

至于汉堡，犹太人当然也在那里引入了证券经纪业。一百年后

(1733 年),参议院档案馆中的一份文件表达了如下看法,“犹太人几乎都是证券经纪大师,并在这方面完全打败了我们的人民”。[55]甚至迟至 18 世纪末,犹太人几乎仍是汉堡唯一的证券购买者。在其他德国城市中,根据记载,菲尔特的证券经纪业(在 18 世纪)几乎完全为犹太人控制。[56]

在维也纳,情况毫无二致。众所周知,18 世纪末奥地利的首都成为著名的证券交易中心,针对利奥波德一世时期犹太人的活动,国务大臣路德维希如此评价道:“主要由于犹太商业的影响与信用,重要的商业交易得以经常在维也纳进行,市场上最重要的外币兑换与商业谈判尤其如此。”

波尔多也如此。在那里我们得知,[57]“主要的商业活动就是往国内买入证券与输入金银。”甚至远在北端的斯德哥尔摩,也传来了同样情况。[58]19 世纪初(1815 年),犹太人控制了那里的证券经纪市场。

作为这一时期的主要证券经纪人,犹太人必定与证券市场的建立渊源极深。但又不止于此。他们赋予证券交易所及其活动以其独有的特征,在此过程中,他们成为“投机未来的开创者”,实际上也是一般性投机的创始人。

证券投机始于何时,目前尚难确定。一些人认为,[59]早在 15 世纪,意大利的城市中就已经出现了这种类型的交易。[60]但在我看来,它并未获得无可置疑的证明。[61]

现代投机并非始于 15 世纪的意大利,而应更准确地定位在 17 世纪的阿姆斯特丹。几乎可以肯定,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股份,标志着股票买卖的出现。当时突然涌入流通领域的大量等额股份,这一时期强大的投机趋向,自该公司创建以来的巨大股权,投机活动产生的利率变化——所有这些必定推动了阿姆斯特丹证券交易所的证券与股票交易,[62]该交易所在当时已经是一个高度发达的机构。仅仅八年间,证券交易变得如此普遍与鲁莽,以至于当局将其视为一种罪恶,试图加以取缔。1610 年 2 月 26 日,政府的一项布告禁止商人出售超出其实际拥有的股份,1621、1623、1677、1700

98

等年份也发布了类似禁令，但它们并未见效。

谁是这些投机者？答案是所有那些拥有足够金钱的参与者，而不问宗教信仰如何。尽管如此，在这项活动中，犹太人仍比其他人更为突出，作此假设并非冒失。他们对于证券交易业发展的贡献，体现在证券经纪及期货交易设备的专业化之上。关于这两点，我们都有证据。自 18 世纪末以来，犹太人“发现”了证券与股票业，这已是广为接受的事实。[63]这个看法未必能说明一切；但完全空穴来风也不太可能，尤其是我们可以找到证据来说明。我们已经提及的尼古拉斯·梅斯·范·霍利说道，早在 17 世纪下半叶，犹太人就已经是主要的股票持有人。后来，人们发现他们在荷兰的两个印度公司中均为大投资者。就东印度公司而言，德·平托[64]是权威人士；就西印度公司来说，董事们给新阿姆斯特丹的总督斯图文森[65]写信，要求他允许犹太人在公司的殖民地定居，“也因为他们投资于公司股份中的大量资本”。在提到这两个公司时，玛拿西·本·以色列向克伦威尔报告道，[66]“犹太人在荷兰的东、西印度公司都起了重要作用”。

然而，最重要的是，详尽探讨证券交易业各个方面的第一本著 99
作，是由一位 17 世纪末居住于阿姆斯特丹的葡萄牙犹太人所写，我指的是唐·约瑟·德拉维加出版于 1688 年的《乱中之乱》(*Confusion de confusions*, etc.)。[67]一位证券交易专家将其描述为“无论在形式还是在实质上，都一直是对证券与股票交易最为精当的描述，甚至在今天仍然如此”。该书见证了犹太人是投机未来领域的首位“理论家”这一事实。德拉维加还亲自参与商务，其著作清楚反映出他当时的生活环境。

将德拉维加的著作与其他已经引用的证据结合在一起，必然得出这个结论：即便犹太人不是证券交易业的实际“创始人”，他们也与它的起源很有关系。

尽管有些人对这个观点存有疑问，但就支持这一观点的直接证据而言，我有一张王牌。

我们拥有一个报道，它来自法国驻海牙大使 1698 年致法国

政府的公文，其中清楚地写道，犹太人控制着证券交易业，并按其意志影响它的发展。以下是最突出段落的全部摘抄：[68]

> 在这个犹太人享有大量权利的国家（荷兰），根据这些虚伪的政治投机者们通常不可靠的预言，证券的价格如此多变，以致它们使得交易在一天之内进行好几次，这种交易应当被视为赌博而非商业；不仅如此，控制了这项活动的犹太人还竭力使用一切诡计欺骗人们，甚至欺骗那些惯于此道的人……他们的犹太经纪人与代理人，是全世界最聪明的一类……他们拥有大量的债券与股票。

由于作者熟知证券交易活动的所有秘密，因而能够详尽描述犹太人如何成功地在阿姆斯特丹证券交易所获得卓有影响的地位，我即将在下文提及此点。

一旦与其他中心的证券交易所相比较，我们就会对荷兰首都证券交易所看得更清楚。让我们先看看伦敦的情况。自 18 世纪以来，它成为继阿姆斯特丹之后欧洲的主要金融中心。犹太人在伦敦证券交易所占据的优势地位，甚或比阿姆斯特丹更加显著。17 世纪末以来伦敦证券市场的日渐繁荣，可以追溯至阿姆斯特丹犹太人的努力，而他们在那时就已在英国定居。如果真是如此，它就有力地证明了犹太人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是阿姆斯特丹证券交易扩张的原因。他们何以能在当时已经高度发达的伦敦交易所具有如此的影响力？

我们应当注意犹太人在伦敦交易所获取影响力的一两个细节。

1657 年，所罗门·多罗米奥申请成为交易所的一员，尽管交易所原则上排斥犹太人，但这个规定很快被人们抛诸脑后。无论如何，17 世纪末的伦敦交易所（自 1698 年以来以零钱小巷著称）中挤满了犹太人。他们是如此众多，以致交易所的一个特别角落被冠以“犹太小道”（Jewss' Walk）之称。“这个巷子里挤满了犹太人”，一个当时人这样写道。[69]

拥挤从何而来？[70]答案很显然。他们搭威廉三世的便车从阿姆斯特丹而来，并随之带来了在那里流行的证券交易机制。由约翰·弗朗西斯讲述的这些事件，被许多权威人士（甚至犹太人）认为是真实的。

证券交易所就像密涅瓦[①]一样，它以全副武装的姿态出现。英国首批贷款的主要参与者是犹太人：他们向威廉三世提供了有益的建议，他们中间富有的梅迪纳是马尔博罗公爵的银行家，每年给予这位将军6000英镑贷款，作为回报，他总能最先得知战场上的消息。英国军队的胜利，在给英国带来荣誉的同时，也给梅迪纳带来了利润。价格涨落的各种把戏，从战场传来的虚假战报，信使的欺骗行为，幕后金融集团的形成，以及拜金之轮（Mammon's wheels）的整个运转——对于这一切，证券交易所的最早开创者都了如指掌，并为了自身利益而充分加以利用。

就所罗门·梅迪纳爵士（被称为"犹太人梅迪纳"）而言，他可以被视为在英国进行公债投机的开创者。我可以列举安妮女王统治下的其他许多犹太富人，他们都在证券交易所从事投机活动。玛拿西·洛佩斯是其中一位。在炮制了女王去世假消息后的大恐慌中，通过买断因此而跌价的所有政府债券，他积聚了一笔财富。桑普松·吉迪恩也是如此，他作为"伟大的犹太经纪人"闻名于非犹太人中间。[71]当回忆起以下事实时，我们便可感到那一时期伦敦犹太人的雄厚财力：据皮乔托估计，18世纪初，年收入在1000至2000英镑的犹太家庭有100户，年收入在300英镑的为1000户；同时一些犹太人，例如门德斯·达·科斯塔、摩西·哈特、亚伦·弗兰克、德达圭勒男爵、摩西·洛佩斯·佩雷拉、摩西或安东尼·达·科斯塔（他在17世纪末成为英格兰银行的董事）及其他人，是伦敦最富有的商人。

很显然，那一时期的犹太富人引发了大规模的证券投机活动。但更令人吃惊的是，可能在18世纪上半叶，犹太人就已经将证券

① 密涅瓦（Minerva），即希腊神话中的智慧女神雅典娜。——中译者注

投机作为一项专门的职业引入伦敦证券交易所。据我所知，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注意到这个事实，但却有支持它的充分证据。

在此类事件上波斯特勒韦特颇为可靠。他断言：[72]“证券投机……起初如同私人财产一样，仅是利润与股份从一人到另一人的简单偶尔转让；但通过控制商业的证券经纪人的努力，它变成一种贸易；或许，证券交易能够使人披上诚实的外衣，使用一切阴谋、诈骗与诡计去做任何事情；既然经纪人控制着这个暗箱，他们将整个交易变成了赌博，按照自己的喜好随意抬高或压低证券的价格，常常使得买卖双方天真地将他们的金钱交由那些惟利是图的舌头任意处置。”

众所周知，犹太人构成了相当大一部分的经纪人。早在1697年，伦敦证券交易所的100名合法经纪人中，有不少于20人是犹太人与外国人。毫无疑问，这个数字在随后几个世纪增加了。“希伯来人从天底下各个角落蜂拥到了零钱小巷”，弗朗西斯这样写道。实际上，在18世纪30年代（即伦敦交易所创立的一代人时间之后），一位可靠的观察家评论道，[73]犹太经纪人的数目是如此众多，而所有人都从事这个行业又不可能，其结果“导致几乎半数的犹太经纪人转向证券投机”。这位作者还将当时伦敦犹太人的数目估计为6000名。

在某种程度上，证券投机是证券经纪发展的结果，而这一过程并不仅限于伦敦。法兰克福也出现了同样的趋势。17世纪末，那里的犹太人占据了整个经纪业，[74]毫无疑问，他们逐渐转向证券投机业。1617年，汉堡[75]的葡萄牙犹太人中仅有4名经纪人，但不久之后就达到了20人。

考虑到这些事实，同时考虑到将犹太人视为促成伦敦交易所套汇业发展的公众观点，[76]即认为犹太人在很大程度上参与了18世纪末政府债券的大规模投机，我们将不得不同意一位一流权威人士表达的观点：[77]如果今天的伦敦是世界的主要金融中心，那么它这个地位很大程度上应归之于犹太人。

在早期资本主义时代，其他城市的证券交易所要远远落后于阿

姆斯特丹与伦敦。在巴黎，这一行业直到18世纪末才开始发展。证券投机（在法语中称为 *Agiotage*）在法国的开始，可以追溯至18世纪初；兰克[78]在伊丽莎白·夏洛特写于1711年1月18日的一封信中发现了“投机者”（*Agioteur*）一词。我认为这个词与“票据”（*billets de monnaye*）存在某些联系，但人们此前还不知其为何物。因此，它在当时并未留下持久的印象。早在1730年代，法国已经感受到英国与荷兰的经济优势，这两个国家的资本主义要比其他邻国更发达。当时的一位作家就明说：[79]“股票的流通是我们的邻国获得巨额财富的源泉之一，它们拥有一座银行，支付股息，并出售股票与股份。”很显然，当时的法国，情况并非如此。甚至在1785年，一道法令（8月7日）宣称“国王获悉，在过去某个时间，一种新式的商品（即股票与股份）已被引入到资本之中”。

18世纪法国的证券交易活动相对不太重要，这种状况直接暗示了犹太人对当时法国（尤其是巴黎）的经济生活几乎没有影响。他们居住的城市如里昂或波尔多，并不有利于股票经纪业的发展。然而，16世纪的里昂，在短期内出现了一种人们今天可能称之为证
104 券的较为繁荣的商业，但目前尚无令人满意的理由可以解释。[80]无论如何，它并无后效。

还是回到巴黎。巴黎所有的股票经纪活动大概都可归于犹太人。这个行业的中心位于坎康普瓦大街，后来因为法律名义的诈骗而变得臭名昭著。一位可靠的专家说道，[81]在这条特别的街道上住着“许多犹太人”。尽管如此，与法国的第一批股票投机相连，甚至比法律更擅长操纵技艺的大师就是路易十四时期的著名金融家撒母耳·伯纳德。当“票据”变成一片片毫无价值的废纸时，无怪乎它们被人冠以“伯纳德纸”（*Bernardines*）的绰号。[82]至于约翰·劳（John Law），他在阿姆斯特丹习得证券交易机制的有关知识。[83]尽管我无法断定他是否为犹太人（据说[84] Law＝Levy），但可能性很大。难道他父亲不是一位“金匠”（与银行家）？他是一名基督徒固然不假，但这并不必然是其非犹太性的证明。他肖像中体现的犹太外貌（例如在其著作《论货币和贸易》1720年的德文版中），支持

他是犹太人的观点。另一方面，他那小贵族与冒险家相混合的奇特特征，又反驳着这个假设。

在德国，交易所惟独在两个拥有众多犹太人的城市——法兰克福与汉堡——获得了重要地位。上文已提及有关犹太人影响的例证。

至于柏林，可以说那里的证券交易所，从一开始就是个犹太机构。19 世纪初甚至在 1812 年犹太人获得解放之前，他们就已构成交易所的最主要成员。4 位总裁中有 2 名犹太人；整个证券交易委员会的构成如下：4 位总裁，两大行会的 10 名监护人，一人来自埃 105
伯海员行会，另有 8 名“经选举产生的犹太商人”。因此，在总数 23 人中，犹太人达 10 名之多。他们是公开的犹太人，很难确定委员会中是否有以及有多少受洗犹太人和秘密犹太人。

事实上，他们的数字再清楚不过地表明，犹太人占据了证券经纪业的大量份额。在 6 名合法证券经纪人中有 3 名犹太人。而且在经营棉花与丝绸的 2 名合法经纪人中也有 1 名犹太人，而其接替者仍是犹太人。这就是说，在总共 3 人中，有 2 名是犹太人。[85]

就 18 世纪的德意志而言，证券投机活动仅仅限于汉堡与法兰克福。在那个世纪之初，证券贸易遭到禁止。1720 年 7 月 19 日，汉堡市议会发表了如下声明：“议会非常憎恶而反感地听到，某些二等公民在建立保险公司的借口下擅自从事股票经营活动。议会害怕它会对全体民众及上述二等公民带来不良后果。”[86]当权者只是道出了对这个问题的一般感受，而当时一位作家愤怒地斥责道，[87]“证券与股票是一项危险的交易，具有邪恶的毁灭性”。

犹太人在此是否也是创始人？至少可以确定，证券经营的推动力来自保险界，而这在上面已经提及的 1720 年的声明中十分明显。事实上，众所周知，犹太人积极推动了汉堡海上保险业的发展。[88]关于证券交易影响的更多证据是间接的。这同样适用于法兰克福。首个可以确定的材料来自 1817 年的奥格斯堡，是当年 2 月 14 日关于票据案件的法院判决记录。由于市场利率的上涨而产生了信用票据的价格差，强制执行这个差价的申请被驳回，理由是它

106 从本质上是危险的活动。案件涉及的总额为17630弗罗林，而原先的合约要求在巴伐利亚州交易所发行价值达9万弗罗林的债券。原告的名字是海曼（Heymann），被告竟是乌尔曼（H. E. Ullmann）！这是德国债券投机的首例案件。[89]

到了1817年，我们进入一个与之前不同的时期，我认为它在证券交易史上开辟了一个新时代。为何是新的时代？它究竟有何独到之处，而必须以“现代”这个令人敬畏的词语来描述？

比较过去之人与现在之人对证券交易活动的判断，便可发现它在今天占据的位置已与一百年以前迥然不同了。

直到18世纪，即使在资本主义圈内，公债投机仍受到蔑视。从18世纪流传下来的英、法、意、德等国的标准商业手册与词典来看，它们或者根本不提及证券交易（尤其是在经济“落后”的国家），或者正如波斯特勒韦特那样，即使探讨了这个主题，却仍然情不自禁地表达了对它的蔑视。今天的小商人、小店主或农民对证券交易所持的观点，正是18世纪富商们持有的观点。当1733年众议院讨论约翰·伯纳德爵士的议案（关于阻止“臭名昭著的证券投机行为”）时，所有发言者齐声谴责这个行业。半代人之后，在波斯特勒韦特的书中，仍可发现同样苛刻的词语，他指出“对于那些骗子，我们可以体面地称其为证券经纪人”。他将证券投机视为“公愤”，并已成为“国家丑闻”。[90]无怪乎那一时期的立法彻底禁止这种行业。

但是，对证券交易的厌恶远不止于此。它必定与对作为交易活动基础的一般债券的嫌恶相联系。很显然，国家的利益与那些保
107 卫证券贸易的人相一致；因此，一边是统治者与证券经纪人结成孤独的伴侣，另一边则是余下的所有人——仅仅除了那些沉溺于证券购买的人以外。事实上，国债被视为一桩可耻之事；那一代中最杰出的人士均认为，国债的发展是一项罪恶，因而应该采取一切可能的手段与之作斗争。理论家与实践者在这点上站到了一起。在商界，人们认真讨论了如何偿还公债的问题；有人甚至建议，国家应当推卸与债务有关的责任，并将之一笔勾销。这种行为竟然发生在18世纪下半叶的英国！[91]当时的理论家并无不同意见。公共借

贷体制被大卫·休谟称为“一种毫无争议的毁灭性……行为”[92]；关于“借贷的毁灭性行为”，亚当·斯密写道，“持续借贷这种毁灭性的权宜行为……将使采纳它的每个国家逐渐走向衰弱……巨额债务的发展，现在令人烦恼；而从长远来看，则会毁灭欧洲所有的大国。”[93]与通常一样，亚当·斯密的这些见解是其时代即早期资本主义时代经济状况的一面镜子。没有比如下事实更能使之区别于我们的时代：在亚当·斯密的整套体系之中，没有为证券或者证券交易所及其业务的研究留有任何位置。

然而，大约与此同时，一本专门探讨信用及其好处、证券交易及其价值的著作出现了，该书可以被恰当地称为公共债务与股票交易领域的“雅歌”。与《国富论》立足于过去不同，该书面向未来。我指的是约瑟夫·德·平托于1771年出版的《论信贷及其流通》(*Traité du credit et de la circulation*)。平托是葡萄牙犹太人，因而在此我要特别提及他。在此书中，可以发现19世纪提出的保护公共信贷、证券交易及公债投机的许多论证。如果说亚当·斯密及 108
其体系是站在证券交易萌芽期的末端的话，那么平托及其信贷理论则可以被视为站在现代证券交易的开端；在这个时期，证券及股票投机成为经济活动的中心，而证券交易所成为经济体的心脏。

悄悄的但却很确定的是，公众舆论向着有利于证券交易的方向转变，对证券交易所的承认势在必行。公众舆论随着形势的发展而日渐壮大，敌视性的法规逐渐被废除，故一旦拿破仑战争结束、和平再度降临，证券交易所就获得了巨大发展。

因此，我们有理由谈及证券交易史上的新时代。实际变化是什么？犹太人在多大程度上与这种新状况的产生有关？

证券交易机制并无多大变动，它早在1688年德拉维加出版其著作时就完成了。辅助性的商业活动在各地纷纷冒出，而犹太人通常是其创始人。因此，我发现[94]保险业(在德国)是由W. Z. 韦特海默在法兰克福创立，犹太人还创立了一种名为“当年交易”(*Heuergeschäft*)的独特的船舶租赁形式。

但证券交易活动发展中的亮点，并非辅助性商业的兴起，而是

商业额在深度与广度上的增长。

自19世纪初起，证券数量开始在市场上猛增，它们迅速进入公众视线，这些事实众所周知，无需复述。但随着证券数量的增长，
109 投机也得到了扩展。在18世纪中期以前，伦敦与阿姆斯特丹的投机活动，就好比水面上泛起的小小涟漪。一个可靠的信息提供者告诉我们，第一份私人贷款业务直到1763年才在阿姆斯特丹办理。而在此之前，投机活动仅限于公债领域，“但在上次战争期间，年金债券大量充斥于市场”[95]。即便如此，18世纪中期阿姆斯特丹交易所仅有44种不同种类的证券，其中25种是国内债券，6种为德国贷款。当18世纪结束时，第一类债券已达80种，第二类也有30种。[96]然后出现了一次激增，尤其在拿破仑战败之后。阿姆斯特丹交易所从创立之初到1770年，总共经营了2.5亿盾的债务，而仅在十四年间(1808—1822)，仅伦敦一家公司就发行了更大一笔债务——0.22亿英镑。这些事实皆广为人知，十年间在市场上发行了如此巨额债券的那家伦敦公司，其身份无须特别指明。

一旦提及这家公司及其四个分支，我们就已触及证券交易活动的广泛发展与犹太人对它的影响这二者之间的关联。1800—1850年间，既是股票市场的扩张期，又是罗斯柴尔德家族及其附属机构的扩张期。罗斯柴尔德这个名字不仅指代这个公司，它代表着犹太人对于证券交易活动的整体性影响。借助于这种影响，罗斯柴尔德家族得以在政府证券市场中取得强大地位，甚至可以说是独占地位。可以毫不夸张地断言，许多国家的财政部长若不能与这家公司达成协议，其财源的大门很可能就要关闭。19世纪中期有条著名格言：“全欧洲只有一个政权，这就是罗斯柴尔德：众多的银
110 行是其走卒，商人与工人是他忠实的士兵，而投机则是其利剑。”(A.威尔语)海涅的相关风趣妙语众所周知，无须引用，它们远比其他任何数据表格更能证明这个家族的重要性。

我在此不打算书写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历史，哪怕梗概也不写。读者如果想了解这个显赫家族的财富，很容易找到大量材料。[97]我所做的只是指出现代证券交易活动可以归因于他们的一两个特

征，以便弄清楚，证券交易不仅在数量上而且在质量上都烙有罗斯柴尔德家族（因此也是犹太人）的印记。

第一个应当注意的特征，是自罗斯柴尔德家族出现以来，证券市场已国际化了。可以设想，由于证券交易活动巨幅扩展，大量财富从世界各地涌向借贷中心就成为必需。今天，证券市场的国际化已经是一个公认的事实；在19世纪之初，人们却将其视为惊奇之事。在1808年半岛战争期间，拿单·罗斯柴尔德在伦敦致力于资助英国军队在西班牙的行动，人们将其行为视为一个惊人的成就，实际上这个行为奠定了他所有影响力的基础。1798年以前，只存在法兰克福公司；正是在这一年，迈耶·阿姆谢尔的一个儿子在伦敦创建了分支，另一个儿子于1812年定居巴黎，第三个儿子于1816年定居维也纳，第四个儿子则于1820年在那不勒斯定居。这样一来，就具备了把国外借贷视作内部借贷的条件，而公众也逐渐开始习惯于把资本投到外国证券上，把以家乡的流通货币来结算利息视为可行的。在19世纪初期的作者笔下，这是不可思议的，“每个政府债券的持有人……都可以在各地不费任何周折地获取股息。法兰克福的罗斯柴尔德家族为许多政府支付利息；巴黎的 111
分支则在伦敦、那不勒斯或巴黎为奥地利、那不勒斯和英国—那不勒斯的公债支付股息”[98]。

可能的投资圈由此得以扩大。但罗斯柴尔德家族还意识到，获取可借到的每一分钱都是重要的，为了达此目的，他们熟练运用证券交易机制来募集流动贷款。

根据对当时有关记录的判断，[99]罗斯柴尔德家族在1820—1821年间发行的奥地利债券，无论在公共借贷还是在证券交易领域，都是一件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这是首次调动全部资源为股票创造需求之举，可以说政府债券的投机活动由此发端，至少在欧洲大陆是如此。

此后，“创造需求”成为证券交易活动的口号。为了实现该目的，遂有了有步骤的买进和卖出，以产生价格变动，而罗斯柴尔德家族率先致力于这项活动。[100]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从事着法国人

所谓的“证券投机”，对于一个庞大的银行来说，这是一件颇新鲜的事。事实上，罗斯柴尔德家族只是采用了阿姆斯特丹犹太人通过人为影响市场的方法，但他们却将之应用于一个全新目的——在公众面前出售新证券。

当我们看看这一时期——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时代——初现曙光并独立发挥作用的新活动时，银行家与证券交易所或者银行家与公众之间变化了的关系将会愈加突出。我指的是产生贷款的业务。

证券的创造

产生贷款的业务，是借助于证券的创造来获取利润的一种尝试。它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代表了一种极强大的资本主义力量。
112 自此以后，证券与股票的产生，不只是因为那些缺钱人的需要，也不再依赖于信用，而是作为一种完全独立的资本主义活动形式而存在。迄今为止，人们一直在等待可能的投资者到来，而现在终于出现了。可以说，贷款筹集者开始有了野心，他推动了借贷活动。但这几乎没有引人注意。然而，当小国需要贷款时，我们看到了它是如何运作的，据此可以想象一种“贷款的商业旅行”。“现在我们拥有有着大型组织的富裕公司，这些公司花费时间与人力，致力于在全世界范围内寻找能为其产生贷款的国家。”[101]

自然，贷款筹集者与证券交易所以及公众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变化。既然贷款筹集者的主要工作是促使人们占有股票，那么他必须有野心、有闯劲。

目前尚无一部令人满意的贷款产生史。因此，我们不知道它是何时最先开始的；然而，其起源无疑可以追溯至 18 世纪，其发展可以分为三个显著的阶段。

在第一阶段，无论银行或富有个体（在证券交易所时代之前提供贷款的人）均受委托出售债务，并以佣金作为回报。这是奥地利在整个 18 世纪采纳的方法：“巨额贷款，尤其是那些在国外签订的贷款，通常是在银行或金融家集团的介入下获得的。当事公司通过公共认购来安排所需金额的供应，再将款项交给借款人或其代

理人，并把利息及本金的一部分偿付给各个贷方——必要时从自己的资金中偿付；当然，这一切都出于某种考虑。”[102]

大约在18世纪中期，已经出现了“贷款经营者”。1769年，愿意从事短期贷款的意大利与荷兰公司已经出现。[103]亚当·斯密对这个行业的描述，使其愈加清晰。“在英国……商人一般是给政府预付金钱的人。但预付资本并不意味着减少资本，而恰恰相反，是 113
为了增加他们的商业资本，除非在认购新贷款的过程中能够售出他们的股份并获利，否则他们将不会认购。”另一方面，在法国，那些参与金融活动的人们，都以私人方式预支自己的钱。[104]

这个行业的专家来自何处？他们并非来自18世纪从事短期贷款的银行家，而极有可能来自证券与股票经销商。18世纪末以来，在证券经纪人的竞争下，垄断政府贷款的伦敦银行家这个小集团彻底破产。当时也是一家犹太公司，首次将贷款发放与证券交易所联系起来。我指的是当时控制零钱小巷的人——亚伯拉罕与便雅悯·戈德斯米德，他们堪称“18世纪的罗斯柴尔德家族”。1792年，他们成为证券交易所的首批代表[105]与伦敦银行家在提供新贷款上展开了竞争。从那时起到1810年亚伯拉罕去世时，这家公司已控制了货币市场。或许我们可以将他们视为最早的“贷款专家”，而这后来为罗斯柴尔德家族继承。即使有关戈德斯米德家族的论断尚存疑虑，但对于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断言却无可置疑，因为后者是这一领域当之无愧的第一人。

很显然，只有少数富有的公司以发行公债为生。毕竟，这种需求相对有限。而满足私人需要的证券市场一旦被打开，一片广阔的活动领域就等待着开拓。必须人为地创造一个巨大的需求，这种趋势催生了公司创建与抵押业务。

实施公司创建的商号“专门通过大规模生产证券与股票并将其兜售给公众以赢利”（克伦普语）。对于由此开始激励经济活动的 114
驱动力，无需进行描述。如果根本不考虑是否有证券需求的情况就发行新证券或扩展原有的证券以创造新资本，这并不符合企业家的利益，对一些十分重要的企业家而言更是如此。

是谁率先开创了这种商业模式？即便犹太人没有实际创建它，他们无疑也促进了它的发展，对此我们不难说明。

据我们所知，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活动再次成为这方面的第一道曙光。19 世纪 30 年代的铁路繁荣，使大规模的公司创建成为可能。罗斯柴尔德及其他犹太家族（埃希索尔家族、富尔德家族等等）都是这个领域的开拓者，并将这个行业带向繁荣。

在某种程度上，参与的程度可以根据铁路修建的长度或资本认购的数额来推断。但私人公司的实际股份却难以估计。尽管如此，我们知道，罗斯柴尔德家族“建造”了法国的北方铁路、奥地利的北方铁路、奥意铁路及其他更多铁路。

而且，如果从时人的观点来判断，将会发现罗斯柴尔德家族实际上是第一批“铁路大王”。1843 年，《奥格斯堡总汇报》这样写道：“当工业活动中的投机行为在过去几年间开始流行时，铁路成为欧洲大陆的一项必需事业，而罗斯柴尔德家族大胆投身其中，并在这项新运动中遥遥领先。”如同他们以前在公债方面的作为一样，罗斯柴尔德家族在铁路建设方面引导着潮流。“没有一家德国公司不指望罗斯柴尔德的友善。那些他未予照料的公司都不十分成功，几乎很少有公司与他们没有联系。”[106] 这些无论是敌是友均认可的陈述，已足够重要了。

115 从那时候起，浮动公司（floating company）的活动就成了犹太企业家的专项活动。重要的是，那些最伟大的人物如赫尔施男爵或斯特劳伯格博士均为犹太人，而且普通职员中也有许多犹太人。看看下一页在 1871—1873 年间德国创建的公司数字，就足以说明，参与这项工作的犹太人数量惊人。[107] 但这些数据并未反映全部内容。首先，它们只构成整体中的部分，并专指犹太人很可能避开的“不稳定”的公司；其次，在许多情况下，犹太人只在幕后发挥控制性影响，而那些在前台的仅仅是傀儡。即便如此，这些数据仍将提供有用的信息。

在私人银行仍很重要的国家（比如英国），这种趋势或许可以很好地观察到。在此，权威人士告诉我，在 1904 年列入《银行家年鉴》的 63 家银行中，有 33 家是犹太人开办的，或者起码涉及重要

的犹太利益，而这 33 家银行中又有 13 家是一流银行。

在私人银行已为股份制银行所取代的国家中（比如德国），很难确定犹太人在这一职业中的比例。但在银行合资的趋势中，种种迹象表明犹太人充当了公司创建者。

无论在 50 年代还是 70 年代，更不用说 90 年代，如果没有投机银行的合作，公司的资金募集在这任何一个十年中都是不可想象的。正是由于银行将资本预付给它们自己建立的有限公司，庞大的铁路建设事业才得以存在。事实上，私人企业在此过程中也作出了巨大贡献，但其财力无法与大银行相抗衡。1842—1847 年间，法国在铁路建设方面的花费不少于 1.44 亿法郎；在随后的 4 年里花费了 1.3 亿法郎，在 1852—1854 年间总额已达 2.5 亿；仅 1855 年一年就花费了 5 亿，1856 年为 5.2 亿。[108] 德国也是如此。“这一时期（1848—1870）我们的整个铁路网……都是在银行的帮助下……建立起来的。”[109]

116

商业机构属性	创立者总数	犹太人数目
25 家一流的上市公司	25	16
2 家最大的采矿业辛迪加	13	5
大陆铁路公司（资本为 150 万银币）	6	4
12 家柏林土地购买公司	80	27
建筑业协会	8	4
9 家大型银行	104	37
9 家柏林酿酒厂	54	27
20 家北德意志机器制造厂	148	47
10 家北德意志煤气厂	49	18
20 家造纸厂	89	22
12 家北德意志化工厂	67	22
12 家北德意志纺织厂	65	27

这个问题的原因并不难寻找。一方面，新型股份制银行的兴起导致可利用资本的增加，从而为与之相称的大型企业的产生铺平了道路。另一方面，股份公司试图获得更大的利润而比私人公司更加努力地拓展业务，为此会充分利用摆在它们面前的一切机会。[110]

117 这种特殊的银行活动是如何起源的？[111]我认为它可以追溯至1852年“动产信用公司”(*crédit mobilier*)[112]①成立之时。

“动产信用公司”的历史众所周知。[113]尤其令我们感兴趣的是，它始于两名葡萄牙犹太人以撒与埃米尔·佩雷尔，并有其他犹太人参与其中。认购人清单显示两位佩雷尔总共持有11446股，富尔德·奥本海默持有11445股，其他大股东有马勒特·弗雷尔、便雅悯·富尔德、罗马的托洛尼亚、汉堡的所罗门·海涅、科隆的奥本海默；换言之，他们就是欧洲犹太人的主要代表。而罗斯柴尔德家族不在此列，因为“动产信用公司”直接与之相抗衡。

在犹太人的不论合法与否的大批分支企业建立后，法国的“动产信用公司”随之产生。在奥地利有S. M. 罗斯柴尔德于1855年创立的“奥地利中央信贷银行”。在德国，仿效新原则建立的首个机构是德国工商银行(达姆施泰特银行)，它在科隆的奥本海默家族提议下于1853年建立。[114]这家银行最早的董事之一是赫斯，而他曾在“动产信用公司”做过高级经理。柏林市民贴现银行是此种类型的第二个机构。它起初由基督徒创办，但它转变为今天的模样要归功于大卫·豪泽曼的作用。德国的第三个例

① 动产信用公司，全称 Société générale du Crédit Mobilier，是法国的一家大股份银行，由贝列拉兄弟创办，并为1852年11月18日的法令所批准，它是作为新型金融企业出现的。其主要目的是充当信贷的中介，该银行广泛参与了法国、奥地利、匈牙利、瑞士、西班牙和俄国的铁路建设。它的主要收入来源是用它开办的股份公司的有价证券在交易所进行投机。在它之后，中欧的其他许多国家也仿照它建立了类似的机构。1867年，该银行破产，1871年停业。——中译者注

子柏林市民商业银行也一样，它由已经提及的与达姆施泰特银行有关的科隆公司，以及著名的柏林银行家如门德尔松公司、S. 布莱希罗德、罗伯特·瓦尔施奥尔公司、席克尔兄弟及其他人创办。最后，在德意志银行（1870 年）的创建中，犹太因素再次占据了支配地位。

工业的商业化

无论如何，随着投机银行的出现，资本主义一时间发展到了它的顶峰。它们推动着经济生活商业化的进程，使之尽可能向前发 118
展。作为证券交易所后代的投机银行，将证券交易活动（即投机）带向了鼎盛。[115]证券交易以做梦都想不到的比例扩展着。其比例是如此之大，以至于有人认为，至少在德国，投机性股份制银行将取代证券交易所。[116]如果恰当地理解这些术语，它可能包含了一丝真理，即证券交易所不再是一个公开市场，而有可能被大金融集团（*la haute finance*）支配，但作为一个经济组织，由于其范围在不断扩大，它通过现代的发展而必然获利。

这就是我所谓的工业的商业化。股份制银行的证券交易活动正越来越成为经济生活各部门的控制性力量。实际上，今天工业领域的一切活动都取决于金融力量。新工业是否应当建立，或者旧工业是否应当扩展，“万能供应商”（universal provider）为了扩展其商业是否应当增加资本——所有这些现在都在银行或银行家的私人办公室中决定。同样，商品的分配也越来越成为一个金融问题。我们的主要企业不仅是家工业公司，同时也是家金融公司，这样说一点也不为过。证券交易所决定着大多数国际商品及原料的价格，那些希望在激烈竞争中生存的人都必须控制证券交易所。总之，有把握断言，当今一切经济活动都趋向成为商业交易。

电气工业是最好的例子。自其创立以来便代表了一种新的类型。迄今为止，当大型资本主义企业获得并执行完定单时，其工作才被视为结束。一个特定的工厂在每个大城市都有一个指定的代

119 理人，而在多数情况下，这个代理人也代表其他工厂，他寻找顾客并非那么积极主动。而在电气工业，所有这些都改变了。其组织者率先发现，一个企业的主要职责在于为自身创造市场。他们怎么做？他们努力俘获客户。一方面，他们试图控制买方。比如，通过购买将要采用电气轨道的有轨机车公司的股份，或者干脆购买全新企业的股份，他们取得了对能够控制他们所造商品的人的支配权。在必要情况下，电气公司的董事们为了能给其商品创造需求，会亲自成立有限公司。今天，最成功的电气公司已越来越像为浮动公司服务的银行。

然而，这并非全部。他们采取的另一个策略是在各地建立分支机构，以便尽其所能，占领更多市场。信赖原先建立在一般代理人的基础之上，而现在每家公司都委派自己的专门代理人以扩展工作联系。其结果如何？公司得以近距离接触顾客，能够更好理解顾客的需要；因此，也就可以更好地为顾客供应他们所需的产品、更容易满足他们的愿望，等等。

众所周知，这是德国通用电气公司采用的体制，而费利克斯·多伊奇（Felix Deutsch）公司在对它的扩展方面可谓首屈一指。老牌公司很慢才跟上潮流。西门子与哈尔斯克公司长期以来自以为“太过尊贵而不屑于追逐顾客”，直到他们中的一位董事贝利纳接受了能够产生有效影响的新计划，其公司不久便从竞争对手那里收复失地。

这个例子是典型的，我们可以这样概括：工业的商业化是篱笆中的缺口，而犹太人可以由此穿入商品的生产与运输领域，正如他们以前在商业与金融领域内做的那样。

120 我们并非想通过这些来断言，犹太人作为工业家的历史肇始于此。完全不是这样。一旦现代资本主义将一切经济过程中的技术与商业内容区分开来，人们很快便发现，犹太人同时参与两者。事实上，商业更能吸引犹太人，但在早期资本主义时代，犹太人就已成为某些工业中的首批经营者。

他们在这里建立了烟草业（奥地利的麦克伦堡）；在那里建立

了威士忌酿造业(波兰、波希米亚);在一些国家,他们是皮革制造商(法国、奥地利),在其他国家,他们是丝绸制造商(普鲁士、意大利与奥地利);他们在汉堡制造长统袜;在菲尔特生产时尚眼镜;在法国制造淀粉;在摩拉维亚生产棉花。他们几乎在各地的裁缝贸易中都是先驱。我可以通过我搜集的材料说明,在18世纪及19世纪初期,还有许多其他例子表明犹太人是资本主义工业家。[117]但我认为,考虑犹太经济史的这方面没有意义,因为它没有包含特别的犹太因素。犹太人或许出于偶然才从事某种行业,没有他们的参与,它很可能一样会繁荣。不妨举一两个例子。在波兰与奥地利,犹太人是贵族的管家,这使他们成为威士忌的酿造者。在其他国家,他们从事烟草业,这是他们当宫廷犹太人的直接后果,他们长期垄断烟草贸易也与此相关。在大部分例子中,他们的商业活动促使他们开始制造长统袜,并最终导致了长统袜制造业的出现,就像纺织业中的情况一样。非犹太人与犹太人一样,经历了一个相同的过程。然而,旧衣经营是个例外。它本质上是个犹太行业,首先推动了新式服装的出售,最终导致了裁缝业的出现。

但归根结底,直到工业的商业化出现之后,也就是直到几乎每个现代工业中的管理与组织工作对所有人来说都变得普通之后, 121
直到一个人可以从某个行业转到另一个行业而无需因此降低其技能时,犹太人对工业活动的影响才开始变得重大。现在,各领域的技术层面都经历了一个分化过程。因此不罕见的是一个以皮革业起家的人最终转变为钢铁生产者,其间先后(我们能否这样说?)当过烈酒与硫酸制造者。旧式资本主义企业家往往带有技术的烙印,而现代实业家则没有固定的特点。你能否想象,克虏伯公司会制造除枪支以外的任何物品,博尔西格公司会生产除机器以外的任何物品,西门子公司会制造除电气设备以外的任何物品?你能否想象,H. H. 迈耶除了北德劳埃德公司以外还会关心其他任何公司?另一方面,如果明天拉特瑙、多伊奇、贝利纳、阿诺德、弗里德兰德尔、巴林这些人更换了职位,他们也将取得与现在一样的成

功。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他们都是经商人士，特定的领域对于他们的活动无关紧要。

因此，人们常常这样认为，基督徒作为技术员开始创业，而犹太人作为推销员或售货员开始立业。

今天，了解犹太人在工业活动中的参与程度是非常有用的，然而却鲜有材料能证明这一点。我们应当满足基于担任工业企业董事的犹太人数目的大致估算。这种方法当然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如何能够确定无疑地说出谁是犹太人而谁又不是犹太人？比如，又有多少人知道，在德国拥有比其他人更多董事头衔的科隆的哈根（Hagen）一开始叫做利未（Levy）？除此之外，光有数量还不能作为其影响程度的标准。而且，一些公司的经营能力本身并不取决于董事会成员；另外，还有一个将犹太人排斥在重要职位之外的不成文规定。因此，在任何情况下，获得的数据只与犹太人影响的很小一部分相关。

122

董事长

行业	总数	犹太人数目	犹太人比例
皮革、橡胶	19	6	31.5
金属	52	13	25.0
电气	95	22	23.1
酿酒	71	11	15.7
纺织	59	8	13.5
化工	46	6	13.0
采矿	183	23	12.8
机器	90	11	12.2
钾碱	36	4	11.1
水泥、木料、玻璃、瓷器	57	4	7.0
总数	808	108	13.3

董事会成员

行业	总数	犹太人数目	犹太人比例
酿酒	165	52	31.5
金属	130	40	30.7
水泥、木料、玻璃、瓷器	137	41	29.9
钾碱	156	46	29.4
皮革、橡胶	42	12	28.6
电气	339	91	26.8
采矿	640	153	23.9
化工	127	29	22.8
机器	215	48	21.4
纺织	141	19	13.5
总数	2092	511	24.4

我引用了它们的全部，这些编辑好的资料来自最新版的《德国股份公司手册》。就电气工业而言，在此仅关注那些拥有600万马克的企业，在化学工业是500万，机械与纺织业是400万，其余的则是300万。

这些数字暗示了什么？犹太人在以上列出的工业领域中的影响是大是小？我认为，无论数量如何，这种影响都非常大。我们必 123
须牢记，这个几乎占据全部董事长七分之一以及全部董事会成员近四分之一的社会群体，仅仅构成整个德意志帝国总人口的百分之一。

124

第七章　资本主义观点在经济生活中的发展

前几章研究清楚表明，犹太人的影响远远超出了商业机构的形成这一领域。换言之，证券交易所不只是经济生活中的一种机制，它也是某种精神的体现。实际上，一切最新形式的工业组织都是这种精神的产物，因此我特别希望这一点能够引起读者的注意。

我们今天经济生活的外部结构主要是由犹太人建立起来的，而经济生活的根本原则——可以称为现代经济精神或经济观点——同样可以追溯其犹太起源。

要探寻这种说法的证据，必须另辟蹊径。很显然，文献证据在此没有多大用处。认为犹太人的思想态度有些异常的说法在商业圈中颇为盛行，这种感觉必定是一个有价值的向导。非犹太商人或其代言人所表达的观点，尽管是片面的且常常是刺耳的，却极有帮助，因为他们稚嫩地表达了对犹太精神的厌恶，可以说就像是一面镜子（尽管往往无疑是一面凸透镜）。我们将要提及一些发表意见的人，他们把犹太人视为最坏的敌人，因此我们必须试图领悟其言外之意，从他们旨在传达相当不同信息的陈述中推断出事实真相。能使此项任务变得比较容易的一个因素，恰恰是这些表达出来的观点具有一致性——但这种一致性决非出自鹦鹉学舌，而是出于条件的相似。正是这种相似性，才让它们作为证据更有说服力。

125　首先，必须注意到，犹太人无论身处何处，皆作为商业竞争者而存在，因此基督徒商人遭受损失的抱怨随处可闻。我们得知，他们的生计濒危是因为犹太人剥夺了他们的利润，他们的生存机会

由于顾客们倒向犹太人而大为减少，等等。

17、18世纪（即我们最为关注的时期）的一些文献摘录将会证明我们已经提到的事实。让我们首先转向德国。1672年，勃兰登堡的许多庄园抱怨犹太人“将面包从其他居民口中夺走了”。[1] 在1717年3月19日但泽商人的请愿中，几乎可以发现同样的说辞。[2] 在1712与1717年，马格德堡老城的许多市民反对允许犹太人进入他们中间，“因为城市的福利、商人的成功都取决于这个事实……不许犹太人在此交易”[3]。

1740年，埃特海姆市民在对其主教的请愿中陈述道：“众所周知，犹太人的卑劣手段只会导致损失和毁灭。”同样的观点也体现在这一谚语中：“在所有已衰落的城市，犹太人必定多如干草。”[4] 1750年普鲁士法令的前言中提到，“我们城市中的大商人抱怨道……与他们经营同种商品的犹太人，极大减少了他们的生意。”在南德情况也一样。比如在纽伦堡，基督徒商人不得不坐视他们的顾客去购买犹太人的商品。1469年，犹太人被从纽伦堡驱逐；有相当多的犹太人定居在邻近的菲尔特市，他们在纽伦堡的顾客出于买主为自己寻求最佳利益的考虑，不惜前往菲尔特购物。① 难怪整个17、18世纪，纽伦堡的长老们颁布了许多法令，禁止与菲尔特的犹太人交易。[5]

在整个18世纪，犹太人都被排斥在商业行会之外，手工业行会 126
也一样，这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无需进一步强调。[6]

英国有何不同？绝无二致。约西亚·蔡尔德说道：“犹太人是个狡猾的民族……剥夺了英国商人潜在的利润”；他们将商业经营到“激起英国商人反感的程度。”[7] 当1753年犹太“归化法案”成为法律时，满怀敌意的大众强烈反对这个讨厌的种族，以致该法案次年就不得不废止。一个最大的担忧在于：如果犹太人成为英国公民，他们将“致使本地人沦为无业游民”。[8]

---

① 德意志第一条铁路建在纽伦堡与菲尔特之间（1835年）。很难说文中提到的犹太人的影响是否与之有关，但这的确是一个奇怪的事实。——英译者注

在法国，从马赛到南特，也听到了同样的声音。1752 年，南特城的商人用以下词语哀叹时运不济："这些外来者继续从事违禁贸易……已给这个城市的商人造成了巨大损失，要是没有这些绅士的好意，他们将陷于困境，既不能供养家庭，也不能缴纳税款。"[9] 七年前的 1745 年，图卢兹的基督徒商人无比惋惜地宣称："每个人都奔向了犹太商人。"[10]"我们恳求你阻止这个民族步步进逼，否则无疑将摧毁朗格多克的整个贸易"——这是来自蒙彼利埃商业公会的请求。[11]他们在巴黎的同行则将犹太人比作胡蜂，胡蜂奔向蜂窝只是为了杀死蜜蜂，撕开它们的身体，以提取储存在内脏中的蜂蜜。[12]

在瑞典[13]、波兰[14]，类似的呼喊也回荡着。[15]1619 年，波森的市政当局在致国王西吉斯蒙的一封信中抱怨道，"犹太人的竞争给商人及手工艺者带来了层层阻力与重重困难。"

但所有这些还不足够。我们想知道关于犹太人危及其他人生计以外的事情，我们想找出这个问题的原因。他们为何能够成为
127 基督徒商人如此有力的竞争者？只有回答了这个问题，才能理解犹太商业方法的独特本质，即萨瓦里所谓的"商业秘密"（les secrets du négoce）。

让我们参考当时人，特别是参考那些充分接触日常生活的人们的观点，以探查原因。在此，答案再次相当一致：犹太人因其不诚实的交易而更为成功。"犹太人……在支付中有一种准则与惯例，它可以称作撒谎与诈骗"，你可以在菲尔兰德尔·冯·西特瓦尔德的著作中读到这些内容。[16]类似内容还见于乔治·保罗·洪恩编撰的《诈骗趣典》，[17]在"犹太人"条目下，全书唯一的按语是："犹太人是骗子，无论就集体还是个体而言……"《商人宝典》中关于"犹太人"的条款也持同一口径[18]，而一位研究举止与道德的匿名作者宣称，柏林的犹太人"通过抢劫与诈骗谋生，这在他们自己看来并不构成犯罪"。[19]

法国也流行着相似观点。"犹太人，"萨瓦里说道，"以善于经商著称，但却不能以完全的诚实与可靠打点生意。"[20]

那么，这些控告意味着什么？即使"诈骗"一词的内涵十分广

泛，也无法将许多犹太人的商业实践包括在此范围之内。当人们称犹太人是骗子时，那只是对下面这个事实的一种说辞：犹太人在商业交易中通常不注意现有的贸易法律与惯例。犹太商人冒犯了基督徒，是因为他们忽视了基督徒同行的某些传统，（时不时）违反了相关法律，且最重要的是没有留意商业礼节。仔细观察针对犹太商人的具体指控，并考察其内在本质，你将发现，犹太商人与基督徒商人之间的冲突是两种观点的斗争，两种对于经济生活持根本不同——或者说对立——观点之间的斗争。

为了全面理解这种冲突，有必要了解一些支配经济活动的精神 128
观念，而犹太人自16世纪以来便在经济活动中获得了一个日渐稳固的地位。他们与那种精神是如此格格不入，以至于到处都将他们视为一个不安定因素。

在我所描述的“早期资本主义时代”的整个时期，即犹太人开始发挥影响的时代，就经济生活而言普遍流行着与中世纪的特征——封建关系、手工劳动、三个等级等——相同的基本概念。

这一切的中心是个体的人。不论是作为生产者还是消费者，利益决定着他对社团及其单元的态度，决定着规范经济活动及商业实践的法律。每一部这样的法律，在目的上均为私人性质；所有为国家作贡献的人都拥有一种私人的观点。并非每个人都可为所欲为，相反，法律在各个方面限制了他的活动。要点就在于，这些限制源于个人主义精神。一方面，商品被生产、购买、出售，以便充分满足消费者的需求；另一方面，生产者与交易者期望获得公平的工资与利润。什么是公平，怎么能满足需求，这些都由传统和惯例决定。

因此，生产者与交易者应当只接受与其生活的舒适标准相称的利润。这是中世纪的观点，也是早期资本主义时代流行的观点，哪怕在多多少少按现代标准开展商业的地方也是如此。我们在当时的工业法规中发现了它的表达形式，并在当时的商业文献中找到了它的正当性。[21]

因此，获取利润被这一时期的绝大多数人视为不正当的、“非

基督徒”的行为；人们（至少在表面上）遵守着托马斯·阿奎那的旧
129 有经济教导。[22]宗教或伦理准则依然高于一切，[23]因而没有出现将经济生活从宗教与伦理的束缚中解放的迹象。无论哪个领域内的任何活动，都必须遵照最高的裁决——上帝的意志。毋庸赘言，这种态度与那种拜金态度是针锋相对的。

生产者与交易者能实现自足就够了。这项原则的一个显著结果是，每个人的活动被严格限定在其所在的区域。因此，竞争是完全不可能的。一个人必须在自己的领域内遵照传统和习俗所希望的方式——何时、如何、何地——来从事工作。觊觎邻居的领域完全遭到禁止。农民接收了他的田产——包括牧场与林地在内的许多土地，可以养活自己及其家庭；与他从未梦想过增加其财产一样，手工业者与商人也甘愿满足于自己的份额，而不去窥视邻居的行业。农民拥有土地，城市居民是其顾客：不论哪种情况，他们都是自己生计的源泉；不论哪种情况，他们都能自给自足。因此，商人必须遵守许多防止竞争的保护性法规。此外，这也是一种商业礼节，即你不可渔猎顾客。你应该等待他们到来，“然后”（用笛福的训诫来说），“借助于神的保佑以及自己的谨慎，他才可以指望用自己的物品与邻居交易”[24]。参加集市的商人除了“夜以继日地守候在自己的货摊前”，别无他事可做。[25]

夺走邻居顾客的行为，是可鄙的、非基督徒的和不道德的。[26]“从事商品交易的商人”应恪守这条准则：“不得以口头或书面的形式将任何人的顾客夺走。不能这样对待其他人，因为你自己也将遭到其他人同样的对待。”[27]然而，这不只是一条准则，它已成为一项法令，我们可以反复遇到它。在美因茨，其措辞如下：[28]“任何人不应阻止其他人的购买活动，或通过抬高价格让某种商品更加昂
130 贵，违者以没收其出售之物品论处；任何人不应干预其他人的商业活动，或将自己的商业扩大到使其他商人破产的规模。”在萨克森，情况也大致相似。[29]“任何店主不应将顾客从其他人的商店中叫走，也不应通过标语或手势来阻止他们购买。”

即便是在不影响邻居生意的情况下招揽顾客，也被视作卑鄙。

在伦敦，直到18世纪初，人们仍认为店主将橱窗装饰得高雅别致，以诱惑顾客是不合适的。笛福与他后来的编辑们一样，直言不讳地表达了对这种行为的鄙视，他还略带满足地提及，只有个别面包师与玩具商是有罪的。[30]

广告你的生意或赞扬你的商品，也是绝不允许的。广告这种优雅的艺术，首先出现在17世纪中期的荷兰，出现在英国是17世纪末，法国则更晚。1667年创办的《根特邮报》于当年10月3日刊登了第一则商业广告。[31]此时的伦敦，没有一家报纸刊登广告；即便是在伦敦大火之后，也没有一家企业想到要为自己的新地址发布广告。直到1682年，约翰·霍顿出版了《农业与贸易改进集》后，伦敦的商人群体才开始习惯把出版物作为广告的媒介。[32]在此之前，在大街上小规模向行人分发传单的现象已经出现。

两代人之后，波斯特勒韦特[33]的陈述表明，时人已注意到它流行开来的事实。“现在，在报纸上对贸易与商业事务广而告之，这在整个英格兰、苏格兰与爱尔兰王国已相当普遍；……然而几年前，有名望的商人把在报纸上刊登广告以接触公众视为卑鄙可耻之事；但目前（1751年）看来，它似乎相当受尊重，交易中有巨大信誉的人们对此体会最深，它是使他们提供的信息为整个王国所知 131
的最便捷、最廉价的办法。”

在当时的法国，广告还没有如此先进。萨瓦里在其词典中（1726年）[34]并未提及“*réclame*”（意为“广告”）一词的经济含义。直到六年后的1732年，该词典的增订版出版后，他才补充道：“于大街上张贴海报，使一些事情广为人知。”他说的事情是指：船票出售；航行时间；大贸易公司从远方运到货物的通告，但它只在准备公开出售这些货物的情况下才会有；新工厂建立；地址变更。然而，最基本的商业广告却不见其中。报纸上的商业广告直到18世纪下半叶才出现。有点令人吃惊的是，第一份著名广告单《小海报》（*Les Petites Affiches*）于1751年5月13日问世，其中并未包含任何真正的商业广告。[35]换言之，“我在某地出售某种商品”这种简单的通告直到18世纪才在英国流行开来，在法国则还要晚得多。

在德国，仅有一两个城市在这一领域走在前列。可以以柏林与汉堡为例，但即便在那里，这种革新也是孤立的，唯一的例外是书籍，它们一开始就被大量广而告之。

赞扬你的商品或指出你的商品在哪些方面比其他人的优越，同样是邪恶的。商业中最不适当的话，就是说你的价格比同行低。“廉价出售”是最不绅士的行为：“通过廉价出售或降低价格以损害你的邻居，将不会得到保佑。”[36]

廉价出售在当时人们的眼中糟糕之极，更不值得广而告之。“自从我们的作者去世后，”笛福的《英国商绅大全》第五版（1745年）的编辑们说道，[37]“这种廉价出售行为发展到如此可耻的地步，
132 以致某些人公开广告他们将廉价出售余下的商品。”人们会问，为什么这些编辑如此关注此事？其原因体现在随后的段落中：“我们的杂货商互相竞争，广告其廉价出售的商品，而这是一个公平交易者负担不起的。”这是老调重弹：固定的利润、固定的生计、固定的生产及固定的价格。

我们有一个法国巴黎的例子，它更醒目地表明人们认为这种冒犯之举多么可憎。1761年的一项法令[38]向法国首都的各色人群宣告：发布广告，用低于惯常价格来出售商品，应当遭到严厉谴责，且只能视为处于困境中商人的最后手段。这项法令继续禁止巴黎及其郊区的商人“争相追逐顾客，尤其是分发传单以引起人们注意商品”。

与生产者一样，消费者同样受到关注。在某种程度上，消费者受到的关注甚至更多，因为所有的生产都是为了消费的原始概念尚未消逝。故人们强调商品的**优质**，强调货真价实的原则；为了达此目的，各地颁布了无数法令，这种现象在17、18世纪尤为突出。

任何一件商品的交换价值对企业家影响最大——这个观点在纯粹资本主义的概念获得认可之前很久就有了。我们可以从18世纪英国对此问题的矛盾观点中看出其发展是多么缓慢。约西亚·蔡尔德爵士主张，应当允许每个制造商按自己的判断来决定

用什么样的商品和什么样的品质供应市场。这种主张在当时似乎是少数派，就像他的见解在许多其他问题上也是少数派一样。今天，看到蔡尔德当年呼吁制造商有权生产劣质产品的文字时，人们会感到十分奇怪。“如果我们想要获得世界性贸易，”他宣称，[39]“就必须模仿荷兰人，他们既生产最优质的产品，也生产最劣质的产 133
品；唯其如此，我们才能满足各种市场、迁就各种口味。”

在一个有着此类经济思想的世界中，“公平价格”(just price)的理论是一种根本因素。个体在价格形成过程中没有发言权。价格事先已被确定；它与经济生活中的其他一切一样，受制于宗教与伦理原则。正因为如此，才能有助于公共利益，也有助于消费者与生产者。不同的时代有其不同的决定标准，比如在路德的时代，生产成本是决定因素。但随着商业交往的扩大，公平价格的原则变得越来越不可能，价格必须由市场因素决定的观念[40]越来越广为接受。尽管如此，价格建立在伦理(正如下文所示)而非自然原则之上的观点，仍为人们所强调。因此，个体**不该**任意决定价格；而后来的观点是，他**不能**任意决定它。

在一个什么样的世界中，这些观点占据支配地位？如果我们必须用一个词来形容，那就是“缓慢”。稳定是其堡垒，传统是其向导。个体从未在喧闹与混杂的商业活动中迷失自我。他能够完全控制自己；他拥有自己的尊严，并不会为了利润而降低价格。伴随着少许的个人自豪感，商人们在各地开展商业与贸易。与最迅速地感受到资本主义加速发展的大城市相比，这种自豪感在乡村更为强烈。这一时期有位敏锐的观察家注意到“乡村商人傲慢与自大的举止”。[41]我们几乎到处都能看到这类商人：穿着紧身及膝的短裤与长外套，头戴假发，动作有几分僵硬。与他做生意波澜不惊；他以传统方式服务他的顾客，而无需太多想法或担忧，他毫无兴奋 134
感，也从不抱怨这种方式缺陷很多。

今天，贸易繁荣的最好标志之一是普遍的匆忙与忙碌，但直到18世纪末，这却被视为懒散的自然标志。商人们故意放慢脚步。“在巴黎，人们处在持续的匆忙之中——因为那里的人无事可做；

而在这里(即丝绸业中心里昂,一个颇重要的商业城市),我们步伐缓慢,因为每个人都很忙碌。”这是上文提及的那位观察家于1788年得出的判断。[42]

在这幅图景中,非国教徒、贵格会教徒、卫理公会教徒都是合适的角色,尽管我们习惯于把他们视为最先与资本主义观念相关的人群。外部举止是内在生活的反映。“迈出稳健的步伐,不要翘起二郎腿”,是清教徒生活法则的一条标准。[43]“虔信者如果有或者应当有爱己之心,就将以井然有序的步伐行走,并以庄严高贵的姿态坐车。”[44]

犹太人就闯入了这样一个世界。他们迈出的每一步,都冒犯了经济原则与经济秩序。这十分清楚地体现在各地基督徒商人的一致抱怨中。

但是,犹太人是这方面的唯一罪人吗?专门挑出“犹太交易”(Jewish dealing),将之诬蔑为不诚实、违背法律及惯例,并将其特征描述为撒谎与诈骗,这样公平吗?毫无疑问,就违反惯例与法规而言,基督徒生产者与交易者的行为不总是无可指责的。对此应当想到,人性本如此。但除此之外,我们所关注的时代,并不能自夸为拥有很高的商业道德标准。否则,为什么有必要制定众多涉及经济活动各个方面的法规与禁令?当时的证据已毋庸置疑地证明了这点。

135 上文已经提及的《诈骗趣典》出版于18世纪初。它必定广为传阅,因为短短几年间就发行了好几版。打开这本书,你不禁会奇怪,这个世界上是否还有诚实存在。诚然,产生这种印象,是由于此书在小小篇幅内就集中了如此多关于诈骗的实例和插图。但即便考虑到这个事实,当时必定存在大量可疑行为的印象也不能根除。如果在这一点上仍有疑问,那么其他证据也很快会将疑问消除。“你会发现如今(1742年)很少有不掺假的货物,”一位德国作家如此感叹。[45]有许多针对此类邪恶行径的禁令,帝国诏令(如1497年诏令)、治安条例(如1548年奥格斯堡条例)以及起源于商业圈的行规习俗(如1607年卢卑克准则),所有这些均针对这种行

为而发。但弄虚作假绝不仅仅限于商品的生产领域，贸易中的虚假行为也不陌生。破产欺诈于17、18世纪频频发生，在当时已是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人们再三抱怨它们频频出现。[46]实际上，17世纪英国商人散漫松弛的商业道德臭名远扬。[47]诈骗及伪造据说是“英国商人根深蒂固的罪”。“我们的商人，”一位17世纪作家说道，[48]“通过对商品没完没了的过分要价，向世界宣告，如果他们控制了世界，就将欺骗所有人。”

情况既是如此，特地标出犹太人的理由是什么？面对当时的这种既定原则，我们能否真的说出犹太人行为的某些独有特征？我认为我们可以做到此点。我认为独到的犹太特性，不仅存在于到处冒犯现行经济秩序的个体犹太人中，而且存在于全体犹太人之中。犹太人的商业行为反映了在犹太商人中间广为接受的观点。因此，犹太人从未意识到自己做错了什么，也从不会为商业的不 136
道德感到内疚；他们的策略与一种对他们而言合适的体制相一致。他们自认为正确的事情，在其他人看来却是错误而愚蠢的。我们这里谈论的，并不是那些公认为不当并普遍受谴责的资本犯罪。必须在某些法律制度（例如财产）的基本准则和那些随着社会进步而变化的习惯行为之间作出区分。只要所有权存在，盗窃行为就要被视为一种资本犯罪，但就收取利息而言，每个时代的看法存在许多不同。第一种可归于前一类，第二种则属于后一类。

毫无疑问，犹太人在其独特的商业活动中，犯下了这两种形式的不当行为。人们普遍认为，犹太人早期从事着不道德的行为。比如，他们因接受并经营盗赃而经常遭受指控。[49]但作为一个整体，犹太人自己也谴责这种行为；就此而言，正如有诚实的与不诚实的基督徒一样，犹太人中也有诚实者与不诚实者之分。如果有犹太人沉迷于惯常的诈骗行为，那么他们就是与绝大多数的犹太人及基督徒为敌；而后两者均认为，这种行为有违公认的正确标准。我们有证明这点的有力记录。汉堡犹太人的历史即是一例。17世纪，葡萄牙犹太人在一定程度上要为新来的德国犹太人的正当商

业行为向当局负责。一旦泰达斯科人[①]来到汉堡，他们必须向其葡萄牙同胞保证不购买盗赃，也不从事见不得光的买卖。有一次，德国犹太人的长老被召集到马哈玛德[②]，他们受到警告，因为他们中
137 的一些人违反了誓言；还有一次他们因为从士兵手中购买盗赃而受到警告。[50]

在掂量早期资本主义时代针对犹太人的种种指控——它们从总体上来说并非空穴来风——时，必须记住我所强调的这一点。公认的犯罪，如盗窃及接受盗赃，不能包括在这一论题之下。与基督徒一样，犹太人也痛恨这种犯罪行为。然而，对于所有犹太人违反法律与惯例的共有行为，犹太人并没有觉得这是错误的，此类行为可以被视为一种独特犹太观点的结果，这些必须进入我们的认识范围之内。通过观察他们的行为，我们能够发现什么？

我们发现，犹太人比其邻居更多地以商人身份出现在我们面前；他们为了自身的缘故而从事商业；他们认识到，在真正的资本主义精神之中，获利高于其他一切目标。

我举不出比《辜黎柯·冯·哈梅因自传》更好的例证，顺便说下，它是一本有关早期资本主义时代犹太生活与思想的信息宝库。一个汉堡商人的妻子辜黎柯，生活于1645—1724年间，这一时期汉堡与阿尔托纳(Altona)的犹太社团正迅速成长并走向繁荣；我们几乎可以在各个方面将这个不寻常的女人视为这一时期的典型犹太人。她的叙述自然淳朴、鲜活有力，引起了读者关注。当我翻开这本《自传》时，作者以其丰富的生活阅历，为读者展现了一个完整的人物性格，这使我再三想起著名的拉特夫人(歌德的母亲)。

我在此引用这本精彩的著作，为的是说明那一时期的犹太人嗜好金钱，而这在辜黎柯这名才华横溢的妇女身上竟然都如此突出，

---

① 泰达斯科人(*Tedescos*)，在意大利文中指“德国”，在犹太人中通常指阿什肯纳兹犹太人。——中译者注

② 马哈玛德(*Mahamad*)，葡萄牙犹太人会众的管理机构。这个词仍在伦敦的葡萄牙与西班牙犹太人中间使用。——英译者注

所以我认为这种特征必定是普遍的。实际上，金钱是她的全部要义与终极目标，也是她最乐意与其他人谈及的对象。尽管该书关于商业事务的叙述仅占很小一部分，但作者不少于609次（全书共313页）提及金钱、财富、获利等等。人们的特征与行为只是在与金钱多少相关时，才会被作者提及。她最津津乐道的是好婚配——好不好是从经济观点来判断的。子女的婚嫁实际上成了辜黎柯一项主要的商业活动。“他也看了我的儿子，几乎行将达成协议之际，却由于1000马克而无法撮合。”这类事在书中比比皆是。她在谈及自己的第二次婚姻时写道：“下午，我丈夫用一枚一盎司的贵重金戒指和我结了婚。”我不由将这种在犹太人中间流行的独特婚姻观念视为他们重视金钱的征兆，尤其是他们从纯商业的角度赞美生活中最珍贵事物的习性。比如，儿童自有其价值。这也是那一时期犹太人中间理所当然之事。“花了我许多钱的孩子与没花我一分钱的孩子都一样，他们都是我亲爱的孩子，愿上帝宽恕他们，”辜黎柯写道。达到适婚年龄的人具有一种价格，会随市场行情的变化而变化。学者或学者的孩子很抢手。在一个事例中，我们得知一名父亲用自己的孩子投机。正如格雷兹提及的，所罗门·迈蒙众所周知的天赋时常被人引述：“11岁时，他已完全掌握了《塔木德》，他……作为未来的丈夫而受到众人追逐。他那贫穷的父亲，带着一份投机心理，一次性为他准备了两位新娘，而他却没有看中……其中任何一位。”太多类似的事件已足以证明这个结论，即它们必定是典型的。

但是，反对者可能强调基督徒也同样看重金钱，只不过嘴上不承认而已；人都是虚伪的。这种反对可能包含了某种程度的真实。就此而论，我要说的是，犹太人所专有的特征是天真地把金钱作为生活的中心；这点在他们看来天经地义，不用掩饰。

17、18世纪的人对于我们注意到的这一特征有什么见解？他们似乎对此普遍看法一致，这支持了我们的理论。当时，资本主义尚不发达，犹太人被视为一种经济观点的代表，这种观点把获取利润作为一切商业活动的终极目标。使之有别于基督徒的，并不是

犹太人的“高利贷”，也不是其追逐利润、聚敛财富；而是犹太人公开从事这种活动而不认为有任何不妥，他们无所顾忌并冷酷无情地专注于自身的商业利益。但更可怕之事与基督徒“高利贷者”有关，这些人“比犹太人更坏”。“犹太人将其灵魂穿在衣袖上，而丝毫不感到羞耻；但这些人用基督徒的伪善面容从事着魔鬼般的交易。”[51]

必须引用一两个当时人的看法。“这些人除了邪恶的财神以外再没有其他的上帝，除了获取基督徒的财产以外再没有其他的目的……他们……从一切事物中寻找利润。”[52]这是约翰·麦加罗波利斯神父于1655年3月18日写下的判词。另一种看法更为苛刻。[53]“不要相信那些(巴西)犹太人许下的承诺，他们是个不讲信义且胆小懦弱的种族，并与全世界尤其是与一切基督徒为敌。只要他们自己能够在炭边取暖，就根本不关心谁家房屋着火。他们宁愿看到10万基督徒死去，也不肯遭受100克朗的损失。”就连对犹太人较为友善的萨瓦里，[54]也指出了这点。“人们将一个设法获得想要的利益并榨取与他交易者的高利贷商人，称为‘一个真正的犹太人’。当与一个刻薄、冷酷和吝啬的人交易时，人们通常说‘他已落入犹太人之手’。”诚然，“公事公办”(Business is business)这个短
140 语最早由一位基督徒商人造出，但毫无疑问，犹太人首先依照它制定出他们的方针。

在此我们应当提到，几乎所有国家的谚语都将犹太人描述为逐利者(gain-seeker)，他们对金钱情有独钟。“甚至对犹太人而言，我们的圣母马利亚也是神圣的”(匈牙利谚语)——指的是克雷姆尼泽金杜卡①。“黄色是最适合犹太人的颜色。”(俄罗斯谚语)“黄色对犹太人而言是最昂贵的颜色。”(德国谚语)

这种犹太人认为合法的逐利行为，为他的商业原则及行为提供了解释，但这些原则和行为也常常引发抱怨。首先，他毫不理会某个行业或手工业与另一个行业或手工业之间的严格界限，而这种

① 克雷姆尼泽金杜卡，一种流通于匈牙利的金币。——中译者注

界限又普遍为法律或惯例所强调。我们再三听到这种指责，即犹太人不满足于一种类型的活动，他们做任何自己能做的事情，因而扰乱了行会制度希望维持的秩序。他们的目标是把持一切商业与一切生产；他们有一种力图在各个方面扩展的强烈欲望。“犹太人通过将全部贸易笼络到自己身边，力图摧毁英国商人”，这是约翰·麦加罗波利斯神父于1655年发出的进一步抱怨。[55]“犹太人是窥探各种贸易的狡猾民族，”约西亚·蔡尔德爵士说道。[56]辜黎柯也这样描述她父亲的生意：“他经营宝石及其他商业——因为每个犹太人都是贸易上的万事通。”

德意志的行会曾无数次抱怨贸易中无处不在的犹太人，抱怨他们毫不在乎经济活动中被严格划分的界限。1685年，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市政当局强烈抱怨犹太人参与了一切商业活动，例如亚麻与丝绸零售业、布匹与书籍销售业。[57]在另一个法兰克福（奥得河畔的），[58]犹太人受到指责，是因为他们出售外国编织品，从而损害了金饰带制造者的利益，等等。

或许，形成这种无所不做贸易（universal trading）倾向的原因在于，众多杂用品与所有罚没的抵押品仅仅由于巧合而汇聚到一起， 141
它们集中在犹太人的商店里，出售它们就再自然不过地干扰了各个行业经营者的专项生意。这些二手商店是现代百货商店的原型，它们的存在威胁到工商业的主流秩序。追溯至15世纪的一首古老的累根斯堡歌曲，形象描绘了这种二手货物的收集，[59]而随着时间推移，其中的细节变得越来越清楚：

任何一种手工业，无论多卑微，
犹太人都会将之毁到极致。
无论谁需要衣服，
他会赶紧向犹太人付款；
无论银器、亚麻还是马口铁，
或者他家当时缺少的任何物品，
犹太人会随时满足他的需要，

用他持有的抵押品——这他确实有许多。
因为被盗的物品与强盗的赃物，
很少与犹太人无关。
*　　*　　*　　*　　*　　*　　*
披风斗篷、齐膝短裤、少女的面纱，
这一切犹太人那里都有的卖。
这样，没什么人去光顾手艺人，
因为全世界都与犹太人交易。

这里出现了一个有趣的问题。犹太人违反行会规矩以及他们对纯商业目的的强调，是否与他们对重商主义的敌视有关？他们的目标是为了建立自由贸易的原则，而置指导重商主义国家的商业理论于不顾？似乎如此。“犹太贸易”是应用于18世纪法兰克福商业中的术语，因为这种贸易主要从事进口——“它极少雇佣德
142 国劳动力，但只有依靠国内消费才能繁荣。”[60]19世纪初，德国市场上充斥着廉价英国产品，而其中大多数靠拍卖出售，犹太人被视为这种进口贸易的中流砥柱。犹太人几乎垄断了这些拍卖活动。“由于犹太人在很大程度上掌控了制成品交易，因此与英国的贸易多半同他们进行。”犹太人的“商店里摆满了外国的帽子、鞋子、长统袜、皮手套、铅与铜制品、漆器、餐具、各式成衣——它们均由英国船只运入。”[61]法国的情况也大致如此。[62]然而，不止于此。犹太人在重商主义时代还犯下了一个致命之罪：他们进口了原材料。[63]

我们接着就看到，为了追逐商业利益，犹太人不仅很少在乎行业之间的障碍，而且也很少在乎国家之间的障碍，更不用说在乎各个行业中流行的行规法条。我们已经看到，人们在早期资本主义时代是如何鄙视追逐顾客的行为。在此，犹太人依旧是冒犯者。他们到处寻找买家与卖家，而不按商业惯例的规定，待在店里等待顾客到来。对此，我们拥有大量证据。

1703年柯尼斯堡[64]的毛皮商提出控告，指责“犹太人赫尔施与摩西及其代理人，在买进原材料与出售制成毛皮领域常常占据领

先地位，他们（请愿者）因此蒙受了许多损失”。1685 年，法兰克福珠宝商与金匠也遭遇了类似经历。[65]犹太人借助众多“耳目”，在基督徒商人的眼皮底下将金银抢购一空，后者被迫从犹太人那里购买所需的一切旧金银。几年前，那个城市的整个贸易机构曾抗议犹太人“秘密监视基督徒商人的贸易”。在稍早的 1647 年，法兰克福的裁缝们发起请愿，[66]要求禁止犹太人从事新衣销售业。“令我们痛苦的根源之一就是，犹太人可以自由出没于街头，满载各式各样的货物与布料，像许多骆驼与驴子一样，跑去迎接来到法兰克福 143
的每个新人，不管他的地位高低，都向他兜售他想要的东西；由此剥夺了我们的日常生计。”[67]甚至在比这更早的 1635 年，丝绸商人也请愿，他们悲叹犹太人“守候在城市的犹太区外、小旅馆以及有机会的一切地方；一旦士兵及军官来到城市，他们就公开或秘密地穿过许多街道，以便接触他们。他们还安排了一些熟练的裁缝，并给予后者一些设备，以便在军队路过时能够在其商店中展示他们的商品”[68]。

1672 年，勃兰登堡有过这样一起控告。[69]“犹太小贩穿梭于城乡之间，将他们的商品强售于人。”奥得河畔的法兰克福也有类似事情，[70]那里的细节则更为充分：犹太人追逐顾客——追逐旅客至其酒店，追逐贵族至其城堡，追逐学生至其宿舍。在奥地利的尼科尔斯堡，我们得知：[71]“犹太人将所有的贸易、所有的金钱、所有的商品，都笼络到身边。他们在城外守候，试图结交并亲近尚在路上的旅客们，努力从基督徒市民那里揽走顾客。”

19 世纪早期一位博学的作家描绘了犹太人如何寻找新顾客。[72]他说这是他们的惯例：“犹太人经常去各种公共场所，在那里阅读许多报纸，力图获得做生意的每个可能的知识，尤其是记下有什么样的陌生人将会到来；通过聆听每一段对话，发现谁家的房屋有危险，以便与他们讨价还价或者签订合同。”

在犹太旧衣商居住的街道中，也有许多类似的活动场景，人们看到的结果也常常是一样的。实际上，交易者有时会抓住行人的胳膊，试图强迫他们购买。在我们的现代城市中，这种开展生意的

144 方式并不让人陌生；众所周知，在18世纪的巴黎，这种行为与旧货商，也就是我们所知道的旧衣商有关，而他们绝大部分是犹太人。[73]对这种场景有个绝妙描述，值得在此引用：[74]“有的人为这些杂乱无章的商店拉生意，会极粗鲁地向你喊；一旦他们中的一个请到了你，所有其他的店主将在你的途中重复这种震耳欲聋的邀请。他们的妻子、女儿、雇工、狗，都在你耳旁吼叫……有时，这些家伙抓住某位老实人的手臂或肩膀，不顾后者意愿，将其强拉进店；他们用这种不得体的游戏找消遣……”

从那时在德意志西部地区游历的一位旅行家口中，我们听到了同样的故事。“走在犹太人众多的街道上，已成为一件烦心事。他们的纠缠时时刻刻、无处不在，你会不断遇到这种问题，我可以卖给你什么东西？要不要买这个、那个或其他的？”[75]

他们或者变成四方行走的商人，以摆脱习俗约束。“犹太人从未想过要将放在走廊的椅子搬回商店柜台，而通常借助厚木板来扩展它们；他在能够进入的任何房屋中，靠墙摆一个长凳或一张桌子，或者甚至将前廊变成一个商店；或者租一辆手推车，将之改装成他的移动商店，他通常还会粗鲁地把推车停在一家出售与他同样商品的商店前。”[76]

“抓住顾客”——这是他们的目的和目标。这难道不正是今天大型企业的指导原则？一些重要的商业组织，例如德国通用电气公司，不也指向同样的目标？

一旦人们求助于广告，这项措施就开始系统化。我们刚才注意到的那些来自旧货商的“震耳欲聋的邀请”，现在则由我们商业生活中无处不在的广告制造出来了。如果犹太人被认为是“抓住顾客”这一制度的创始人，那么，将他们视为现代广告之父的断言同
145 样站得住脚。然而，对此我却不能提供决定性证据。有必要仔细研究最早的报纸，以便发现发布广告者的名字。事实上，迄今为止，很少有人研究广告。唯一受到足够重视的分支是商业公告的历史。尽管如此，我可以举一两个例子，来说说犹太人与广告行为的关系。

我所知道的最早的广告，可以在1711年5月28日的《福斯报》(*Vossische Zeitung*)第63卷中找到，大意是："这是为了告知所有人，一位荷兰商人(犹太人?)到达了位于犹太街的博尔滕先生家中，他带来了各种质量上乘的茶叶，现在愿意廉价出售。任何人若有意购买，应当尽早前来，因为这位访客在此停留的时间不超过八天。"

报纸中的第一个著名广告，可以追溯至1753年的荷兰。广告者是位名叫拉扎尔的眼科医生。[77]一份非常古老的美国广告——我不敢说是不是最古老的——出现于1761年8月17日的《纽约信使报》(*New York Mercury*)中，其内容如下：[78]"海曼·利未将在贝亚德街出售各式营地装备、最棒的英式军靴……以及用于光荣战争的盛大场面的一切东西。"

最后，犹太人是现代出版业这种广告机器，尤其是廉价报纸的创办者。[79]波利多尔·米勒劳创立的《小报》(*Petit Journal*)是"廉价(half-penny)出版业"的雏形。

然而，获得可能的地址，在路上拦截旅客，为商品大唱赞歌——这些只是俘获顾客游戏的冰山一角。另一个可以补充的内容是装饰待售商品以吸引顾客。犹太人是这门技艺的伟大能手。更为甚者，有足够多的证据表明，获得尽可能多的顾客，或者通过创造新 146
的需求以扩大顾客圈，是每个商人的经营权利(及义务)，而犹太人是此一通则的最先拥护者。

现在，在一个品质得到规范的社会里，要达到这种目的，唯一有效的手段就是降低价格。因此，我们发现犹太人利用了这个武器，就不会感到惊讶。我们看到，正是它让犹太人遭到基督徒商人的厌恶，因为后者的经济立场是全力维持价格。犹太人廉价出售；犹太人破坏价格；犹太人试图以低价吸引顾客——17、18世纪的犹太人在哪里从事买卖，哪里就充满了此类抱怨。

如果引用关于这一问题的所有证据，我们的篇幅将会超载。因此，举出其中一些就足够了。

首先，在1753年"归化法案"通过后，英国爆发了反对犹太人

的风暴。主要的担心之一就是，如果犹太人被承认为公民，他们会廉价抛售商品，从而使本地人无法谋生。[80]

其次，这种抱怨也来自法国。“犹太人带到集市上的……物品……的售价，要比在商店中出售的廉价许多”，这是朗格多克的省长对蒙彼利埃商人（1740 年 5 月 31 日）的抱怨所作的答复。[81]南特的商人认为，[82]那些觉得与犹太人交易是做了好买卖的公众，往往是被骗了。同时，他们承认犹太商店中的价格确实比其他地方低。巴黎的商人也承认：犹太人售出的价格甚至要比工厂里的还便宜。[83]关于一位名叫亚伯拉罕·欧勒曼的菲尔特犹太人，[84]巴黎的铜器商曾这样记录：“他以低于全国均价的价格出售同样质地的铜器。”在里昂，熟练的丝织商们通过了一份决议（1760 年 10 月 22 日），其中将经济困顿归咎于犹太人的影响，因为后者通过降低价格而控制了各省的丝绸业。[85]

147　1815 年，瑞典议会讨论了是否应当给犹太人完全贸易自由的问题，而反对这项提议的主要理由便是犹太人的廉价出售行为。[86]

我们还感受到来自波兰的同样压力。犹太人告诉基督徒商人，如果他们（后者）以与犹太人一样便宜的价格出售货物，他们也能够吸引到顾客。[87]

德意志也毫无二致。勃兰登堡（1672 年）[88]、法兰克福（17 世纪）[89]、马格德堡（1710 年）[90]都重复着同样的情景。当时一位在德国的瓦拉几亚旅客[91]记载了这种无所不在的控告。《1750 年普鲁士一般法令》承认了这一点。“我们城市的商人……抱怨……出售同样商品的犹太商人给他们造成了重大损失，因为后者以较低价格出售。”即使到了 19 世纪，仍能遇到这类抱怨。奥格斯堡的批发商们请愿（1803 年），要求反对承认犹太人，[92]我们从中读到，“犹太人懂得如何从普遍的商业萧条中获利。他们以极不道德的价格从急需钱的人手中获取货物，然后再以较便宜的价格出售，从而扰乱整个市场”。

即便在今天的许多行业部门中，基督徒生产者及商人仍将犹太人的降低价格视为一种严重危害贸易的行为。众所周知，这是

个公开秘密，经常引发讨论，我会在下文相关处再次谈及这个问题。

金融的历史是另一个例子，因为它表明犹太人有搞低价格的名声。18 世纪初，奥地利政府像往常一样决定在荷兰筹集新贷款，国王向负责谈判此事的帕奇曼男爵发布命令(1701 年 12 月 9 日)，向他征求私人意见，并以匈牙利铜矿作担保以筹集更大一笔贷款。更特别的是，男爵联系了荷兰的葡萄牙犹太人，因为联省的其他臣民在一般保证以外要求一项附加保证。[93]维也纳宫廷档案馆的一份 148
报告(1762 年 5 月 12 日)表述了这样一个观点："鉴于犹太人能够提供比其他人更低的价格……在有关军队承包合同的问题上，与他们达成协议是明智的。"

然后就出现了一个令所有自作聪明者试图联手解决的问题。在工作时、在商店里、周末下午在城墙外散步以及傍晚喝啤酒时，他们再三互相询问：这如何可能？这究竟是怎样做到的？犹太人怎么能实现廉价出售的"卑劣行径"？原因何在？

依据每个询问者的能力与立场，答案是不同的。因此，对于现有的无数解释，在没有考察其价值之前是不能接受的；鉴于人们关于犹太人能够降低价格的见解具有一致性，我们没有理由对之产生怀疑。无论如何，目前仅有那些能够对某种特殊的经商方式或特殊的商业道德给予提示的观点，才能引起我们的兴趣。

最常见的解释是他们不诚实，其结论是以这种方式得出的：由于犹太人开支相同，生产成本也一样，如果其价格低于通行的价格，其中肯定存在见不得人的因素。犹太人必定通过不诚实的手段获取了商品，他们毫无疑问盗窃了物品。犹太人普遍的坏名声，更加强了这种解释的可能性，而且低价必定支持了针对他们是赃物接受者的指控。

我不打算引用支持这种观点的事例，因为这其实最乏味。毫无疑问，在许多情况下它是正确的。但如果将此解释为犹太商人采取低价的唯一原因，那么根本没有必要提及此事，因为它没有任何实际意义。

149 事实上，即使是行会成员中的极端分子，也只能寻找其他原因解释犹太商人的廉价出售行为。他们发现，犹太人并非经常参与真正的违法活动，而是经常有他们根本不应当做的行为。是什么行为呢？犹太人经营违禁物品（战时禁运品等）；失效的保证物；被没收的货物（比如被海关官员没收的）；从负债累累因而非常需要钱的人那里[94]，以近乎白送的价格买入的货物；[95]在拍卖中三文不值二文而拍到的旧货；因破产而贱卖的货物；[96]质量不合格的产品；[97]或最后，犹太人不惜自己破产也要压低价格。[98]

很难说清，这些事例——梅斯商人所谓的“犹太人的卑劣行径”[99]——在多大程度上是普遍的还是零星的。这对于我们的目的而言也不太重要。说它们纯粹是捏造出来的，似乎也不大可能。然而，值得注意的重要一点是，以上列举的卑劣行径都被归到犹太人名下。即便只有很小一部分与事实相符，也足以使得它们能反映症状；对于用来支持以其他方式获得的结果，它们也十分有用。我将在下文回到这个问题上。这里将继续列出一些解释犹太人可以低价的原因。

与已经提及的情况一起出现的，还有针对犹太人出售劣质商品的指控。这种指控频繁出现，其正确性几乎无可置疑。来自马格德堡的一份官方报道，来自勃兰登堡的一个请愿，来自法兰克福的一起控诉[100]——所有这些均指向同一个问题。我曾不止一次把《商人词典》作为可靠权威参考，此书也提及犹太人出售劣等商品：“他们知道如何擦亮和润饰，如何重新上色，如何展示其最佳面，如何
150 提供一个光鲜的外表、气味、味道，以致最伟大的鉴赏家也常常上当受骗。”

我们十分熟悉的南特商人的报告中也重复了此类言辞。尽管犹太人的货物很廉价，但实际上很昂贵，因为他们出售已经过时或者不能再用的东西。他们为长统袜重新上色，并用研光机使之变亮，然后作为新货出售。但它们却很不耐穿。里昂的丝织商讲述了同样的故事：[101]犹太人破坏了丝绸业，因为他们为了低价出售，只订购次等品。同样，1705 年波希米亚的长官也说，[102]“犹太人已

经掌握了一切手工业与商业，但由于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只生产劣质产品，因此可盈利的出口贸易并未出现。”韦格林在瑞典议会(1815 年)上的观点也与此一致。“确实，”他说道，“犹太人独自从事棉布印染业，但他们的劣质商品——所谓的‘犹太白布’(Jews' calico)——完全破坏了这个行业。”

从早期资本主义时代就已开始的这种抱怨，一直没有间断。基督徒制造商声称，犹太人降低价格的必然结果是：为了不惜一切代价维持低价，犹太人降低了商品质量。

总结所有这些引证的事实，我们可以看到犹太人开创了替代原则。

所谓犹太人的劣质商品，实际上却并非完全如此。它们除了在质量上更差外，也与其他商人的商品并非同一种类。它们是与原有物品有着同样用途的新物品，但却是由更廉价的原料或是通过降低生产成本的新过程而制成。换言之，替代原则开始出现，犹太人因而可以被视为应用这一原则的先驱。最频繁的情况发生于纺织品之中，但也有其他例子，比如咖啡替代物。从某种意义上说，与此相关的染色业也必须提及，犹太人的影响推动了它的发 151
展。起初，人造茜素的发明者将昂贵的化学药品与其红色染色材料混合使用，而犹太人引进了更廉价的材料，从而推动了染色业发展。

此外，还有一项针对犹太人的指控，尽管它出现得不多。那就是犹太人之所以能够以比基督徒更低的价格出售，是因为缺斤短两。[103]在我们已经提及的阿维尼翁羊毛商的例证中，犹太人因此遭到讥笑辱骂。就德国犹太人而言，我们可以提供一个实例说明。“犹太人寻找最微小的利润。如果他测量的长度是 10 厄尔[①]，实际则只有 $9\frac{7}{8}$。基督徒(顾客)清楚这一点，并自我安慰道：‘犹太人量得短，10 厄尔从来都不是 10 厄尔，但犹太人卖得便宜。’”[104]

对我们而言，所有这些事例的重要之处在于，是否以及在何种程度

① 厄尔(ell)，旧时欧洲量布的长度单位。——中译者注

上可以从据称是犹太商人采用的不同降价方法中，追寻一些犹太人所特有的普遍商业原则。在我看来，整个情况可以归结为，某种程度上犹太人在商业中抓住了证明目的的手段。考虑其他商人，以及尊重法律规定与社会需求，这些都不重要；而另一方面，与商品有关的交换价值，以及一切商业活动只与财富有关的观念，这些变得重要起来。我在别处已描述过资本主义的内在倾向——不顾一切获取利润，这里可以看到它的早期起源。

但我们尚未列全犹太人为降低价格而采取的各种方法。现在，我们转向与上述方法同等重要但却在实质上不同的方法。上述方法仅仅带来价格的表面降低，或者以其他人为代价的实际降低，而马上要说的方法却产生了真正的、绝对的低价。到底是什么方法呢？以某种方法
152 降低总生产成本的革新。无论生产者还是销售者都不会自我满足，如果工资降低或生产销售过程更有效率，那么实际的生产支出便会降低。

犹太人采纳了所有这些能够降低商品价格的方法，并且率先采纳了这些方法，对此我们拥有充分的记录可以证明。

首先，犹太人能够卖得更便宜，是因为他们比基督徒商人更满足于薄利。公正的观察家们多次留意到这个事实，甚至犹太人的竞争者也承认它的真实性。让我们再次引述马格德堡的官方报道。犹太人卖得很便宜，“那里的商人必定蒙受了损失。因此他们必须像犹太人那样遵照后者的要求开展生意。”[105]另一份文献也认为“犹太人比基督徒更满足于薄利”。[106]波兰犹太人告诉了波兰基督徒什么？[107]那就是如果他们（波兰人）不如此奢侈地生活，他们也能以与犹太人同样的价格出售货物。18世纪末一位目光敏锐的德国旅行家，得出了同样结论。“抱怨（犹太人卖得便宜）的原因显而易见：它存在于傲慢店主的过度骄傲之中，在交易中，他们的开销是如此之多，以致无法收取低价。因此，犹太人应该值得公众感激，他们以节俭的习惯带来了收益，并迫使开销大的店主，要么变得更加节约，要么走向彻底失败。”[108]维也纳宫廷档案馆的报道（1762年5月12日）也持同一看法。犹太人货品卖得比基督徒价

低，“是因为他们更节俭，生活更节约”。1756 年 1 月 9 日的一份匈牙利文件中重复了同样内容，文件讨论了约瑟夫二世减少犹太人经营烈酒特许的提议。其中指出，[109]由于节约而贫穷的生活，犹太人得以为他们的特许支付更多费用。

对于他那个时代英国的这一问题，约西亚·蔡尔德爵士有最清楚的阐述。“他们是个拮据的民族，过着悲惨的生活，”他说道，[110] 153
“因此，他们能够也确实承担起比英国人更为薄利的贸易。”18 世纪中期，这种观念仍然十分流行，因为这样的呼声不断扬起：犹太人由于极端节约，才能以低价出售给本地人。[111]法国也流行着类似观点。朗格多克的省长在答复蒙彼利埃商人长期的抱怨时说道，[112]“我坚信，除了他们对公众的要求缺乏关注以及尽可能获取利润的顽固决心之外，犹太商业……对蒙彼利埃商人造成的损害是较小的。”

但这并非全部。一些必定拥有明察秋毫的天赋的人宣称，犹太人发现了另一种窍门，他们借此得以成功获得与其基督徒邻居相同甚或更大的利润，哪怕他们的价格相对较低，这个窍门就是他们增加了营业额。直到 19 世纪前半期，它一直被视为一项专门的“犹太实践”[113]：“薄利多销远比巨利缓销来得好。”这种看法并不少见，它实际上频频出现。[114]

小利润，快赢利——显然与社会经济组织中主要仅为生存而生产的原有观念相违背——犹太人是这项新商业原则之父。利润曾被认为由传统所固定，此后它就由每个商人自行决定。这是伟大的创新，它同样源自犹太人。每个商人设定合适利润率的行为，这是犹太人的准则；决定是否以一定的利润出售，或者在一段时间内不获取利润的情况下出售以便在今后获得更多利润，这也是犹太人的准则。[115]

最后，我们还需提及对犹太人的一种嘲辱，即他们要么通过雇佣最廉价的劳动力，要么借助更经济的方法以降低生产成本。

第一种方法引起了大量抱怨。阿维尼翁的羊毛制造商[116]、蒙彼 154
利埃的商人[117]、奥得河畔的法兰克福市政当局[118]及另一个法兰克

福的裁缝行会，都是一些恰当的例子。但这些不满的人们都没能认识到，犹太人最早以资本主义组织来经营工业，他们为此使用了他们已经在商业中用过的新型生产形式。

在此，我们不能忽略犹太商业方法的另一个特征，但这个特征在早期资本主义时代的文献中并未提及，可能是由于其发展较晚的缘故。我指的是通过某些策略或其他方式来吸引新顾客的有意识努力——以新的排列方式摆放待售物品，某种新型支付系统，部门之间的新合并，或者某种新型服务组织。如果将归因于犹太人的所有贸易与商业发明（技术发明当然除外）汇编成表，将会是一项最吸引人的研究。让我提及一些可以比较确定是源于犹太人的发明。至于犹太人是否仅仅首次应用了它们，抑或实际创造了它们，我对此无从回答。

首先我将提及旧货与残次品贸易、尾货与废品贸易——犹太人能够“在各地维持自己，并从以前没有任何价值的最寻常物品中获利，诸如破旧衣服、兔皮与没食子果（gall-nuts）”[119]。总之，我们可以将犹太人称为废品业的创始人。因此，在18世纪的柏林，犹太人是首批羽毛清洁家、首批害虫杀手以及所谓的“白啤”发明人。[120]

很难说清楚，犹太人在多大程度上创建了杂货店。无论如何，既然犹太人持有抵押品，正是在他们的商店里首次聚集了大量商
155 品。出售各种类型、各种用途的物品，难道不是现代百货商店的显著特征？其结果是，百货商店的所有者很少关心出售了何种物品，货物只要售出了就行。他的目的是为了做生意，而这与犹太精神相一致。除此之外，众所周知，犹太人控制了今天美国[121]与德国[122]的大部分百货商店。

当出售大量商品或昂贵商品时，零售业组织中引进了一个重要革新，即分期付款制度。在德国，无论如何可以相当确定地说，犹太人也是这一领域的先驱。我们可以从一位19世纪早期的作者那里读到，“犹太人中间存在一个店主阶层，他们对于普通人来说必不可少，并为贸易带来极大利润。他们将衣服与布料出售给普

通顾客，并接受小额的分期付款”[123]。

餐饮业中也有源自犹太人的众多革新。英国的第一家咖啡馆（可能也是世界上第一家），是由一个名叫雅各布斯的犹太人于1650或1651年在牛津创办的。[124]直到1652年，伦敦才有了第一家咖啡馆。后来，当克姆宾斯基人[①]引进消费及价格的标准化以作为商业指导原则时，人们都知道餐饮业迎来了一个新时代。

在所有这些例子中，吸引我们的，与其说是革新本身，倒不如说是它们所见证的趋势——一种新型商业理想已经产生：采用新的窍门。这正是我在本章中探讨的主题，它涉及犹太精神、犹太商业道德以及独特的犹太经济观点。

综上所述，早期资本主义时代犹太人与非犹太人观点之间的强烈对比清晰可见。传统、谋生理想以及地位所具有的强大影响—— 156
这些都是非犹太人观点的核心要素。而犹太人观点的新颖之处体现在哪里？应该如何形容它的特征？我认为一个综合性的词语将会符合我们的需要，这就是“现代”。犹太人的观点是“现代”观点；犹太人用现代人的方式从事经济活动。浏览17、18世纪归于犹太人名下的“罪孽”，你将发现今天的商人无不将之视为正确无误的适当之举，无不将之视为每一行业的天经地义。许多世纪以来，犹太人反对当时的主导观点，拥护经济活动中个人自由的目标。个体不为任何习俗法规所限制，他的生产范围与职业区分不受阻扰：他能够随心所欲地为自己赢得地位，并能够抵挡所有挑战者的进攻。如果可以的话，他应当有权以其他人为代价而前进；他的斗争武器是聪明、机敏、狡猾；在经济竞争中，除了是否违法，什么都不需要考虑；最后，一切经济活动都应当由个体以其认为的能够获得最有效结果的方式进行调节。换言之，自由贸易与自由竞争的经济理性主义思想在此变得重要起来；总之，在现代经济观点的形成过程中，犹太人发挥的影响，就算不是决定性的，也是巨大的。为什么？正是他们将新观念引入一个在完全不同的基础上进行组织

① 克姆宾斯基人（Kempinsky），柏林的里昂人。——英译者注

的世界中来。

在此，出现了一个相关的问题。甚至在现代资本主义时代之前，犹太人就显示出了采纳现代资本主义原则的能力，我们对此该如何解释？这必须扩展为一个更大的问题。在现代经济生活的形成过程中，是什么使得犹太人能够发挥这种我们在上文的探讨中已经观察到的决定性影响？

第二部分
犹太人的现代资本主义才能

第八章　问　题

159

我们面前摆着一个大问题。我们试图解释犹太人在过去两三个世纪的经济生活中发挥作用的原因所在。除了极少数人以外，大家都承认这是个问题。个别人趋附时尚，否认犹太人在现代经济生活中占有任何特殊的地位，宣称其中没有犹太人的身影。这类人会反驳我。此外，还有一小群人认为，犹太人在经济上意义不大，他们对现代经济生活没有产生任何影响。对于这两类人的观点，下文基本不予考虑，下文是写给那些与我持同样看法的人，即那些认为犹太人对现代经济生活的结构起了决定影响的人。

我已经提及犹太人对于现代资本主义的才能。如果要使我们的研究结果更加丰富完善，就必须彻底弄清以下两件事情：(1)他们有什么才能？(2)他们的才能如何发展起来的？

犹太人有什么才能？在本书第一部分中，我们已经看到他们致力于这些：创建并推动国际贸易、现代金融、证券交易所，以及几乎一切经济活动的商业化；支持不受限制的商业交往与自由竞争，并将现代精神注入所有经济生活之中。在目前这一部分的标题下，所有这些活动都可以归结为“资本主义”一词。在第九章中，我们将揭示所有这些已经提及的事实，是通过资本主义组织结合在一起的。因此，必须对后者的要点进行探讨，至少要探讨其大概，以便解释个体在资本主义体制中的特殊作用。这种方法将给予那些通常与犹太人问题联系在一起的模糊概念——例如“经济能力”、“商业贸易与讨价还价的才能”及其他已造成许多混乱的类似浅薄的词汇——以致命一击。

160

至于第二点，即犹太人的才能如何发展起来的？如果有人要去营救一个溺水者，就需要碰巧站在水边，那里停靠着一条船；或者站在一座桥上，从而可以提供救生圈。简言之，他在某个特定场所的偶然出现，使他有可能从事这个行动，即通过划船靠近或将救生圈投向这个身处险境的溺水者。或者，他这样做是因为他是岸边人群中唯一有勇气跳入水、奋力游向溺水者，并将其安全带回岸边的人。我们可以将第一种情况称为“客观”条件，而第二种则是“主观”条件。这种区分同样适用于考虑犹太人的资本主义才能：这种才能可归因于客观条件或者主观条件。

我们先来讨论第一种情况中的诸多原因。首先，必须严格考察各种已有的解释，以便确定没有把未经证实的假设作为它的基础，并避免把已证实的内容作为一种教条。有一种危险很普遍，它对于摆在我们面前的这个问题尤其如此，这就是种族和宗教偏见可能会造成一片混乱，正如在绝大多数我的前人关于这一问题的著作中所见的那样。我将在这方面尽最大努力避免他们的错误，并尽力确保我的考虑无可非议。我的目标是为了如实发现相关的因果作用，而不带任何影响我作推论的先见，我举证的方式力求让任何人都容易接受，无论此人是赞同同化的犹太人还是犹太民族主义者，是主张种族决定信仰的人还是热衷环境决定论的人，是反犹主义者还是反对反犹主义的人。因此，我的出发点必须始终来自
161 所有方面都能承认的事实。这将排除求助于“独特种族特征”或类似观点的任何可能。

任何不承认犹太人具有特殊天赋的人，在解释这个民族在现代经济生活中所起的作用时，不会考虑任何民族特性，而会要求用犹太人因历史偶然性而处的外部环境来解释这种作用。我将努力在第十章满足这种要求。

最后，如果犹太人对现代经济生活的贡献，显然不能完全通过其历史处境的条件来解释，那么就应该寻找主观原因，并考虑犹太人的独特特性。这将是第十二章的目标。

第九章　何为资本主义企业家

162

资本主义[1]一词被用来指两个不同的社会集团——同时从事管理和经营活动的生产方式所有者与除自身劳动力以外一无所有的庞大工人群体——之间存在固定合作关系的经济组织。在这种合作关系中，资本的代表者是主观动力，即他们决定着生产过程中的“如何生产”及“生产多少”，并承担一切风险。

那么，什么是这整个体制的主要动力？首先，或许是最重要的，就是追求所得或利润。这是问题的关键，并使事业得以日趋扩大。此外，一切经济活动都是严格合乎逻辑的。如果说前资本主义时期奉“平静不动”（*quieta non movere*）为口号并以传统作指导，那么现在则要求持续不断的变动。我将其全部的特征归纳为“经济理性主义”，我将用这个术语来描述资本主义体制的第二个主要动力。

经济理性主义通过三种方式表现出来：（1）存在一个**计划**，以使一切事情按照正确安排进行，而且这个计划包括遥远未来的活动；（2）**效率**是应用于一切生产方式之选择的准则；（3）由于“金钱关系”（cash nexus）规范着一切经济活动，对盈余的追求无处不在，精确的**计算**由此成为每项经济活动的必需。

众所周知，现代商业不只是铁轨、棉花、蒸汽机的生产，或石块、人员的运输。众所周知，这些只是整个经济组织的一部分。企业家的特征不是对上述过程的开展进行安排。这些特征要到别处寻找，眼下我们大致可以这样说，它们是一种对生产方式、劳动或商品时常买卖的过程。换言之，在企业家的交易合同中，金钱是衡

163

量价值的标准。

我们何时能说一笔生意成功完成了？当然是签订的合同完成得好。但“好”的精确含义是什么？它肯定与提供或接受的商品及服务的质量和数量无关；它仅仅指所支出钱款的收益，并指超出支出的盈余（利润）。这是企业家的目标，以便掌握那些可控因素以实现这种盈余。

鉴于我们的目标是揭示犹太人在这方面的能力，接下来必须考虑资本主义企业家在资本主义领域中有何作用（即主观经济因素）。我们试着发现，为了在竞争活动中取得成功，哪种特殊技能是必需的。一言以蔽之，我们要寻找这种类型。

在我看来，给现代资本主义企业家的最好画像，是将之描绘为集合了两种迥然不同本性的人。与浮士德一样，他可以说是集两种灵魂于一身；然而，与浮士德不同，这两种灵魂不希望被分离而是融洽地结合在一起。这两种本性是什么？一是企业家（并非狭义上的资本主义企业家，而是相当广义上的），一是商人。

谈到企业家，我指的是能够终生致力于某个目标的人，由于这个目标靠个人无法完成，它需要与其他人合作才能实现。因此，企业家必定与艺术家或预言家不同。与他们一样，他具有一种使命；与他们不同，他感到他必须将之实现。因此，他是能够窥探遥远未来之人，他的每个行动都是有计划的，并在仅仅有助于整个目标时
164 才会行动。就这种（非资本主义）企业家的例证来说，我们可以提及某个非洲或北极的探险家。只有当他将自己的活动与商人的活动结合起来，这个企业家才成其为一个资本主义企业家。

那么，什么是商人？就是倾其所有从事营利事业的人；他以是否具有经济价值来衡量所有活动与所有条件，将一切事物变成黄金的对等物。对他而言，世界是一个有着供求、好坏及盈亏的巨大市场。不断挂在他嘴边的问题是，“它的花费是多少？我能否计算出它的花费？”他的最后一个问题极可能是，“行价是多少？”他的思想为一系列交易活动所包围，其全部精力贯注于成功问题。

在我已勾勒出的这种结合中，企业家是一种稳定的因素，而商

人是一种变化的因素。

企业家的稳定性，必定使他在心中确立起一些遥远的目标，他必须遵循一定的计划以实现它。策略中的变化与其本性相悖，稳定性才是他的根本特征。但商人是多变的，他的行为随市场行情而不断摆动。如果主导形势需要，他必须能够在不同时期改变策略及目标。“忙碌”(busyness)是他最大的特点。

这个集两种灵魂于一体的理论，是为了澄清我们关于资本主义企业家的概念。但我们必须更加深入地分析这个概念，而这可以从其实际构成入手。

我察觉到企业家中有以下四种类型：

(1) 发明者。不只是技术意义上的发明者，而且也是组织者意义上的发明者，后者能引入新形式，为生产、运输、销售带来更大的节约。

(2) 发现者。也就是在深度或者广度上发现销售商品的新形式的人。如果他为其商业活动发现了一个新领域，比如说向爱斯基摩人出售浴盆、向黑人出售留声机，这就是一个广度上发现的例 165
子；而如果他在业已立足的市场中创造了新需求，这就是一种深度上的发现。

(3) 征服者。真正的企业家通常是征服者，有决心和意志去克服前进途中的一切困难。如果需要，他必须敢于冒险，以一切(即以他的财富、名望甚至生命)作赌注，以便在事业中获得巨大成就。征服可以是在生产中采用新方法，在信用不太稳定时仍扩展商业，等等。

(4) 组织者。企业家首先必须是一个组织者。即，他必须能够安排大量人力，以便获取最成功的结果；必须能够因人制宜，根据其不同的特点灵活使用；必须能够把工作交给最能胜任的人，从而获得最大效益。为了圆满做到这些，需要许多天赋与技巧。例如，组织者必须能够看一眼就知道某人的特长，知道在众人中谁最适合他的意图。他必须能够让其他人代他工作，即给予这些人信任以减轻压在自己肩上的重担。最后，他还必须能够密切关注生产

过程中的人力因素，使之在数量上和质量上都能满足需要，并使他们彼此之间关系融洽。总之，对商业的管理必须尽可能最有效。

现在，商业组织远不止于熟练的人手与方法，它同时还意味着考虑地理的、人种的，以及一切偶然的条件。比如，威斯汀豪斯电力公司是美国组织最好的公司之一。这个公司决定占领英国市场，于是在那里设立分支，其组织完全模仿母公司的形式。一些年
166 之后，结果如何呢？这个英国分支在经济上陷于破产，主要是由于没有充分考虑英国的不同情况。

这使我们转向商人的活动。商人没有固定行业，他只在经济体之中有一些明确的职能。但这些职能的种类很不同。例如，提供船只并供应人手和弹药，前往遥远的荒地征服，将当地人从炉边和家中赶出，并占有他们的货物与动产，用船只装载后者回家，再在公开拍卖中将之卖给出价最高的竞标者——所有这些都是一种贸易形式。

或许，可能存在一种不同的形式——比如，一位商人试图从一个时尚但缺钱的人那里获取一条旧裤子，他接连五次前往此人家中，都无功而返，却最终从一个愚笨的乡巴佬那里骗得同样的裤子。

或者，它也可以采取证券交易所中的套汇交易方式。

显然，这些例子差异很大，正如现代贸易与中古贸易之间差别很大一样。在前资本主义时期，开展贸易意味着要以很大规模进行，正如意大利与德意志城市中的“王室商人”(royal merchant)那样，而商人必须是企业家(一般意义上的，而不仅仅是资本主义意义上的)。“每个热那亚市民都在自己家中筑有塔楼；一旦爆发内战，这些塔楼的防卫墙将成为冲突的场所。这些市民是大海的主人；他们建造桨帆并用的大木船，去最遥远的地区游荡抢劫，将战利品带回热那亚。他们与比萨人的敌对旷日持久。”这些人也可以看作是“王室商人”，但并非我所说的商人。

我将那些以从事出色买卖为目标的人视为商人，他们身上结合了两种活动：算计与谈判。简言之，商人必须是：(1)善于投机的算

计者；(2)精于谈判的生意人。

作为善于投机的算计者，他必须在市场上最便宜地买进、最昂贵地卖出。这意味着他必须以尽可能低的价格获取劳动力和原材料，并在生产过程中不出现任何浪费。一旦准备出售商品，必须将 167
之卖给信誉可靠者，等等。对于所有这些，他必须算计，同时必须投机。这里所定义的投机，指的是从特例中得出一些结论——我们可称之为经济判断力，即彻底调查市场，评估所有征兆，辨认未来的可能性，并选择从长远看最有用的行动方针。

为了达到这一目的，经销商必须在各个方面拥有一百双眼睛、一百只耳朵与一百个鼻子。在这里，他必须找出亟需资金的贵族或准备参战的国家，以便把握心理时机，向他们提供贷款；在那里，他必须控制劳动力集团，以便使他们愿意在稍低于一般工资的条件下工作；在一个地方，他必须对公众所需新商品的时机形成正确判断；在另一个地方，他必须评估一场政治危机对证券交易所的实际影响。在任何情况下，商人皆以金钱来体现结果，因此出现了算计。在美国，这方面的行家通常被称作“一位了不起的精明的算计者”。

但是，仅有对营利性商业的辨别力还不够，商人必须同时拥有从事买卖的能力。在这方面，他的谈判能力立刻表现出来，他将从事的工作，很像两位诉讼当事人之间的仲裁者。他将与对手谈判，提出理由与反对理由，以引导后者做出某个行为。谈判就是用智力武器较量。

因此，贸易意味着就某些商品——无论它是股份、贷款还是什么事物——的买卖进行谈判。沿街叫卖的小贩在后门口从事的活动——例如试图向厨师出售“皮”颈圈，或犹太旧衣商花一小时走到牧民处说服他买一条裤子——也必须被称作贸易。但它同样必须被用来指称拿单·罗斯柴尔德的活动，如他与普鲁士政府的代 168
表为100万马克贷款做的谈判。它们之间的区别不在于种类，而在于程度；因为从本质上说，一切贸易都是谈判，这种谈判不一定需要口头对话。店主以人们能接受的方式向公众推销商品，这其

实也是一种谈判。所有广告不过是谈判的“沉默展示”，这是什么意思？其目的通常都一样：为了使潜在的购买者确信某种商品优越。一旦人人去买被推销的商品，卖主的愿望就实现了。

为了创造利润，为了赢得信任，为了刺激购买——这些都是贸易成功者的目标。他如何实现这些目标并不重要。他不仅借助外部力量而且动用内部力量，以促使顾客根据自由意愿前来购买。他通过施加暗示而获得成功，其中最有效的手段，是要在买者心中唤起立即购买将最有利的意识。我们在《马格努斯·巴尔福德传奇》(*Magnus Barford Saga*，1006 年)中读到：“孩子们，我们会有大雪，芬兰人说道，而他们有可供出售的雪地鞋。”这是一切商人的原型，芬兰人的暗示则是一切广告——商人赖以战斗的武器——的原型。他不再像图德拉的便雅悯时期的热那亚先驱那样，蜷缩在设防的塔楼之中，也不再像 17 世纪东印度公司的早期殖民者那样，如果当地人拒绝与之“贸易”就用枪炮捣毁他们的房屋。

第十章　犹太人现代资本主义才能的客观环境

169

既然已经知道什么是资本主义企业家，下一个问题就必须是，犹太人能够在许多方面形塑资本主义制度的外部环境是什么？为了找到答案，我们必须回顾自15世纪末至今——资本主义形成的时代——犹太人在西欧与美洲的地位。

怎样才能最恰当地描绘这种地位呢？

牙买加总督在一封致枢密大臣的信(1671年12月17日)中透露出喜悦之情。[1]“他以为，”他写道，“没有其他臣民可以比犹太人更能让国王陛下获利：**他们拥有大量的货物与广阔的通信**。”实际上，这两大理由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犹太人取得的进展。但同时必须牢记他们在其居住地人群中的特殊地位：他们被视为外来者而遭鄙视，并被当作不充分的“半公民”。

因此，我将指出犹太人成功的四大原因：(1)他们散居在广阔的区域；(2)他们被当作外来者对待；(3)他们的半公民地位；(4)他们的财富。

犹太人散居在广阔的区域

最重要的事实是犹太人散居于世界各地。他们的散居自从第一次流放时期就已开始；在遭到西班牙与葡萄牙的驱逐后再次流散，接着在大规模离开波兰时再度流散。上文已经注意到他们过去两三个世纪的流浪，注意到他们定居在德国与法国、意大利与英国、近东与远东、荷兰、奥地利、南非及东亚。 170

这些流散的后果，是同一家族的支派在不同的经济生活中心扎根，并在各地建立起举世闻名的许多分支。让我们举几个例子。[2]

洛佩斯家族的中心位于波尔多，但在西班牙、英格兰、安特卫普与图卢兹都有分支。著名银行家门德斯家族同样来自波尔多，在葡萄牙、法国与佛兰德都有分布。同样，门德斯家族的亲戚加迪斯家族也定居于各个地方。卡塞尔家族分布在汉堡、英格兰、奥地利、西印度群岛、巴巴多斯与苏里南。其他有着世界范围分支的著名家族有科斯塔家族（达·科斯塔家族）、科内利亚诺家族、阿尔哈迪比家族、沙逊家族、皮埃尔家族、罗斯柴尔德家族。我们可以继续无限列举下去；它充分表明，在全球至少两个地方拥有立足点的犹太商业公司，可能数以百计乃至千计。

这一切的意义十分显著。基督徒商行只有通过巨大努力才能获得的东西，犹太人只需很小努力就能获得，后者从一开始就有分散的中心，从而得以开展国际贸易，并利用国际信贷；总之，“广阔的通信联系”是一切国际组织的首要必需。

让我们回顾一下我所观察到的犹太人对西班牙与葡萄牙贸易、黎凡特贸易及美洲经济发展的参与。绝大多数定居在不同地区的犹太人是从西班牙流散出来的，这产生了重要后果。他们由此成了代理人，将殖民贸易——甚至更大程度上的白银之流——引向以荷兰、英国、法国与德国为代表的新渠道。

犹太人足迹所至的这些国家，恰好都处在经济大复兴前夕，因
171 而能从犹太人的国际联系中获利，这难道不重要吗？众所周知，犹太人将贸易之流从那些驱逐他们的国家转向热情接纳他们的国家。

正由于他们在莱戈恩（Leghorn）的主导地位，这里才在18世纪被称为“欧洲在地中海贸易的最大仓库之一”，[3] 这难道不重要吗？正是他们促成了连结南北美洲的商业链条，从而确保了北美殖民地的经济存在，这难道不重要吗？欧洲主要中心的证券交易所由于他们的控制而成为公共信贷国际化的工具，这难道不更加重要吗？

恰恰是由于散居在广阔的区域，他们才能做到这一切。

依此来看，对犹太人重要性的极好描述，乃是由一位两百年前研究这种情况的敏锐观察家所作。其描述丝毫没有褪去新鲜的色泽，它见于1712年9月27日的《观察者》：[4]

他们广泛分布于世界各大贸易地区，成了相距最遥远的民族之间互相交流的媒介，人类通过他们得以普遍联络起来。他们仿佛嵌在大楼中的木栓和钉子，尽管本身价值微不足道，但对于整个架构的维持，却绝对必需。

犹太人如何利用自身散居状况所带来的特别知识优势，以及如何控制证券交易所中的活动？这在法国驻海牙大使写于1698年的一份报告中有详尽表述。[5] 我们的信息提供者认为，犹太人对阿姆斯特丹证券交易所的控制，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他们消息灵通。这个证据价值重大，我将全部段落翻译如下：

他们就这两个问题（消息与商业）与他们眼中的同胞（会众）开展通信。其中，威尼斯的同胞被当作最重要的（尽管他们并非最富裕，人口也并非最多），因为他们又通过萨洛尼卡的同胞将东方与西方以及东方与南方联结起来。对这个民族而言，萨洛尼卡是东西方两个世界的统治中心，它对威尼斯负责，而威尼斯与阿姆斯特丹一道统治着北部国家（包括伦敦受宽容的犹太社团以及法国的秘密同胞）。作为这一联合的结果，他们获得的消息与商业内容，几乎就是当时世界上所能得到的最好信息；据此，他们建立了每周集会制度，并精明地选在周六之后的一天（即周日）举行，所有派别的基督徒这天都沉浸于宗教活动中。这些制度，包括每周收到的消息中的蛛丝马迹，在由他们的拉比以及会众头目仔细筛选后，于周日下午提交给他们的犹太证券经纪人与代理人。这些人极聪明，他们彼此之间先协调安排妥当，再分头去传达那些对他们各自最有用的消息；准备好在翌日，即周一早上，根据各自的意向开始种种操控：售出、买进或交换股份。他们一直掌握着大量的商 172

品储备，故可以一直决定着最有利的时机，并充分利用证券的涨或落——有时甚至同时利用涨和落——来开展计划。

他们的散居还为他们赢得大人物的信心。实际上，犹太人迈向巨额融资的步伐遵循了下面这个几乎一成不变的模式。一开始，他们凭借语言能力担任了君主们的翻译；随后，他们充当了派到外
173 国宫廷的中间人或特别谈判者。很快，他们控制了雇主的财富，同时还荣幸地通过后者的恩典而被允许成为其债权人。从这里到控制国家财政——再后来就是控制证券交易所——就不远了。

从古代起，他们的语言知识及其对外国文明的熟稔，必然令他们成为受宫廷欢迎的访客，并为他们赢得王室的信任，这并非是牵强附会的假设。不妨想想在埃及的约瑟；想想（约瑟夫斯所说的）阿格里帕王及克劳狄皇帝母亲的密友亚历山大长官[①]；想想埃塞俄比亚女王干达基的犹太财政大臣，我们可以从《使徒行传》（8：27）中读到此人。

至于中世纪的宫廷犹太人，我们有他们以出任翻译与谈判者而闻名的确证。我们知道，犹太人以撒被查理曼派到哈里发哈仑·拉希德的宫中；卡隆缪斯是皇帝奥托二世的犹太朋友与宠臣；著名的哈斯戴·伊本·沙鲁特（915—970），是哈里发阿布杜-拉赫曼三世的外交代表，因为与西班牙北部的基督教宫廷谈判而声名鹊起。[6] 与此类似，当伊比利亚半岛的基督教君主需要娴熟的谈判者时，他们找到了犹太人。阿方索六世就是个很好的例子。为了在穆斯林小君主之间挑拨离间，他选派语言能力与外交才华出众的犹太代理人，将他们送到托莱多、塞维利亚与格拉纳达的宫廷。在随后时期，犹太密使遍布整个西班牙宫廷，其中包括一些精通人种学的犹太人，他们被詹姆士二世派到亚洲充当间谍、刺探情报，并试图发现约翰长老的神秘国度；[7] 此外，还包括与新世界发现有关

① 亚历山大长官（Alabarch Alexander，约公元前 15 或 10—公元 69），斐洛之弟，为亚历山大里亚城亲罗马的犹太贵族及社团领袖。——中译者注

的许多翻译与受信任的代理人。[8]

考虑到犹太史上的西班牙时期不仅在一般经济意义上重要，而且在特殊经济意义上也重要，故值得提及这些事例，因为它们清楚 174
显示了犹太人发展到卓有影响地位的原因。但这种地位不限于西班牙时期，也大量存在于随后的时期。因此，犹太外交家被尼德兰联合省的中央议会（States-General）雇来与各国交涉，比如德尔蒙特、梅斯基塔[9]及其他人都非常有名。同样著名的是“希伯来大人”（Seigneur Hebraeo），黎塞留用它称呼富有的伊德尔方索·洛佩斯，这位法国政治家把他派到荷兰执行一项秘密任务，并在他回国之后赐予他“国务顾问”（*Conseiller d'Etat ordinaire*）的头衔。[10]

最后，犹太人的散居以另一种方式引人注目。正如上文所见，他们的国际性散居产生了丰硕成果，而他们分散在某个特定国家的各地也产生了同样重要的后果。举例来说，犹太人担任着军事供应商（他们的这种活动自古就有，难道我们没有读到当贝利撒留围困那不勒斯时，当地犹太居民提议为这座城市供应储备？）。[11]一个十分确切的原因在于，他们比基督徒更容易囤聚大量商品，这是由于他们与不同中心的联系所致。“犹太企业家，”一位18世纪作家说道，“不受这些困难的影响。他所需做的一切，就是恰当地借助他的同胞，顷刻之间便能拥有任其支配的一切帮助。”[12]实际上，当时的犹太人做生意时，从不是“作为孤立的个体，而一直作为世界上最庞大贸易公司的一员”。[13]在18世纪下半叶巴黎商人的一份请愿书中，有如下字句，[14]“他们是金钱熔化后到处流动与分散的原子，但无论如何又趋向于重新合成一股重要的财富之流”。

作为外来者的犹太人

在过去一两个世纪，犹太人几乎处处作为陌生者，即作为新到的外来者存在。他们从来不是在他们取得最成功活动之地的原居 175
民，也不是从附近地区来到这些中心的，而是来自在行为、习俗乃至气候上不同的遥远土地。对于荷兰、法国、英国而言，他们来自西班牙、葡萄牙然后是德国，他们从德国其他城市迁往汉堡与法兰

克福，后来散布于整个德国的犹太人则来自俄属波兰。

因此，犹太人在任何地方都是殖民者，故具有足够的经验快速融入新环境。在这方面，他们遥遥领先于欧洲各民族，而后者直到美洲殖民地创建后才开始成为这方面的能手。

新来者必须眼光敏锐，以便在新环境中找到适当位置；他们必须小心翼翼，以便没有妨碍地获取生计。当本地人仍在暖床上沉睡之际，新来者就已站立在尚未破晓的刺骨晨风中，他们由此变得精明能干。他们必须集中精力获取立足点，故他们的一切经济活动都受这个渴望支配。他们必须决定如何最有效地管理自己的事业，以及清楚什么是通向目标的最佳捷径——哪些工商业分支能获得最多利润，通过什么人建立商业联系，以及用什么原则指导商业活动等。这一切不就是以经济理性主义代替历史悠久的传统吗？我们观察到，犹太人已经做到了这些；我们一想起他们处处是陌生人、新来者、移民，他们竭力如此做的原因就变得十分清楚。

说犹太人在多个世纪里是各民族中的陌生人，还包含另一层意义，即心理与社会的意义。他们取得陌生人的地位，既出于他们与寄主之间的内在对立，又出于他们与居住地民众之间近乎种姓般
176 的隔离。犹太人自认为是个独特的民族，也被其他民族这样看。因此，犹太人发展出了与“陌生人”交往时的行为举止和思想态度，这在世界公民的概念尚不存在的时代尤其如此。在一切没有人道主义考虑的历史时期，单单与“陌生人”打交道这个事实，就足以减轻良心的不安、缓解道德的束缚。与陌生人交往时，人们从不过分讲究。由于他们在任何地方都是少数群体，犹太人一直与陌生人、与“异类”交往，在其经济活动中更是如此。如果说一个陌生人只有十分之一甚或百分之一的机会与“异类”打交道，那么在犹太人那里却恰恰相反，他们与陌生人打交道的机会为十分之九或百分之九十九。其后果如何？犹太人借助“适用于陌生人的伦理”（如果我能在不被误解的意义上使用该术语的话）的次数远远比非犹太人来得频繁；它对于前者是一条准则，而对于后者则只是一次例外。犹太人的生意经就基于此。

与犹太人的外来者地位紧密相连的，是他们在各地享有的特殊法律地位。但这本身具有重要性，因此我们要单独讨论。

作为半公民的犹太人

乍看之下，犹太人的法律地位似乎对其经济活动影响巨大，它限制了犹太人可能从事的职业，往往也就关闭了谋生通道。但我认为这些限制的影响被高估了。我甚至要说，它们对犹太人的经济发展一点也不重要。至少，我没有意识到犹太人对现代经济体制发展所留下的任何痕迹与这些限制性规定有关。在我们最关心 177
的这个时期，由于影响犹太人的法律在不同地区差别巨大，这些限制显然不可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尽管如此，我们还是注意到，犹太人的影响有个显著的相似性，它贯穿于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秩序之中。

限制犹太人的法律是如何不同的，这个问题并未一直得到充分关注。首先，在不同国家之间，这些法律存在显著差别。因此，当犹太人在荷兰和英国的经济生活中取得与其基督徒邻居几乎完全平等的地位时，他们在其他国家仍受到重重限制。但即使在后一情况中，他们的遭遇也不尽相同，因为在某些城市与地区他们享有完全的经济自由，比如在法国的教皇属地。[15]此外，连限制条件的数量与类型在各个国家——有时在同一国家的不同地区——也不尽相同。在许多情况中，它们表现得十分随心所欲，看不出任何根本原则。某个地方不许犹太人沿街叫卖，另一个地方则不许他们当店主。此处允许他们成为手工业者，而另一处却否认了他们的这项权利。他们在这里可以买卖羊毛，到那里却被禁止。这里他们可以出售皮革，那里则遭禁绝。烈酒销售在这里让他们承包，这种想法换个地方又显得反常。人们在这里鼓励他们开办工厂，在那里却严格禁止他们参与一切资本主义企业。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或许，最好的例子来自18世纪普鲁士对待犹太人的做法。在这里，同一国家某个地区的限制法令遭到另一地区彻底反对。《1750年普通特许令》修正案（第二条）禁止犹太人在许多地区从

事手工业；然而，1790 年 5 月 21 日的王室法令允许布雷斯劳的犹
178 太人“从事各种机械工艺”，继而认为“如果基督徒手工业者自愿接受犹太男孩为学徒，并最终将他们吸纳到行会之中，这将是我们许多快乐的源泉”。1797 年 4 月 17 日的《一般章程》为普鲁士东南地区的犹太人制定了一条类似法规（第十条）。

又如，虽然柏林的犹太人被禁止（根据《1750 年普通特许令》第十三与十五条）将肉类、啤酒与烈酒出售给非犹太人，但西里西亚所有本地出生的犹太人在这方面却拥有完全的贸易自由（根据 1769 年 2 月 13 日的一项法令）。

允许或禁止哪些商品可以用来贸易，这似乎是随意定下的，难以理解。因此，《1750 年普通特许令》允许犹太人交易本地或外地的加过工但尚未染色的皮革，但不准交易未加工的或染过色的皮革；允许他们从事未加工的牛皮、羊皮贸易，但不许从事未加工的母牛皮或马皮贸易；允许他们交易各种加过工的毛织品与棉制品，但不许交易未加工的羊毛或羊毛线。

如果考虑到不同等级的犹太人享有不同的法律地位，这个情况将变得更加令人困惑。例如，布雷斯劳的犹太社团（在 1790 年 5 月 21 日的法令改变情况之前）由四大群体组成：（1）拥有“普通特许令”者；（2）拥有“特许令”者；（3）仅被宽容者；（4）暂时居住者。

第一等级包括那些在贸易和商业方面与基督徒享有平等地位的犹太人，他们这方面的权利是世袭的。第二等级由那些拥有“专门（有限的）特许令”的犹太人组成，他们被允许从事专门规定的某些种类的商品贸易，不过这种权利不能传给子女，尽管其子女在取得这种特权时会被优先考虑。第三等级由那些有权在布雷斯劳居住，但其经济活动要比第二等级受到更多限制的犹太人构成。至于第四等级，它包括那些仅被允许在这个城市短期居住的犹太人。

179 但他们对能否一直拥有这些已到手的权利也从不肯定。例如，1769 年居住在乡村地区的西里西亚犹太人，被允许在农场出售啤酒、烈酒与肉类，而 1780 年这个许可被撤销，1787 年又再次恢复。

然而，在所有这些情况中，必须牢记的是，过去两三个世纪工

商业上的这些限制规定很大程度上形同虚设，事实上，资本主义兴趣有各种办法规避它们。最简单的办法就是越过法律，而且随着时间发展，官僚国家对此闭目不问。但也有许多回避不便之处的合法方式：只要能增加额外的收入来源，君主们总是愿意做出让步，颁布特许令、专利和给予例外对待的整套文件。犹太人在获取这些特许令时，动作并不慢。1737 与 1750 年普鲁士法令提及的附加条款——一切对犹太人的限制能被一道特别的王室命令取消——到处都被心照不宣地执行着。肯定有办法摆脱限制，要不然犹太人如何参与那些法律禁止他们从事的贸易（比如皮革、烟草）？

然而，只要某个地方的经济活动是在团体基础上组织起来的，工业规定本身就会对犹太人的前进步伐构成真正的障碍。行会之门对犹太人紧闭，挂在每个行会大厅上的耶稣受难像把他们阻挡在外。这样，如果他们希望参与任何由行会垄断的工商业，就不得不作为“外来者”、闯入者以及自由贸易者而存在。

他们的前进之路上还有一个更大的障碍，这就是限制他们在公共生活中的地位的法律。在这个问题上，所有国家惊人一致；无论何处，犹太人都被排除在中央或地方的政府机构外，也排除在律师、议会、军队、大学外。这不仅适用于西欧许多国家，如法国、荷兰、英国，也适用于美国。由于众所周知，没有必要全面考虑犹太 180
人在前政治解放时代的法律地位。我们在此只需要提到，他们在许多国家的半公民状态一直持续到 19 世纪。美国是他们获得平等公民权的第一个国家，这项原则于 1783 年在那里颁布。法国著名的解放法令颁布于 1791 年 9 月 27 日；荷兰巴达维亚国民议会于 1796 年给予犹太人完全的公民地位。但在英国，他们直到 1859 年才获得彻底解放，而德语国家更在十年之后。1869 年 7 月 3 日，北德意志联邦最终确立了他们的平等公民地位，奥地利则到 1867 年，意大利是在 1870 年。

同样众所周知的是，在许多情况下，解放法令是一纸空文。比方说，翻开任何德国自由派的文献，会日复一日地发现关于犹太人从未获得军衔、当不了法官等等的抱怨。

犹太人在公共生活中遭受的挫折，却大大有利于工商业，因为犹太人集中了全部精力从事工商业。在其他社会群体中，最有才华的大脑大都投身于国家服务之中，而在犹太人中间，如果不再将精力耗在犹太社团的“学习之所”（*Beth Hamidrash*）中，这些人就会把精力投入生意。现在，经济生活越是致力于谋求利润，经济利益获得的影响越大，犹太人就越是会通过工商业为自己赢取在国家中的尊重与权力，而相关限制法律恰恰不让他们获得这种尊重与权力。犹太人为什么如此看重黄金（正如上文所见），就变得一目了然了。

如果公共生活中的排斥能在某一方面有利于犹太人的经济地位，赋予他们比其基督徒邻居更有利的条件，它在另一方面对犹太
181 人同样有益。它使犹太人不受政治党派偏见的影响。他们对待国家和当时的政府没有任何偏袒。正因为如此，他们成为国际资本主义体制旗手的能力便优于其他民族。他们为不同的国家提供金钱，而民族冲突正是犹太人获取利润的主要来源。而且，政治中立使他们能够在许多国家持续服务于不同的王朝或政府（例如遭受了多次政治变动的法国）。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历史证明了这一点。因此，通过低人一等的公民地位，犹太人反而可以促成那种除了获利以外对其他一切漠不关心的资本主义式发展。因而，他们再度推动并强化了资本主义精神。

犹太人的财富

在过去三四个世纪使犹太人的经济使命成为可能的客观条件中，必须考虑到这点：在一切时期、在任何他们发挥了并非无足轻重的经济作用的地区中，他们控制着大量金钱。但这种论断与全体犹太人的财富无关，因此强调在各个时期都存在许多贫穷犹太人的反对观点是没有意义的。任何人只要去过德国东部边境的犹太社团或了解纽约的犹太区，对此都很明白。但我认为（这个主张更具体），自 17 世纪以来，犹太人中间一直有大量财富，今天依然如此。换言之，总有许多犹太富人，而且平均来说，犹太人肯定比其周围的基督徒富有。说句题外话，德国最富有的人或者美国最

富有的三个人都不是犹太人。

实际上，来自比利牛斯半岛的许多流亡者必定十分富有。我们知道他们的出走伴随着“资本的迁出”（*exodo de capitaes*），即资本 182
从这个地区流出。然而，在许多时候他们变卖了房产，以换取外币。[16]这些逃亡者中最富有的可能移居了荷兰。根据记载，至少荷兰的第一批定居者——曼努埃尔·洛佩斯·霍门、马利亚·努涅斯、米格尔·洛佩斯及其他人——拥有巨额财富。[17]其他富有的西班牙人是否在17世纪到来，或者那些已经定居的人是否增加了财富，这些都无从证实。但可以确定，17、18世纪的荷兰犹太人以富有著称。尽管没有解释这一问题的统计数字，但其他重要证据还是大量存在。旅行者们情不自禁地赞叹，这些难民的居所奢华壮观，宛如宫殿一般。如果打开一本当时的版画集，很快会发现，阿姆斯特丹或海牙最壮观的建筑皆由犹太人建造或居住——其中有德尔蒙特男爵、尊贵的德·平托爵士、达·科斯塔勋爵及其他人的？（17世纪末，德·平托的财富据估计达800万弗罗林。）至于阿姆斯特丹犹太婚礼的王室般奢华，辜黎柯·冯·哈梅因在其《自传》中有生动描绘，她的一个女儿就嫁到那里。[18]

其他国家也如此。17、18世纪法国的情况由于萨瓦里的叙述而为人所知。这是他的原话：“当一个商人积聚了大量财富而闻名时，我们说他‘就像犹太人那样富有’。”[19]

至于英国，富有的塞法尔迪人来此之后的实际财富数字尚有留存。大量富有的犹太人跟随查理二世的新娘布拉干萨的凯瑟琳而来，伦敦在1661年仅有35户犹太家庭，而两年后这个名单增加了不下57户新来者。根据阿德曼·布莱克威尔的著作，1663年犹太富商的半年营业额如下：[20]雅各·阿博比，13085英镑；撒母耳·德维加，18309英镑；杜阿尔特·达·席尔瓦，41441英镑；弗朗西斯科·达·席尔瓦，14646英镑；费尔南多·门德 183
斯·达·科斯塔，30490英镑；以撒·达泽维多，13605英镑；乔治与多明各·弗朗西亚，35759英镑；戈梅兹·罗德里格斯，13124英镑。

正如上文所见，17、18 世纪德国犹太生活的中心为汉堡和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这两座城市中犹太居民的财富都可以借助数据估算。

在汉堡，西班牙、葡萄牙犹太人也是第一批定居者。1649 年，其中 40 个家族参与了汉堡银行的创建，这显示出他们必定已经生活得相当舒适。但很快，犹太人财富与影响的不断增长引发了抱怨。1649 年，他们因举办炫耀的葬礼和驾驶马车招摇过市而受到指责；1650 年，他们因建造的房屋像宫殿而遭到指责。同年颁布的禁奢令不许他们过分炫耀奢华。[21]17 世纪末以前，塞法尔迪犹太人似乎拥有所有的财富；然而，大约就在这个时候，他们的阿什肯纳兹同胞也快速崭露头角。辜黎柯·冯·哈梅因说，许多德国犹太家庭在她年轻时相对贫困，后来迅速发家致富。辜黎柯的观察由 18 世纪前二十五年的数据所证实。[22]1729 年，阿尔托纳的犹太社团由 279 名认捐成员组成，其中有 145 名富人，总计拥有 5434300 马克(271715 英镑)，即人均超过 37000 马克(1850 英镑)。汉堡社团共有 160 名认捐成员，其中 16 名富人的财富总计 501500 马克(25075 英镑)。如果我们将它们与每个个体的具体情况相比，这些数据就显得低于实际情况。1725 年居住在汉堡、阿尔托纳与万茨贝克(Wandsbeck)的犹太富人如下：乔尔·所罗门，21 万马克(以下单位皆为马克)；他的女婿，5 万；埃利亚斯·奥本海默，30 万；摩西·戈尔德施密特，6 万；亚历克斯·巴本海姆，6 万；埃利亚斯·萨洛蒙，20 万；菲利普·埃利亚斯，5 万；撒母耳·席塞尔，6 万；贝伦德·海曼，7.5 万；参孙·拿单，10 万；摩西·哈姆，7.5
184 万；萨姆·亚伯拉罕的寡妇，6 万；亚历山大·以撒，6 万；迈耶·贝伦德，40 万；萨洛蒙·贝伦斯，160 万；以撒·赫兹，15 万；曼格努斯·海曼，20 万；拿单·本迪克斯，10 万；菲利普·曼格努斯，10 万；雅各·菲利普，5 万；亚伯拉罕·奥本海默的寡妇，6 万；扎卡利亚斯·但以理的寡妇与女儿，15 万；西蒙·德尔·班克，15 万；马克斯·卡斯滕，20 万；亚伯拉罕·拉扎勒斯，15 万；卡斯滕·马克

斯，6 万；贝伦德·萨洛蒙，60 万里索尔[①]；迈耶·贝伦斯，40 万；亚伯拉罕·冯·哈勒，15 万；亚伯拉罕·拿单，15 万。

鉴于这个名单，毫无疑问，汉堡当时有大量犹太富人。

法兰克福情况相似，其色彩甚至更加鲜活。16 世纪末，犹太人的财富开始积聚，此后便稳步增长。在 1593 年，法兰克福有 4 名犹太人和 54 名基督徒（占 7.4%）的纳税额超过 15000 弗罗林，而 1607 年犹太人的数量已达到了 16 名（基督徒为 90 名，比率为 17.7%）。[23]1618 年，最贫困的犹太人缴纳 100 弗罗林的税，最贫困的基督徒则缴纳 50 弗罗林即可。而且，300 户犹太家庭在 1634 到 1650 年间缴纳了不低于 100900 弗罗林的驻防守卫税。[24]

法兰克福犹太社团的纳税人数目在 18 世纪末增加到 753 人，他们总共拥有至少 600 万弗罗林。这其中半数以上操纵于 12 个最富有的家族手中：[25]施派尔，604000 弗罗林（以下数字均为弗罗林）；赖斯-埃利森，299916；哈斯、卡恩与斯特恩，256500；舒斯特、格茨与阿姆谢尔，253075；戈尔德施密特，235000；迈尔，211000；奥本海默，171500；韦特海默，138600；弗洛斯海姆，166666；林德斯科夫，115600；罗斯柴尔德，109375；西奇尔，107000。

18 世纪初，柏林犹太人中间一定没有贫穷的乞丐。1737 年，在 120 个居住在普鲁士首都的犹太家庭中，仅有 10 户拥有不到 1000 塔勒[②]，其他的都拥有 2000 到 20000 塔勒，甚至更多。[26]

犹太人是所在国人口中最富有的群体由此得到了证明。这种 185
状况自从过去两三百年一直延续到今天，而今天或许已更普遍、更广泛了。其结果如何？绝不能低估为这些流浪者提供避难的那些国家。这些国家因犹太人的寄居而获利，并为推动资本主义发展做好了充分准备。因此，应该特别留意，犹太人的迁徙影响了贵金属积累中心的转移。它显然影响了经济生活的趋势，使西班牙和

① 里索尔（rthlr.），即 Reichsthaler，为普鲁士及北德意志地区通行的一种银币单位。——中译者注

② 塔勒（thaler），近代欧洲尤其是德意志地区通行的一种银币单位。——中译者注

葡萄牙耗空了金银，而英国与荷兰富有起来。

同样不难证明，犹太人的金钱使17世纪一切大型经济活动得以存在并为之提供资金。如果犹太富人早一代人时间离开西班牙，那么哥伦布的远航将不再可能；如果西班牙流亡者的财富没有用来帮助英国、荷兰与汉堡的话，那么伟大的印度公司可能永远无法成立，那些17世纪创立的大银行也无法快速稳定下来；换言之，如果犹太人迟一个世纪从西班牙被逐出，那么一切将大为不同。

实际上，这就是为什么犹太人的财富影响如此大的原因。它促使资本主义企业得以创立，或者至少便利了这个过程。创办银行、仓库、证券与股票经纪业——所有这些对于犹太人而言要比其他人容易得多，因为他们的口袋更殷实。这也是为什么他们能成为国王们的银行家的原因。最后，还因为他们拥有能够借出的金钱。这个活动要比任何其他事物更大程度地为资本主义铺平了道路，因为现代资本主义是放债的产儿。

放债包含着资本主义的根本思想，资本主义从放债中获得了许多自身独有的特征。在放债中，一切与质量有关的概念消失了，只
186 有与数量有关的概念才重要。在放债中，契约成为商业的基本要素；关于报酬的协议、对未来的承诺、交付的概念都是其组成部分。在放债中，不存在只为了自足而生产的观念。在放债中，没有什么是有形的（即技术性的），一切都纯粹是思想行为。在放债中，这类经济活动丧失了意义，它不再是一个运用体力或脑力的问题，而完全是一个成功的问题。因此，成功是唯一有意义的事物。在放债中，不劳而获的可能性首次得到了证明；你无须诉诸武力，就可以使别人为自己劳动。

总之，放债的特征就是一切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组织的特征。

但历史地看，现代资本主义的出现也归咎于放债。无论什么情况，只要有必要为原始支出花大钱，或者某项生意是作为一个有限公司开始的，这点就成立。就本质而言，有限公司在原则上只不过是一桩有望立即获利的放债事务。

因此，犹太人的放债活动是一个推动他们创造、扩展、促进资

本主义精神的客观因素。但我们最后的评论已经触及一个更深入的问题，它超越了种种客观考虑。在放债者的活动中是否早已存在一种特别的心理因素？不仅如此，还可以追问，仅凭客观条件能否完全解释犹太人的经济角色？难道没有什么独到的犹太特性是我们在推论时必须考虑的？然而，在开始这一章之前，我们必须先谈谈与此相关的一种极其重要的影响——犹太宗教。

187

第十一章　犹太宗教在经济生活中的重要性

引言

有三个原因让我专辟一章考虑犹太民族的宗教，并阐明它对犹太经济活动的巨大影响。首先，只有细致地研究犹太宗教并且为研究它而研究它，才能从经济角度充分认识它在各方面的意义；其次，它要求一种特别的研究方法；再次，它在犹太人发展的客观因素与主观因素之间占据着中介位置。因为，就任何宗教都表达了某种特别的精神观而言，它有一种“主观的”面相；而就个体生长于其中来说，它又具有一种客观的面相。

宗教对于犹太民族的重要性

一个民族或其中某个群体的宗教对其经济生活具有深远影响，这没有什么争议。只是到最近，才由马克斯·韦伯阐释了清教与资本主义之间的关联。实际上，马克斯·韦伯的研究对本书极为重要。任何对其研究感兴趣的人不禁要问，韦伯归之于清教的一切，难道就不能在同等程度上——很可能在更大程度上——归之于犹太教；不，它很可能意味着归之于清教的东西实际上要归之于犹太教。这种关系将在下文予以探讨。

考虑到宗教对任何开化民族的民族生活的影响，都不如犹太教对犹太民族的影响这样全面，我们更有理由去问，如果清教都具有一种经济影响，那么犹太教的经济影响何其大哉！对于犹太人而

言，宗教并非礼拜日与圣日的事情，它触及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
连最细小的行为也不例外，它规范着**一切**人类活动。对于每个行 188
动，犹太人都会自问，这将增加上帝的荣耀还是亵渎他的圣名？犹太律法不仅仅规定了人与上帝之间的关系，也不仅仅表达了抽象的概念，它更为一切可能的关系——无论是人与人之间还是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制定了行为准则。实际上，犹太律法与犹太伦理一样，也是犹太教体系的一部分。犹太律法来自上帝，道德律法与神圣诫命在犹太教中不可分离。[1] 因此，在现实中并没有特别的犹太教伦理。犹太伦理就是犹太宗教的基本准则。[2]

没有其他哪个民族会像犹太人这样精心为哪怕是最卑微的人提供宗教指导。约瑟夫斯对此有极好的表述：关于“律法”，你可以去问你遇见的第一个犹太人，他谈起它们来，比谈自己的名字还要好。其原因既在于每个犹太儿童接受的系统宗教教育，也在于这个事实，即神圣的宗教仪式部分是由阅读与解释《圣经》段落组成的。在一年中，《托拉》被从头到尾通读一遍。此外，犹太人的一项首要义务是学习《托拉》。“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申命记》6：5）[3]

也没有其他哪个民族会像犹太人这样认真奉行上帝之道，只有犹太人才会如此彻底地执行宗教命令。确实，有人宣称犹太人是最不虔诚的民族。我这里不会掂量此话是否公允。但他们肯定是世界上最“敬畏上帝”的民族。他们时刻生活在战战兢兢的敬畏之中，敬畏上帝的怒气。“我因惧怕你，肉就发抖，我也怕你的判语”，《诗篇》的作者如是说（119：120），这句话可以适用于所有时代的犹太人。“常存敬畏的，便为有福。”（《箴言》28：14）“虔信者从不弃离他们的敬畏。”（*Tanchuma Chukkath*，24）[4] 一想到犹太人的上帝，那 189
可怕、骇人、发出诅咒的耶和华，就可理解这点。在世上所有的文献中，无论是此前还是此后的，没有比耶和华对那些不遵行其诫命者许诺的威胁（见著名的《申命记》第二十八章）更恶毒的了。

但这种巨大的影响（敬畏上帝）并非孤立存在。还有其他因素与之结合在一起，几乎强迫犹太人最小心谨慎地遵守他们的宗教

诫命。在这些影响中，最重要的莫过于他们的民族命运。当犹太国家被摧毁时，法利赛人与文士——珍视以斯拉的传统并努力使遵从律法作为生活目标的那些人——成了民族领袖，他们自然将事态的发展引向自己乐见的轨道。没有国家、没有圣所，犹太人在法利赛人的领导下聚集在律法（海涅称之为“移动的祖国”）周围，成为一个由一群虔诚文士领导的宗教兄弟会。这与罗耀拉[①]的信徒会把一个现代国家分散在各地的余民聚集在自己周围非常相似。法利赛人现在领导了整个民族的发展。他们中最卓越的拉比自视为古代犹太教公会的继承者，实际上拉比被如此尊重，以致成为全世界犹太人在精神与世俗事务上的最高权威。[5] 犹太人在中世纪的变迁，仅仅有助于增强以这种方式发端的拉比权力。它是如此具有强制性，以致最终犹太人自身也不时抱怨这种重负。犹太人越是被隔绝或自绝于居住地的民族，拉比的权威就越发增强，也就越容易迫使犹太人忠于律法。但拉比所强调的遵守律法，必定由于内在原因而成了犹太人的一种迫切需要：它满足了他们内心的渴望，
190 它看起来是生命赐予他们的最珍贵的礼物。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各地犹太人时刻遭受种种迫害与苦难，而唯有它让他们保持尊严，没了它生活将毫无意义。在很长时期内，宗教指导铭记于《塔木德》之中，因此在许多世纪中犹太人靠它而生、为它而生、因它而生。《塔木德》是犹太人最珍贵的财产；它是犹太人呼吸的生气，是他的灵魂。《塔木德》成了一代又一代人的家庭史的一部分，每个成员都熟悉它。“思想家生活在它的思想观念里，诗人徜徉在它纯粹的理想状态中。外部的自然和人类世界，大地上的强权与世事，在犹太人看来，如同千年一遇的意外与幻影；唯一的现实就是《塔木德》。”[6]《塔木德》可以被恰当地比作（在我看来，这个比喻同样适用于一切宗教文献）一个外壳，流散犹太人就藏在这个外壳下；它使他们免受一切外部影响，从而维持内在力量。[7]

因而，我们看到正是这种力量的作用，才使犹太人直到现代一

① 罗耀拉（Loyola，1491—1556），西班牙贵族，耶稣会的创始人。——中译者注

直是最敬畏上帝的民族，使他们内心深处最虔诚——如果“虔诚”一词不恰当的话，不如说使他们到处保持着对其宗教规诫普遍而严格的遵守。对于本书目的而言，我们必须认为这种特征适用于一切类型和各种状态下的犹太人，16、17、18 世纪的马兰诺也包括在内。我们必须把这些人也视为正统派犹太人。研究这段犹太史的最大权威写道：[8]“绝大多数马兰诺是犹太人，其数量之多远远超过人们一般的想象。他们屈于环境的压力而仅在表面上做基督徒。其实，他们仍旧过着犹太人的生活，遵守着犹太宗教的信条……只有对阿拉卡利亚·德·赫纳雷斯、希马卡斯等地档案馆中的大量材料加以整理和利用，才能充分察觉这种令人钦佩的忠贞。”

在公开承认自己信仰的犹太人中，最富有者通常是出类拔萃的 191
《塔木德》学者。在犹太人中间，《塔木德》的知识是否是一条通向荣誉、财富与宠爱的捷径？最有学识的《塔木德》学者同时也是最机敏的金融家、医生、珠宝商、批发商。例如，我们得知，一些西班牙的财政大臣、银行家与宫廷医生，不仅在安息日而且每周抽出两个晚上学习宗教圣典。在现代时期，死于 1855 年的老阿姆谢尔·罗斯柴尔德也是如此。他严格遵照犹太律法生活，从不在陌生人哪怕是皇帝的餐桌上吃任何东西。一个很了解这位男爵的人这样讲道：“他被视为全法兰克福最虔诚的犹太人。我从未见过一个人如此折磨自己——拍打胸膛，仰天流泪呼唤——就如罗斯柴尔德男爵于赎罪日在会堂中所做的那样。连续不断的祈祷使他虚弱以致昏厥。花园中植物的香味飘进他的鼻子，他这才苏醒过来。”[9①] 他的侄子威廉·查尔斯死于 1901 年，作为法兰克福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最后一位成员，他一丝不苟地奉行最细枝末节的宗教规定。这个虔诚的犹太人在某些情况下拒绝接触被其他人碰过的任何不洁物体。因此，经常有个仆人走在他前面擦拭大门的把手。而且，他

① 桑巴特在德文版中引用这个内容时，将之作为安息日发生的事情。显然，这是描述赎罪日的。——英译者注

从不触摸任何用过的纸币，而只使用刚刚从印钞厂里取出的钞票。

如果这就是罗斯柴尔德生活的写照，那么遇到一年中有半年不吃任何肉食的犹太商旅便不足为奇，因为他们不能确定其屠宰方法是否符合犹太律法。

然而，如果想要了解正统派犹太教，就必须去东欧，它在那里
192 还没有瓦解的迹象——你必须亲自去那里或阅读相关的书籍。在西欧，正统派犹太人仅是一个很小的少数派。但当我们谈及犹太宗教的影响时，这种宗教直到一代人之前仍所向披靡，正是它指引着犹太人取得如此之多的胜利。

犹太宗教典籍

穆罕默德将犹太人称作“圣书之民”(the people of the Book，一译“有经人”)。他是正确的。没有其他民族如此彻底地依据一本书而生存。他们宗教的各个阶段通常可归结为某部书，而这些书可被视为犹太宗教的典籍。以下就是这些书的清单，每部书都起源于某个特定时间，并对一些其他的书有所补充：

1.《圣经》，即《旧约》，止于第二圣殿被毁。它在巴勒斯坦以希伯来文诵读，而在流散地以希腊文(《七十士译本》)诵读。

2.《塔木德》(尤其是《巴比伦塔木德》)，起讫时间从公元2世纪到6世纪，它是犹太宗教指导的主要宝库。

3. 迈蒙尼德的《法典》，编撰于12世纪。

4. 雅各·本·亚设(1248—1340)的《法典》(又称《四列书》[*Turim*])。

5. 约瑟·卡罗的《法典》——即《布就筵席》(16世纪)。

这些“典籍”使犹太宗教获得了生机，但它们在科学研究和虔诚的犹太人眼中是不同的。前者实事求是地看待它们，而后者把它们理想化了。

它们的真实面貌如何？《圣经》，即《旧约》，筑起了犹太教整个

结构的根基。它由不同时期的许多人写就，最后的成品就好比一幅文学马赛克。[10]它最重要的部分是《托拉》，即《摩西五经》。它如 193
今的形式是通过在以斯拉之后的某个时期将两种完整著作拼合起来而成的。一是新旧律法书(《申命记》，前 650 年)，另一个是以斯拉的律法书(前 440 年)。[①]《托拉》的独特特征要归功于以斯拉与尼希米，他俩引入了一个严格的律法系统。通过以斯拉及其创立的文士(Soferim)学派，今天所见的犹太教正式发端；从那时起到现在，一直没有改变。

除《托拉》以外，我们必须提及所谓的智慧文学——《诗篇》、《约伯记》、《传道书》、《德训篇》[②]与《箴言》。这些完全是后流放时代的犹太文献，只有在那个时期才可能产生，因为它们假定律法的存在，那种遵从律法上帝就会赐予生机而违背律法就会招致死亡的观念充斥其间。与先知书不同，智慧文学关心实际生活。其中的一些书卷包括多代人的智慧结晶，因而年代相对较早。例如，对本书最有用的《箴言》成书于公元前 180 年。[11]

从《圣经》中分出两股支流。一支主要通过《七十士译本》，部分汇入希腊哲学，部分汇入保罗的基督教。它们后来的发展不在本书关注之列。

另一支主要通过流行于巴勒斯坦的《希伯来圣经》，汇入犹太“律法”之中，这个过程我们必须关注。

犹太人对《圣经》的具体发展，早在以斯拉时代就已开始。首先由文士学派，而后由希勒尔与夏迈学派继承与扩展了这项工作。实际的“发展”由阐释与补充《圣经》组成的，这又是通过争论获得的，争论这种方法在希腊化世界中很流行。这种发展其实是一种 194

① 即，《申命记》第五章 45 节—第二十六章 69 节(大约形成于公元前 650 年)，《出埃及记》第十二章 25—31 节、第三十五章至《利未记》第十五章、《民数记》第一章—第十章、第十五章—第十九章、第二十七章—第三十六章(大约形成于公元前 445 年)。——英译者注

② 《德训篇》即《便西拉智训》，并不属于《希伯来圣经》正典之列，但在天主教中被视为正典书卷。——中译者注

日益收紧的律法形式主义，在于保护犹太教免受希腊哲学的侵蚀。在此，与往常一样，犹太宗教是对分裂力量作出反应的表现形式。申命律法是针对巴力崇拜作出的反应；祭司法典是为了抗拒巴比伦的影响；后来迈蒙尼德、拉比亚设与卡罗的《法典》都是为了应对西班牙文化的影响；公元前后坦拿（Tannai，意为“教师”）的教诲则是为了反对希腊文化的萎靡不振的学说。[12]

大约公元200年，“贤哲”的旧有口头传统由犹大·哈纳西（意即犹大亲王）编纂，此人通常就被称为拉比。这部著作就是《密释纳》。在《密释纳》之后，进一步的阐释与补充又由萨博拉（Saborai，意为“给建议者”）在6世纪（500—550年）搜集并固定下来。这些讨论《密释纳》的部分被单独称为《革马拉》，其作者是阿摩拉（Amorai，意为“讲述者”）。《密释纳》与《革马拉》共同构成《塔木德》，它有两个版本，分别为《巴勒斯坦塔木德》与《巴比伦塔木德》，后者相对更为重要。[13]

由萨博拉编定的《塔木德》，成为犹太宗教指导的主要宝库，而它取得普遍的权威，则要拜穆罕默德的征服所赐。首先，它成为巴比伦犹太社团生活的法律基础，当地的领袖为“流散地亲王”与两所《塔木德》学院的院长——加昂（Gaon，意为“卓越”）。随着伊斯兰教不断扩张，在它征服土地上的犹太社团与巴比伦加昂的联系愈加紧密；他们向加昂咨询宗教、伦理与一般法律问题，忠诚地接受后者的裁决，而这一切都建基于《塔木德》之上。实际上，巴比伦开始被视为犹太生活的新中心。

195 一旦《革马拉》写成并获得固定的形式，犹太教的发展随之停止。尽管如此，我们必须提及在后塔木德时代体现了这个宗教所有实质的三部法典，这首先是因为它们将犹太教以一种稍稍不同的形式加以呈现，其次是因为它们在规范宗教生活时不得不对已经变化的状况有所留意。所有这三部法典都被犹太人确认为与《塔木德》有着同等的权威，最晚出现的《布就筵席》仍被今天的正统派犹太人视为包含宗教义务的官方版本。令我们感兴趣的是，所有这些法典继续固化着犹太人的宗教生活。对于迈蒙尼德，连

格雷兹都颇有微词："《塔木德》中的大量内容今天仍是可变的，但他（迈蒙尼德）将之变成不可变更的律法。……他的律法编纂剥夺了犹太教的发展能力……他不考虑《塔木德》法规出现的年代，而主张它们适用于一切时代与所有环境。"拉比雅各·本·亚设比迈蒙尼德更进一步，而约瑟·卡罗又比雅各·本·亚设更进一步，从而达到了最终的极限。卡罗的著作倾向于极端的排他主义，满目是吹毛求疵的诡辩。犹太人的宗教生活"被《布就筵席》终结和统一，但这是以牺牲内在灵性与自由思想为代价的。卡罗给予犹太教以固定的形式，它一直保留到今天[14]"。

因而，这就成为犹太宗教生活的主流；犹太教从这些典籍中汲取了它的观念与理想。当然，还存在一些支流。例如，前基督教时代的启示文学就代表了一种神圣的、普世的、个人主义的犹太教；[15]此外尚有着迷于符号与数字的喀巴拉文献。但这些支流在犹太生活的总体发展中仅占很小份额，就其对历史上犹太教的影响而言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它们也从未被"官方的"犹太教视为犹太宗教的典籍。

关于这些典籍的现实主义概念已说了不少。但正统派犹太人 196
中间流行的看法又如何呢？从许多方面来看，影响大得多的，不是犹太体制的真实起源如何，而是虔诚犹太人相信这种起源如何。因此，我们必须试图了解他们的看法。

传统的观点认为（这也是每个正统派犹太人仍然坚持的），犹太体制有着双重起源：部分来自天启，部分来自"贤哲"的灵感。天启指的是成文和口头传统。前者包括在《圣经》的神圣经卷之中——它的正典由犹太教大议会的成员确定。它包括三大部分：[16]《托拉》或《摩西五经》、《先知书》与《圣文集》（其余的书卷）。《托拉》是在西奈山赐给摩西的，由他"在四十年的旷野流浪中逐渐教导给他的人民……他直至临终之际，才完成成文《托拉》，即《摩西五经》，并将之传给以色列人，我们有义务将成文《托拉》的每个字母、每个词语都视为上帝的天启[17]"。其余的书卷同样是神启的产物，或者起码是由神激发的。然而，对待《先知书》与《圣文集》的态

度要比对待《托拉》稍稍自由一些。

口头传统或者口传《托拉》，是对成文《托拉》的阐释。它也来自在西奈山上对摩西的启示，但由于时间仓促而没有及时书写下来。直到很晚的时候——第二圣殿被毁后——才被编入《密释纳》与《革马拉》之中；由于它们都是受神启示而来，因此包含了对《托拉》唯一正确的解释。《塔木德》中还包括拉比法令与哈加达（*Haggada*），后者是对《圣经》中除律法规定以外内容的解释。而对律法规定的解释被称作哈拉哈（*Halacha*），哈拉哈与哈加达相互补充。除此之外，还存在法律裁决的汇编，即上文已提到的三部法典。

197 所有这些文献对于犹太宗教生活有何重要意义？哪些是犹太人信仰的内容，哪些又是他们遵行的诫命？

首先，必须假定到目前为止，我知道犹太教中没有系统的教义。[18]任何对犹太教教义的系统编定，都是由非犹太人在尝试。[19]犹太宗教的本质，尤其是《塔木德》的结构，其特征就是缺乏条理，它与任何教义系统的表述都不一致。尽管如此，在犹太教中仍可发现某些原则，其精神体现于犹太人的实践之中。实际上，举出这些原则并不困难，因为它们从一开始就一直完好保存着。从以斯拉时代到我们的时代，所谓的“以西结精神”一直在犹太教中享有崇高地位。它不断发展，直至产生了合乎逻辑的结果。为了发现这种“精神”是什么，我们只需借助这个宗教的典籍——《圣经》、《塔木德》与后来的拉比文献。

要想确定这些教义在何种程度上仍被接受，是个更艰巨的任务。例如，《塔木德》中有句格言“杀死外邦人中的最优秀者”，这是否仍有效？其他由普弗夫科伦、埃森门格尔、勒林、尤斯图斯博士这帮人从犹太宗教文献中搜罗出来的恐怖格言，是否仍有人相信？或者它们是否像今日拉比们愤然反对的那样已彻底过时了？显然，某些教义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表达方式，而且在全部文献尤其是在《塔木德》中，一旦涉及某些具体问题，“赞成”与“反对”的观点均可看到。换言之，从《塔木德》中可以彻底“证明”任何事情。

因此，在反犹者与其犹太或非犹太的反对者之间的攻击和反击古已有之；因此，有些人根据《塔木德》证明为黑的东西，另一些人能根据同一典籍证明它是白的。一想到《塔木德》在很大程度上不过 198
是不同拉比学者之间的辩论集，这点就毫不奇怪了。

为了找到规范实际生活的宗教法令，我认为我们必须作出一种区分，即把通过自学为自己寻求律法的人与根据他人权威来接受律法的人区分开来。在第一种情况中，重要的是去表达这种或那种见解。是否有与之截然相反的见解倒不重要。因为对于通过学习典籍陶冶心性的虔诚犹太人而言，获得一种见解就够了。它可以激发出某种行动步骤，还可以为自己已经开始的某项行为提供额外的理由。在这两种情况下，有来自书本——尤其是来自《圣经》，来自《托拉》则更佳——的许可就足够了。因为一切都源自神圣，某个段落与其他段落的约束力是一样的。这个原则无论对《圣经》、《塔木德》，还是对后来的拉比文献都适用。

如果此人没有或不能自学这些典籍，而只能依靠精神导师的指导或者依靠他推荐的书，情况就不同了。这个人只能接触到一种观点，它是通过对互相矛盾的文本作出适当解释而得到的。显然，这些观点必然时不时地发生变化，与各个时期的拉比传统相一致。因此，为了找到任何时期都适用的律法，就必须去寻找各时代的拉比传统怎么看它——这项任务自拉比律法书出版后就不繁难了。从 11 到 14 世纪，我们有迈蒙尼德的《大能的手》（*Yad Hachazaka*）[①]，从 14 到 16 世纪有拉比雅各·本·亚设的《四列书》，16 世纪之后有卡罗的《布就筵席》。它们中的每一部都提供了当时所接受的指导，因此每一部都是决定性的权威。因此，过去三百年间，在但凡有意见分歧的地方，一律以《布就筵席》中的规定为准。正如上引教科书所写，“首要的是，拉比约瑟·卡罗的《布就筵 199

① 迈蒙尼德《法典》（*Mishneh Torah*）的另一个称呼。《法典》共 14 卷，与希伯来文“手”（yad）的数值相同（y=10，d=4），故犹太人又用圣经中的典故（见《申命记》6:21）称之为《大能的手》。——校注

席》与拉比摩西·伊塞勒林的注释及其他注解一道，被全体以色列人奉为仪式遵守的典范。”律法还体现在由迈蒙尼德从《托拉》中总结出来的613条诫律中，它们甚至直到今天仍然有效。“根据我们（已故）拉比的传统，上帝借助摩西之手赐给以色列人613条诫律，其中有248条训诫与365条禁诫。所有这些诫律都具有永恒性；只有那些与犹太国家、巴勒斯坦农业生活及耶路撒冷圣殿仪式有关的诫律除外，因为流散地的犹太人已无法履行它们。我们要遵守369条诫律，其中有126条训诫和243条禁诫；此外还有7条拉比诫令。”[20]

在拉比律法的指导仍被遵循，而建立在私下学习典籍基础之上的观念没有形成的时候，正统派犹太人在过去这个世纪的生活便由这些法规支配，今天依然如此。因此，我们必须从已经提及的法典中收集那些对个体宗教生活具有决定作用的法令。这样，本书不会关注改革了的犹太教，那些为了适应现代观念而写的著作，例如最近绝大多数关于“犹太教伦理”的阐述，也对本书目的毫无用处。我所关心的，是要揭示真正的犹太教导与资本主义之间的关联，并揭示它在现代经济生活中的重要性。

犹太宗教的基本观念

让我即刻声明：我认为犹太宗教有着与资本主义一样的重要观念。我在两者中间看到了同样的精神。

为了试图理解犹太宗教——顺便说一下，一定不要将之与以色列宗教[①]混为一谈（两者在某种意义上是相互对立的）——我们必须牢记其作者是一位心思缜密的文士，其工作在他之后又由一群文士所完成。要注意，他不是先知，不是预言家，也不是一位有远见或强大的君王，而是一位文士。我们也必须牢记这是**如何**出现
200 的：既不是作为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也不是作为悔悟的灵魂最深层需要的表现，更不是作为受神启示信徒的情感体现。相反，它的

① “以色列宗教”这里指《圣经》中的以色列人的宗教。——校注

出现是靠一种周密的计划，靠机敏的推论以及基于“它的宗教必须用来保护人民”的外交政策。在随后的世纪里，出于同样的冷静考虑、同样的对终极目标的关注，诫律条文不断增加。那些在以斯拉时代以前及此后出现的与文士计划不合的内容，逐渐消失。

使之诞生的独特环境的痕迹在犹太宗教中至今清晰可见。在此过程中，它作为一种智力创造而吸引我们，它仿佛是投入生物世界的一种思想和意图，机械熟练地运转着，注定要摧毁与征服自然界，并对其施加统治。资本主义也是这样出现的：与犹太宗教一样，它也是自然与受造世界中的外来因素；与犹太宗教一样，它还是熙熙攘攘的生活中一种有组织、有计划的事物。这些醒目的特征与一个词语联系在一起：理性主义。理性主义是犹太教也是资本主义的典型特征；理性主义或理智主义（Intellectualism），这两者的死对头是不负责任的神秘主义以及从激情的感官世界汲取艺术灵感的创造力。

犹太宗教没有神秘意识，它或许是世界上唯一没有神秘意识的宗教。它不懂得崇拜者与上帝交流时欣喜若狂的状态，而这种状态在所有其他宗教中被奉为最崇高和最神圣。不妨想想印度人（Hindoo）中间的苏摩祭（Soma libation），想想因陀罗（Indra）本人的出神，想想波斯人的霍玛（Homa）祭，想想狄奥尼索斯，想想希腊神谕，想想西卜林书（Sibylline books）——即使是沉着冷静的罗马人也向之求助，只因为它们是由在癫狂状态中预言未来的妇女所写。

直到罗马帝国的最后时期，宗教生活继续在各个方面保留了异 201
教特征——这种特征传播广泛，影响了绝大多数民众，使他们全神贯注于肉体或精神的兴奋，通常发展成酒神式的疯狂，随后又视之为神迹和祭神仪式的一部分。一般认为，激情或决心的突发和爆发，是受神灵激发人的灵魂所致；某人感到羞愧或悔恨的行为，通常也归结为神灵影响。[21]“神明驱使我这么做”——在普劳图斯的喜剧中，一个引诱少女的青年男子向他父亲如此申辩。

当穆罕默德处于突发的出神状态之时，必定也经历了类似的事情。伊斯兰教中存在大量的神秘主义，至少它有旋转起舞的苦修

教士。

基督教也是如此。自它从犹太教中分离出来，就为情感预留了空间——三位一体的教义、讨喜的圣母崇拜、焚香与圣餐，都是这方面的见证。但犹太教引以为豪地鄙视这些怪诞而神秘的成分，并对之加以彻底谴责。当其他宗教在极乐的狂喜中与上帝虔诚交流之时，犹太会堂中却没有比公开诵读《托拉》更为重要之事。这是以斯拉规定的，并被最小心谨慎地执行。“自从国家灭亡后，学习成了犹太教的灵魂，与他们所珍视的诫命无关的宗教仪式被视为毫无价值。安息日与宗教节日的公共仪式的核心特征，就在于诵读《律法书》、《先知书》，在于 *Targumists*（翻译者）提供的翻译段落，以及 *Haggadist*（布道者）对此所作的布道解释。”

202

愚蠢之根是安息日：冰冷的安息日称了
他们的心，可这心比他们冰冷的信念还冷。
每到第七天就在可耻的懒散中打盹，
模仿他们那精神不振的上帝的疲惫。

这是罗马人的观点。[22]

因此，犹太教对神秘主义不以为然，它不会另眼相看情感世界中对神明的神圣热情。阿斯塔尔特①、达芙妮②、伊西斯③与奥西里斯④、阿佛洛狄忒⑤、弗莉卡⑥与圣母马利亚——这些在犹太教中全

① 阿斯塔尔特（Astarte），《圣经》中作“亚斯他录”，迦南神话中司掌爱情、丰饶等方面的女神。——中译者注

② 达芙妮（Daphne），希腊神话中的女神，河神之女，为摆脱阿波罗的求爱而变成了一颗月桂树。——中译者注

③ 伊西斯（Isis），古埃及神话中的大地和繁衍女神。——中译者注

④ 奥西里斯（Osiris），古埃及神话中的死亡之神，亡灵的引导者和守护者。——中译者注

⑤ 阿佛洛狄忒（Aphrodite），希腊神话中的爱情女神，罗马神话中称为维纳斯。——中译者注

⑥ 弗莉卡（Fricka），北欧神话中的众神之后。——中译者注

不存在。犹太教的崇拜禁绝一切图像艺术。“耶和华从火焰中对你们说话，你们只听见声音，却没有看见形像。”(《申命记》4：12)“有人制造耶和华所憎恶的偶像，或雕刻，或铸造，就是工匠手所作的，……那人必受咒诅！”(《申命记》27：15)“你不可做什么形像”的诫命在今天仍被接受，虔诚的犹太人从不制作任何偶像，也不将之置于家中。[23]

犹太教与资本主义之间的亲密关系，通过上帝与以色列人之间的法律关系——我已道出了这种关系类似于商业联系的性质，只是没说该词有令人不悦的含义——而进一步阐明。实际上，犹太教的整个宗教体制完全是耶和华与其选民之间的契约，这是一份包括所有后果与所有义务的契约。上帝应许并赐予恩惠，公义之人必须给予他相应的回报。实际上，上帝与人类之间的利益共享都可以用此话表示——人类履行《托拉》吩咐的某些义务，并从上帝那里获得相应报酬。因此，每个人通过祈祷接近上帝时，都要带上自己或祖先的一些东西，以此回报他将要向上帝所做的请求。[24]

这份契约通常规定，人类因遵行义务而获得奖赏，因忽视义务而遭受惩罚；奖赏与惩罚部分来自此世、部分来自来世，从而出现了两种必然结果：首先，不断估量任何行为必然带来的得失；其次，可以说出现了一种针对每个个体的复杂的记账制度。 203

拉比(公元164—200)的话对这整套概念作了很好的阐释：“什么是一个人所当选择的正道呢？那就是一条能给选择者以荣耀和他人之赞誉的道路。要谨守圣诫，轻重如一，因为圣诫所被赋予的价值非你所知。务请权衡守诫所失与其所得孰轻孰重，以及破诫所得与其所失孰少孰多。当心三件事，你便不致越入罪孽之域：明白在你之上，有眼在看，有耳在听，你的一切行为都记录在案。”[25]① 因此，某人被判定为“正义”还是“邪恶”，取决于遵守与忽视诫律之间的平衡。显然，这需要持续的账目记录；因而每个人都拥有自己

① 此处引文的翻译采自《阿伯特：犹太智慧书》，阿丁·施坦泽兹诠释、张平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第24—25页。——中译者注

的账目，以记录自己的言行，甚至开玩笑的言论都被仔细记录下来。根据一处经文（*Ruth Rabba*，33*a*），先知以利亚从事记录账目的工作；而根据另一段经文（*Esther Rabba*，86*a*），这项任务被指派给了天使。

因此，每个人在天堂中都有一份账目：以色列拥有特别大的一份（*Sifra*，44*b*）。而迎接死亡的方式之一，就是备好你的“账目”（*Kohelet Rabba*，77*c*）。有时，来自账目的“摘要”是随要随有的。当天使们控告以实玛利时，上帝问道：“他现在什么状况？是义人还是恶人？”（即他遵行的诫命是否比他忽视的诫命多？）天使们回答：“他是义人。”当马尔·乌克巴去世时，他询问自己（用于慈善的钱财）的账目结算情况。其总数为 7000 祖兹[①]。他担心这些将不足以拯救他，于是放弃了一半财产以求万无一失（*Kethuboth*，25；
204 *Baba Bathra*，7）。判断某人正义或邪恶与否的最终定论，是在他死后作出的。届时账目完成，其总数得以列出。这个结果在被宣读后，附在一份文件（*Shetar*）中被交给每个个体。[26]

不难发现，记这些账并非易事。在圣经时代，赏罚已在此世作出，这个任务尚不艰巨。但此后，赏罚部分在此世、部分在来世作出，由此成为一个棘手的难题；于是，拉比神学中发展出了一种复杂而精密的记账制度。拉比们区分出资本总额（或本金）与报酬（或利息），前者被保留到来世，后者只及于此世。为使不让储存在天堂中对义人的奖赏减少，上帝在给予他普通的现世的好处时并未减少这个储存。只有当他接受了特别的（即奇迹般的）好处时，义人在现世的所得才会减少他在天国的奖赏。此外，义人会在此世因其罪而立即遭到惩罚，恶人则会因其善举而立刻获得奖赏，这样，前者在天堂只会获得奖赏而后者则只会遭受惩戒。[27]

还有一种概念与这种神圣的账簿有关，并与资本主义第二个根本特征酷似，这就是利润的概念。罪恶或善行被视为与有罪者无关的事物。根据拉比神学，每种罪恶皆单独存在，自成一体。“惩

① 祖兹（zuz），一种古希伯来银币单位。——中译者注

罚视罪恶的客体而非主体来定。”[28]所违反的诫命的数量本身就很重要，而根本不考虑有罪者的个性或其道德状况，正如金钱总额与人无关一样，也如这个总额可以与另一个抽象的金钱总额加起来一般。因此，为了获得此世与来世的福祉，义人必须不断努力增加他的奖赏。现在，由于不知道何种特别的良心状态值得上帝仁慈，
205
也不知道在他的“账本”里奖赏和惩罚哪个更多，他只有不断行善，直至生命最后一刻，以此为其账本不断增加奖赏。因此，一切个人价值的有限概念不被允许进入他的宗教观念世界，取而代之的，是没完没了的纯粹数量的理想。

还有一种趋势与此类似，且遍布于犹太道德神学中，这就是将获取金钱视为达到目标的一种手段。这个概念在灌输宗教教诲的书籍中频频出现，其作者很少意识到，他们在警告不要获取过多财富的同时又美化了这种行为。通常对这个主题的探讨归于“贪恋”之列，为第十条诫律所禁止。“一个真正的以色列人，”一份现代最受欢迎的“信仰助手”评论道，[29]“避免贪恋，他将全部财产仅视为取悦上帝的一种方式。难道他生活的全部目标不是以其全部财产和乐趣用于实现这一目的？实际上，这是一项获得财富和增加快乐的义务……它们本身并非目的，而是作为一种彻底遵照上帝意志行事的方式。”

如果有人强调，这并非可以证明宗教观念与获利原则之间有关联的决定性证据，那么，只要看一看神圣仪式的特别程序就将令人信服。在仪式的某个阶段，存在一种真实的公开拍卖行为。与诵读律法相联系的荣誉差事被给予了出价最高者。在经卷被从约柜中取出之前，管事绕着中央讲坛边走边喊：“谁愿意购买‘*Hazoa vehachnosa*’（意即从约柜中取出经卷和放回去的行为）？谁愿意购买‘*Hagboha*’（意即当众高举经卷的行为）？谁愿意购买‘*Gelilah*’（意即诵读结束时收起经卷的行为）？”这些荣誉被标价出售给最高
竞标者，而他们则将钱财放在会堂的济贫募捐箱中。不用说，今天 206
这种行为久已不见于会堂崇拜。但它在很久以前十分普遍。[30]

另外，一些精通《塔木德》的人有时会就最棘手的经济问题争

辩，这些人本身具备经验丰富的商人的各种技巧，他们的言论含义奇特，必然让我们得出他们宣扬获利的结论。这个或那个拉比推荐的现代获利方式散见于《塔木德》之中，他们中的不少人本身就是大商人，将《塔木德》中的这些段落辑录起来，将是一项令人兴味盎然的工作。我只引用一两个例子。“拉比以撒也教导说，一个人应当让他的钱一直流通。”拉比以撒还给了这个好建议：一个人应当将他的财富分作三份，一份投资于地产，一份用于动产，第三份是随时可用的现金（*Baba Mezia*，42*a*）。“拉夫曾对儿子说，你过来，我指导你一些世俗事务：脚上仍有灰尘时就要出售你的商品。”（这不就是一个快速周转资金的建议吗？）“首先打开你的钱包，然后松开小麦袋……你的盒子里还有椰枣吗？赶快去酿酒人那里。”（*Pesachim*，113*a*）

犹太宗教与资本主义之间的对应关系的意义何在？这只是一种巧合？或是命运开的愚蠢玩笑？是其中一个影响另一个，还是两者具有共同的起源？提出的这些问题，我希望能够在下文予以回答。在此，应当充分注意到这些问题。我们的下一步比较简单，即揭示犹太宗教中的个人习俗、想法、观念与规则如何影响犹太人的经济行为，揭示它们是否通过犹太人而便利了资本主义的扩展，如果是这样程度又有多大。我们这方面将只关注首要的心理动机，而避免一切猜测的困难。我们面对的第一个问题，是发现犹太宗教所确立的目标及其对经济生活的影响，这是下一部分的内容。

207

赏罚的观念

契约的观念是犹太教根本原则的重要内容，通过它必然得出的推论是，任何履行契约者将获得奖赏，而违背契约者将遭受惩罚。换言之，从法律和伦理的角度看，善行带来昌盛、恶行招致惩罚，是所有时代犹太宗教的一个概念。只有对昌盛和惩罚的解释才会起变化。

犹太教的最古老形式根本不知有来世。因此，苦难与灾祸只出现在此世。如果上帝希望施加惩罚或赐予奖赏，他必须在人的有生之年进行。因此，义人在此世获得昌盛，恶人则在此世遭受惩

罚。上帝说:遵行我的诫命,“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的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因此,约伯痛苦地呼喊道:“恶人为何存活,享大寿数,势力强盛呢?……神用篱笆拦住我的道路,使我不得经过;……他在四围攻击我,……他的忿怒向我发作,以我为敌人。”(《约伯记》21:7;19:8,10,11)“为什么将一切的恶加在我身上,由于我一直遵行他的道?”

在以斯拉之后不久,来世(*Olam Habo*)的观念在犹太教中逐渐流行开来,灵魂不朽与肉体复活的观念也是此时出现的。这些信仰有外来的起源,很可能来自波斯。但与犹太教中的其他外来因素一样,它们也被赋予了一种伦理意义,以与这个宗教的特质相符。正义与虔诚将在死后得到伸张的教义逐渐发展起来。因此,对永恒的信仰被文士拿来与原有的赏罚教义调和,为的是强调道德责任感,也就是强调对上帝审判的敬畏感。[31]

现在,此世繁荣的观念得以扩展。这不再是此生行善的唯一奖赏,来世会受到的奖赏也被加入进来。尽管如此,上帝在此世的赐福仍是整个奖赏中不小的一部分。此外,一个人在此世的繁荣是 208
上帝对其生活满意的明证,他由此可以期望也能在来世获得奖赏。这样一来,命运无常的观念就不再令人困惑。现在,可以将无常的命运视为上帝在此世对义人违反诫命施加的惩罚,以便他在天堂中的回报不会减少。

“财产的教义”(如果此术语可用在犹太宗教上的话)也多少形成了,这在智慧文学中体现得最清楚。生活的最大目标是为了遵行上帝诫命。离开了上帝,现世的幸福就不复存在。因此,为了自身的缘故而寻求获得现世财产,是愚蠢之举,而应当获得它们以便用于神圣的目的,因而财产成为上帝恩宠的外在标志和保证,也是其赐福的体现——这种想法不失为明智。依此看来,现世的财产包括一套设备齐全的居室与健康舒适的身体——简言之,就是财富。

通览犹太文献,尤其是《圣经》与《塔木德》,将会发现在其中有些段落里,贫困被赞美成比财富更为高尚与尊贵之物。但另一方面,又有无数段落把富有称作上帝的赐福,而只是警告对它们的滥

用会有危险。而且，我们处处皆可读到，财富本身并不必然带来幸福，其他事物也很重要（比如健康）；“善行”（在最宽泛意义上使用该词）就比财富更有价值或一样有价值。但总之，没有任何事物被用来**反对**财富，也没有出现上帝厌恶财富的任何段落。

我曾在一次公开演讲中表达过这种观点，但它遭到来自各方的严厉批评。最受质疑的是这点：财富在犹太宗教中被视为一种有价值的善行。我的许多批评者，其中包括几位杰出的犹太拉比，不
209 厌其烦地从《圣经》与《塔木德》中举出段落反驳我。我承认《圣经》与《塔木德》中有多处将财富视为对正义的威胁，并高度赞美贫困。这些内容在《圣经》中大约有半打，在《塔木德》中则更多。但重要的是，这些段落的每一个都被十倍于此的、体现了一种完全不同精神的其他段落所盖过。在这里，数量当然十分重要。

我以这种方式给自己提出问题。让我们想象一下年迈的阿姆谢尔·罗斯柴尔德于某个星期五晚上，在他从证券交易所“挣得”100万之后，转向《圣经》获取启迪。关于他的收入以及这些收入对升华灵魂的影响（这种影响肯定是这位虔诚的犹太老人在安息日前夕想要的），他将在那里发现什么呢？这100万会让他良心不安吗？或者，他难道不能正当地去说“上帝的保佑支撑着我这一周。感谢你，主啊，你仁慈地将光明赐予你的仆人。为了得到你的恩宠，我要多行慈善，并比以前更严格地遵行你的诫命”？如果他通晓《圣经》，将会说出这样的话，而他确实通晓《圣经》。

他的眼睛将沾沾自喜地停留在《圣经》中的许多段落上。在他钟爱的《托拉》中，他将反复读到上帝的这段赐福：“他必爱你，赐福与你，使你人数增多；也必在他向你列祖起誓应许给你的地上，赐福与你身所生的、地所产的，并你的五谷、新酒和油……你必蒙福胜过万民。”（《申命记》7：13—15）当他继续读到这几句话时，该会有多感动啊：“因为耶和华你的神，必照他所应许你的赐福与你。你必借给许多国民，却不至向他们借贷。”（《申命记》15：6）然后，假定他翻到《诗篇》，将在那里发现什么？

耶和华的圣民哪，你们当敬畏他，因敬畏他的一无所缺。（《诗篇》34：10）

敬畏耶和华……便为有福。……他家中有货物，有钱财。（《诗篇》112：1—3）

我们的仓盈满，能出各样的粮食；我们的羊在田间孳生千万。（《诗篇》144：13）

当读到《约伯记》的结尾时，他会与约伯一道欢喜，因为受尽磨难的约伯最终获得了比一开始还要多的赐福："他有一万四千羊，六千骆驼，一千对牛，一千母驴"及其他。（幸运的是，我们的阿姆谢尔对现代圣经评鉴学一无所知，所以不知道《约伯记》中的这段是后人添加的。）

先知同样许诺，如果以色列人遵行上帝之道，便会获得现世的奖赏。倘若阿姆谢尔翻到《以赛亚书》第六十章，将发现外邦人有朝一日会把金银奉送给以色列人的预言。

但是，阿姆谢尔最喜爱的书或许是《箴言》，[32]"它以一种最丰富的方式表达了当时流行于以色列的生活观念"（正如一位拉比所言，他写信给我，引用了此书中的这六段经文，以证明我的错误：《箴言》22：1，2；23：4；28：20，21；30：8）。在此，他将被警告财富本身不能带来幸福（22：1，2），即使家财万贯也一定不能不认上帝（30：8），"想要急速发财的，不免受罚"（28：20）。（或许他会对自己说，他并没有"急速"致富。）唯一可能令他不快的段落，或许是读到"不要劳碌求富，休仗自己的聪明"（23：4）。但片刻之后，一旦他注意到此段之前的话，他就宽心了。可能这六段经文根本不会让他困惑不已，只要他记得此书中称颂财富的诸多段落。实际上，这些段落非常之多，以致可以说它们设定了《箴言》的整个基调。[33]可以从中引用一些：

她右手有长寿，左手有富贵。（3：16）

丰富尊荣在我，恒久的财并公义也在我。（8：18）

211 富户的财物是他的坚城。(10:15)

智慧人的财,为自己的冠冕。(14:24)

敬畏耶和华心存谦卑,就得富有、尊荣、生命为赏赐。(22:4)

智慧文学还包括《传道书》与《所罗门智训》。诚然,前者[34]并不具有统一的精神,后来的许多添加使之充满了矛盾。然而,即使在这里,这位虔诚的犹太老人也无法找到教导他轻视财富的任何段落。相反,财富被给予了极高评价:

神赐人资财丰富,使他能以吃用……这乃是神的恩赐。(5:19)

设摆筵席,是为喜笑。酒能使人快活,钱能叫万事应心。(10:19)

《所罗门智训》也同样称赞富有。这种情况在《便西拉智训》中亦不少见。老阿姆谢尔必定带着喜悦阅读它。如果某位拉比告诉他,《便西拉智训》几乎将富人视为有罪者,认为财富是罪恶之源,并以第十章至第十三章为证。阿姆谢尔会这样回答:"我亲爱的拉比,你弄错了。那些段落是对财富危险的警告,但一位能够避免风险的富人因此更加公义。'不依靠罪恶的手段而发财致富的人,可算是幸运。……这个人可真是当之无愧的财主,人人都应该祝贺他的宽宏大度。'"(31:8,11)[①](因此阿姆谢尔会继续说)"我亲爱的拉比,为什么你不提及那些谈论积聚了百万资财者的段落,比如下面这几段?"

勤劳致富要比空话饿肚强得多。(10:27)

---

① 《便西拉智训》有关段落的中译文引自《圣经后典》,张久宣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中译者注

穷人靠贤良赢得荣耀，富人靠财富赢得荣耀。(10:30)

万事出于主：成功和失败，贫穷和富有，生命和死亡。 212
(11:14)

黄金和白银可以提供安全的保证，但是比不过腹有良谋。(40:25)

财富和势力可以产生信心。(40:26)

与其乞讨还不如死去的好。(40:28)

"我是否应该为我的百万资财而感到羞愧，我亲爱的拉比"(阿姆谢尔将这样结束这场虚构的对话)，"我是否不应将之视为上帝的赐福？想到贤哲便西拉如此称赞伟大的所罗门王(47:18)：'在以色列之主上帝的名义之下，你收集银子和金子，如同锡和铅一样。'拉比，我将同样以上帝的圣名，像收集锡铅一样来收集金银。"

在《塔木德》中，表达了同样观点的段落俯拾即是。如果财富的主人遵行上帝之道，那么财富就是对他的赐福，反之贫困就是对他的诅咒。在全部《塔木德》中，几乎找不到轻视财富的内容。让我们引用一些关于这个主题的《塔木德》格言：

有七种"与义人相称、与世界相称"的特征，其中之一就是财富。(*Aboth*, vi. 8)

在祈祷中，一个人应当求助于拥有财富与财产的上帝……实际上，这两者并非来自商业，而是根据美德。(*Kidushin*, lxxxii*a*)

拉比以利亚撒说道，"义人爱金钱胜过爱身体"。(*Sota*, xii*a*)

拉巴敬重富人，拉比阿吉巴也是如此。(*Erubin*, lxxxvi*a*)

只有在匮乏之时，人们才懂得最珍视财富。(*Aboth de Rabbi Nathan*)

这些有关财富的教导，只会鼓励产生一种入世的生活观。这是

犹太人的观点，即使他们也相信来世。实际上，犹太教中有过苦修
213 运动的尝试（例如，9 世纪的卡拉派曾聚集起来过修士生活；[①]11 世纪巴奇贾·伊本·帕库达在西班牙宣传苦修主义），但都没有扎下根来。犹太教即使在劫难深重的时期，也一直保持乐观。在这方面，基督徒不同于犹太人，他们的宗教试图剥夺一切可能的世俗欢乐。财富在《旧约》中常常受到称赞，却被《新约》屡屡谴责，《新约》转而高度赞美贫困。艾赛尼派超世脱俗的所有观念被吸收进《福音书》。人们可以轻易回想起有关这种影响的许多段落。（参见《马太福音》6：24；10：9，10；19：23，24）“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这是基督教关于这方面的精神主旨，它与犹太教显著不同。在全部《旧约》中找不到与耶稣这一格言相似的内容，整个拉比文献中很可能也找不到。

无需详述虔诚犹太人与虔诚基督徒对于经济活动的不同态度。基督徒被迫用各种智力体操（mental gymnastics）把艾赛尼派关于财富的概念从其经文中抹去。而富有的基督徒一想到天国之门对他紧闭，该会多么焦虑啊！与他相比，正如我们看到的，犹太富人却“以上帝的名义”像收集锡铅一般收集金银。

众所周知，基督徒的宗教阻碍着他们的经济活动。同样众所周知的是，犹太人从未遭遇这种障碍。一个犹太人越虔诚、越熟悉其宗教文献，就越会受这些文献中的教导的激励，去扩展其经济活动。在虔诚犹太人的心中，宗教和商业完美交融的例证可以从令
214 人愉快的《辜黎柯·冯·哈梅因自传》中找到，此书上文已经提到。她说：“赞美上帝，他慷慨大方、忠诚可靠，总是弥补我们的损失。”她还写道：“我丈夫给我寄来一封长长的安慰信，劝我平复灵魂，因为值得赞美的上帝将恢复我们曾经失去的一切。的确如此。”

---

① 此处有误，卡拉派的特征是他们接受并严格按照《托拉》的字面意义生活。——英译者注（校按：斐洛笔下的特拉普提派［Therapeutae］符合桑巴特的这个描述。）

生活的理性化

既然犹太教依赖于上帝与其子民之间的契约，即依赖于一种每一方必然拥有明确责任的双边法律协议，那么，犹太人的责任是什么？

这个问题的答案由上帝通过他的仆人摩西反复给出。以色列人一再被告知身负两条最大的义务：要成为圣洁，并遵行上帝的律法。（参见《出埃及记》19：6；《申命记》4：56）上帝并不要求献祭，所要的是服从。（《耶利米书》7：22，23）

众所周知，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犹太人把对律法无微不至的履行视为正义。早期可能存在过的内在圣洁，在形式主义与律法主义出现后很快消失了。成为圣洁与遵行律法变成可以互换的词汇。众所周知，这种律法主义是拉比们的策略，他们以此保护犹太人先是免受希腊文化而后是免受基督教的影响，最后，当第二圣殿被毁后，他们又用它来维持民族意识。与希腊文化的斗争导致了法利赛主义出现；与以信仰取代律法的保罗基督教的斗争，则促使法利赛宗教转变成《塔木德》宗教，文士“控制一切生活领域”的原有策略比从前有了更大发展。犹太社团在政治孤立中完全屈从于新的等级制度。他们对最终结果心满意足，因此接受了实现这个结果的方式。学校和律法比圣殿与国家更为持久，法利赛人的拉比主义拥有无限的影响。自此之后，正义意味着严格遵照律法生 215
活。在以律法为中心的文士影响下，虔诚被赋予了一种法律含义。宗教成了习惯法。在《密释纳》中，这一切都得到极好的表述。《摩西五经》中的诫命及从中推导出的诫命都来自神，必须不加质疑地遵守。由于来自外部的压力越来越大，重要的与不重要的诫命之间的差别越来越小。[35]

因此，它一直维持了两千年之久，今天依然如此。严格的正统派继续坚守这种形式主义与没有变化的犹太教原则。《托拉》的字字句句在今天仍然像它当初在西奈山上被赐予摩西时那样具有约束力。[36]虔信者必须遵守这些律法与诫命，而不论它们重不重要，也

不论它们看上去是不是有意义。它们必须被严格遵守的唯一理由乃在于它们是由上帝所赐予的。这种绝对的遵守造就了正义，也铸成了圣洁。“依《托拉》来看，圣洁或神圣就是能够实现上帝启示的意志而不作任何斗争，并带着执行自己意愿的那种快乐去执行上帝的意志。这种神圣，这种神人意志的完全交融，是只有极少数人才能彻底达到的崇高目标。因此，关于神圣的律法首先是指通过奋斗达到这个目标。这种奋斗任何人都可以行；它要求持续的自我警觉和自我学习，要求与一切低级和粗俗、肉欲和兽性作无尽的斗争。遵守《托拉》的吩咐，是朝越来越高的神圣攀登的最安全的天梯。”[37]

这些内容十分清楚地显示了神圣与律法主义彼此相关，显示了以色列人的最高目标仍是成为一个祭司的国度和圣洁的民族，而通往那一目标的途径是严格遵守上帝诫命。一旦这一点清楚了，我们就可想象犹太宗教对于整个生活的重要性。从长远看，外在的律法主义并非一直是外在的，它对内在生活产生了持续影响，这种内在生活从遵守律法中获得了独有的特征。

216 这个塑造了犹太教的心理过程在我看来是这样的：首先，上帝的吩咐无论内容如何都重要。但逐渐地，这些内容必须在其遵守者看来十分清楚，这样，一种明确界定的生活理想便从上帝的言词中发展出来。为了遵循这一理想，实现正义和达到神圣便是每个信仰者内心的渴望。

虔诚犹太人在物质层面上说的神圣在过去（以及在今天）指的是什么？在继续讨论之前，我们先来努力获得这方面的一点概念。

让我们回想下前一部分所讨论的犹太宗教的“世俗性”。与此一致，否认或压制自然本性几乎无法达到神圣，与之相反的观点是其他宗教——如佛教或原始基督教——所教导的。犹太教一直敌视面向来世的苦修主义。“对于已经赐予你的灵魂，要保护它，而永远不能消灭它”，这句《塔木德》格言是构建生活行为的基础，并流行于所有时代。[38]

因此，否定生命不能实现神圣。运用激情与欲望也不能达到神

圣。如果真是这样，就不能把它作为一种理想树立在所有正义者面前。因此，只存在另一种可能——根据基于超自然法则的某种理想计划而有目标地生活，要么利用自身的各种欲望，要么压制它们。总之，神圣就是生活的理性化，即决心用道德生活取代充满欲望与嗜好的自然状态。成为神圣就是变得完善，而要实现这一目标，就要通过道德遵守来克服一切自然习性。[39]

一种坚固的二元主义——这种极度的二元主义是我们本性中的必要部分——成了犹太人伦理价值观的特征。自然并非是不神圣的，但也不是神圣的。它还不是神圣的，却可以通过我们变得神圣。它包含了一切罪恶的种子，蛇依然潜伏在草丛中，正如它很久之前就潜伏在伊甸园中那样。“上帝确实创造了恶冲动，但他也创造了《托拉》这部道德律法，这是前者的解毒剂。”[40]人类生活的全部 217
就是一场反对自然中有害力量的伟大战争，这是犹太道德神学的指导原则，正是在它的指导下，才制定了相应的法令和法规系统，生活由此会被理性化、去自然化、完善化和圣化，而无需放弃与压制它。在此过程中，我们看到基督徒（艾赛尼派）与犹太人（法利赛派）的道德观念显著不同。前者自然导向远离尘世、遁入寂静的隐居与修道（如果不是通向死亡），后者则以无数链条将其忠诚的信徒绑在个体及社会生活之上。基督教使它的信徒变成修士，犹太教则使其信徒成为理性主义者；前者的结局是超脱此世的苦修主义，而后者的结局是此世之中的苦修主义（这里所谓的苦修主义指的是克制人的自然本性）。

如果对这些法规逐条考察，我们就会对犹太伦理（因此同时也对犹太宗教）所代表的内容了解得更清楚。

律法的作用是双向的。它的存在就有影响，其内容也是如此。

存在一部人们有义务遵行的律法，这会让人反思自身的行为，并让这些行为与理性的命令相吻合。每个欲望之前都设有一个警示；虔诚者的每次自然冲动都被各种警示的法规和宗教教导所消除。如今，由于遵守形形色色的法规（迈蒙尼德编定的著名诫律就包括 365 条训诫——其中 243 条仍然有效——及 248 条禁诫）对那

些没有深入了解过这些法规的人来说几乎是不可能的，这个系统还包括学习《圣经》尤其是《托拉》的诫律。这种学习本身就能使生活变得神圣。“如果恶冲动控制了你，那就前往学习之所吧”，《塔木德》如此告诫道。

全部法令乃是为了使信徒的生活变得高尚，这个观念任何时候都被接受，直到今天仍被许多正统派犹太人坚持。

218 上帝想完善以色列，因此增加了诫命的数目。（*Makkoth*，23*b*）

上帝赐予诫律，是为了使人类高尚。（*Vajikra Rabba*，13）[41]

一个人最好别出生，但一旦来到世上，就要持续检讨自己的行为。（*Erubin*，13*b*）

人们应当在每个晚上批判检讨自己白天的行为。（*Magen Abraham on Orach Chajim*，239，§ 7）[42]

“遵行”与“记住”由同一句话规定。[43]

“主啊，你看护与关爱”（*Deum respice et cura*）[44]仍是犹太人的座右铭。遇见国王或看见侏儒或黑人，路过一栋倒塌的建筑，吃药或沐浴，注意到风暴即将来临或听见雷声轰鸣，早起穿衣或进食，进入或离开房屋，问候朋友或碰见仇家——对于上述每种临时情况，都有一项必须遵守的诫命。

这些诫命内容如何？它们的总目标在于克制人身上的动物本能，在于约束欲望与嗜好，在于以考虑周到的行为替代冲动；总之，在于“对人进行伦理调节”。

如果没有考虑相关律法，就不能去想、去说、去做任何事；一旦行动了，就要瞄准圣化上帝之名这个伟大目标。因此，一定不能为了去做而做任何事，也不能自发或本能地去做任何事。

一定不能因为纯粹的乐趣而喜欢自然。只有在考虑到上帝的智慧与仁慈时才能喜欢它。春枝萌芽之际，虔诚的犹太人会说：

“上帝，我们的主啊，你是应当称颂的……你从虚无中创造了世界，并为世界提供了美好的动植物，从而给孩子们带来了乐趣。”看到彩虹时，他将立即想起与上帝的契约。无论在高山上、大漠中，还是在河流边，只要他的内心为自然的壮观所深深触动，他就会通过 219
祈祷表达自己的情感，“上帝，我们的主啊，你是应当称颂的……你创造了世间万物”。

一定不能因为艺术本身的缘故而喜欢艺术。应当避免创作造型艺术，因为这容易违反十诫中的第二诫。甚至诗歌也不受赞许，除非它提及上帝。倘若怀有一些实用目的，一切阅读行为都是好的。“诵读《托拉》经文或与之有关的书籍是最好的。如果为了消遣而阅读，让我们选择那些能够教导一些有用知识的书籍。有的书是为了娱乐或打发时光而写，其中有些会唤起罪恶的念想，这些书籍不许阅读。”[45]

一定不要沉溺于无害的欢乐。“亵慢人的座位（《诗篇》1：1）——这指的是异教徒的剧院与竞技场。”唱歌、跳舞与饮酒，除非它们与宗教仪式相关，否则都是禁忌。“拉比多萨·本·希尔坎经常说：晨贪睡，午贪杯，流连儿戏，置身不知经者的聚会，这些将弃一个人于世界之外。”[46]“爱宴乐的，必致穷乏；好酒，爱膏油的，必不富足。”（《箴言》21：17）

如果真是那样，将人引向“不当”行为的那些特性就是无用甚至有害的。这些特性包括：热情（一个人处于这种状态，会做出无用之事）、[47]好心（只有受善意的驱使才能行好心；一定不能被怜悯冲昏了头，否则理想律法的高贵与尊严会从你眼前消失）、[48]肉欲（“情欲的来源——即罪的来源——就在于纵欲”）、[49]率真。总之，反映人类天性（因而不神圣）的一切特性都属此类。

另一方面，虔诚者的首要美德是自制与谨慎、热爱秩序与工作、克制与节俭、纯洁和持重。

自制与谨慎，尤其是言词方面的，总是道学家们爱谈论的主 220
题。“多言多语难免有过，禁止嘴唇是有智慧。”（《箴言》10：19）[50]

后来的传统一直坚持如此。“拉巴认为，谁发起不必要的交

谈，谁就违反了一条诫命。”(*Joma*, 19*b*)一本启迪大众的现代著作写道：“我们的圣洁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控制住舌头，取决于保持安静的能力。讲话的能力……是为了神圣的目的而赋予人类的。因此，我们的贤哲禁止一切不必要的闲谈。”[51]

自制与谨慎通常为虔诚的犹太人所强调：

> 谁是强者中的最强者？那些能够控制情欲者。(*Aboth de R. Nathan*, xxiii. 1)
>
> 殷勤筹划的，足致丰裕；行事急躁的，都必缺乏。(《箴言》21:5)
>
> 脚步急快的，难免犯罪。(《箴言》19:2)

至于勤劳和节俭，相关告诫不胜枚举。

犹太人必须叫醒白天，而不是让白天叫醒犹太人——拉比们在就《诗篇》第57章9节的经文布道时如此训诫。[52]

必须抑制人类最强烈的本能，使之步入正轨，去除它们的天性力量并使之服务于有用的目的。总之，它们必须被理性化。

以满足饥饿的本能为例。禁止只是为了满足食欲的进食；应当为了身体的缘故而进食。义人坐下来进食，乃是践行造物主的诫命。因此，《托拉》中才有关于食物的大量法令；因此，诫命要求进餐时保持严肃——进餐前后都要祈祷；因此，犹太人被建议要适度节制并忘却进食的快感。“只是由于上帝的仁慈，你才能以他的创造物为食。因此，你全部的吃喝行为不可像野兽那样，而必须被圣
221 化；它必须被视作获取能量以便为上帝服务的行为。”[53]“犹太人应当把满足食欲当作一次圣事，应当将餐桌视为祭坛、将食物视为祭品，喜爱进食仅仅是为了获取履行义务的更多能量。”[54](顺便说一下，犹太烹调是十分出色的。)

最后，当然也是最重要的，正如饥饿一样，爱情也必须被理性化，即必须抑制爱情的自然表达。性爱领域最彻底地体现了这种严格的二元主义。全世界——尤其是文明民族——的这种性爱观

应归之于犹太人(其中介是受此观念影响的基督教)。所有更早的宗教都在性行为中看出某种神意,并将性事视为天启的本质。它们或深或浅都有生殖器崇拜,都没有谴责肉欲,或者将妇女视为罪恶的渊薮。而犹太人自以斯拉时代以来就一直持相反的观念。

为了圣化自己以便与上帝交流,摩西"不得靠近自己的妻子"。约伯说他为了博得上帝宠爱,与自己的眼睛立约不看少女。[①] 警惕妇女的话充斥在全部智慧文学中。[②] 同样的精神也主宰着《塔木德》。"宁可死去,也别犯下不贞之罪。"(*Sanhedrin*, 75*a*)实际上,连死亡也赎不了的三大罪是谋杀、偶像崇拜与通奸。"同女人做生意?要确保不要和她们独处。"(*Kiddushin*, 82*a*)这种恐惧贯穿于全部法典之中。任何人与有亲缘关系的、属于违禁之列的妇女进行有罪的性交,《帮助之石》(*Eben Ha-ezer*)都会判他被石头砸死。也一定不能为了"从中获取快乐"而去看此类有亲缘关系妇女的衣服或小手指。男人也不能去等女人,不能拥抱他的姨婶或已成年 222
的姐妹。

今天,拉比们的相关规定仍十分露骨。"保护好自己,不接触任何不洁之物",他们中最有名的一个拉比这样说道。"不要去看、去听、去读、去想使你思想不贞或使你了解不洁的任何事物。不要在街上跟在女人后面走,如果办不到,不要色眯眯地看她。[③] 别让眼睛对女人的头发、让耳朵对她的声音有所渴望,别为她的容貌愉悦;别去看妇女的衣服,如果你知道是谁穿着它。在任何事上别抱投机心态……两性不应在一起打趣取乐。哪怕是假惺惺地捏捏手、眨眨眼,抱抱与吻吻,也都是有罪的。"[55]

这些警告未曾被忽视,这可以从许多虔诚犹太人的自传中看

---

① 参见《约伯记》:"我与眼睛立约,怎能恋恋瞻望处女呢?"(31:1)——中译者注

② 桑巴特举出的例证来自《箴言》5:3—4。但这段不是清楚地针对坏女人吗?——英译者注

③ 比较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这句话:"记住妇女的面孔而没有欲望,……这岂非既不知智慧又不知美德吗?"——英译者注

到，其中一些现在能读到现代语言的版本。[56]

但一定不能忽略最重要的一点。其他宗教也有恐惧妇女的迹象。自从妇女给世界带来罪恶的概念流行开来之后，就一直有人病态地忙于各种避开女人的猥亵想象，仿佛女人是恶魔的化身似的。在其他宗教中，男人遁入荒野里的修士洞穴或逃入修道院。不论哪种情况，他的宗教将“贞洁”强加给他，由此产生的招人讨厌的种种后果为研究隐修生活的人所熟知。但犹太教并不如此。犹太教并不禁止性交，而是使之理性化。它并非不认为性交有罪。性交一直是有罪的，但这种罪可以在某种程度上通过圣化去除。因此，犹太教提倡早婚，把夫妻关系作为某种“一直放在那位伟大监工（Taskmaster）眼前”的东西来规范。

223 “男人不该没有妻子，女人也不该没有丈夫，但双方都应确保在他们的结合之中有上帝的精神。”这是一条座右铭，《塔木德》与后来的法典就按照它制定了众多指导已婚夫妻的法令和法规。这里只提几个例子。在 11 世纪，拉比以利亚撒·本·拿单根据这个主题专门编了一部法典——《帮助之石》；在 13 世纪，拉比纳赫曼就婚姻的圣化写了一部名作。[57]《帮助之石》的规定后来被《布就筵席》采纳，这些规定连同其注解至今仍为人们接受。贯穿其中的这些主要思想上文已经讨论过：遵照上帝的意志圣化你身体的力量；小心维护你的男子气概；随时当上帝的仆人。[58]

这就是犹太人的婚姻观，它一直延续了两千多年。《多比传》中有个感人的故事，它可以很好地总结我们对这个问题的思考：

> 关门闭户，屋里只剩下多比雅和撒拉两个人。多比雅从床上站起来对妻子说：“起来，亲爱的。让我们向主祈祷，求主怜悯我们，保护我们。”撒拉站起来，于是他们双双祈祷，乞求上帝保佑。
>
> 这时多比雅祷告道：我们列祖之上帝呀，你当得赞美。天地生灵颂主名，浩荡造物恩，荣耀永无疆。
>
> 你创造亚当，又为其配偶夏娃，做他的帮手与内助，使他们

成为人类的父母。你说："男人不宜独居，我要给他配个得力帮手。"

主啊，我选中撒拉，皆因本乎正义，并非出自情欲。求你怜悯我们，许我们白首偕老。

接着他们同说"阿门"，上床过夜。（《多比传》8：4—9）[①]

可能有人会问，为什么我用如此长的篇幅讨论犹太生活的这一方面？答案很简单。我确信由犹太宗教造成的生活的理性化，尤其是性生活的理性化，对经济活动产生的影响是怎么高估都不过分的。如果能把宗教算作犹太经济生活中的一个因素，那么行为 224
举止的理性化肯定是它的最好表达。

首先，对任何经济秩序而言，许多优秀的品性与美德——如勤劳、整洁、节俭——是必不可少的，而它们的存在都要归功于理性化。但如果按"贤哲"的命令生活，全部生活要服务于获取财富的需要。持重、克制与虔诚等品性对商人都是有利的。简言之，《圣经》与拉比文献所宣扬的整套行为理想多少像是小店主的一些道德要求——满足于拥有一个妻子，准时偿还债务，在星期六或星期天前往会堂或教堂（视具体情况而定），无比蔑视周围有罪的世界。

但犹太人的道德教诲并不只用来生产这种体面的小店主。甚至可以质疑这种类型是否就是这种教诲的全部产物。无论如何，它对经济发展并未产生多大影响。事实上，中产阶级的体面就源自小商业阶层的狭隘视野。因此，除了这个阶层拥有可以为资本主义奠基的品性以外，它与资本主义就没什么关系了。但资本主义并不是从这些品性中发展出来的，因此我们必须从其他方面寻找使犹太人成为资本主义先驱的原因。

首先可以看到，家庭生活在犹太人中间的培育，产生了经济发

① 《多比传》有关段落的中译文引自《圣经后典》，张久宣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中译者注

展所必要的能量。毫无疑问，培育与完善家庭生活是犹太拉比的工作，但必须补充的是，犹太民族的变迁对此也有促进作用。在犹太教中，妇女首次获得高度尊重，这是美满家庭生活存在的首要前提，对男人的行为关系重大。拉比们通过有关结婚、婚姻关系与子女教育等方面的律法和法规，从外部施加限制和影响，尽一切可能
225 建立完全纯洁的家庭生活。较之其他宗教的信徒，虔诚的犹太人更加视婚姻为神圣，这可以用非法出生的统计数据证明。犹太人中间的非法出生要比基督徒少得多。[59]

每一千人中的非法出生率

年份	国家	全部人口	犹太人
1904	普鲁士	2.51	0.66
1905	维腾堡	2.83	0.16
1907	黑塞	2.18	0.13
1908	巴伐利亚	4.25	0.56
1901	俄国	1.29	0.14

如果更细致地考察俄国的数据，会发现犹太人中间的非法出生与非犹太人大不相同。与此同时，不能忘记犹太人中间的性道德标准要更低一些。下表显示了俄国的非法出生人口的百分比：

俄国每一百人中的非法出生率

年份	希腊正教徒	天主教徒	新教徒	犹太人
1868	2.96	3.45	3.49	0.19
1878	3.13	3.29	3.85	0.25
1898	2.66	3.53	3.86	0.37
1901	2.49	3.57	3.76	0.46

这就是在犹太人中间流行，并由他们引入的那种家庭生活的一个结果。此人将自己最好的东西贡献给了它，他反过来又从中获得了充沛的力量、勇气，以及一种维持和扩展其生活状况的动

机。这种家庭生活为男性能量形成的中枢，巨大到足以推动资本主义这种强大的经济体制。这种体制需要巨大的能量，我们几乎无法想象，除了通过能同时迎合社会本能和家庭理想的心理影响起作用，还有什么能够生产出这种能量。

或许，有必要在心理影响之外再找找身体影响。通过把婚姻生 226
活理性化，犹太人的体质定然被塑造得多么奇怪啊！我们看到这种现象——一个性欲强烈的民族（塔西佗说“他们这个民族性欲最强”[*proiectissima ad libidinem gens*]）由于其宗教而被迫保持彻底的克制。婚外恋遭到绝对禁止；每个人必须满足于拥有一个妻子，但与她性交甚至也受到限制。

这一切的后果显而易见：巨大的能量储备遭到堵塞，不得不寻找其他出路。由于犹太人自耶稣诞生以来的整个处境是清楚的，我们假定经济活动是他们的主要渠道就没有错。但我们应该更进一步。就一般而言，有可能证明受限制的性欲与追逐利润是齐头并进的。当前，对于这个对一切现代社会问题都非常重要的事实，几乎没有什么科学研究。[60]贵族气派的生活方式通常伴随着对金钱与情爱的挥霍，而吝啬、贪婪与储备大量金钱总是与性生活的压抑如影随形——这些都是日常经验，本书篇幅有限，要想借助这里提供的有限观察来解决这个最有趣的问题，会被人责为自大；但在我看来，它们不应当被忽略，至少可以作为一种假设存在。

我们看到，犹太人拥有大量的资本主义才能，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之于其宗教导师施加给他们的性抑制。整个生活的理性化对犹太人体力和智力的影响，必须留给科学家们去调查；[61]眼下这方面的研究才刚刚开始。我说的是针对性交、吃喝等方面的明智法规所产生的影响。（顺便提一下，值得注意的是，犹太律法长期以来对不适合结婚的人结婚有限制。）

最后再说一点。生活的理性化造成了犹太人所习惯的生活方 227
式与自然相对立（或平行），这也使得他们能够适应资本主义经济体制，因为这同样是与自然相对立（或平行）的。获取利润的观念在现实中有何表现？除了将塑造犹太生活的犹太宗教法规应用于

经济活动之外，还有什么是经济理性主义？资本主义要想发展，自然的人必须被改变得面目全非，取而代之的是一种理性主义的心理机制。必须重新评估一切经济价值。其结果如何？“资本人”（*homo capitalisticus*）与“犹太人”（*homo Judoeus*）密切相关，两者属于同一类别，都是“理性的、人为的人”（*homines rationalistici artificiales*）。

所以，犹太宗教导致了犹太生活的理性化，就算它没有在实际上产生犹太人的资本主义能力，也无疑增加和增强了这种能力。

以色列与诸民族

读者应该记起，犹太人经济发展的原因之一在于以色列人世代作为陌生人和外来者。如果我们试图解释这种隔离，就会在犹太宗教的法令中找到根源，将会发现这个宗教一直主张并强化分界线。正如从这个方面研究犹太史，并取得很大成就的勒鲁瓦-博利厄极好地所言：“其律法赐予他们团体精神。”事实在于，犹太人的律法要求他们与外邦人隔离。因为如果他们想遵守律法，就必须抱团。犹太人创造了隔都，从非犹太人的观点来看，这并非是敌对的结果，而是一种让步与特权。

但犹太人希望与其他人隔离，是因为他们觉得自己优于周围的普通人。他们是上帝的选民、祭司的民族。拉比们尽全力煽动自豪情绪——从以斯拉直到今天，概莫能外。以斯拉禁止犹太人与异族通婚，认为这会亵渎犹太纯洁性；而今日虔诚的犹太人每天清晨都这样祈祷，“我们的主啊，你是宇宙之王，祝福你，你没有把我生为一个外邦人（陌生人）”。

228 因此，他们在整个流散时期都孤立而分离地生活。这种孤立和分离既是独立于流散（多亏了犹太律法加在他们身上的种种约束），又是因为流散而形成的，他们因而自成一体；或者可以这样说，由于他们自成一体，才会孤立和分离。

他们早在巴比伦流放时期就已自成一体了，这在现实中又造就了犹太人的国际性特征。他们中的许多人，特别是那些富人，自愿

留在巴比伦，但他们保留了犹太信仰并热忱地奉行。他们与那些返回家园的同胞之间维持了活跃的交往，对他们的命运持同情态度，为他们提供帮助，并不时向那里派遣新的定居者。[62]

这种联合纽带在希腊化时代的流散地没有丝毫松懈。“他们在城市中和全世界紧密团结。无论在哪里扎营，他们与锡安都一直维持联系。在旷野深处就如同在故土的家中一样……通过流散他们进入了世界。他们在希腊化时代的城市中接受了希腊语言与希腊方式，哪怕只是把这作为其犹太性的外套。”（威尔豪森语）

这种状况继续贯穿于他们流放的多个世纪，如果有何不同的话，就是联系更紧密了。“你知道他们团结得有多紧！”西塞罗如是说。[63]的确如此，而且今天仍然如此。关于他们在公元 130 年发起的叛乱，史料记载：“帝国及帝国以外的所有犹太人都被鼓动起来，他们对约旦河两岸的叛乱分子予以或多或少的公开支持。”[64]今天，一旦一个犹太人被从俄国某个城市或其他地方驱逐，情况会有任何不同吗？

自远古以来，他们就自成一体因而显得孤立和分离了。所有民族都对他们憎恨外族印象深刻，最早这样指责他们的是阿伯德拉的赫卡泰乌斯（公元前 300 年）。其他许多古代作家重复了这种控告，[65]而且措辞几乎一模一样。或许最著名的段落来自塔西佗：“犹 229
太人相互之间是极端忠诚的，他们随时准备向其他同胞表示同情，但对其他一切民族却只有憎恨与敌视。他们从不与外来者一起吃饭或睡觉；他们这个民族性欲最强，却从不与外国女人发生关系。”（*Historia*，V，i. 5）

犹太护教者从未试图反驳这些观点，[66]这在他们看来必定有所根据。

犹太人团结得很紧并自我封闭，这确实常常是因为受到寄主不友好的对待所致。但这并非问题的根源。犹太人想要与邻人隔离而居，是由于他们的宗教。这可以从他们对那些礼遇他们的国家的态度中看出来。古代世界就有一两个例子，我刚刚给出了例证（塔西佗等）。中世纪也有同样的趋势。以伊斯兰纪元 1 世纪的阿

拉伯为例。当时的犹太人按照由坦拿与阿摩拉设定的宗教而生活——遵守饮食法与宗教节日、斋戒期(White Fast)与安息日。“尽管他们对这个友好的国度没有任何抱怨,但他们仍日夜期待返回圣地,并企盼弥赛亚降临……他们与巴勒斯坦的犹太人有直接联系。”[67]再以摩尔人统治下的西班牙为例。当生活在穆斯林中间的基督徒已经忘却了母语(哥特拉丁语),也不再理解他们的圣书甚至以其基督教信仰为耻时,西班牙犹太人却越发致力于他们的民族语言、他们的《圣经》及其古老的宗教。[68]这种态度在这一时期的犹太诗歌与犹太哲学中有清晰反映,这或许是中世纪犹太人最值得自豪的事情。他们生活在阿拉伯—西班牙世界之中,并得到其他民族的尊重,他们是严格“民族”的,即“宗教”的;他们从弥赛亚期盼中汲取诗歌的灵感,并情不自禁地向往锡安。[69]这方面只需
230 提及伟大的犹大·哈列维,他的锡安颂歌是新希伯来诗歌才华的最高表达。

如同云朵滑过蓝色的天际,犹太教也在历史中蜿蜒前行,对古老而神圣过去的记忆如同拂面清风,让它神清气爽。直到今天,虔诚的犹太人仍这样祝福子女:“愿神使你如以法莲、玛拿西一样。”(《创世记》48:20)

犹太社会有机体的这种隔绝与分离对经济生活有何影响?犹太人一迈出隔都大门,就要与陌生人交往。上文已讨论过这点,这里再次关注它,是为了表明这种态度是犹太教教导的直接后果:将周围的民族视为“异类”时,犹太人只不过是在遵守一项神圣的命令。他们的行为在此同样得到了圣化,这是与“陌生人”有关的特殊律法体制所许可的。

在这个体制中,最重要和讨论得最多的法令与收取利息有关。在旧的犹太神权政治中,[70]正如在早期文明的各个社会中一样,无息贷款是某人帮助邻居的常见形式。但须注意到,即使最古老的法律汇编也允许从“陌生人”那里收取利息。

犹太法典也不例外。这方面最好的例子是《申命记》第23章20节。《托拉》中其他涉及利息的内容为《出埃及记》第22章25

节、《利未记》第 25 章 37 节。它们共同构成从坦拿时代直到现代的活跃讨论的话题。其主要例证和中心问题出现在《塔木德》的《中门篇》(*Baba Mezia*, 70*b*)里。我自己的感觉是,它的大部分内容是在运用各种诡辩贬低《托拉》中意思明确的规定。《申命记》中的这段话是什么意思呢?“借给外邦人可以取高利贷,只是借给你兄弟不可取。”唯一的疑问出在原文的措辞上,它可以同时理解为“你**可以**取高利贷”或“你**应当**取高利贷”,这两种理解都合乎语法。(毋庸赘言,译文中的“高利贷”正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利息”。)

231

不论哪种情况,虔诚犹太人都可从非犹太人那里取利——这是我们关心的重点所在。在整个中世纪,犹太人没有遇到基督徒所承受的反高利贷禁令的麻烦。据我所知,拉比们从未质疑过关于这个问题的犹太律法。[71]另一方面,在历史上的有些时候,《申命记》中的“可以”被读作“应当”,这些时候正是犹太人成为放债者的时期。

现代讨论这个问题的人看来忽视了一个事实,即《申命记》中的法令作为规范犹太人生活的律法之一被接受了,犹太传统许可向陌生人借钱并收取利息。这是 613 条诫律中的第 198 条,还可以在《布就筵席》中找到类似内容。《申命记》中意思十分明确的法令在现代拉比[72]看来有些不合时宜(原因难以理解),为了消除这种不合时宜,他们试图强调此句中的“陌生人”并非指所有非犹太人,而仅指异教徒或偶像崇拜者。如果真是如此,不要忘记,对于谁是偶像崇拜者从未有过任何明确的概念。此外,忠于第 198 条诫律的虔诚犹太人不大可能像饱学的拉比们这样作出微妙的区分。对他而言,知道借他钱的人不是犹太人、不是“兄弟”、不是邻居,而是外邦人,就足够了。

现在要考虑一下虔诚犹太人与虔诚基督徒各自在放债于欧洲首次成为必需时的立场,这种需要最终促生了资本主义。放高利贷上瘾的虔诚基督徒在临终前充满悔恨,准备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放弃令其灵魂焦灼不安的不义之财。而虔诚犹太人会怎样呢?在有生之年的每个夜晚,他注视着装得满满的保险柜,他已用从中溢

232 出的珠光宝气减轻了可怜的基督徒或穆斯林的焦虑。这是一个温暖他内心的景象，因为每个便士就几乎像他献给天国之父的祭品一般。

除这个特别问题以外，陌生人在犹太法典中还受到了特别对待。对他的义务从不像对“邻居”与同胞那样必须遵守。只有无知或想要歪曲事实的人才会断言与之相反的情况。确实，关于“陌生人”的法律和道德观念随时代变化而变化。但一直不变的根本观念是，对陌生人的考虑要少于对同胞的考虑。从《托拉》最初形成直到今天依然如此。这是不带偏见地研究过《圣经》、《塔木德》、法典和答问文献中有关陌生人的律法后得出的印象。诚然，在《托拉》中也存在主张自家人与陌生人平等的段落（《出埃及记》12：49，23：9；《利未记》19：33，34，25：44—46）。但在这样一个涉及哈拉哈（律法法规）的问题上，口头传统不容忽视。其次，以上举出的段落都提到外邦人（*Ger*），即那些定居在巴勒斯坦的非犹太人，这是由于犹太人了解外邦人的感受，“因为你们在埃及地也作过外邦人（*Gerim*）”。（在关于“利息”的那段经文中，用的词是“Nachari”，这是来自其他民族的词汇。）随着时间推移，在犹太律法中非犹太人与犹太人相比处于劣势的情况自然在不断增加。在最新的法典中，其内容是如此之多，以致占据了大量篇幅。[73]

有关陌生人的律法对于经济生活有何重要性？这种影响是两方面的。首先，与陌生人的交往无须任何顾虑，商业道德（如果我可以这么说）可以变得有弹性。我承认这种情况绝非出于必然，但有充分条件使之如此，而它必定在某些圈子中司空见惯。“如果一个非犹太人在账目结算中犯了错，犹太人可以用它谋私；他没有义务指出错误。”这是我们在《四列书》中读到的内容，尽管约瑟·卡
233 罗没有将之纳入他的《布就筵席》，但后来伊塞勒林把这作为一个注释加进了卡罗的法典。虔诚犹太人必定得出的结论是，他不必在与非犹太人交易时非常仔细，这难道还不明显吗？与犹太人交易时，他要小心谨慎，确保度量衡公正、准确；[74]但与非犹太人交易时，即使获得了不公正的好处，他的良心也不会不安。不可否认，

在某些情况下，诚实对待非犹太人也会被教导。[75]但要明白这是理应如此而无需教导的！此外，律法的实际措辞是这样的："可以占非犹太人的便宜，因为经上写着，不应占你兄弟的便宜。"（上下文不是谈论诈骗，而是说向非犹太人索取高价。）

这种观念必定在学习《塔木德》及由此产生的诡辩术十分普遍的那些地区（比如东欧）牢牢扎根。它对犹太商业的影响就如格雷兹所描述的（这自然是没有偏见的证词）："曲解一个用语的意思、使用各种聪明的诡计、玩文字游戏、反对他们所不了解的……这些都是波兰犹太人的特征……单纯与可靠、诚实与公正，在他身上荡然无存。他从犹太经学院中熟练掌握了各种技巧，将之应用到所有不如他狡猾的人身上。他乐于欺骗和使诈，这给予他几分成功的快感。但他不能对自己民族的人用这套：他们彼此都清楚真相。遗憾的是，正是非犹太人尝到了受《塔木德》训练的波兰犹太人的苦果。"[76]

其次，犹太商业律法中对非犹太人的区别对待，导致工商业观念彻底转变，通常是朝着更加自由的方向转变。如果我们已将犹太人称为自由贸易之父，因而也是资本主义先驱，那让我们在此指出，他们能为这一角色做好准备，恰恰是因为其工商业律法中的自由贸易精神，而这种精神正是从他们对待陌生人的态度中获得了向自由放任政策迈进的巨大推动力。显然，与陌生人的交往放松 234
了他们的私人义务，而代之以经济自由。让我们更仔细地考察这点。

在犹太人彼此之间的贸易上，《塔木德》和几部《法典》中的价格理论与整个中世纪欧洲通行的关于"公平价格"（*justum pretium*）的经院教条完全对应。但就犹太人与非犹太人之间的贸易而言，并不存在公平价格。价格的形成如同今天一样，是由"市场中的讨价还价"决定。[77]

尽管如此，要注意的重要事情是，工业与企业自由的观念对于中古欧洲的基督教法律而言是完全陌生的，但这类观念早在《塔木德》中就有，在后来的《布就筵席》中体现得更清楚。这个问题值得

认真研究，并且应当由专家研究。我在此只举出一些例证。尽管它们数目很少，但我认为这是有关这一问题的决定性证据。我的第一个例证来自《塔木德》，其中完全认可了卖家之间的自由竞争：

> 《密释纳》——拉比犹大认为店主不应给孩子们分发果仁，因为这会养成孩子们去他那里购物的习惯。但拉比们却允许这样做。此外，破坏价格是不合法的。但拉比们说道，“愿对他的记忆受到祝福”。
>
> 《革马拉》——立刻出现的问题是，拉比们在第一种情况中持这种态度的原因何在？答案是，这个店主会对竞争者说，“我给孩子们果仁，你可以给他们梅子”。拉比们在第二种情况中持这种态度的原因何在？这段话禁止价格变动，然而他们却说：“愿对他的记忆受到祝福。”答案是，他们祝福对拉比犹大的记忆，因为他降低了价格。（*Baba Mezia*，60*a* and *b*）

在几部《法典》中，原因通常被省略了，只有单调乏味的律法陈述。“店主可以把果仁等礼物送给那些到他店里购物的孩子，以赢
235 得他们的光顾。此外，他可以以低于通行的价格出售，其竞争者对此无能为力。”（*Choshen Mishpat*，225，§ 18）

同样，商人会把商品带到举办集市贸易的集镇去，在规范这类商人的行为的律法中，可以读到以下内容：“如果陌生人的卖价比本地商人便宜，或者他们的商品质量更好，本地人不能阻止他们，因为这能惠及犹太大众。”（*Choshen Mishpat*，156，§ 7）

此外，“如果某个犹太人打算以低于别人的利率借钱给某个非犹太人，别人不能对此加以反对”（*Choshen Mishpat*，156，§ 5）。

最后，犹太律法赞成工业上的自由放任。我们可以在《布就筵席》中找到例子：“有人在街上开办某项手工业又没有遭到邻居抗议，那么如果这条街上的其他居民想要从事同样的职业，第一个人不能抱怨新来者从其口中夺走了生计，也不能横加阻止。”（*Choshen Mishpat*，156，§ 5）

很显然，贸易自由和工业自由与犹太律法相一致，因而也就与上帝的意志相一致。这在经济生活中是多么强大的动力！

犹太教与清教

我已提到，马克斯·韦伯对清教之于资本主义制度重要作用的研究，促使我思考犹太人的重要性。尤其是我觉得，清教在资本主义中发挥了强大影响的主导观念，而资本主义在犹太教中发展得更充分，时间上也比清教要早得多。

对这两大宗教的彻底比较不在本书研究范围之内。但我认为如果进行这种比较，将会看到犹太教与清教之间存在着近乎奇特的观念的一致性，至少在那些我们已经探讨过的问题上是如此。在两者之中，都将发现以宗教利益为重、神施予赏罚的观念、此世之中的苦修主义、宗教与商业的密切关系、算计罪恶的概念，以及 236
最重要的生活的理性化。

让我举一两个例子。以犹太教与清教对性问题的态度为例。我在费城最好酒店的房间中发现了一则告示，大意是："访客若与女士有商务往来，如该女士尚在房中，敬请敞开房门。"这难道不是《塔木德》中这句古老格言（*Kiddushin*，82*a*）的翻版："同女人做生意？要确保不要和她们独处。"

而且，英国人的礼拜日不正是犹太人的安息日吗？

我还要引用海涅的话，[78]他对许多事情见解独到。他在其《忏悔录》中追问道："信仰新教的苏格兰人难道不是希伯来人吗？他们也用《圣经》中的名字给自己取名，也有自己的耶路撒冷和法利赛式的伪善言词。他们的宗教难道不是一种允许吃猪肉的犹太教？"

清教即犹太教。

前者是否受到后者的影响，如果真是如此其程度又如何，这些都是极难回答的问题。当然，众所周知，在宗教改革时期，犹太人与某些基督教教派往来密切，学习希伯来语和希伯来语经文曾风行一时，17 世纪的英国犹太人受到清教徒高度尊敬。诸如奥利弗·克伦威尔这样的英国领袖将他们的宗教观念建基于《旧约》之上，克伦威尔自己曾梦想

在《新约》和《旧约》之间达成和解，上帝的选民与英国清教徒能够结盟。当时有位名叫纳坦尼尔·霍尔梅斯的清教牧师，他认为最好的事情莫过于遵照先知预言成为上帝选民的仆人，并屈膝为他们服务。大众生活中透露出的希伯来腔调不少于教堂中的布道。如果英国议会中的演讲用希伯来语说的话，你会相信自己仿佛置身在巴勒斯坦一般。自称为“犹太人”的“平等派”（他们将对手贬称作“亚玛力人”），力倡将《托
237 拉》作为英国立法的准则。克伦威尔的军官们建议他按照犹太教公会成员的数目来任命其枢密院的七十名成员。再洗礼派的托马斯·哈里森将军重返1653年的议会后，和他的同党叫嚣着要将摩西立法引入英国。1649年，下院提议应当在周六而不是在周日遵守主日。获胜的清教徒在旗帜上印上“犹大之狮”。[79]重要的是，不仅《圣经》，连拉比文献也在众多神职与世俗人士中间广为传阅。

总之，看来可以根据充分证据推断出清教教义源自犹太文献。专家们必须就此下判断。我这里所做的，不过是提示一二罢了。最后，我要关注一份风趣的小册子。它出现于1608年，内容似乎是为了证明犹太教与加尔文教（它是最正宗的清教）之间的亲密关系。它名为《加尔文的犹太之镜》（*Der Calvinische Judenspiegel*），在第33页中以如下滑稽的方式比较了这两大宗教。（旧式德语是令人愉悦的。）“如果我身负荣幸，可以说说我为什么成为一名加尔文教徒，我就必须坦白，唯一说服我的理由是，在所有宗教中只有它在生活观与信仰观上和犹太教有如此多的共同点。（接着是许多类似的表述，半严肃、半讥讽。）……8. 犹太人讨厌马利亚的名字，只有在她以金银铸就或者她的形象被刻上硬币后才能容忍她。我们也是如此。我们也喜欢刻在便士和克朗上的马利亚，我们将全部尊重给予这个，因为它们在商业上有用。9. 犹太人处处费尽心机欺骗大众。我们也是如此。出于这个原因，我们离开了自己的祖国，流浪在其他不知道我们本来面目的国家，这样，我们可以通过诈骗和诡计……将无知的乡巴佬引入歧途，骗他们，逼他们就范……”

第十二章　犹太特性

238

问题

在一部具有科学特征的著作中，决定研究本章标题所提示的问题，是需要下一番大决心的。因为对民族心理学不加全面理解而是浅尝辄止，近来已蔚然成风，成了一知半解者调剂心情的玩物；与此同时，心智粗俗者已经把描述犹太天赋当作最新形式的政治竞赛，在我们这个糟糕的时代，他们的粗鲁本能只会冒犯所有那些尚且保留了些许好品位与公正客观的人。种族心理学中没有道理的花哨分类，已经得出这个结论：在这一研究领域无法产生任何科学结果。读完 F. 赫茨、让·菲诺等人的著作，[1] 不禁会产生这种感觉，即试图从任何人群中寻找共同心理特征的努力是徒劳的；法语中的“精神”（*esprit*）是个神话——事实上，不存在所谓的法国人，正如不存在犹太人一样。但是，当穿过大街并注意观察时，你将与一种特别的类型迎面相遇；当阅读一本书或站在一幅画前时，你几乎会无意识地说，这真是多么德国啊，那真是十足的法国啊！

这难道只是我们头脑中幻想出来的意象？[2]

非也。如果我们思考人类历史，就必须建构某种“集体灵魂”（collective soul）的假设。比如谈及犹太宗教，我们必定会将它与使之诞生的犹太民族联系起来。或者，一旦说到犹太人对现代经济发展产生了影响，就必然意味着肯定有某种本质上犹太的东西使之成为可能。否则，我们可能会宣称，就算爱斯基摩人取代了犹太

239 人，西欧经济史也不会有什么变化，或许甚至大猩猩也能做得一样好！

这种归谬法（*reductio ad absurdum*）清楚地表明，必定存在着某种独到的犹太特性。让我们从一个稍稍不同的角度来思考这个问题。让我们观察一下犹太人具有现代资本主义才能的客观环境。正如上文所见，首先是犹太人散居在广阔的区域。不诉诸主观因素的话，就无法解释流散及其影响。有一件事是显著的：一个民族的散居，其本身并不必然产生经济或文化后果；相反，散居通常可能导致融合以及最终的消失。

有人已不无道理地宣称，犹太人的散居使他们适于充当中间人。的确如此，但这不也让他们容易成为君主们的谈判家与私人顾问，这些职业自远古以来不就充当了通向更高职位的敲门砖？这种能力对于并非犹太人一开始就有的这些新职位而言是否必不可少？

我们已经承认，犹太人的散居对于他们在国际贸易与信贷上的成功起了不小作用。各地犹太人团结在一起的事实难道不是这种成功的先决条件？如果他们像其他许多散居民族那样没有维持联合的纽带，这又会发生什么？

最后，让我们不要忘记，犹太人刚好来到那些已成熟到可以接受资本主义的民族之中。但即便如此，如果说犹太人在荷兰、英国、德国、奥匈帝国影响巨大（今天仍然如此）——远比他们对西班牙人、意大利人、希腊人与阿拉伯人的影响大——这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他们与其寄主之间的反差所致。可以看到，在对商业越是迟钝蒙昧的民族中间，犹太人对经济生活的影响越有成效。除了独到的犹太特性，还有什么因素能够令人满意地解释这点呢？

240 无论他们与其寄主之间内在不同的根源是什么，重要的是这种陌生性（strangeness）能对经济生活产生持续的影响。不假设存在犹太人的内在特性，将再次无法领会此点。一个民族或部落遭受憎恨与迫害，这并不构成激励他们在其活动中加倍努力的充分理由。相反，在许多情况下，这种蔑视和虐待只会摧毁道德品行和进

取心。只有拥有特殊的品质，这种品质才能在环境的压力下成为能量再生的源泉。

此外，要注意他们的半公民地位。与前文相同的论证难道不也适用于这里吗？它是如此显著，几乎成了自明之理。犹太人在任何地方都不享有与其他人群同等的权利，但他们在任何地方都比其他人群获得了更多的经济成就。对此，只有一种解释——独到的犹太特性。

另一方面，在不同国家及不同时期，犹太人的法律地位各不相同。他们在一些国家可以从事的职业，在另一些国家却遭到禁止；而在其他国家，例如英国，他们与其他人在这方面完全平等。然而，他们几乎在各地都集中于特殊的职业。在英国与美国，他们通过成为金条商人或店主而开始商业活动。除了再次借助于他们的独特特性，这难道能用任何其他方式解释吗？

至于犹太人的财富，它本身不足以解释他们在经济活动领域取得的巨大成就。如果能把钱有效用于资本主义事业，一个拥有巨大财富的人必定有很高的智力。这当然是无须证明的。

因此，必定存在着犹太特性。剩下的只是去发现它们。

我们一想到作为一个团体的犹太人，自然就会想到他们的宗教。但在继续行文之前，我想假定，一方面我将限定这个统统包括在犹太宗教之下的团体，而另一方面，我又将扩大这个团体。我所 241
谓的限定，是只考虑西班牙和葡萄牙驱逐犹太人之后的那些犹太人，即只考虑中世纪结束之后的犹太人。我所谓的扩大，是要在我的视域内包括进犹太后裔，哪怕这些人已经放弃了犹太信仰。

不仅如此，我也会涉及那些反对犹太特性存在的论证。

（1）上文已经谈到，西欧与美国的犹太人很大程度上已同化到所在地人群之中。这无须否认，即使独到的犹太特性如同白昼一样清楚。社会群体之间不可能混合起来吗？一个拥有全部德国特性的德国人，仍可以是“国际无产阶级”中的一员！或者另举一例，难道一个德裔瑞士人就不能同时是瑞士人与德国人？

（2）流散地的犹太人据说不构成一个“民族”或“人民”——依

照此词普遍接受的定义。[3] 因为他们并非一个政治、文化或语言共同体。对这种异议的回答是，除那些已提及的标准（例如共同的起源）之外，还必须考虑许多其他标准。但一般来说，还是别太拘泥于某个定义为好。

（3）犹太人彼此之间的不同被过多强调了。据说不存在完全同质的犹太人，他们相互之间差别巨大。西方犹太人不同于东方犹太人，塞法尔迪犹太人不同于阿什肯纳兹犹太人，正统派犹太人不同于自由派犹太人，平日里的犹太人不同于安息日的犹太人（借用马克思的词语）。这也无须否认。但这绝不妨碍共同犹太特性的可能性。难以设想车轮之中的车轮吗？大团体中就不能同时包含小团体吗？不妨想想一个英国人所属的许多群体。他可能是天主教徒或新教徒，可能是农民或教授，可能是北方人或南方人，以
242 及除此之外只有上帝才知道的其他什么人。但他仍是一个英国人。犹太人也是如此。他可能属于整体中的某个群体，可能拥有那个群体所有个体共有的某些特性，然而他仍保留了独到的犹太特性。

最后，必须明确指出，我不打算概述所有犹太特性，而只想讨论那些与经济生活有关的犹太特性。我不赞成使用一些老式的表达，例如犹太“商业主义”、“讨价还价精神”这类词语。我也不会像有的人那样，把获利的欲念作为某个社会群体的特性。获利的欲念是人性——是彻彻底底的人性。事实上，我必须抛弃之前关于犹太灵魂的一切分析（只要它们与经济生活有关），这是基于以下原因。首先，犹太人适合做什么，这从未被足够清楚地指出。“适合贸易”一语太过含混，根本没什么用。因此，在这一章中，我试图表明，犹太人特别适合经济活动领域。其次，仅仅有描述还不是解释。如果我想证明某个人具有一切在证券交易所充当出色投机家的必要能力，那么，倘若我只说他将成为一个出色的经纪人，就显得不够充分了。这好比说贫困是由于贫穷一样。然而，这就是人们迄今为止对待犹太人的经济才能的方式。我将采取不同的方法，将试图发现犹太灵魂中的某些属性，它们与资本主义有机体中

经济功能的运作志趣相投。

在弄清方向之后，接下来我将论述什么是真正的犹太特性。

解答的一种尝试

令人惊奇的是，尽管问题庞大，但在有关犹太人的不同观点之中，却有一种高度的一致性。无论在文献中还是在实际生活中，总有一个要点会被公正的观察者认可。阅读杰利内克或福摩尔、张伯伦或马克思、海涅或歌德、勒鲁瓦-博利厄或皮乔托——换言之，阅读虔诚的或不循规蹈矩的犹太人、反犹的或亲犹的非犹太人——的著作，将获得这个印象：他们都意识到犹太人具有共性。这让一 243
个准备再度描述犹太天赋的人感到欣慰。无论如何，他可能说不出什么其他人没有说过的内容，尽管他的立场可能略有不同。就我而言，我将尝试揭示犹太特性、犹太天赋和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三者之间的关联。我将先试着勾勒犹太特性的详情，再探究它们与资本主义之间的关系。

与其他绝大多数讨论这个问题的作者不同，我将从指出一种尽管时常被提及，但其重要性从未获得应有承认的犹太特性开始。我指的是犹太人过度的智力（extreme intellectuality）。在他身上，智力兴趣与智力技能比身体（体力）能力获得了更强发展。犹太人确实可以称得上是“高级智能体”（*l' intelligence prime le corps*）。日常经历再三证明了这点，还可援引许多事实加以论证。没有其他民族像犹太人这样高度重视学者。“智者优于国王，有学问的私生子胜过无知的大祭司。”《塔木德》如是说。任何了解犹太学生的人都十分清楚，过度重视纯知识并非只是过去才有的事。如果不能成为“智者”，至少有义务接受教育。在任何时候，教育对于以色列人来说都是强制性的。事实上，学习是一项宗教义务；在东欧，会堂仍被称作“Shool”（又作“Schule”，即“学校”）。学习与崇拜齐头并进；学习本身即是崇拜，无知是死罪。一个不能阅读的人，不仅在此世为粗俗之人，而且在来世会遭受诅咒。在隔都的流行谚语中，没有什么比愚蠢遭受了更多蔑视。“不公胜于愚蠢”及“傻子

是一种不幸”都很有名。[4]

最有价值的人是有智力的人，而最优秀的人是智力最高者。不妨听听一个通情达理的犹太人怎样描绘未来理想的人（你可以说
244 是超人）。那些思维构成不同的人看到被他奉为理所当然的东西，必然瑟瑟发抖。“文明人将拥有意图明确的智力……以取代盲目的本能。制服本能而代之以意志力，并用反思取代单纯的冲动，这应当成为每个人坚定不移的理想。只有在自然本性受理性力量控制时，个体才成为完全意义上的人。而一旦从本能中解放出来的过程彻底完成，我们就有了理想天赋，可以摆脱自然法则的控制而获得绝对的内在自由。文明应该只有一个目标——使人从一切神秘、从一切本能行为的模糊冲动中解放出来，并培育他的纯粹理性的一面。”[5] 想想吧。天赋的实质恰恰是本能的表达，但它在这段话里竟然被设想为理性与智力的最高形式！

对智力高度评价的一个后果是，一份职业受尊敬与否，取决于它是要求“脑力劳动”多，还是要求“体力劳动”多。前者的地位几乎在任何时代都比后者要高。不错，现在仍有一些犹太社团，其中艰苦的体力劳动天天有，但这很难适用于西欧犹太人。甚至早在塔木德时代，犹太人就更偏好那些体力消耗少的职业。正如拉比所说，“世界同时需要卖香料者和制皮革者，但成为前者是幸福的”。此外，“拉比迈尔经常说，一个人应该教会他的儿子一门干净而舒适的手艺”（*Kiddushin*，82*b*）。

犹太人对他们突出的特性相当敏感，总能认识到在他们的机智与其邻居的粗野之间存在一道巨大的鸿沟。波兰犹太人中间流行的一两个谚语，以颇幽默的方式表达了这种对比：“上帝帮助一个人对付外邦人的手和犹太人的脑。”“上帝保护我们不受犹太人脑力（moach）和外邦人体力（koach）的欺负。”脑力（*Moach*）对体力（*Koach*）——这是对犹太人问题的浓缩。它理当成为本书的题词。

245 智力兴趣的主导地位，使犹太人的智力技能得天独厚。“说起你喜欢犹太人什么时，你总不会说他是个傻子。”“一个勇敢的希腊人、一个愚笨的犹太人、一个老实的吉卜赛人——这些都是不可思

议的。”这是罗马尼亚人中间流行的谚语。一句西班牙谚语说：“一只跑得慢的野兔与一个傻犹太人，这两者的几率是一样的。”[6] 有谁与犹太人做过交易而不认为他们一般说来比其他人更有理解力、更机智？我甚至可以称之为机敏或精明；一个多世纪之前，一个对犹太人有着最敏锐观察的人，[7] 将他们描绘为“机智，并对眼前事物的天赋极高”，但他又补充道，“比过去还差了些”。

“犹太人的头脑是台精密仪器，像磅秤般精确”，绝大多数人会同意勒鲁瓦-博利厄下的这个判断。当 H. S. 张伯伦[①]谈到犹太人“理解力”不发达时，他必定是在特定意义上使用该词，而不可能将之解释为快速思考、准确分析、精密剖视、快速组合、迅速抓住要点、进行类比、区分相关事务、得出结论。犹太人能够做到这一切。正确强调这方面犹太特性的杰利内克指出，[8] 希伯来语特别善于表达需要心智的活动。希伯来语中有不下 11 个词表达寻找或探究，有 34 个词表达区别与分开，有 15 个词表示组合。

毫无疑问，这些心理天赋使犹太人在比如象棋、数学[9] 及一切计算工作中极为突出。这些活动的前提，都需要强大的抽象思维能力和特别的想象力，冯特[②]巧妙地称之为组合能力。他们作为医生（诊断能力）[10] 的技能同样可以归功于他们的计算、剖析、组合的才智，这“就如同闪电，瞬间照亮了黑暗”。

并非不为人知的是，犹太人的智力常常堕落为吹毛求疵。（磨坊一旦没有谷物可磨，就会磨自己。）但与另一个事实相比，这还不 246
算重要。犹太人的智力是如此强大，以致它的发展容易以牺牲其他心理品质为代价，其心智因而容易走向片面。让我们举几个例子。犹太人对天性缺乏理解，他对情感的反应要比对智力的反应差。我们几乎想不出有像雅各·伯梅[③]那样的犹太神秘主义者，当

---

① H. S. 张伯伦（Houston Stewart Chamberlain，1855—1927），英国种族主义理论家，著有《19 世纪的基础》。——中译者注

② 冯特（Wilhelm Wundt，1832—1920），德国生理与心理学家。——中译者注

③ 雅各·伯梅（Jacob Böhme，1575—1624），德国基督教神秘主义者和神学家。——校注

我们记起在喀巴拉中发现的那种神秘主义时，这个对比仍然引人瞩目。同样，一切浪漫事物也与这种独特的生活观格格不入；犹太人无法忘我地同情这个世界、同情人类或自然。这是疯狂的热情与严肃而务实的思维之间的不同。

与这种特性多少有关的，是缺乏某种敏感，某种包容和创造的天赋。我在布雷斯劳时，有一天，一位来自远东西伯利亚的犹太学生来我这儿“研究卡尔·马克思”。他大约花了三周时间才抵达布雷斯劳，到的第一天就拜访了我，并借走一本马克思的著作。几天后，他又来找我，与我讨论他已经阅读的内容，还了此书，又另借了一本。如此持续了几个月之久。后来他返回家乡。这个年轻人对其新环境没有任何印象；他没有任何熟人，从不散步，对他居住的地方几乎一无所知。布雷斯劳的生活被他彻底漠视。毫无疑问，他来布雷斯劳之前就已经这样了，将来会继续如此。他将走过这个世界，而不看一眼。但他却熟悉了马克思。这个例子是否典型？我想是的。这种情况可以经常遇到。难道我们没有不断因为犹太人热爱抽象、倾向于远离感官、长久逗留在抽象世界中而留下印象？难道犹太画家比文人与教授少得多，这只是偶然吗？甚至在犹太艺术家那里，其工作中难道没有某种智力因素？弗里德里希·瑙曼在比较著名犹太画家马克斯·利伯曼与斯宾诺莎时，说过一句绝妙的话：“他是在用大脑画画。”

247 犹太人当然看得相当清楚，但他没有看很多。他不认为他的环境是生气勃勃的，这就是为什么他对生活、对生活的完整性、对生活作为一种自然成长的有机体没有真正的概念。简言之，他对生活的私人层面没有真正的概念。一般经验定能支持这种观点；但如果还要其他依据，可以在犹太律法的特性中找到，正如上文所见，这些特性在于废除了私人关系，而代之以非私人的和抽象的联系、活动或目标。

事实上，可以在犹太人中间发现一种关于人类的非凡知识。他们能够用敏锐的智力去探究每个毛孔，所能看到的一个人的内在，恐怕只有伦琴的放射线才能观察到。他们集合起此人所有的品质

与能力，注意到他的优点与弱点，并能迅速发现什么最合适他。但他们很少去观察此人的整体，因而常常会误把他灵魂深处最厌恶的行为归之于他。而且，他们称赞一个人时，很少根据他的个性，而是根据某些清楚可见的特征和成就。

因此，他们对与私人相连的一切状况缺乏同情。犹太人的整个存在与通常理解的一切骑士精神，与一切多愁善感、游侠精神、封建主义和父权制度格格不入。他也不能领会建立在这些关系之上的社会秩序。他对“社会各阶层”与行会组织深恶痛绝。在政治上，他是个人主义者。他适合生活在宪政国家中，因为这里的一切人际交往皆由法律准则所明确规定。[①] 他是“自由主义的”生活观的天生代表，这种生活观不承认有血有肉、有鲜明个性的男男女女，而只承认拥有权利与义务的公民。这些在不同民族中并无不同，但构成人类的一部分，这部分只不过是众多难以归类的团体的总和。就像如此多的犹太人看不到自己那样（他们不是否认了自己的显著特性而宣称他们与英国人、德国人或法国人并无不同 248
吗？），他们也不将其他人当作活生生的存在，而只视之为臣民、公民或其他类似的抽象概念。这让他们不凭借“灵魂”而是通过智力观察世界。其结果导致他们轻易地认为，无论什么事，只要能规整地记录在纸上，并能借助智力得到正确安排，就必定能在实际生活中适当加以解决。如此多的犹太人仍然认为，犹太人问题只是个政治问题；他们深信一个自由主义的政权就是一个要求消除犹太人与其邻人之间不同的政权。令人大吃一惊的是，一位学养非常全面的人写了关于犹太人问题的最新论著，他竟然认为，过去三十年间的整个反犹运动都是由马尔[②]与杜林[③]的著作引起的。“上千人成了集体迫害的受害者，上百万健壮劳动力背井离乡，这些都突

① 这不是普遍的现代趋势吗？对照梅因（H. Maine）爵士的格言：从身份到契约代表了社会进步。——英译者注

② 马尔（Wilhelm Marr，1819—1904），德国反犹活动家，“反犹主义”（anti-Semitism）一词的发明者。——中译者注

③ 于尔根·杜林（Eugen Dühring，1833—1921），德国哲学家。——中译者注

出表明了于尔根·杜林的力量”(!)。[11]这难道不是墨水与鲜血、理解力与本能、抽象与现实之间的对立吗?

这个头脑具备如此智力的民族怀有的宇宙观,必定是一种与理性相一致的有序结构。因此,他们在理性的帮助下试图理解这个世界;他们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是理性主义者。

强烈的自我意识一旦与占主导地位的智力结合起来,这个会思考的存在就会围绕那个自我对世界加以分类。换言之,他将通过目的、目标或意图观察世界。他的视角是目的论的,或是一种实用的理性主义。这种特性在犹太人身上发展得最充分,各种观点在这个问题上完全一致。大多数其他观察者从犹太人的目的论入手,而我则将之作为犹太人过度智力的结果,我认为其他一切犹太特性皆源于此。但这样说,我决非要将这种犹太特性的巨大重要性最小化。

249 在犹太天赋的各种表达形式中,都能发现这种目的论趋势,它有时被称为过度的主观。有人说印度—日耳曼种族是客观的,而闪米特族是主观的,[12]无论这是不是真的,犹太人肯定是最主观的民族。犹太人从未在外部世界中迷失自己,从未深入宇宙,也从未翱翔于思想的无尽太空;但正如杰利内克所说,他潜入表层之下寻找珍珠。他将万物与自我联系起来。他永远都在问为什么,有什么用,后果如何,谁受益(*cui bono*),他最大的兴趣永远是事物的结果,而非事物本身。将任何活动的本身作为目的,都是非犹太的;顺其自然而漫无目的地生活,是非犹太的;从自然中寻找无害的乐趣,也是非犹太的。犹太人把取之于自然的一切,都变成“可以促成更高道德生活的伦理教科书中的散页”。正如上文所见,犹太宗教在其目标上是目的论的,它的每条法规都考虑了伦理准则。在犹太人看来,整个宇宙就是遵照某个计划而形成的。正如海涅早就发现的,这是犹太教与异教之间的不同之一:“他们(异教徒)拥有一种无尽、永恒的‘过去’,它存在于世界之中,并通过必要的法则随之发展;而犹太人的上帝独立于世界之外,他把这个世界创造成一种自由意志的行为。”

没有哪个词比“Tachlis”[①]让犹太人更熟悉的了，它的意思是意图、目的、结果或目标。干任何事都必须有一个“tachlis”；生活本身，无论作为一个整体还是在单个活动上，都必须有某种“tachlis”，宇宙也必定如此。那些宣称生活与世界的意义不是“tachlis”而是悲剧的人，将被犹太人视为愚蠢的空想家。

对待事物的目的论深入犹太天性的程度，可以从哈西德派那里看到，他们对现实生活的需要毫不关心，因为“其中没有目的”。谋生是没有意义的，因此他们让妻子儿女忍饥挨饿，自己则埋首于圣 250
书学习。在所有那些精神不振、笑容慵懒、理解和宽恕一切的犹太人那里也能看到这点，这些犹太人站在远离此世的高度凝视生活。在我们这个时代中，我能想到的具有此类罕见精神的文人是乔治·希施菲尔德[②]、阿瑟·施尼茨勒[③]和乔治·赫尔曼[④]。其作品的伟大魅力就在于他们用这种超凡脱俗俯瞰喧嚣的世事，在于弥漫诗作中的淡淡忧伤，在于他们的多愁善感。他们所缺乏的意志力恰恰是一种消极形式的精神力量。他们的所有歌谣中回荡着同样轻柔的悲痛哀诉：世界多么漫无目的，因而多么哀伤！自然本身便染上了这种忧伤；尽管花草树木闪耀着春天欢快的气息，但秋天就潜伏在附近；秋风在落叶和太阳的金辉中嬉戏，如此美景即使空前，仍将归于凋零。主观性与万物皆有目标的概念（两者是二而一的），夺去了犹太作家诗作中的质朴、清新与率直，因为犹太诗人不能单单享受世界的景象，无论此景是人类的命运还是自然的幻化；他们必须思索它，反反复复地思考它。空气中闻不到樱花草与紫罗兰的芬芳，树林里没有闪烁着浪花的小溪。但为了弥补这些缺失，犹太诗人拥有陈酒的醇香，和一对哀伤地凝视远方的、魅力非

---

① “Tachlis”，来自意第绪语，意为目的。——中译者注

② 乔治·希施菲尔德（George Hirschfeld，1873—1942），德国剧作家。——中译者注

③ 阿瑟·施尼茨勒（Arthur Schnitzler，1862—1931），奥地利剧作家。——中译者注

④ 乔治·赫尔曼（George Hermann，1848—1906），德国作家。——中译者注

凡的双眸。

一旦这种从万物中寻找目的的思维与强烈的意志、巨大的能量储备(通常与犹太人相关)结合起来,它就不再只是一种观点,而成为一种策略。他为自己设定一个目标并为之努力,不让任何事物将他从既定轨道上拉开;他心意已决,甚至可以说固执倔强。海涅就曾以倔强来称呼其民族的特性,歌德认为这种犹太特性的本质就是能量和追求直接目的。

251 我要说的下一个观点是灵活性,但我不太确定,这适用于全体犹太人呢,还是只适用于阿什肯纳兹(德国)犹太人。歌颂塞法尔迪(西班牙)犹太人的作家,总是强调这些犹太人具有某种高贵的风度、某种盛气凌人的举止。[13]而他们的德国同胞则总是被描绘为活泼的、积极的、有点激动的。[14]甚至在今天,尤其是在东方,你会遇到许多西班牙犹太人,他们给你留下高贵、周到与自制的印象,丝毫没有那种在欧洲犹太人身上司空见惯的道德或身体上的灵活性。但心智的灵活性——快速领悟与足智多谋——却是一切犹太人共有的。

智力、目的论、能量与灵活性(intellectuality, teleology, energy and mobility),是犹太特性的基石;这四大要素的本质错综复杂。我相信犹太人的一切品质皆可轻易从这些要素中找到端倪。下面就以经济生活中特别重要的两个特性——极度的活跃性与适应性——为例。

犹太人是活跃的,或者可以说是勤劳的。用歌德的话来说:"每个犹太人,甚至最微不足道的犹太人,都忙于实现某种世俗的、临时或短期的目标。"这种活跃性往往堕落为躁动不安。他必定一直忙忙碌碌,一直处理事情,使之有结果。他一直在动,且不在意自己成了那些有机会想歇歇的人眼中的讨厌鬼。我们大城市中的一切音乐与社会"事务"皆由犹太人运作。犹太人天生就是进步及其各种福音的倡导者。为什么会这样?这是因为他的务实和他的结合了智力的灵活性。智力这点尤其重要,因为它从不稳扎稳打。从长远来看,一切智力都是肤浅的;它从不探究事物的根源,也从

未达到灵魂或宇宙的深处。因此，智力容易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这就是为什么在犹太人中间同时存在着狂热的正统派与无知的怀疑派的原因；他们都同出一源。

但犹太人最有价值的特性——他的适应性——却要归功于这种肤浅的智力，犹太人的适应性或许在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犹 252
太人一直是个倔强的民族，但他们的适应性与他们维持自身民族特性的能力都同出一源。这种适应性使他们能够暂时屈从相关法律，如果环境这样要求的话，不过情况一旦好转，他们就会故态复萌。自古以来，犹太特性便同时表现为反抗与屈服并存，尽管这些特征似乎互相冲突，但它们仅仅是看起来如此。诚如勒鲁瓦-博利厄所言，“犹太人既是最顽固的又是最顺从的，既是最执拗的又是最温顺的”。

各个时代的犹太民族领袖与“贤哲”们，都充分意识到变通与弹性的重要性或必要性，如果以色列人想继续生存，就必须不厌其烦地对之加以坚持。相关的例子在犹太文献中能找到很多。“当柔若芦苇，任风将其吹向任意一方；因为除非是在卑让的人中，否则《托拉》无以存身。为何《托拉》会被比喻为水？为了告诉你：正如水流的途径是不往高处去，只向低处流一样，除非是在卑让的人中，否则《托拉》无以存身。”[15]① 又如，“当狐狸掌权时，要向它点头哈腰”[16]。此外，“浪来时要弯腰，它会从你身边流过；不弯的话，它会将你冲走”[17]。最后，祈祷书中有如下一段恳求：“愿我的灵魂像尘土一样达及每个人。”

拉比们正是以这种精神劝告其教友，在放弃自身信仰就能生存时，假装接受所在国的主流信仰。这个建议在很大程度上被采纳，用福摩尔的话来说：“犹太种族，通过不时装死得以不断存活。”

今天如果有的话，也只有为数极少的伪基督徒或伪穆斯林。尽管如此，犹太人适应环境的惊人力量比从前更大了。今天西欧与

---

① 此处引文的翻译采自《天下通道精义篇：犹太处世书》，张平译注，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85—86页。——中译者注

美国的犹太人不再希望完整地维持其宗教与民族特征；相反，只要
253 民族主义精神尚未唤醒他的话，他希望抛弃其特性，转而同化进他居住地的人群中，与这些人住在一起乃是拜命运所赐。看哪，他也能成功实现这点。

或许，犹太特性体现得最鲜明的例证就是，英国的犹太人成为英国人，法国的犹太人成为法国人，等等。就算他没有真正成为英国人或法国人，他至少看上去像他们。费利克斯·门德尔松[①]可以创作德国音乐，雅克·奥芬巴赫[②]可以谱写法国音乐，索萨[③]能写出《星条旗永不落》；而比肯斯菲尔德勋爵[④]自称为英国人，甘必大[⑤]自称为法国人，拉萨尔[⑥]自称为德国人。总之，有一种观点认为，犹太人的才能通常没有一点犹太性而是与其环境相一致的，这被再三用来说明不存在明确的犹太特性，这是很奇怪的；事实上它以惊人的方式证明了完全相反的观点。它证明犹太人有着非凡的适应性天赋。如果犹太人从一个星球前往另一个星球，他在新环境中的陌生感不会持续很久。他能快速摸到门径，轻松适应新环境。他想成为德国人，就能成为德国人；如果做意大利人更适合他，他将成为意大利人。他做任何事，涉猎任何事，都能成功。他可以在匈牙利做纯正的马札尔人，在意大利当意大利民族主义者(Irredenta)，在法国做反犹太者(如德雷蒙!)[⑦]。他善于抓住一切

① 菲尔克斯·门德尔松(Felix Mendelssohn，1809—1847)，摩西·门德尔松之孙，德国音乐家。——中译者注

② 雅克·奥芬巴赫(Jacques Offenbach，1819—1880)，法国作曲家。——中译者注

③ 索萨(John Philip Sousa，1854—1932)，美国作曲家与指挥家。——中译者注

④ 比肯斯菲尔德勋爵(Lord Beaconsfield)，即曾任英国首相的便雅悯·迪斯累利(Benjamin Disraeli，1804—1881)。——中译者注

⑤ 甘必大(Léon Gambetta，1838—1882)，法国政治家，曾任外交部长。——中译者注

⑥ 拉萨尔(Ferdinand Lassalle，1825—1864)，德国工人运动家，全德工人联合会创始人。——中译者注

⑦ 德雷蒙(Édouard Adolphe Drumont，1844—1917)，法国反犹宣传家。——中译者注

尚处萌芽状态的事物，并使之全速发展至鼎盛。[18]他能做这一切，都是由于他的适应性。

我已经说过，这种特别的适应能力源自犹太特性的四大因素。但它或许与犹太人的理性主义，而非与其他三者更有关联。由于理性主义，他能够从外部观察一切事物。如果犹太人是万事通的话，这不是因为他必须这样，而是因为他决定这样。他怀有的任何信念并不出自内在的灵魂，而由他的智力构想。他的立足点并非坚实的大地，而是空中想象的城堡。他没有根本的原创，而有机械 254
的理性。他缺乏情感的深度与本能的力量。这是犹太人成其为犹太人的原因，但他也能不同。比肯斯菲尔德勋爵由于各种偶然或政治机遇而成为保守派，但施泰因①、俾斯麦、卡莱尔②成为保守派却是不得不如此——保守是他们的天性。如果马克思或拉萨尔生于另一个时代，或生长于另一种环境，他们很容易会成为保守派而非激进派。事实上，拉萨尔已经动了成为反动分子的念头，毫无疑问，他要是充当起普鲁士容克，保证会像他充当社会主义鼓动家那样尽显当行本色。

犹太人适应性的动力，当然来自万物的终点皆是一种目的或目标的观念。一旦犹太人下定决心做什么，剩下的就相对容易了，而他的灵活性会让他更成功。

犹太人的高度灵活性令人赞叹。他能够赋予自己他最想要的个人外表。他在过去通过装死保护自己，如今则通过改变肤色或其他形式的模仿。最好的例证来自美国，很难将那里的第二、三代犹太人从非犹太人中区分出来。而无论多少代之后，你仍可以识别出德国人，这也适用于爱尔兰人、瑞典人、斯拉夫人。但只要其种族体征允许，犹太人就已成功模仿了美国佬，尤其在穿着、举止和发型等外在特征方面。

---

① 施泰因（Heinrich Friedrich Karl Stein，1757—1831），普鲁士政治家、改革家。——中译者注

② 卡莱尔（Thomas Carlyle，1795—1881），英国文学家、历史学家。——中译者注

由于在心理和道德上具有灵活性，犹太人能轻而易举地熟悉周围环境中的智力氛围。心理上的灵活性能让他迅速掌握任何人群的“口音”，快速注意到什么才重要，快速摸到处事窍门。而其道德灵活性能帮助他排除前进道路上麻烦的障碍，无论这种障碍是伦理方面的还是审美方面的。他能够灵巧有余地做到这些，因为他
255 只有很少的我们所谓的个人尊严。如果问题是要达到预期目标，那么即使不忠于自己，对他而言也是微不足道的。

这种描述是否合乎实际情况？犹太人为争取生存而对不断变化的环境具有明显的适应能力，这当然有充分证据。但还有一些证据表明，犹太人拥有某些特别的天赋。我指的是他们在新闻业、律师职业、演艺行业上的才能毋庸置疑，而这一切都可追溯至他们的适应性。

在本书中，我们多次提及阿道弗·杰利内克，他曾对这两者之间的关联做了巧妙概述。他说：“记者必须迅速、灵活、活跃、热情，能够快速分析并快速将许多事物结合在一起；必须能够直切主题，掌握当天任何问题的主旨，或敏锐地察觉一场论争的要点；必须能够清晰而明确地概述他的主题，运用隽语、对比、说教，简言之——用醒目的句子描述，并通过适当的怜悯使这种描述有生气、借助机敏为之着色、添加佐料使之有味。”这些不都是犹太人的特征吗？

演员与律师若想获得成功，取决于他能否在各种思想纷然杂陈的陌生世界中快速定位自己，能否没有太大困难地对人对事作出正确判断，对它们形成准确评估，并将之用于自己的目的。犹太人的主观性天赋在这方面对他们有利，因为借助这种天赋，他能够轻易地换位思考，从而为自己考虑并保护自己。要知道，法学构成犹太文献的主体部分！

应用于资本主义的犹太特性

现在面临着的问题是，犹太特性怎样并以何种方式促使犹太人成为金融家和投机家？在资本主义制度的框架内，犹太特性怎样使他们在从事经济活动时，也能取得他们在作为数学家、统计学

家、医生、记者、演员和律师时取得的那种成功？也就是说，对资本主义事业的独特才能在多大程度上源自构成犹太特性的四大 256
因素？

概括说来，我们在这方面要重复上文在谈及资本主义与犹太宗教的关联时已经说过的话，即资本主义与犹太特性在基本观念上呈现出非凡的相似性。因此，我们在犹太特性、犹太宗教与资本主义之间找到了三重对应。我们所发现的犹太民族的主导特征是什么？是不是过度的智力？智力这个品质是否使资本主义制度区别于其他一切制度？组织能力源自智力，而我们在资本主义制度中看到了脑与手、管理与生产的区分。“要让最伟大的工作圆满完成，你需要一千只手，但只需一个大脑。”这是对资本主义事务的总结。

最纯粹的资本主义形式，就是那种抽象观念能在其中得到最清楚表达的形式。我们已经看到，抽象观念是犹太特性的主要部分，故这里无需花费力气论证资本主义与犹太人在这方面的密切关系。另外，资本主义的抽象特性还体现在用仅仅是数量上的不同（交换价值）来取代所有质量上的不同。在资本主义时代到来之前，交换是多边的、多样的和技术性的过程；而现在，这只是一种专门化的行为——商人的行为。此前，买者和卖者之间存在多种关系，但现在只剩下了一种——商业关系。资本主义趋势消除了不同的方式和习俗，消除了许多地方与国家的悬殊差别，而代之以大都会的规整。简言之，出现了一种迈向统一的趋势，而资本主义与自由主义在这种趋势中有许多共同点。我们已经揭示了自由主义与犹太教之间的近亲关系，因此又得出资本主义、自由主义与犹太教之间的三重亲密关系。

资本主义和犹太教之间的内在相似如何得到最佳体现？它是否通过金钱使资本主义实现毫无生气的高度一致的政策大获成 257
功？金钱是公分母，一切价值都借此表达；同时，它在资本主义体制中是经济活动的终极目的。因此，在这种体制中，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就是成功。犹太人难道会不同吗？他不也把资本增殖作为首

要目标？资本的抽象性不仅与犹太人的灵魂意气相投，资本主义体制对金钱的高度推崇也在这种犹太特性——目的论——中找到了共鸣。黄金成为重要手段，它的价值在于你可以将之用于许多目的这个事实。它几乎无需技巧就展示出，致力于实现某个目标的天性会感到自己为某种东西吸引，这种东西之所以有价值，不过是因为它是达到目的的一种手段。此外，犹太人的目的论将他对成功的看重凸显出来。（因此，这是与资本主义的另一个相似点。）因为他如此重视成功，他不惜为了明天而牺牲今天，他的灵活性有助于他这方面做得更好。在此，我们可以再次注意到与资本主义的相似性。资本主义不断寻找新生事物，寻找扩展的方式，并为了明天而放弃今天。想想我们的整个信用制度，这种特性难道没有在此足够清楚地展示出来吗？还要记住，犹太人非常擅长组织信用，也就是擅长将未来某个时候能起作用的价值与服务为今天所用。人类的思想能够清晰描绘出未来的感受和未来的需要，而信用恰恰提供了通过现在的经济活动来生产未来价值的机会。毋庸赘言，信用在现代生活中广泛存在。原因也是显而易见的：它提供了绝佳的机会。的确，我们必须放弃那些源自“完全投身于现在”的快乐。[19]但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犹太特性与资本主义还有一个共同点，即实用的理性主义，我指的是根据理性塑造一切活动。

258 为了使这整个对应更加清楚，让我再举几个具体实例。犹太人适合充当企业家的角色，这既是由于他的意志力，也是由于他习惯制定种种目标。他的智力灵活性能解释他为什么善于发现新的生产方法与新的销售机会。他是创办新组织的行家，特别善于发现什么人最适合干什么，这种能力对他很有用。由于在资本主义世界中，一切都不是根本或自然的，而只是机械或人工的，犹太人对前者缺乏理解就无关紧要。连大规模企业本身也是人工的或机械的，你可以扩大或缩小某个事务，也可以根据环境对之调整。这就是为什么犹太人能够如此成功地组织大型资本主义企业的原因。而且，犹太人能够轻易领会没有人情味的关系。我们已经注意到，

他很少依赖个人情感行事。因此，他不在乎古老的“家长制度”，几乎不会关注有时仍在劳动合同中存在的些许情感因素。在买者与卖者、雇主与雇员之间的全部关系中，他将一切减化到法律和纯粹的商业基础之上。在工人为了获得他们与雇主之间的集体协议——该协议会制约工作条件——而展开的斗争中，犹太人几乎一律站在工人那边。

但如果一个犹太人适合当企业家，他几乎生来就特别适合当商人。而他在这方面的才能几乎数不胜数。

商人以计算为生，计算也一直是犹太人的基本元素。热爱抽象使得计算对他而言有如轻车熟路，这是他的强项。现在，一种计算的才能与一种总是盯着某种目标工作的能力结合起来，这已经为商人赢得了一半胜利。他能够正确估量任何条件下的时机、可能与优势，排除一切无用之事，并通过计算评估全局。倘若赋予这个 259
清醒的计算家以丰富的想象力，你面前就会出现一个完美的投机者。以闪电般的速度对任何状况作出判断，考虑一千种可能出现的结果，抓住最有价值的东西并据此而行动——正如我们已指出的，这些就是证券经纪人的目标。对于这一切，犹太人都具有必要的心理天赋。我要特别强调，在聪明投机家的活动与能成功诊断病情的聪明医生的活动之间，存在密切关系。犹太人由于他的特性，非常适合这两个行业。

好的证券经纪人必定是好的谈判家。还有比犹太人更聪明的谈判家吗？他们在这方面的能力不早就被承认和利用了吗？能适应市场需要，并满足任何形式的特需，这是证券经纪人的首要条件。显然，犹太人凭借其适应性能够做得像其他人一样好。次要条件是能够提供建议，在这方面，犹太人能换位思考，因而也很合格。

无论怎么看，结论都是：对于实现资本主义的最佳结果，没有任何其他一组特性能像犹太特性这样适合。我无须进一步讨论这种对应关系，聪明的读者能够轻易找到。在结束这个主题之前，我只想让他注意这点：一直意在搅乱平衡趋势的证券交易业的狂躁

不安，与犹太人躁动不安的本性之间有对应关系。

我在上文已用三个词语来形容理想企业家的特征——他必须敏锐、聪明与多谋。敏锐是说能快速理解、准确判断，必须能三思而行，并能抓住正确的时机。

聪明是说他必须了解世界，必须在待人接物上有自信，能在任
260 何紧要关头自信地作出判断；最重要的是，能知道周围人的弱点与失误。

多谋是说充满想法。

资本主义企业家还必须拥有三种额外的品质：他必须活跃、清醒与周到。我所谓的清醒，是指摆脱激情、情绪与不务实的理想主义。至于周到，是指可靠、认真、有条理、利索与节俭。

我认为这种概述大体代表了资本主义企业家和犹太人。

第三部分
犹太天赋的起源

第十三章　种族问题

263

前言

严格来说，我之前为自己设定的任务至此已经完成。我力图揭示犹太人在现代经济生活各个方面的重要性，并探究资本主义与“犹太性”之间的关联。换言之，我致力于阐明犹太人迄今为止并将继续在经济生活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原因，致力于表明他们的伟大成就部分出自客观环境、部分源于内在特性。

但行文至此，又冒出了许多新问题，如果我不想让我最令人敬重的读者带着遗憾放下本书的话，就一定不能对这些问题置之不理。显然，任何人只要跟着我的思路，看到独到的犹太特性不仅存在，而且它们能解释为什么犹太人在经济体中产生了巨大影响，那他就必定会问，这些特性的真正本质是什么，它们是如何产生的，其最终影响又是什么。

这些问题的答案可能大不相同。我们注意到的犹太特性，或许只不过是一种没有相应的有机体的功能；或许只是表面现象，很肤浅，完全无法在体现它们的人身上扎根；或许只是大衣上的一根羽毛——风一吹就掉；或许只是一种会随人的消失而逝去的东西。

或者，它们可能成为一种根深蒂固的积习，但尚未强大到足以遗传的地步。另一方面，它们可能变得如此显著，以至于代代相传。如果是这样，就会有一个问题：它们是何时出现的？这些特性 264
犹太人一直就有吗？它们究竟是犹太人与生俱来的天性，抑或只是在历史过程中获得的？如果是后者，那又是在古代还是在晚近

获得的？此外，所有遗传的特性能一直持续，还是仅有暂时性——即是持久的还是短暂的？由于我们研究的是一个社会群体，故此处有必要回答这个问题：该群体是一个种族实体吗？简言之，犹太人是个在血缘上有别于其他民族的人群吗？最后，在此类问题中，我们必须探讨这种可能性，即该群体的独有特性，是出自它与其他群体的混合，还是出自群体内部的选择。

这个问题无疑是多方面的。不过最糟糕的是，现代科学无法明确回答上述问题。当然，类似的尝试已有，但它们往往带有偏见，而任何人只要对这个主题有粗浅的了解，都会面对更多问题与困惑，而不是答案。

在我看来，当务之急是获得对眼下这些问题的一个清楚了解，并适当梳理一下手头已有的大量材料，唯有这样，才能把淹没在昏暗中的犹太人问题抽取出来。在一般犹太人问题与种族问题交叠之处，仿佛已有一千个魔鬼被释放出来，专门在此扰乱人的心智。针对遗传的学说，一位权威[1] 近来竭力主张：现在最需要的，是形成对其基本组成部分的精确认识。这在极大程度上同样适用于犹太人是不是种族这个问题，或许一个门外汉也能对该问题有所贡献，仅仅是因为他与专家们立场不同。这种想法鼓励我尝试对今天流行的将犹太人视为种族的理论概述一番，我只概述这方面可靠的理论，这已经有无数个了，更不用说为数众多的错误假设了。

265 关于犹太人的人类学

关于犹太人的起源及其人类学与人种学，当前的种种观点在基本事实上相当一致。通常假设[2] 以色列与犹大一样，源自不同东方民族之间的混合。在公元前 15 世纪，当时还是游牧部落的希伯来人打算在巴勒斯坦定居，他们发现那里早已有人居住，计有迦南人（他们很可能在当地享有霸权）、赫梯人、比利洗人、希未人与耶布斯人（《士师记》3：5）。最近的研究得出与原有观点相反的结论，认为以色列部落在当时与这些民族大量通婚。

后来直到人口中的一部分被掳到巴比伦时，种族混合现象仍在

巴勒斯坦继续。至于流放者(他们的历史在此至关重要)的情况，我们从最近出土的楔形文字铭文中了解到他们对待通婚的态度。这些铭文表明，在犹太人与巴比伦人之间“无疑”存在逐步的融合。这些移民以巴比伦人的名字为子女取名，而巴比伦人则以波斯人、希伯来人与阿拉米语的名字为子女取名。[3]

构成犹太人的各民族与部落之间的相互关系如何，这是不太清楚的；他们与其他类似的群体有什么不同，这点更加不清楚；而最不清楚的是，他们如何被称呼。最近对“闪米特”(Semite)一词的使用饱受争议，结果使该词在人类学界不再使用。这个争议，就像有关雅利安人的争议一样，只表明允许语言学概念干预人类学对人的划分会有多么谬误。通常被接受的观点是，所有闪族人都讲闪语，但从人类学上看，他们却属于不同的群体。[4]

我个人认为，就如何精确划分文明的东方各民族展开争论，这没有什么意义。我们在这方面一无所知也无关紧要。然而，有件 266
事是肯定的：所有文明的东方民族，即埃及人、巴比伦人、亚述人、腓尼基人与犹太人，因为他们的起源和早期历史而同属一类，或许可以称为“沙漠”或“沙漠边缘”的民族。一个来自北方的白肤金发碧眼的部落与这些人群相混合的假设，现在几乎被一致当作无稽之谈。只要没有发现比扫罗的绯红头发或拉美西斯二世木乃伊的狭长头骨更令人信服的证据，日耳曼人无所不在的理论[5]就必须被冷眼相看。

那么，什么是构成犹太人起源的那些族群的人类学历史呢？一个常见的答案认为，犹太人像从前一样，继续在流散中与非犹太邻居通婚。勒南、洛布、纽鲍尔等人认为，现代犹太人很大程度上是希腊化时代异教皈依者的后代，或者是在公元后最初几个世纪犹太人与非犹太人通婚的后代。白肤金发犹太人的存在(大约占13%)——他们尤其分布在东欧——为这种观点提供了可能。但据我了解，完全相反的观点如今已占上风——犹太人自以斯拉时代起就一直与外界严格分离。在超过两千年的时间里，他们不和其他民族接触，他们依然维持着种族纯洁。无可否认，在他们漫

长的流散中，少数外来民族的血液进入犹太人体内。但这些外来因素非常少，没能对犹太民族的种族纯洁产生任何值得重视的影响。

现在看来，历史上皈依犹太教的人数被过高估计了，这是相当明确的。毫无疑问，在希腊化与早期基督教时代，犹太教在异教民族中间赢得了信众。（随后的许多世纪便毫无结果，只有一个例
267 外。）针对这些皈依者，罗马法与犹太律法都制定了条款。但我们有把握设想，他们都是所谓的“门口的皈依者”（Proselytes of the Gate）——遵照犹太人的教导崇拜上帝，但并未受割礼，也不许与犹太女子结婚。这些人最终几乎全部倒向基督教。事实上，虽然罗马皇帝安东尼·皮乌斯（Pius）统治时再次允许犹太人行割礼，但却明令禁止对皈依者实施割礼。因此，皈依犹太教成了一种可受惩罚的罪行。这极有可能并非禁令制定者的本意，但其影响很快得到认可并被扩大。[6] 塞维鲁斯“以死亡相惩罚，禁止皈依犹太教”。

但就算我们承认在早期基督教时代，犹太人中间出现了与外邦人的混合，这种混合的规模也不会很大，这只要想想当时总共可能只有大约几百万犹太人就行了，而且不管怎样，这些外来因素来自与犹太人密切相似的民族。

在犹太人随后进入欧洲历史的多个世纪中，我们可以认为，皈依活动几乎完全停止了。因此，在整个中世纪，犹太人仅仅接受了极少的非犹太血统。8 世纪卡扎尔人引人注目的皈依活动不能算作例外，因为他们的疆域并不十分辽阔。10 世纪时，它仅局限在克里米亚西部的一隅之地，到 11 世纪这个犹太弹丸之国便彻底消声匿迹。仅有一小群卡扎尔余民作为卡拉派继续在基辅生活。因此，即使全部卡扎尔人信仰了犹太教，犹太人的种族纯洁也几乎没有受到丝毫影响。而且，事实上，除统治集团或上等阶层之外，其他卡扎尔人是否成了犹太人，是十分值得怀疑的。[7]

因此，通婚依旧是使犹太血统不纯的唯一可能的来源。在犹太史的某些时期，必定发生了犹太人与非犹太人的通婚。在那些犹太凝聚力有所松弛的时期，比如在基督教出现之前的一个世纪，或

者12、13世纪的西班牙，通婚很可能为数众多，这并非是过分的假 268
设。即便如此，这种松弛也从未持续很长时间，犹太正统观点很快重新占据上风，并排斥非犹太人。法利赛人在基督教之前一个世纪取得的那种松弛，导致了12、13世纪由迈蒙尼德的分裂引起的另一次松弛，而后者引起的反弹让犹太男子与基督徒和穆斯林妇女的通婚被宣告无效。[8]

但有迹象表明，这类通婚仍然存在。它们为早期西班牙的基督教公会议所明令禁止。例如，埃洛维亚公会议(304年)第16条教会法规定，“天主教教徒的女儿不得与异端结婚，除非后者返归教会。这同样适用于犹太人与分裂者”。第三次托莱多公会议(589年)第64条教会法禁止犹太人拥有基督徒妇女，无论是作为妻子还是情妇；此类结合如果导致子女出生，子女必须受洗。第四次托莱多公会议(633年)第63条教会法再度规定，拥有基督徒妻子的犹太人如果希望继续与她生活，就必须接受基督教。[9] 不过，这些教会法所反对的这种婚姻，看起来不大可能有很多。无论如何，由于这些婚姻的后代不再属于犹太教，犹太人的种族纯洁不可能因此受到多少威胁。

同样，犹太人与北方民族的任何混合也不可能。有种流行观点认为，德国犹太人直到十字军时代一直生活在基督徒中间，与他们在各个方面都交往自由。但这种观点不可信，德国犹太史最权威的学者之一布兰就声称，在那一时期，即使最低程度的同化假设都是“一个空洞的幻想，只要对那一时期犹太人的内部生活有所了解，这种印象就会荡然无存”[10]。

白肤金发的犹太人仍然有。他们被视为犹太人与北方白肤金 269
发种族混血的证明。但是，著名学者都不视之为犹太人与斯拉夫邻人合法结合的产物。另一方面，还有一种有人信的假设[11]认为，白肤金发犹太人是犹太人与俄罗斯人非法结合的产物，这要么是通过普通方式，要么是在集体迫害期间以强暴方式产生的。但这种假设的弱点一看即知。即使它解释了为什么俄国会有白肤金发的犹太人，却也无法解释为什么德国、南部国家、北非与巴勒斯坦

会有这类犹太人。

实际上，没有必要借用种族混血解释白肤金发的犹太人。一个极好的例子是，所有肤色深的民族中都产生了许多变种。[12]

还是回到犹太人在二十多个世纪中保持了种族纯洁这个事实上来。这方面有个证据：全世界犹太人有相似的人类学特征，而这种相似性在许多世纪中非常稳定。“遭遇或环境的不同没能模糊一种共同的类型，较之任何其他种族，犹太人身上更能证明遗传远远比环境影响大。”（E. 奥尔巴赫语）

目前，犹太种的人类学同质性已被许多解剖实验与测量证实。[13]唯一尚存疑惑的问题是，阿什肯纳兹人（德国犹太人）与塞法尔迪人（西班牙犹太人）之间的古老差别能否在人类学上反映出来。关于这一问题，存在两种对立观点，[14]但我认为其中任何一种依据都不足以作出有说服力的独立判断。但必须指出，私下的观察看来会赞同这两者之间存在某种人类学差异的观点。西班牙犹太人瘦削而优雅，有着小手小脚和纤细的钩鼻，而他们的德国同胞，却长着粗壮的罗圈腿，与宽阔饱满的赫梯鼻子。他们在普通观
270 察者眼中难道不是两种不同的类型吗？然而，尚无科学根据解释这种不同。

另一有争议之处在于，今天的犹太人是不是一个在生理与病理学上都不同于其邻人的独立实体。毫无疑问，从这个角度看，犹太人在许多方面确实显现出某种特性——青春期较早，对癌症特别是子宫癌患病率极低，特别容易得糖尿病和精神病，等等。然而，有人并不将这些视为犹太人的生理与病理特征，而是将之解释为犹太人的社会地位、宗教实践等方面带来的后果。[15]在此，同样没有充分根据足以下定论。

这与犹太人的相貌不同。众所周知，相貌是两种因素——某种脸形及其特殊表现——的产物。你无法衡量其中任何一个，因此必须完全依赖普通的观察。正如色盲患者无法区分颜色一样，那些无法看出不同面相的人自然对相面术一窍不通。因此，当一些作者[16]说对于四分之三有教养的犹太富人，无法只根据他们的面孔来

准确判断他们是不是犹太人时，根本没有回应的必要。但是敏锐的观察者能明白无误地分辨出来。所谓的犹太相貌仍是个事实，这几乎没有人会否认。毫无疑问，有些犹太人看起来一点不像犹太人，而许多非犹太人看起来很像犹太人。我不会像某些人那样离谱，[17]仅仅因为哈布斯堡家族有厚嘴唇或法国路易王室有鹰钩鼻，就说他们有犹太相貌。在东方民族（或许包括日本人）中间，我们确实也遇到了犹太类型。这丝毫没有减损犹太人在人类学上的稳定性。如果它能证明什么的话，只表明犹太人与东方民族有着共同的起源。（顺便提一下，失踪的以色列十支派据说位于日 271
本——这种猜测有点荒诞不经，但日本人与犹太人之间一些惊人的相似又让它似乎不无道理。）将犹太相貌作为颓废的一种表现，或者像里普利那样将之视为隔都生活的后果，这些观点不是很有说服力，如果我们考虑到在古埃及与巴比伦纪念性建筑上描绘的无可否认的犹太类型的话。看看希沙克（Shishak，前 973 年）时代犹太俘虏的画面，或者萨尔曼萨尔[18]（Salmanasar，前 884 年）宫中犹太使者的图像，你将确信，从那时起直到现在的几乎三千年间，犹太人的面容几乎没有变化。这是犹太人种在人类学意义上独立存在，以及其特性在多个世纪中以最不寻常的方式稳定不变这种提法的又一证据。

犹太“种族”

有鉴于这一切，我们能否谈及一个犹太种族？答案取决于“种族”一词的含义是什么。但是对它下定义并不容易，因为很可能有多少作者写它，它就有多少种定义。[19]当然，任何人都可以说，我把这种或那种东西当作种族的标志，而如果运用这个标准，就可以确定犹太人是不是一个种族。但此类做法更像是儿戏。真正需要的是一个科学的定义。如何界定呢？已经尝试过的许多方法——人类学上的差异、头骨测量、生物学实验及其应用——都没有取得不容置疑的成果。然而，仅仅因为对人种至今没有取得令人满意的分类，而就此断言人类学上的差异并不真的存在，这也是一个谬

误。爱斯基摩人不同于黑人，南意大利人不同于挪威人，我们不需要通过人类学就知道这点。

犹太人也是如此。他们也许难以分类，但他们肯定在人类学上有自己的特征。因此，当一位杰出学者[20]写道“我只承认一种犹太
272 宗教共同体，而对犹太种族一无所知”时，我们必须将之当作一时性起的轻率表达。对它的反驳就是，我们可以在“犹太宗教共同体”旁轻易放上有着同样历史的“犹太民族共同体”。

区别犹太人与非犹太人的人类学特征也是如此。我坚信，犹太人无论身居何处，都是一个与众不同——比如与瑞典人或黑人不同——的人类学群体。他们绝不仅仅是一个“宗教共同体”。

归根到底，这种争论难道不是与措辞有关吗？有些人认为不存在犹太种族。这没关系。但他们又承认犹太人有人类学特征。由于没有可以描绘它们的令人满意的术语，这是个巨大遗憾。将犹太人称为“民族”并不合适，因为“民族”的定义不比“种族”少。但名称有什么重要呢？那种东西就摆在那里，我反正会毫不犹豫地谈论犹太种族，或者，如你所愿，在种族二字上加上引号。

让我借用阿瑟·鲁平[21]的几句妙语来总结这部分内容，此人是研究犹太人的出色权威，我认为这些话是阐述这一主题的最好表达：“‘种族’一词不应被过分延伸。如果我们将史前时代就发展出独特人类学特征的群体包括在内，而这些人此后从不与其他群体混合，那么实际上白种人中间现在就不存在任何‘种族’，但现实情况是他们全都已经反反复复地通婚了。至于犹太人，他们是否早在史前时代就具有共同的种族特征并将它们保存至今，这个细节无关紧要。重要的是，那些坚持犹太宗教的人，确实形成了一个与周遭世界界线分明的群体，即使迟至18世纪末，在严格避免与非犹太人结婚的多代人之后仍旧如此。由于缺乏更好的名称，源自这个群体的共同体可以被称为种族，更确切地说是‘犹太种族’。”

273 犹太天赋如何稳定不变

在这些人类学考量中，最令人感兴趣的问题是，犹太人的身体

特征与智力特性之间是否存在任何关联。我们想弄清楚，后者是否生来就有的，即它们是否具有种族性。为了探究这个问题，有必要看看我们已在现代犹太人身上观察到的特性，能否也在古代犹太人那里找到；它们能否追溯至他们历史的最早期，还是出现在稍后的时代——如果是后者，又会是什么年代。

结果会是，我们将注意到犹太人的智力特性一直稳定不变，犹太灵魂的某些特征可以追溯至犹太族群形成之时。我们无法直接证明这一切，因为没有来自早期时代关于犹太大众特性的可靠叙述。我们所拥有的，只是简单而少量的观点表达，但它们具有特殊价值。例如，我们极有兴趣地注意到，《摩西五经》有四处（《出埃及记》32：9，34：9；《申命记》9：13，27）对犹太人的叙述与塔西佗后来的描述相似——都表明他们是个倔强固执的民族。同样令人感兴趣的是，西塞罗说他们最兄弟般地团结一致；马尔库斯·奥勒利乌斯指责他们是个躁动不安的民族，他这样说他们："哦，马科曼尼人！哦，卡迪人！哦，萨尔马提人！我终于发现了一个比你们更不安分的种族！"最后，胡安·瓦尔特·德尚·胡安认为他们才智敏锐，且这种才智十分适合用于世俗事务。

需要注意第一点是：

（1）犹太人在整个流散期间对待他们居住地民族的态度。在过去这个世纪，我们看到了一种冷漠疏远。在资本主义到来并使他们获得自由之前，犹太人被视为"陌生人"、"半公民"。他们到处遭受憎恨与迫害，但他们却知道如何在各地保全和维持自身。

古代的情况如何呢？之后又如何呢？自从犹太人开始与其他 274
民族发生接触以来，我们就不断遭遇类似情况：犹太人所到之处，皆遭受排斥、迫害与虐待。首先从埃及人开始，"他们憎恶以色列人"（《出埃及记》1：12）。大数的保罗则走得更远，他斥责犹太人"与众人为敌"（《帖撒罗尼迦前书》2：15）。希腊化与罗马帝国时代也有同样的憎恨、抢劫与死亡等事。斐洛与约瑟夫斯分别记下了公元1世纪发生在亚历山大里亚针对犹太人的恐怖的集体迫害。"对犹太人的憎恨和虐待几乎与流散本身一样古老。"（蒙森语）

在罗马帝国时代，他们的命运并无不同。“这些污秽、喧闹的犹太人真令我厌恶”，马尔库斯·奥勒利乌斯写道。随后在东哥特人国王提奥多里克时代，不计其数的杀戮与劫掠是家常便饭，后来在7世纪伦巴第人的统治下也如此。东方的情况与西方一样，6世纪的巴比伦与7世纪的北意大利一般黑暗。即使在他们享受了许多美好时光的比利牛斯半岛，结局依然苦楚：基督徒与穆斯林都对他们行了凶。

此类例子举不胜举。它们都是基督教与非基督教世界中憎恨犹太人的种种表达。这种现象能否用存在犹太特性——这些特性无论犹太人在哪里都稳定不变——的假设来解释？答案必然是肯定的。对犹太人的憎恨不可能是所有这些民族一时冲动的结果。

而且，犹太人在各个地方和所有时期都是半公民。有时他们确实不属于半公民，因为当地法律就已经这样规定了。古代有许多例证表明犹太人被赋予了特权地位，据此他们得以免除公民的某些义务（例如服兵役），或者在法律条款上享有特别优待。尽管如
275 此，他们并没有完全融入所在国的生活。凯撒利亚是一座位于犹太人土地上并且是在犹太人统治时期建造的城市，当地的希腊居民就反对将公民权授予犹太人，尼禄的大臣伯努斯支持这个决定。[22]在中世纪，这方面几乎没有什么变化。

我们如何解释这种普遍存在的遭遇？不同的国家对犹太人采取了相同的政策，这难道不是清楚地表明，它是由犹太人的某些特性造成的？或者像有些人愿意说的，它是由对犹太宗教的字字句句的严格坚守造成的。一定程度上必定如此。

尽管遭受这一切压迫，犹太人并没有被压倒。从最早的时代起，他们就知道如何维持自身。或许这是由于那种我们在现代犹太人身上注意到的倔强与弹性的奇特结合。他们受到的压迫或许残酷得前所未有，但很快就像盒子里的玩偶一样重新站立。罗马皇帝用尽一切他们掌握的武装铲除犹太人，他们却抵挡住了！虽然皇帝们如此努力，但耶路撒冷的族长在公元3世纪重新为当局所承认，并享有独立的司法权。在古代、中世纪及我们的时代，人

们已用一个词总结了他们对于犹太人的看法——倔强："像犹太人一样倔强。"(*ostinato come un ebreo*)

倔强与弹性的奇特结合，在犹太人对待当局的行为中得到了最佳体现，这方面牵涉到他们的宗教。这种宗教为他们树敌众多，并让他们遭受了巨大苦难。但犹太人仍拒绝放弃自己钟爱的信仰。一旦压迫变本加厉，许多犹太人便假装放弃他们的宗教，但这只是为了能够秘密遵守它的诫律。我们知道这种行为和马兰诺联系在一起，但它几乎与流散本身一样久远。当读到史书中成千上万的表面是异教徒的秘密犹太人、表面是穆斯林的秘密犹太人、表面是基督徒的秘密犹太人时，你将不由为人类历史上的这一独特现象震惊。更让人吃惊的是，许多最虔诚的犹太人，无论是拉比们还是领袖们，都不惜借助假装皈依，以保全性命。比如拉比以利亚撒·本·帕塔，他活跃于哈德良时代，曾假扮异教徒；[23]又如人称拉比撒母耳的伊斯梅尔·伊本·内格雷拉，他是《塔木德》权威，负责解答宗教实践上的问题，曾担任穆斯林国王哈布斯的宰相，他用套语"一切赞颂，全归真主"①开始其主子的法令，而在法令最后敦促该法令的受众按照伊斯兰教法生活；[24]再如伟大的迈蒙尼德，他为自己佯装皈依伊斯兰教的行为寻找了出色理由；[25]伪弥赛亚萨巴泰·泽维尽管皈依了伊斯兰教，但却没有失去追随者的崇敬；那不勒斯的犹太人巴西利乌斯假装为他的儿子们施洗，目的是能够以他们的名字开展奴隶贸易，[26]因为这种行业不许犹太人从事；成千上万的马兰诺被从比利牛斯半岛逐出后，先是作为基督徒出现在世界各地，随后就在第一时间选择回归他们父辈的信仰。这个结合了如此坚定与如此弹性的民族，真的是要有多非同寻常才能做到这些啊！ 276

我们由此注意到许多犹太特性在流散中发展得最鲜明。但是——

① "一切赞颂，全归真主"(*Chamdu-l-Illahi*)是《古兰经》开篇之句，也是穆斯林平日最常说的话之一。——校注

（2）流散本身是否只能作为外部环境的结果来解释？难道它本身就没有见证独到的特性？或者换个稍稍不同的方式问，能否将任何其他民族像犹太人散居那样分散到世界各地？

犹太人很早尝到了流放滋味。大多数人听说过提格拉·帕拉萨，他将一部分犹太人口迁往米底与亚述；听说过后来的巴比伦之囚；听说过托勒密·拉吉，他强迫许多犹太人定居埃及，并在昔兰尼建立了一块犹太殖民地；听说过安条克大帝，他从巴比伦带走两千犹太家庭，将他们安置在小亚细亚的中心弗里吉亚（Phrygia）与吕底亚（Lydia）。蒙森将犹太人在巴勒斯坦之外的定居称为“亚历山大或其将军们的一项发明”。

277 在上述事例中，很容易把犹太人的散居归咎于外部环境，因为在绝大多数情况下，犹太人被带离家园，而非出于自愿。因此，从这些散居中似乎看不到任何内在的犹太特性。这种结论是轻率的。难道就不存在这种可能性吗？即倘若犹太人不具备某些特性，他们或许从来就不会被移植？强制性的定居点必定具有某种目的。它们要么对犹太人被带离的土地有利，要么（这更加可能）对他们定居的土地或城镇有利。别人要么担心他们在自己国家煽动叛乱，要么因为他们的财富或产业而把他们视为有价值的公民、让他们成为新定居点的中坚力量，或者认为他们可靠而被统治者用来加强对骚乱中心的控制（正如托勒密·拉吉在昔兰尼做的那样）。

但是，许多犹太人离开巴勒斯坦是出于经济原因：那里无法为不断增长的人口提供足够的空间。考虑到巴勒斯坦的面积和生产力，出于这种原因而离开这块土地的移民活动必定频繁发生。但这指向一种民族特性，即不断增长的人口，就像人们所知道的，是出于生理学与心理学上的原因。此外，经济压力导致的移民，还可追溯至另一种民族特性。在这方面，已有人拿犹太人与瑞士人比较。瑞士人离开家园，也是因为国家无法赡养所有人。但他们只会因为有精力、有决心为自己创造更好的生活而外迁。印度人就不会外迁，如果人口增长，他将满足于更小份额的粮食。

然而，将一切犹太散居统统视为强制性的，则很可能是片面的。如果不假设一种自愿性的移民，我们就无法解释这个如此普遍的现象，而且它在许多世纪中一直如此。这究竟出自什么原因——是因为一种迁移的本能，还是无法长期待在一块土地上——
278
并不太重要。但必须将某些特性与这个民族联系起来，才能解释他们为什么能如此容易地来回迁移，以及他们为什么会定居在大城市——这种癖好犹太人很早就有了。赫茨菲尔德编出了可能最完整的希腊化时代的犹太定居点清单，他注意到这个惊人事实：在52个城镇定居点中，有39个位于富庶的商业中心。[27]

这一切可以表明，犹太特性决非是在流散时代发展起来的，也不像犹太历史学家们设想的那样是在中世纪发展起来的。相反，流散本身是这些特性的结果。这些特性最先出现，至少在萌芽阶段就已出现。

（3）他们的宗教也是如此。有人说今天的犹太人是其宗教的产物，说某个人或某群人用一种考虑周全的政策几乎人为地塑造出今天的犹太人，我准备承认这种说法。我在前一章对这个主题的陈述试图揭示犹太宗教的巨大影响，尤其是对犹太人经济活动的巨大影响。但我想尽我所能地驳斥由H. S. 张伯伦提出的观点。我试图明确，倘若没有犹太人的特性，犹太人的宗教也不可能有。某个人或某群人能够表达如此令人惊叹的想法，这必然让我们假设此人或这群人具有特别的天赋。而且，整个犹太民族对其教导的接受，不仅仅停留在嘴上，更出自内在的深刻和真诚——这点除了设想他们具有独特的民族特性外，还能怎么解释？今天，我们不再可以不信这种观点：从长远看，每个民族拥有最适合它的宗教，而如果它采纳了另一种宗教，它会不断改变它以适应自己的需要。

因此，我认为我们可以从犹太宗教的特性中推导出犹太民族的
279
特性。由此来看，从犹太传说中举出的犹太个性的许多特征，可以上溯很远，肯定能上溯至巴比伦之囚时代。就像反犹小册子的作者们所做的那样，我也要这样上溯，从多少令人存疑的以撒、雅各与以扫和他们相互欺骗的故事中，推断出犹太人有欺诈倾向，这没

有什么好怕的。我希望这不会引起误会。欺骗这个题材在所有神话中都可见到。我们只需将目光投向奥林匹斯山或瓦尔哈拉天宫[①],就可发现神灵之间以最无耻的方式相互欺骗与欺诈。不,我说的不是这种。我说的是,上文已考察过的犹太宗教体制的根本特性——智力、理性主义、目的论——也是犹太民族的特性,它们必定甚至在犹太教获得发展之前(在此我重复一下,至少在萌芽阶段)就已存在。

(4) 我的下一个论点是,在几乎所有历史时期,犹太人的经济活动都具有显著的相似性。为了主张这是犹太特性稳定不变的证明,我将自己置于主流观点的对立面。我不仅与那些认为犹太经济活动随时间发展而改变的人不同,而且与那些赞同我、也认为在这种发展中存在一个稳定不变因素的人不同。我与后者的不同在于我们在具体经济活动的构成上有分歧。

关于犹太经济史,普遍接受的观点是什么?我认为这可以追溯至海涅,其大意如下。犹太人最初是个农业民族。据说甚至在流散地,犹太人仍然耕种土地,并避免从事所有其他职业。但到了公元 6、7 世纪,他们被迫变卖地产,且无论愿意与否,被迫寻找其他谋生方式。他们去干什么了?他们转而致力于贸易,之后 5 个世纪一直从事此项职业。接着,命运再度重压他们,因为十字军在商
280 业圈内激起了许多反犹情绪,而各个国家日渐壮大的商业阶层组织起行会,将犹太人排挤出市场,只让行会成员独享市场。犹太人被迫再次四下寻找新的职业。一切谋生渠道都向他们关闭了,剩下的唯一可能是成为放债者。因此,他们成了放债者,不久又取得相关特权,因为高利贷法律对他们另眼相待。

这种观点在犹太圈中普遍流行,几乎享有半官方的地位;同化论者不仅这样看,许多犹太民族主义者也这样认为。

在一些犹太与非犹太的(包括前面的赫茨菲尔德)历史学家那

① 瓦尔哈拉天宫(Valhalla),北欧神话中死亡之神奥丁款待阵亡将士英灵的殿堂,此处寓指北欧神话中众神的居所。——中译者注

里，还流行着另一种观点：自所罗门王时代开始，从整个流散时期至今，犹太人一直是个商业民族。

我认为这两种观点都是错误的，肯定是片面的。我希望通过描述犹太经济史的概况，给出我的理由。

从列王时代到民族独立结束——甚至直到《塔木德》编纂的时代——犹太民族都是一个独立自足的经济单元。它将盈余的产品输送到外国，其构成的诸单元生产他们的一切所需，最多通过与邻人进行简单的物物交换，而适当补充自己的劳作。整体情况可以这样表述：这里有自给自足的一个个经济单元，它们雇佣了一定数量的劳动力；它们带有一点庄园制的性质，也带有一些手工业性质。在这里有可能发现少许的商业。在列王时代，我们读到许多巴勒斯坦的商人，他们情况如何？如何解释他们？用商人一词的常规含义谈论他们，将会误解所罗门时期该国经济组织的性质。它只不过是一种大庄园制，与查理曼时代的大庄园制有点类似，显然需要分配商品。但这并非贸易。“所罗门有五百五十督工（他们 281
相当于庄园管理者[*villici*]）的，监管工人。……所罗门王在……以旬迦别制造船只。希兰差遣他的仆人，就是熟悉泛海的船家，与所罗门的仆人一同坐船航海。他们到了俄斐，从那里得了四百二十他连得金子，运到所罗门王那里。”（《列王纪上》9：23，26—28）

这个以及类似的段落，被解读为当时存在繁荣的国际商业交往，甚至存在贸易垄断。但根本没必要这样解释。情况其实很简单，我们只要把皇室想成一个大庄园，庄园里的仆人在另一个大庄园的仆人的陪伴下被派到远方，为的是取回国王宫廷所需的商品，这样解释就行了。皇室的经济独立在圣殿建造的故事中有进一步体现，所罗门要求希兰为他送“一个巧匠来，就是善用金、银、铜、铁，和紫色、朱红色、蓝色线，并精于雕刻之工的巧匠……又求你从黎巴嫩运些香柏木、松木、檀香木到我这里来，因我知道你的仆人善于砍伐黎巴嫩的树木，我的仆人也必与你的仆人同工。……你的仆人砍伐树木，我必给他们打好了的小麦二万歌珥，大麦二万歌珥，酒二万罢特，油二万罢特。”（《历代志下》2：7 以下）同卷经文的

后一段落也体现了这点："所罗门建造旷野里的达莫，又建造哈马所有的积货城。"(《历代志下》8:4)积货城表明庄园及其财富不是商业性质，而是实物性质的。

用来支撑这个理论——大型贸易在稍后的时代得以开展——的其他段落并不支持这种推断。[28]不错，我们确实知道巴比伦的流放者是富有的(《以斯拉记》1:46;《撒加利亚书》6:10,11)，但经文没说他们从事什么职业。格雷兹主张他们通过商业获取了财富，
282 但《圣经》中没有丝毫证据能支持这个观点。或许，来自尼普尔的刻有楔形文字的铭文能支持这种假设。但如果把以西结关于推罗城毁灭的预言(《以西结书》26:2)归因于对腓尼基人的嫉妒，并在此基础上认为巴勒斯坦甚至早在巴比伦流放前就基本上是个商业国家了，这在我看来未免有点冒失。

作出这类论断必须慎之又慎，这充分反映在对《箴言》中一处著名段落的解释中，它描绘了一个奸妇的诡计(7:19,20)："因为我丈夫不在家，出门行远路，他手拿银囊，必到月望才回家。"这个丈夫是商人吗？或许是吧，但他也可能是农民，一个出远门去城镇管家那里交付租金并在那里购买一对公牛的农民。

因此，没有确凿证据表明，商业在当时已是一种专门化的职业。另一方面，倒有不少段落可以用来支持我的观点，即庄园制十分流行，哪怕是在较晚时期流行的。例如，《尼希米记》(2:8)中的诏书提到管理国王园林的亚萨，要求他为城堡大门的横梁提供木料。《利未记》(19:35,36)中有关公道的砝码与升斗的诫命，并没有对这一观点产生不利影响。

但这并不意味着那时没有商人。他们甚至早在列王时代就已存在，但都只是零售商。我们难道没有在《列王纪》中读到，失败的叙利亚王便哈达向亚哈许诺在大马士革立街市，就像他父亲曾经在撒马利亚所做的那样(《列王纪上》20:34)？或者在《尼希米记》(3:32)中，我们难道没有读到银匠和商人在一个特别的角落建造
283 商店？这最后一句话被(贝尔托莱)解释为在当时必定有受到高度尊敬的商人行会，我对此无法理解。你几乎能在羊门看见小店主。

商品的国际交换在当时已有，甚至在最初时就有，这当然不能否认。当时必定存在广泛的贸易与大商人，他们运来奢侈品，以交换巴勒斯坦的剩余产品。[29]“犹大和以色列地的人都与你（推罗的商人）交易；他们用米匿的麦子、饼（pannag，一种甜食）、蜜、油、乳香兑换你的货物。”（《以西结书》27：17）但奇怪的是，这些大商人并非犹太人而是外邦人。那些穿过这个国家的商队是由米甸人、萨巴人、底但人和基达人率领，而不是由犹太人率领。[30]连《箴言》成书时代的零售贸易也操纵在迦南人手中。由于在自己的土地上被排斥于商业之外，犹太人几乎不可能对当时的国际贸易产生任何影响。国际大商人是腓尼基人、叙利亚人或希腊人。[31]“完全缺乏确证来证明犹太人主要出于商业目的而向外移民。”[32]有鉴于这一切，我看不出有什么理由认为约瑟夫斯的叙述是片面并带有偏见的，约瑟夫斯描绘了他那个时代犹太人的状况。它很可能完全属实。他说：“至于我们，我们既不住在一个滨海国家，也不善于经商。”（*Contra Apion*，i. 12）

随后几个世纪几乎没有给这些状况带来什么变化。《塔木德》中的很多谚语表明，在犹太人中间（至少在东部）十分流行自给自足的小型独立经济单元。谈及商业活动将是一个错误。不错，是有人由于成为卖香料的而被视作有福气，因为他不必干体力活了。[33]但此人肯定是零售商而非大商人。实际上，拉比们对贸易尤其是海外贸易并不赞许。有些拉比甚至谴责一切市场行为，转而 284
将他们的信仰固定在无需商品交换的经济组织之中。“拉比阿查·本·约西亚常说，可以把从市场上买水果的人比作什么？可以比作一个丧失母亲的小孩，他被带给其他需要喂养自己婴儿的母亲抚养，但仍不知足。任何人如果从市场上买面包，就与自掘坟墓者无异。”[34]拉布（Rab，公元 175—247 年）再三告诫次子：“来自田地的少量产出要胜过来自大桶（即货栈）的大量货物。”[35]又如，“拉比们教导说：四类谷物不会带来祝福——文士的报酬、通事的薪水、出自孤儿财产的收入与来自海外贸易的利润”。为什么提及后者？“因为奇迹不可能天天有。”[36]

这些是东方的例子。西方的情况又如何？在此，犹太人同样不是大商人。在整个帝国时代及随后的中世纪早期，犹太人与叙利亚人一样，如果他是所谓的“商人”，那他只不过是贫穷的流动商贩，仿佛蝗虫一般在罗马皇室商人的双腿间飞来飞去；又好像17、18世纪的波兰小贩，他们是当时商人们眼中的讨厌鬼。我们从中世纪早期看到的所有犹太商业状况都可以这样描述。简言之，只要贸易（尤其是城际贸易与国际贸易）依然部分是抢劫性的远征、部分是冒险活动，也就是说在现代以前，犹太人从来不是商人。

如果这点——犹太人决非一个古已有之的商业民族——能够成立，那么，那种认为他们是农业民族的观点是否正确呢？只要他们的经济组织是庄园制，这种观点就肯定正确。但这并非全部。在犹太历史学家看来，犹太人后来从事的一种职业是违背他们的意愿而强加给他们的，这种职业众所周知，他们甚至在最早的时期就已从事。我指的是放债，我将最大的重要性加于对这个事实的
285 确立之上。许多世纪的犹太经济史清楚表明，放债一直在人类经济生活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我们在犹太历史的各个阶段，无论是在民族独立时代还是在流散时期，皆可看到这点。实际上，一群务农业主是放债者的极好猎物。犹太人一直是债权人，他们从出埃及之后就是如此。在埃及，犹太人似乎是债务人；正如《圣经》所述，他们离开时卷走了贷给他们的一切：“我必叫你们在埃及人眼前蒙恩，你们去的时候，就不至于空手而去。”（《出埃及记》3：21）“耶和华叫百姓在埃及人眼前蒙恩，以致埃及人给他们所要的……”（《出埃及记》12：36）随后，这种地位发生了改变。以色列人成了债权人，而其他民族沦为他们的债务人。因此，上帝的应许得以实现，这个应许可以恰当地称为犹太经济史的座右铭，它以一句话表达了犹太民族的命运：“因为耶和华你的神，必照他所应许你的赐福与你。你必借给许多国民，却不至向他们借贷。”（《申命记》15：6）[37]

在古以色列，有关借贷体制高度发达的最古老段落出现在《尼希米记》中（5：1—7，11）：

百姓和他们的妻大大呼号，埋怨他们的兄弟犹大人。有的说："我们和儿女人口众多，要去得粮食度命。"有的说："我们典了田地、葡萄园、房屋，要得粮食充饥。"有的说："我们已经指着田地、葡萄园，借了钱给王纳税。我们的身体与我们兄弟的身体一样；我们的儿女与他们的儿女一般。现在我们将要使儿女作人的仆婢，我们的女儿已有为婢的。我们并无力拯救，因为我们的田地、葡萄园已经归了别人。"我听见他们呼号，说这些话，便甚发怒。我心里筹划，就斥责贵胄和官长说："你们各人向兄弟取利！"……"如今我劝你们将他们的田地、葡萄园、橄榄园、房屋，并向他们所取的银钱、粮食、新酒和油，百分之一的利息都归还他们。"

286

这里描述的情况十分清楚。民众被分成两大部分，一为通过放债致富的上层富人阶层，一为绝大多数被他们剥削的农业劳动者。尽管有尼希米与其他改革者的努力，但这种状态必定继续贯穿在整个巴勒斯坦与巴比伦犹太人的历史之中。我们只需翻翻《塔木德》，就能获得证据。在某些篇章中，除学习《托拉》之外，没有什么比放债占据了更多篇幅。拉比们的观念世界中充斥着金钱事务。最后一批阿摩拉之中的拉比纳（488—556 年）作出了一项规定（*Baba Mezia*，70*b*），听起来简直像确立起拉比们对放债的垄断。在三卷题为"门"（*Baba*）的篇章中，有关放债与利率升降的事例多到不胜枚举，此外还有无数对金钱和放债问题的讨论。没有偏见的《塔木德》读者只能得出这个结论：在《塔木德》的世界中，必定存在大量放债活动。

通过流散，这种活动只会不断扩大。对于公元前 5 或 4 世纪埃及流散地的犹太人如何规范放债活动，可以从藏在牛津大学的纸草文书（MS. Aram. cl. P）中窥见一斑：[38]

……亚特玛（Jatma）之子……你给我……1000 谢格尔（segel）银币。而我准备以每个谢格尔每月 2 哈鲁尔（hallur）银

287 币的利息偿还，直到我还清为止。因此，要付你的利息合计为每月2000哈鲁尔。如果有哪个月我没有支付利息，那么利息的数额会加到本金之上，其本身也会产生利息。我将从我来自司库的薪水中逐月偿付，你要给我一份收据(?)，它包括总数以及我偿付给你的利息。如果我不能在……年的柔斯月(Roth)偿清欠你的所有债务……那么你的钱就要翻倍(?)，已付给你的利息也一样，我必须逐月偿付，直到我还清为止。证人，某某某某。

在希腊化与帝国时代，富有的犹太人已开始向王公贵族供应钱财，而较穷的犹太人则借钱给社会底层。罗马人对犹太商业并不陌生。[39]前伊斯兰时代的阿拉伯人对此也不陌生，犹太人向他们放贷取利，他们视之为犹太人的天然行业，仿佛生来就有一样。[40]

犹太人最早是作为放债者出现于西欧舞台的。我们已经注意到，他们担任着墨洛温王朝的金融家，这当然意味他们主要是债权人。[41]他们在西班牙获得进一步发展，在那里他们拥有完全的行动自由，普通民众很快就欠下他们的债。在其他国家出现犹太人问题(即放债)之前很久，卡斯提尔当局就已经在处理欠犹太人的债务问题，其处理方式表明这不是小问题。[42]十字军之后，放债已成为犹太人的首要职业，这点为各方所承认。

那么，我们可以得出这个结论：从最初时期开始，放债就是犹太经济史的首要因素。

288 犹太人被迫依靠放债的神话，只是到欧洲中世纪尤其在十字军之后才真正开始，这是因为他们被排除在其他一切生计之外，而只能接受这个最后的安排。十字军时代之前两千年的犹太放债史，应该肯定能一劳永逸地终结这个神话。广受认可的看法是，犹太人就算愿意也不能从事除放债以外的任何职业，这种看法是不正确的。其他职业的大门决非一直对他们紧闭，事实是他们更喜爱放债。这点已为布赫教授对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的研究所证实，同样的研究也可用于其他城市。倾向从事这个行业是犹太人的天

性；在中世纪及之后的时期，统治者们曾努力将犹太人引向其他职业，但皆以徒劳告终。爱德华一世曾在英格兰尝试过。[43]18 世纪的波森省也试过，[44]如果犹太人愿意，当局会为他们提供津贴，以引导他们改变谋生方式。尽管如此，尽管犹太人与所有人一样有可能成为手工业者和农民，但 1797 年在普鲁士南部的城镇中，仅有 4164 名犹太手工业者，而犹太商人的数目达 1.1 到 1.2 万人。犹太人口只占总人口的 5%或 6%，而基督徒商人总共只有 1.7 或 1.8万人；一旦我们注意到这个对比，这些数据的意义便立刻凸显出来。

然而，可能有人会竭力主张，高利贷活动即使是以相当自愿的形式开展的，也不必用特别的种族属性来解释。普遍的人性足以解释这种活动。只要在有人的地方，如果一群有钱人居住在需要现金消费或生产的另一群人中，很快就会出现一个阶层成为债权人而另一个阶层沦为债务人的情况，在那些规范放债的法律条件不成熟的地区尤其会这样。

确实如此。在富人与穷人住在一起的任何地方，后者都会向前 289
者借贷，哪怕当时尚无金钱——在这种情况下债务体现为实物。在文明的最初阶段，当两个阶层感到他们彼此之间情同手足时，借贷是没有利息的。后来，特别当与外来者的交往出现后，贷方向借方支付一定数量的高出本金的谷物、油或（在货币经济已经建立的地区）金子，支付利息的习俗遂逐渐普及。

在这方面，古代、中古与现代世界之间并无不同。放债与“高利贷”在这三个世界中都有，它们从未被限制在某一种族或宗教成员的内部。比如，希腊与罗马的土地改革，就充分证明了那些国家某些时期的经济状况与尼希米时代的巴勒斯坦极其相似。[①] 在古代世界，神庙是放债中心，因为其中储藏了大量金银财宝。如果耶路撒冷的圣殿中也有人放债——这点决非可以证实，因为《塔木德》中讨论圣殿税的篇章《舍客勒》（*Shekalim*）明令禁止将某些剩

① 参见 A. E. Zimmern, *The Greek Commonwealth*, p. 111 ff。——英译者注

余的祭品用于商业目的——我是说**如果**真是如此，那么它就并无独特之处：古代世界的所有神庙都借钱。我们得知，巴比伦的神庙就与许多大型商业场所没有两样。[45]德尔菲（Delphi）、提洛岛（Delos）、以弗所（Ephesus）、萨摩斯（Samos）的神庙也并无不同。[46]中世纪的教会、修道院、各种骑士会及其他宗教机构，在这方面都扮演了古代神庙的角色。尽管教会明令反对高利贷，但它们仍是货币交易的活跃中心。今天有何不同？位于北海岸边沼泽地的德国农民凭
290 经验已得知，要想赚点小钱，没有比通过向贫困的邻居提供有息借贷更容易的事了。

通过放贷取利以增加财富的做法，是如此轻松容易，以致任何能这样做的人都会试试。在每个大量需要金钱的时期，都有足够多的机会这样做（顺便说一下，所谓的信贷危机也将定期随之出现，欧洲史上近来的信贷危机是由于迫害犹太人所致）。

因此，人人都从事它——并乐意从事它。获取利息的愿望相当普遍。但有没有能力这么做？这就把我们引到支持犹太特性稳定不变的下一个论据上——

（5）犹太人的放债能力。

众所周知，中世纪的许多当局，无论是统治者还是市政府，几乎无不恳求犹太人去他们的城市，以便开展放债。为此向犹太人提供了各种特权。施派尔的主教即是一例。他认为将许多犹太富人算作他的城市的居民，会给这座城市带来某种威望。实际上，15、16 世纪一些意大利城市曾与最富有的犹太放债人达成协议，要求他们前来创建贷款银行和当铺。[47]

为什么会有这些恳求、会提供这些特权？为什么只邀请犹太人而不邀请其他人来创办放债事务？毫无疑问，这一定程度上是因为，虔诚的基督徒不愿从事这种邪恶贸易而玷污了灵魂，所以才把犹太人招来，以代替他们接受诅咒。但这是全部理由吗？难道犹太人就没有显示出从事这个行业的特别能力？他们是最为聪明、最具天赋的放债人，这是为什么需要他们的原因。还有其他原因可以解释他们为什么能在许多世纪中获得大量财富吗？人人都可

去放债，但并非人人都能成功。因此，特别的才能和属性是必 291
需的。

翻开《塔木德》，就会发现放债并非只是犹太人的业余活动。他们将放债变成了一门艺术；高度组织化的借贷机制很可能是他们的发明，并无疑为他们所利用。

在我看来，由一名训练有素的经济学家对《塔木德》与拉比文献中的经济内容进行彻底研究的时代已经到来。我希望本书能够对实现这一目标有所激励。我这里能做的一切，不过是指明方向，以便后来者更容易上手。我会简要提及一些段落，它们在我看来见证了对经济问题，尤其是对信用方面的问题非常熟悉。我们应当记住，《塔木德》形成于公元 200 至 500 年，如果将其中包含的经济学内容与流传至今的古代及中世纪的所有经济思想和观念加以比较，一定会有不少令人惊叹的发现。有些拉比说起话来就好像已精通了李嘉图与马克思的理论，或者起码可以说，他们好像已在证券交易所担任过好几年经纪人，要么为许多重要放债案件当过顾问。下面举一两个例子。

(a) 对贵金属的属性理解深刻："拉比基什达(Chisda)说，有七种类型的黄金：普通金、上等金、俄斐金(《列王纪上》10：11)、精金(《列王纪上》5：18)、拉丝金(drawn gold)、重金(heavy gold)、帕尔瓦因金(Parvayin gold)。"(*Joma*, 45*a*)

(b) 这个观念获得了充分发展：金钱是公分母，而商品可以通过金钱交换。这方面最好的证据是这条律法规定：购买行为不随着价钱支出而结束，而随着商品被送达才结束。《中门篇》第四部分的全部内容都在阐释这点。

(c) 对生产信用和消费信用间的不同概念明确。在第一种情况中，允许收取利息，而在第二种情况中，不允许从犹太人那里收 292
取利息。"如果甲从乙那里以 10 份小麦的租金租来一块地，然后又要求乙再借给他 200 祖兹以经营这块地，并承诺以总数 12 份小麦的租金偿付——这是允许的。但是，能否在租商店或租船时给出更高租金？拉布·纳赫曼(Rab Nachman，公元 235—320 年)根据

拉巴·巴尔·阿布哈(Rabba bar Abuha)的裁决,认为租商店时有时可以给更多租金,因为能够在商店里张贴图画;租船也一样,因为能够在船上悬挂桅杆。商店里的图画将吸引许多顾客从而增加利润,而船只上的桅杆将增加这条船的价值。"(*Baba Mezia*,69*b*)

(d) 律法和实际准则体现了一种异常发达的信用协议制度。在读了《中门篇》第四、五部分后,你会觉得就好像刚读完二三十年前黑塞州一份放债调查报告一般,其中介绍了放债契约中包含的无数陷阱。关于"废除"(*Prosbol*)的律法旨在确保债务在免债之年依然存在,这是借贷高度组织化的一个标志(见《第七年》[*Sheviith*]第十部分)。

(e) 处理存款的方式显示了对这个主题切合实际的知识。"倘若有人在银行家那里存了几笔钱,且它们是绑在一起的,那么银行家就不能动用它们;但如果它们不是绑在一起的,他就可以动用,如有遗失,他要对之负责。但如果这笔钱存在私人那里,无论它们是不是绑在一起的,他都不能动用;如有遗失,他也不必对之负责。拉比迈尔(公元100—160)在这一问题上认为,一个店主应被视为私人;但拉比犹大(公元136—200)却持相反观点,认为店主就像银行家一般……"(*Baba Mezia*,43*a*)

(f) 最后,我将提及犹太人的数字天赋。所有《塔木德》学者都
293 有这种天赋,但它在更早的时代也能发现。《圣经》及之后文献中包含的精确统计清单,必定能给每个人留下深刻印象。一位法国作家就此评论道:"这个种族拥有非凡的计算才能,即对数字有天赋。"[48]

除这一切考虑外,犹太人在放债活动中的巨大成功,有力证明了他们独特的商业能力。其成功就体现于:

(6) 犹太人的财富。

可以轻易表明,一些犹太人在这个种族形成之初就已积累了大量财富;毫无疑问,犹太人的平均财富相当大。在一切时代的所有国家,犹太富人都是人所共知的。

我们可以从所罗门王开始,他的财富甚至在富有的东方统治者

中间赫赫有名，尽管他的财富并非来自成功的贸易（但这个观点也不是铁板钉钉的！）。随后，我们读到巴比伦的一些犹太流放者，他们能在短时期内向耶路撒冷运送金银（《撒加利亚书》6：10，11）。在流放期间，犹太人在幼发拉底河地区的经济生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可以从尼普尔出土的商业契约中找到证明。[49]那些随以斯拉一起回归者携带了大量财物（《以斯拉记》1：6—11），在随后的时期，祭司的富有是臭名昭著的。[50]值得注意，《塔木德》提到的拉比中有大量富人，其中一些非常富裕。把这些以财富出名的人汇编成一份体面的清单，这并不困难。当然，富有的拉比无论如何是居于多数的。[51]

在希腊化时期的流散地，不可避免的印象同样会是，犹太人相当富裕。在犹太人与希腊人混居的任何地方，例如凯撒利亚，[52]前者都更富有。亚历山大里亚也必定有数目特别庞大的犹太富人。其中有已知的非常富有的犹太长官（Alabarch），另外我们上文已提到，亚历山大里亚的犹太人担任着王室的财政官职位。

中世纪早期的情况毫不例外。我们拥有许多犹太人当时享有 294
大量财富的记录。在西班牙，他们许诺，如果里卡尔德王废除反犹法令，就给后者金钱；[53]我们知道在穆斯林统治早期，阿拉伯人羡慕他们的财富。[54]9 世纪的科尔多瓦，拥有“几千户（?）富裕的犹太家族”。[55]同样的史料还有不少。[56]

没有必要阐述中世纪晚期犹太人的富有情况，因为这个事实广为人知。[57]至于所谓的现代时期，本书已提供了足够多的例证。

因此，结论是，犹太人的财富宛如一根金线，贯穿于从所罗门王到巴内·巴尔纳托[①]的整个历史之中，而无一处断裂。这只是一种偶然吗？如果不是，那应当归之于主观原因还是客观原因？

毫无疑问，已有人暗示了客观因素即外部力量，以此解释犹太人的财富。首先，犹太人很早被告知，要从占有金钱中寻找主要的

① 巴内·巴尔纳托（Barney Barnato，1851—1897），英国犹太财阀，19 世纪 70 年代起在南非投资钻石行业。——中译者注

幸福；其次，不安全的地位迫使他们以容易移动的方式积聚财富，如金银首饰，它们容易藏匿，不费劲就能带走。这些原因无疑很好解释了犹太人财富的增长，但它们决非全部原因。我们不可忘记，上述外部力量如果要获得结果，只能对一个拥有某些特殊天赋的民族产生影响。但暂且不考虑这点。此外，举出的事实只在流散地有效。同样暂且不考虑这点。这种解释的最大缺陷在于，它只告诉我们犹太人为什么希望变得富有，并附带告诉我们，他们的财富采取了一种特殊形式。犹太人的这种希望是无足轻重的；因为财富是怎么获得的并没有搞清楚。因此，我们必须寻找其他原因。
295 此外，希望变得富有，在阿尔贝里希抢劫了仙女们的“莱茵黄金”之后就已普遍起来。①

因此，还有另一种对犹太人财富的解释。它正确指出，多个世纪以来，犹太人处于与基督徒邻居不平等的地位，因而他们花费的机会要比后者少得多。社会地位的概念，连同程度不同的舒适标准，产生了与此观念相伴的无数人为需求，但这些对犹太人而言十分陌生。一位研究这一问题的作者以最精细的方式评论道：[58]“毫无疑问，如果拿犹太人与有着同等收入的基督徒相比，肯定是前者更富有，因为基督徒拥有很多犹太人所没有的花费机会，理由很简单——前者属于统治阶层而后者只能忍气吞声。至于犹太富人，他的环境不同于那些基督徒的环境，因为他无需考虑他那个社会阶层的需求。因而，他的任何奢侈行为就未必与他的地位相一致。”

无疑，这是对犹太人财富的一种解释，也能用它解释犹太人独特的经济立场，这种立场我们已在上文注意到。与之相关的观念

① 该典故出自日耳曼古代神话《尼伯龙根之歌》：在莱茵河流经的尼伯龙根，居住着三位莱茵河仙女，她们日夜守卫着河底一块岩石，因为岩石之上镶着一块具有魔力的“莱茵黄金”（Rhine-gold）。尼伯龙根族的矮人阿尔贝里希（Alberich）想得到她们中一位的爱情，却遭到嘲笑，恼羞成怒。三位仙女不经意间透露出，谁要是能够把这些黄金做成指环，就能统治世界，但条件是他必须放弃爱情的秘密；于是，阿尔贝里希诅咒了爱情，抢走了黄金，制作了控制世界的“尼伯龙根指环”。——中译者注

是：自由竞争、收入决定支出（这是对封建社会完全陌生的概念），以及节俭有益（它从一开始就与犹太人密切相关）。让我们回想一则古老的德国谚言：

有七件事罕见：
从不唱歌的修女，
没有情人的女佣，
没有强盗的集市，
没有胡须的山羊，
不知节俭的犹太人，
不带耗子的粮仓，
不长虱子的哥萨克。

296

犹太人积累资本的习性可追溯至其节俭习惯上。有时我们能听到这种说法，犹太人的钱要比基督徒的钱在商业上更经用，且增殖更快。在过去，犹太人不能进入封建士绅令人着迷的交际圈，因而他的钱不会用于其地位要求的排场上。如果节俭的话，他的钱必定投资于商务；当然他可以将之贷出，直接收取利息，17 世纪的汉堡犹太人就习惯这样做。辜黎柯·冯·哈梅因及其朋友们一旦有任何盈余，总是以债券形式贷出。钱从而有了下家，并能增殖。

上述这些考虑都有价值，但它们在解释犹太人财富的现象上不尽令人满意。在任何问题上，它都指向客观因素。但我们不可忘记，这些客观因素对那些不以特别方式构成的男男女女不会产生特别的后果。一个民族不仅仅由于外在环境的压迫而变得节俭。只有新手才会这么认为。此外，在隔都高墙已经倒塌很久的今天，犹太人在成为土地所有者并以最严格的要求规范自己的生活上享有完全的平等——但即使如此，我仍要说犹太人今天比基督徒更节俭。看一看统计数据便可知晓。在巴登，从 1895 到 1903 年间，新教徒的资本增加了 28.3%，犹太人的资本增加了 38.2%。这已够惊人了，但更惊人的是，在同一时期，新教徒的收入增加了 46.6%，

297

而犹太人的收入增加了44.5%。

说到底，上述的可能的原因只能解释现有的财富为何增殖了。但没有人能令人满意地回答这个问题，即财富最初是怎么获得的？对此只有一种答案。对财富有天赋的人能获得它。因此，从犹太人的财富中或许可以推断出独到的犹太特性或属性。

犹太天赋是先天的还是人为的？

我们在前一部分的所有思考的结果是什么？结果就是：犹太人在人类学上的特征极有可能与其智力特性一样，历经几千年而稳定不变。

这能证明什么？我们能否据此推断犹太天赋根源于种族？那些对种族盲信不疑的人们将毫不犹豫地说是。然而，试图以科学方式探究的我们则必须说不。这什么都没证明。

简要提一提种族理论[59]的信徒所使用的一些方法，将表明他们的结论是多么不可靠。他们先预设了犹太人是个种族，再开始探究。既然每个种族必定有特性，那么犹太人就有自己的特性。换言之，他们的特性根源于其种族。但对此却没有实证。说实话，对于身体的或人类学上的特征与智能之间有何关联，我们一无所知。

种族理论家所提出的，是取代原有的犹太或基督宗教的某种新式宗教。雅利安人或日耳曼人在此世的“使命”这种理论，只不过是“选民”信仰的现代形式罢了。如果不是的话，它又能是什么？
298 这也无妨，但不要去骗人，让人以为这就是科学。这是信仰，而信仰与科学最好分开。

正如上文所说，在身体属性与智能之间并不存在明确关联。它们各自的稳定不变可能纯属偶然；这种稳定性可能在每一代重新出现，也可能在传统的帮助下得以延续。在一个像犹太人那样如此依恋传统的民族中间，这种假设看来很有可能。犹太人被迫与其他人群隔离，他们强烈热爱家庭，他们的宗教实践被严格遵守，他们每一代人都积极学习《塔木德》——这一切仿佛提供了某种机制，它可以仅仅通过教育就将某些特性代代相传。

这只是一种观点，但犹太特性仍然**可能**源自天性。这里，有人

会再次将之归结为环境。我已举出犹太宗教、隔都生活、多个世纪以来与钱打交道这三个例子，来解释具体的犹太特性。其中可能包含了一些有利于环境论的因素。但就像我已试图表明的，这些影响仅仅有可能是犹太特性的结果而非原因。

我打算在下一章中分析犹太天赋，重点会依次放在以下几点上：(1)构成犹太人起源的那些种族的最初才能，这体现在他们的生活模式之中。(2)这些不同因素是如何混合的。(3)这些才能中有哪些在犹太历史的影响下继续存在。最后，如果这些考虑仍不够的话，我们将大胆提出这个假设：(4)某些特性形成于历史进程之中。然而，我们将看到，没有必要求助于这个假设，因为前三点足以充分解释犹太天赋了。果真如此的话，结论就已经得出了：犹太特性起源于该种族的天性，而根本不是因为教育的作用。

299

第十四章　犹太民族的变迁

如果有人希望用一句话解释犹太人为什么在世界文明，尤其是在经济生活中重要，他可以说这句话：这是由于一个东方民族迁移到北方诸种族之中，而这两者间又出现了文化联合。已有人用相似的话来说古典世界（尤其是希腊）和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明，认为这两个文明是由漂泊到南方环境中的北方诸民族与当地土著居民混合而产生的。这是个卓越的假设，其中并非没有真实的成分。

但有关犹太人的论断并非只是假设，它是一个可以举出大量证据的确凿事实。我们时代的资本主义文明，是由犹太人这个闯入北方的南方民族与北方当地部族联合的产物。犹太人为商业贡献出非同寻常的能力，而北方各民族尤其是日耳曼人在技术发明上的才能同样非凡。

因此，在考虑犹太天赋及其巨大影响时，我们必须注意什么就显而易见了。无须注意犹太人是否属于闪族、赫梯人或其他什么人种，也无须注意他们是“纯种”还是“混血”，而是要注意到，他们作为一个东方民族迁移到在气候与人种上都陌生的环境中，他们的最好本领在那里开花结果。

他们是个东方民族，也就是说，他们是那些居住于西方阿特拉
300 斯山脉与东方波斯湾之间的民族之一；他们是那些住在北非、阿拉伯半岛、小亚细亚及其边境地带的大沙漠中的种族之一，这里受阳光炙烤、气候干燥；这些种族生活在独特环境中，其独到特性因之得以发育成熟，那种环境自持续了大约一万两千或一万六千年时

间的冰河时代以来就从未改变。

这整片地区——包括了犹太人的发源地——是一片广袤无垠的沙漠地带，其中零星散布着一些可供人畜居住的绿洲。众所周知，世界上最早的文明就诞生在这里较大的河谷中，即诞生在埃及、美索不达米亚与巴勒斯坦。这三者皆是相对较小的肥沃地带，堪称沙漠中的绿洲，这里孕育出的文明本质上就是绿洲文明。埃及的耕地面积大约与今天萨克森的普鲁士省一般大小（约为550万英亩，据《政治家年鉴》）；美索不达米亚的最大范围仅为伦巴第平原的一半（约为4500平方公里，来源同上）；全体以色列人居住的巴勒斯坦也较小，或许不大于巴登省（约为5000平方公里）；而南部王国所在的犹地亚，即犹太人的家园，与安哈尔特（Anhalt）、萨克斯-科堡（Saxe-Coburg）、哥达（Gotha）公爵领地加起来一般大小（约为1600平方公里）。但这些绿洲本身，尤其是巴勒斯坦，又被沙漠割裂得断断续续，犹地亚的自然环境特别恶劣。它的南部边境越过希伯伦和贝尔谢巴，直抵现代的沙漠荒地。

所有这些国家的农业都是耕种绿洲。这意味着什么？它意味着土壤几乎是由人工方式集中起来的，农民的最大目标是为植被的生长收集必要的水分。在巴勒斯坦，土壤的耕作依靠水的供应。干旱是最让农民担忧的灾难，他年年心惊胆战，生怕贫瘠的荒地不断扩张，把自己历经艰辛和磨难才照料好的那块地吞噬掉。他时刻担惊受怕，生怕沙漠给他带来灼热的空气或成群的蝗虫。最重要的是，他对沙漠荒地的担忧，是由于随后而来的抢劫团伙，他们在穿过这个地区时会抢劫、杀戮与掠夺，有时一冲动甚至将他的土 301
地据为己有。这些我们如今称为贝都因人的沙漠之子是游牧的牧羊人，而绿洲定居者曾经是贝都因人的一部分。他们的袭击加速了带有坚固城墙的城市的兴起，使平原居民得以避难其中。沙漠时不时地蔓延到他们跟前，因此他们在任何时候都满是沙漠荒地的精神。

在不安分的、流浪的贝都因人中，有个部落就是希伯来人。大约于公元前1200年，他们来到迦南，肆意掠夺杀戮，最终决定摆脱

流浪生涯而定居此地。这意味着，如果有可能，他们就不做任何事，而当地人就得为他们效力——这是每个征服者的目标。正如耶和华所应许的："耶和华你的神，领你进他向你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起誓应许给你的地，那里有城邑，又大又美，非你所建造的；有房屋，装满各样美物，非你所装满的；有凿成的水井，非你所凿成的；还有葡萄园、橄榄园，非你所栽种的，你吃了而且饱足。"（《申命记》6：10，11）

一旦来此，希伯来人在应许之地做了什么？他们建立了什么类型的经济组织？我们当然说不出细节，[1] 但还是可以想象一二。如我们所见，他们中的位高权重者，很可能在征服大片土地后建立了某种封建社会。通过实物形式的租金、收税人承包或者信用关系，他们将土地的部分产出留给自己。不管怎样，众多希伯来人居住在城镇中，从那些耕作土地的俯首称臣者那里获取租金或利息，后者可称作"殖民地居民"、"自由农"或任何东方用来称呼这一阶层的术语。征服者部落中的一些人可能陷于贫困而沦为不自由的农民，但他们绝不是有影响的人士。这种权势地位由那些居住在西
302 约旦河地区，尤其是犹大地区的西缅、利未及其他家族把持。那些地区只可能使用牛耕："犹大的牙齿必因奶白亮。"其他支派例如流便与迦得，依然待在约旦河东岸，是放牛的半游牧民，一半玛拿西支派也跨过约旦河回到那里。但所有这些支派都必定被注入了游牧精神。否则，就极难理解犹太宗教体制的兴起与发展。

不应忘记，体现犹太人宗教的《圣经》，尤其是《摩西五经》，是游牧民族的文学作品。他们那战胜虚假众神的上帝，是一位沙漠与牧人的神灵。以斯拉与尼希米通过有意识地重建耶和华崇拜而维持了游牧状态，在此过程中，他们对介于中间的农业时代熟视无睹。祭司的法典"故意不提迦南的定居生活……它将自身严格限定在旷野中的流浪时期；严格说来，它想被视为一部沙漠法典"[2]。翻开历史书或大部分先知书，以及包括《诗篇》在内的沙漠圣咏，取自牧羊生活的明喻及暗喻随处可见。只是偶尔才会遇到农民"安坐在家门口的无花果树下乘凉"。耶和华是一位出色的牧者（《诗

篇》第 23 章），他将招聚以色列的余民“如草场上的羊群”（《弥迦书》2:12）。安息年除了意味着暂时不当农民转而效仿古时的以色列人，还能意味什么？以色列从未完全放弃对家族与部落的区分；它一直由许多部落组成，正如绝大多数游牧民族一样。看来没什么疑问的是，甚至迟至公元前 5 世纪，仍必定存在数量虽少但势头强劲的游牧民，他们在统治阶级中肯定有，在人民大众中也很可能有。否则，要他们背负起一个游牧民的宗教哪怕短短一会儿时间，又如何可能呢？

还可以问，那时的游牧习性是否可以追溯至更早的时期？之前 303
几个世纪已休眠的原有流浪本性，有没有可能在巴比伦之囚的影响下再度苏醒？这是相当可能的，而且，犹太民族自巴比伦之囚以来的变迁，只能唤起他们沉睡已久的对沙漠与游牧的情感。关于这点，我将给予特别强调。因此，即使我们倾向于假设以色列人在征服迦南之后过了五百年的定居生活，但很显然，所有力量似乎合谋不让这种状态持久下去。植物（只要能在如此炎热的地区）一旦扎根，就很难再将它拔出来。犹太人与生俱来的“游牧性”或“沙漠性”（Saharaism，如果我可以造一个词的话），通过选择与适应一直保有生气。因此，经过了多个世纪，以色列人仍然是个沙漠与游牧民族。

这个结论并无任何新颖之处。但要得出这个结论，并非没有一些良心上的顾虑。为什么？因为反犹小册子的作者们粗鲁地抓住这点，对它滥加利用，从中捞取资本。但是，我们不能因此而怀疑它的真实性，也不能因此而不承认这是对犹太特性的一种解释。要反驳这些有偏见的蹩脚文人，就需要对这个问题做最仔细的分析，并对其重要性提出一种有启发的观点。迄今为止，这方面几乎没有取得什么成绩；已有的分析要么天真幼稚，要么恶意歪曲。难怪有人会轻视和嘲笑犹太人一直是游牧者这个观点。如果这些人能够证明这个观点是错误的，那么这将会切中要害；然而，尚未有人在这方面严肃尝试过。有种推论是这样的：古代巴勒斯坦地区务农，犹太人当时生活在巴勒斯坦，因此犹太人都务农。这种推论

光从表面上看就不太充分。另外还有一种观点。游牧一词并无辱
304 骂或丢脸之义，要反对最多就是反对抢劫。但为什么会把耻辱与一个勇敢的贝都因部落——它有强悍的领袖（比如大卫王）统帅并以劫掠为生——联系在一起？为什么他们要比非洲某个荒野地区的黑人农业部落更不值得尊敬，或者获得更少同情？显而易见，我在把“游牧”一词用于后来的犹太历史时，并不想用此词随时间流逝而获得的衍生意义，而是继续用它所有质朴清新的原始内涵。

在适当澄清之后，现在让我们试图证明我们这个结论是正确的：在所有时期，通过选择或适应的过程，以色列人一直是一个沙漠与游牧民族。

上文已经提到巴比伦流放对唤醒沉睡已久的游牧本能所产生的可能影响。说实话，我们对巴比伦流放的意义——无论是对产生流放的历程还是返回家园——并没有形成清晰的概念。唯一看来可能的假设是，犹太人当时仍处于游牧或半游牧状态。我们几乎无法设想一个农业民族的征服活动，但是，游牧部落的强制性迁徙在今天并不陌生。[3] 而且，这个假设似乎得到巴比伦之囚的情况所支持：“（他）又将耶路撒冷的众民和众首领，并所有大能的勇士共一万人，连一切木匠、铁匠都掳了去，除了国中极贫穷的人以外，没有剩下的。”在巴比伦人的第二次远征之后，“护卫长留下些民中最穷的，使他们修理葡萄园，耕种田地”（《列王纪下》24：14，25：12）。《耶利米书》中的相关段落（39：10）与此基本一致。

不论流放者身份如何，真正的务农者不在其列，这点可以相当肯定。甚至在第二批流放者被作为俘虏带走后，他们仍然留在原地。《耶利米书》中的段落为我这个观点提供了可能性：土地由不自由的隶农耕种，一旦他们的领主被掳到巴比伦，他们就成了独立
305 的庄稼汉。将这些人视为希伯来人之前所征服地区的原住民的后代，并非过分的假想。因此，从巴比伦之囚开始，较之巴比伦的流放者，犹地亚人口的血管中流淌着更少犹太血液，因为前者基本是犹太贵族，是民族的精华。这种观点其实后来获得了流行。甚至在犹地亚本土，人们也承认巴比伦犹太人的人种最优良。一句古

老的犹太谚语有助于证实这点："就血统而言，罗马时期流散地犹太人之于犹地亚犹太人，就仿佛混合的面团之于纯正的面粉一般；而与巴比伦犹太人相比，犹地亚犹太人又不过是混合的面团。"[4] 拉比以西结（公元 220—299 年）为老好人以斯拉返回巴勒斯坦的行为如此辩解：他把巴比伦犹太人中出身有问题的家庭一并带走了，这样剩下的那些家庭就不会再有与他们混合的危险了（！）。[5]

因而，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巴比伦流放是一种选择过程，通过它，犹太人中的最优部分——他们从不喜欢定居生活的经济——被迫复苏了他们天性中的游牧本能，开始作为城镇居民（即商人）谋生。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中间没有人成为庄稼汉。远非如此。有些人致力于务农，这从《巴比伦塔木德》中来看是确凿的，但情况必然是巴勒斯坦流行的那种情况：富有的贵族居住在城镇里，依靠农民（非犹太人？）劳作。无论如何，我们对当时典型的社会形势的印象就是如此。但也有例外。我们不是也读到许多古代的拉比在犁过的地里走吗？但重要的是，巴比伦流放地的普遍情况绝非是例外。相反，它们是常态。甚至在流放之前，许多犹太人就以自愿流散的形式定居在埃及与其他地区。毫无疑问，在这些离开巴勒斯坦的人身上，古老的游牧本能尚未完全消逝，而他们自我招致的流放只是再次唤醒了这种本性。我们发现，这些无论是起源于犹地亚还是巴勒斯坦的流浪犹太人，从未像绝大多数其他移民那样创建各 306
类农业殖民地或独立定居点。相反，这些分散到世界各民族之中的犹太移民，更愿意定居于大城市，并在那里寻找生计。[6] 我们从未听说他们像今天的瑞士、匈牙利或意大利移民一样，在攒足了钱财后返回故土。将他们与故土联系起来的唯一纽带是宗教。如果他们也曾返回故土，只是在每年逾越节朝圣之时，正如真正的游牧者一样。

巴勒斯坦渐渐不再是犹太生活的中心，而犹太人的散居越来越扩大。甚至迟至第二圣殿被毁（公元 70 年），流散地的犹太人在数量上已经超过了犹地亚的犹太人。这或许事出有因。这个国家即使在人口最稠密时，也只能维持一百多万人，到 150 万人就几乎不

可能了。(今天最多有 65 万居民。)至于犹地亚,其居民不超过 22.5万,耶路撒冷不超过 2.5 万。[7] 在公元之初,巴勒斯坦之外的犹太人口,数量定已更多。据说在托勒密时代的埃及,700 万或 800 万的总人口中,犹太人占了 100 万。[8] 埃及在这方面并非特例。根据约瑟夫斯引自斯特拉波的话来说,其实很难找出一个没有犹太人居住和控制(!)的地区。斐洛列举了他那个时代拥有犹太人口的国家,又补充说他们居住在欧洲、亚洲、利比亚、大陆与岛屿、边陲与内陆的许多城市中。我们从一份写于公元 2 世纪末的西卜林神谕中听到了同样的情况,[9] 而哲罗姆告诉我们,"从大海到大海、从不列颠到大西洋、从西方到南方、从北方到东方的整个世界"都发现了犹太人。[10]他们在罗马帝国早期的罗马城的密集程度,从希
307 律王造访帝都的叙述中可见一斑,我们得知不下于 8000 名罗马城的犹太居民陪伴希律觐见奥古斯都。而且,公元 19 年,4000 名适合服兵役的释奴因"信仰埃及人与犹太人的迷信"而受罚,被流放到撒丁岛。[11]

例子够多了。无论在前基督教时代的流散地有多少犹太人,当第二圣殿被毁之时,以色列人已经散布于地球的表面,这是确凿无疑的。[12]在中世纪,这群拥挤奔忙的人并非静止不动,犹太人一直快速流浪着。这也是确凿无疑的。

向哪里流浪?在大约 5 世纪末,巴比伦人去楼空之后,犹太人先是慢慢地、再加速迁往世界各地——阿拉伯半岛、印度与欧洲。在 13 世纪,他们从英国、法国与德国流出,部分流向比利牛斯半岛,这里已有来自巴勒斯坦与巴比伦的大量犹太人;部分流向东欧国家,那里同样不乏犹太居民,他们早在 8 世纪便从拜占庭经黑海而来此定居。然后,到中世纪末期,一方面是西班牙与葡萄牙,另一方面是俄罗斯与波兰,成为东方以外两个最大的犹太聚居区。流浪从这两个阵营中再次出现,上文已提及这个过程。首先是西班牙犹太人的流浪,然后在 17 世纪哥萨克人的集体迫害后,俄国犹太人开始流散到世界各地。从俄国与波兰迁出是个稳定的过程,直到 19 世纪末,一场火山般的喷发才导致成千上万犹太人前

往新世界寻求避难。[13]

因此，这个民族被不断来回驱赶。作为一个流浪部落，其命运在“永世流浪的犹太人”的传说中得到了生动的表达。[14]时常不安全的处境，让他们想不到在土地上定居。但事实上，他们对这种方式很少有任何偏好。我们所知道的关于流散地犹太生活的一切情 308
况，都指向这个结论：只有微不足道的犹太人务农，哪怕在那些他们没有遇到困难的地方也是如此。或许，16 世纪的波兰是最好的例证，犹太人似乎在那里务农。但即便在波兰，他们也更偏好城市生活。这一时期的波兰城市中，与每 500 名基督徒商人对应的，就有 3200 名犹太商人。[15]

是的，他们成了城镇居民，是出于自愿还是环境压力并不重要，反正他们以后一直都是城镇居民。今天，世界上一半以上的犹太人生活在超过 5 万居民的城市中。在德国犹太人中，这个比例大约为 43.6%（1900 年），在意大利、瑞士、荷兰与丹麦大约为4/5，在英国与美国则为百分之百。

现代城市充其量不过是一片巨大的沙漠：与沙漠一样，它远离温暖湿润的土壤；与沙漠一样，它强迫其居民成为流浪者。多个世纪以来，犹太人通过适应新环境，其原有的游牧本能被重新唤起，而选择的原则只有助于增强那些本能而已。显然，犹太人经历了不断的变迁，他们当中更容易幸存下来的人，不是那些倾向于舒适安定生活的农夫，而是那些拥有强大游牧本能的人。

这个热血而躁动的民族，在旷野中流浪了不只四十年，而是四千年，才最终来到它的应许之地迦南，理因可以在此安顿下来。换言之，犹太人匆匆忙忙，从一个绿洲赶往另一个绿洲，他们来到北方国家，遇到这里定居在土地上、嗅着泥土气息的诸民族，他们与这些民族之间的差别，就像阿登高地温驯的马[①]与暴躁刚烈的阿拉伯战马之间的区别一般。

---

① 阿登高地（Ardennes），位于法国北部、比利时东南部及卢森堡北部。——中译者注

北欧、中欧与东欧各民族是否被称为“雅利安人”或其他名称
309 无关紧要。不错，最新的研究似乎表明，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其实是雅利安人。[16]但这个名称什么也未能告诉我们。重要的是，它们都是来自寒冷北方的民族，适应不了南方温暖的土地。[17]将他们视为雅利安人是会误导人的。因为这样一来，我们必须将肤色黝黑的印度人包括在内，而白肤金发碧眼的欧洲人显然和他们几乎没有共同之处，或许他们的语言除外。在其他方面，欧洲人有着属于自己的鲜明特色。这些特色只要看看今天的这些民族，就可轻易辨认出来。如果我们只用一个词概括这些特征，那就是与沙漠相对的“森林”。森林与沙漠确实是归纳许多国家及其居民之不同的两大对立物。森林属于北方——北方森林有潺潺的溪流和薄雾笼罩的树干，蟾蜍生活在“阴暗的青苔与潮湿的石块”上，冬日暗淡的阳光在白霜上闪闪发光，夏日鸟儿的歌唱随处可闻。当然，黎巴嫩高地上也有森林，就像今天南意大利有森林一般。但任何人只要踏入过南方的森林，就能立刻察觉它与北方森林相似度很小，就能立即意识到“即便在意大利，这里的森林与阿尔卑斯山或波罗的海岸边的森林之间的不同，是可见、可感的。南意大利的森林，静谧美好，里面阳光明媚，透出一股莫名的忧郁，树枝柔韧但茂盛地冲天生长，又在瑟瑟风声中弯曲；它看上去像一处异教神灵的圣所”（赫恩语）。但我们北方森林具有的魅力与神秘，让人感到既亲切又可怕。沙漠与森林，沙石与沼泽——这些两两对应之物，说到底取决于空气中水分的不同，并由此为人类活动创造了不同的环境。大自然的标志在前者那里是海市蜃楼，而在后者那里是云雾水汽。

在古时候，北方的气候特征要比今天显著得多。罗马人笔下描
310 绘的日耳曼，向我们展示了一块蛮荒之地，满是沼泽与密林，此地天空阴沉，空气潮湿，雾气弥漫，到了漫长的冬天则狂风大作。几千年来，许多民族和种族（我们的先辈们）居住在冰雪雨雾的潮湿树林和沼泽之中。他们砍伐树木，辟出居住地，搭建营帐，在开荒中斧和犁发挥了重大作用。从一开始，他们似乎就植根于土壤中；从一开始，耕作似乎就再未停下。即便我们将这些北方民族想象

为“游牧的”，他们也有一种与贝都因部落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我们感到，他们与定居生活的关系，要比绿洲中的农业民族与这种生活的关系更紧密。北方人哪怕只以放牧为生，依然是定居者；而贝都因人即使耕种土地，依然是游牧者。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在于，生活在北方的人要比生活在热带国家的人更亲近自然。哪怕像猎人那样砍伐树木、像牧者那样为羊群从灌木丛中开辟道路，人也是自然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即使冒着被人嘲笑为现代神秘主义者的危险，我仍然认为，在北方，自然与甚至最平凡的人之间也有爱与友谊的亲切纽带，而南方人对此一无所知。在南方，正如正确观察到的，人们仅将自然视为实现文明的工具。即使南方人耕种土地，他对自然仍是陌生的。南方没有乡村生活，人们不在自然中生活，也不与自然一起生活，对灌木与树林、荒原与草地、野兽与飞鸟没有依恋。

不同的环境必定产生不同的结果，从而必定以不同的方式影响人类，这难道还不清楚吗？上述的犹太特性不但受到几千年旷野流浪的影响而且甚至从中获得独特印记，这一假设难道过分吗？答案当然是肯定的，如果我要在接下来力图证明这点，那么我必须承认，当前的生物学知识还不足以揭示环境**如何**对人的解剖学和 311
生理学特征——因此也对其心理倾向——产生影响。胡安·瓦尔特·德尚·胡安的研究已为我们要探究的这方面内容指出了方向，这位16世纪西班牙杰出的医生上文已提及，他在其绝妙著作《人类智力考察》(*Examen de ingenios para las ciencias*)中，通过犹太民族的变迁而从生物学与心理学的角度对犹太特性给出了解释，堪称这方面的首次严肃尝试。这位深刻的思想家对某些人类选择问题的处理在当时是非凡的，他的思想在我看来不应湮没无闻，因此，我将它们述要如下。[18]

瓦尔特提到使犹太人成其为犹太人的四大原因：(1)一个炎热气候。(2)一块不毛之地。(3)该民族在四十年旷野流浪时期的独特食物：他们以吗哪为食，饮用水极其纯净，呼吸的空气非常稀薄。在此环境之下，(正如亚里士多德已经指出的)，新生儿容易变得才

智敏锐(*hombre de muy agudo ingenio*)。(4)"以色列子民一进入应许之地,就面临诸多困难、匮乏、劫掠、征服与各种灾祸,在这种悲惨状况的影响下,他们的智力天赋中多了一份火爆、干燥、炎热的气质。……持续的忧郁与无尽的不幸一起造成血液集中在大脑、肝与心脏之上,血液消耗与燃烧的过程随之发生……这就产生了许多烧过头的黑色胆汁(*melancolia por adustion*)。几乎所有犹太人如今仍然拥有大量这种黑色胆汁,而它导致了……精明、狡诈、刁难与恶毒(*solercia*, *astucia*, *versacia*, *malicia*)。"瓦尔特接着驳斥了这个反对意见,即犹太人在三千年中很可能丧失了以吗哪为食时代获得的特性,他认为某些习性一旦进入身体,就变成第二天
312 性,并遗传了世世代代。但他也愿意承认犹太人的精明程度已大不如前的可能性。

这位马德里医生所达到的深度,我无法将读者带到那里。除了未经证实的理论,我们在那里一无所见。因此,我们应当脚踏实地,满足于指出犹太心理特性与犹太民族变迁之间的关联。

我们已看到,犹太人的智力是他最引人注目的属性,该属性包含了许多其他属性。这点很容易解释,只要我们想起,从其历史的开端起,当他们在静静的河边照看畜群时,犹太人就从来不需要干艰苦的体力劳动。亚当与夏娃被逐出伊甸园时受到诅咒——人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但如果我们只根据字面意义来理解这一诅咒,并将心理不安或焦虑排除在外的话,那么犹太人在任何时期都没有被它所累。牧羊生活需要细心、合作与组织,而后来犹太人从事的一切职业(是自愿还是被迫从事并不重要),尽管需要付出许多脑力,却几乎无需体力劳动。回溯我们中间大多数人的家庭史,两三代之前都用过耕犁、铁砧或纺车。但犹太人并非如此。多个世纪以来,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从未当过农民或工匠,从未生产过什么东西,而只当思考者——脑力劳动者。因此只能设想,随着时间发展,某些天赋与能力便在他们中间发展起来。考虑到犹太人的这种生活模式,只能从中推断出一种非同寻常的智力。

但还不止于此,这种独特的犹太智力是与多沙多石的沙漠结合

在一起的。犹太人是理性的，热衷于抽象事物。我们会再度想到沙漠与森林、南方与北方之间的对立。炎热干燥国家的山水轮廓鲜明，灿烂的阳光和厚重的阴影，繁星照耀的清夜与低矮的植被——难道这一切不都可以归结为“抽象”一词吗？与之相对者当 313
然是具体，比如北方的一切，那里水流充沛、山水多样，富有大片树林和田野，泥土散发着芬芳。天文学和算术首先出现于有着朗朗清夜的热带地区，然后在通过畜牧追捕学会记数的民族中得到发展，这难道是偶然吗？我们能把发明楔形文字[19]的苏美尔人设想为北方民族吗？或者另一方面，在雾蒙蒙的北方犁耕的农民或者在森林中追鹿的猎人，我们能想象这两者中的任何一个可以设想出抽象的数字概念？

理性思考与寻找原因也是如此。这也将我们引向南方世界，这里的植被是人工培育而非自然生长的，永不安全的游牧生活是生存的主导因素。与之相反，传统上认为，北方农民有着舒适、安全及宁静的生活传统，他周围又有着多雾的神秘环境。较之南方死气沉沉的植被环境，对生命和成长的感激之情更能在北方丰盛繁茂的自然中发展起来，至少能发展得更为自由，这并非是完全不可能的。而沙漠（城市也一样）让人丧失了与丰饶的大地母亲的联系，摧毁了他与一切鲜活事物交流的情感，折断了他与动植物间休戚与共的纽带，也就削弱了对自然有机体的一切真正理解。另一方面，城市使人的智能更加敏锐，能促使人去寻找、去探究、去组织、去安排。时刻保持警惕是游牧者的天性，而命运把被迫时刻保持警惕强加给了犹太人——让他们不断注意到事物的新可能、新目标、新组合；一言以蔽之，让他们带着某种目的来安排生活。

犹太人善于适应且灵活多变。如果他想在生存斗争中存活，适 314
应性与灵活性都是游牧者必备的基本品质。而定居的农民根本用不上这些德行。“沙漠生活的法则要求人与财产都有最大限度的灵活性。骆驼与骏马必须能够将游牧者及其财产快速转移，因为他的储备品并不充足，很快会耗尽。此外，他必须能够以闪电般的速度逃离敌人发动的攻击……即使在一般情况下，这种灵活性也

要求部落领袖具有一定的组织才能。”[20](耕地者则无需这些。)“与游牧者的长矛、弓箭和快马相比,耕犁和公牛显得十分懒散。”[21]拿农村与城镇相比,也是如此。回到犹太人的历史,我们就能留意到,从他们跨越约旦河的那一刻起直到今天,城镇在他们中间产生了一种高度的灵活性。

因此,游牧者与炉边定居者之间的对比一直存在,而这种对比可以这样归结:前者决心要实现某个目标,而后者乐于为有价值的对象而劳动。就犹太人而言,几千年的流浪让他们发展出游牧特性。在他们的整个旅途中,应许之地一直在前方;它一直是即将达到的、有待实现的,是他们一直期待的,如同一位不以流浪为乐的旅行者。当下越是令人无望,未来提供的祝福就越丰厚;过去的一切都被视如泡影,一切现实都没有内容,一切行动都没有意义,而只有行动的结果——即作为目的来说的成功——才有价值。在这一系列倾向中,对结果的强调很大程度上导致将金钱用于借贷,或更确切地说,用于整个资本主义关系。犹太人对行动结果的看重,可能同时是他们的资本主义事业的因与果。

为了实现某种预定目标,不仅要有灵活性,还必须有大量的体
315 能与智能。犹太人的第一批祖先必定拥有大量的能量,而居住在北方各民族中间只会增加这种能量。显而易见,与北方的接触完善了犹太人的固有力量。只需比较他在北方和南方分别取得的成就,就会发现这个论断真实不虚。这个民族的南方起源已经让他们拥有了身体和精神能量,而这种淘汰不合格者的选择过程只会让他们的这种能量更多。

这两种类型的民族具有不同的精神,相应地,它们各自的表现形式也不同。水流、林木与芬芳的泥土有自己的童话、神话与歌谣,沙漠与绿洲也一样。探索这个次要问题,尽管会令人愉快,但我们这里只能点到即止,下面必须转而考虑与各民族相关的不同经济体制。

说到底,经济上的不同,可追溯至游牧生活与农耕生活、沙漠生活与“森林生活”(Sylvanism)之间的对立。从树木被砍伐、沼泽

被排干、土壤被犁耕的地方，产生了资本主义时代之前的欧洲占主导地位的社会经济组织——封建的庄园制；它依赖于这些观念：只应当为消费而生产，每个人都应当有地方劳动，每个社会都应当有身份地位的差异。农民与其邻居的财产被严格区分开来，这突出了每个人活动空间有限的观念，突出了“将他召到庄园上令上帝愉悦”的观念；他将留在那里，以传统方式劳作。

从无尽的沙漠荒地中，从游牧追捕中，出现了一种对立的生活方式——资本主义。它没有限定每个人的经济活动，这种活动仿佛饲养员（牧羊人）的经济活动一般，拥有广阔无限的视野，以致今天的劳作到了明天就被废除，并用短短几年时间就让家畜数量翻十倍。牛羊繁殖迅速，但会由于饥饿或疾病而大批死亡。因此，只有 316
在牧羊人而绝非农民的职业中，获取利润的观念才能扎根，无限生产的概念才能成为现实。只有在牧羊人的职业中，这个观点才能成为主导观点：在经济活动中，商品的抽象数量是重要的，而它们合不合适、够不够用反倒不重要。只有在牧羊人的职业中，计算才成为首要的必需品。此外，理性主义也在此发挥了作用，而正如上文所见，理性主义与游牧生活不可分离；因此，“游牧主义”（Nomadism）是资本主义先驱的说法并不为过。资本主义与犹太教之间的关联由此而更加清晰。

尽管沙漠与流浪对犹太特性产生了不小影响，但它们却不是塑造犹太精神的仅有因素。还有其他一些因素，其影响虽不如前者，但可作为它们的补充。

首先是金钱，犹太人是金钱的监护人。金钱在他们的本性上留下了印记，但同时又与之协调一致。因为在金钱中，构成犹太精神的两大因素——沙漠与流浪、沙漠主义与游牧主义——联合了起来。金钱与犹太人的发源地一样，毫不具体；金钱只是一团团、一块块的，像畜群一样；它是流动的；它很少像花草树木一样扎根于沃土之中。犹太人时刻关心金钱，这使他们不去关注质量的、自然的生活观，而是去关注数量的、抽象的概念。犹太人领会了藏在金钱中的一切奥秘，并发现了它的神奇力量。他们成为金钱的主人，

并由此成为世界的主人——正如我在本书第一章中力图描述的。

是他们主动去寻找金钱的？还是一开始是被迫去找、后来才渐渐适应了这个陌生事物的？这两种解释看起来都很有道理。

在一开始，大量钱财看起来几乎是自然而然就流入了他们的财产之中；或者更准确地说，他们一开始得到了大量贵金属，后来又
317 将之转变成货币。我相信从未有人指出过这个事实：早在列王时代，巴勒斯坦便已囤积了大量金银。我们得知，大卫从其掠夺性远征中带回大量金银，更不用说他收受的贡物是金银。“约兰带了金银铜的器皿来，大卫王将这些器皿，和他治服各国所得来的金银都分别为圣，献给耶和华。”（《撒母耳记下》8：10—11）

在我们读到的许多故事中，金银被用于会幕和圣殿的建造，数量之多，近乎难以置信，“王在耶路撒冷使金银多如石头”（《历代志下》1：15）的说法显然不夸张——可以说肯定不夸张，只要我们记起关于这个主题的精确统计信息。所罗门王航行到俄斐的船只，必定在当时打开了一座真正的加利福尼亚金矿。难怪先知以赛亚感叹“他们的国满了金银，财宝也无穷”（《以赛亚书》2：7）。

所有这些贵金属后来怎样了？《塔木德》中的拉比们思考了这个问题，并得出它们仍在以色列的结论。“这是拉比亚历山德拉教导的。有三件事物将返回它们原来的地方：以色列、埃及的钱财（参见《出埃及记》12：35；《列王纪上》14：25）与约柜的法版。”[22]当然，很难举出比这更令人信服的证据了。即使如此，重点仍是，早在犹太史的早期阶段，以色列就囤积了大量贵金属供应。而来自世界各地的钱财多个世纪以来又不断加入进来。我们一定不能忽略这股涌向巴勒斯坦的财富之流，它部分来自交给圣殿的税、部分来自虔诚朝圣者的供品。西塞罗（*pro Flacco*，c. 28）曾哀叹，每年有大量钱财从意大利与各行省运往耶路撒冷。这两种渠道必定带来不少收益，这可从一些有趣的事例中看出。例如，密特拉达提强
318 占了 800 塔兰托的圣殿税，将之存放在科斯岛（Cos）。西塞罗提到弗拉库斯（Flacus）在半途截获了小亚细亚四座城市（阿帕梅亚[Apamea]、拉奥迪齐亚[Laodicea]、帕加马[Pergamum]与阿德拉米

提姆[Adramyttium])运往耶路撒冷的钱财，仅仅来自阿帕梅亚的战利品就达黄金100磅。然后是这些朝圣者们！他们的数目必定极其庞大，尽管不太可能有约瑟夫斯记载的270万人之多，而耶路撒冷当时也不太可能有380座犹太会堂供这些来访者歇脚。但可以肯定，这些朝圣人群就好比蓄水池，钱财从中流向四面八方，许多人必定变得富有，因而能够放贷取利。或许可以取祭司为证：我们得知，他们通常获取了大量神职款项，也不讨厌从事小额放债业务。[23]

下一个重要问题是，犹太人是否发现了金钱的秘密力量？借贷机制是他们创立的，还是他们从巴比伦人那里学来的？现在看来相当确定的是，在犹太人抵达巴比伦之前，钱财就已在当地自由流通，尽管我们在放债发展的规模上没有任何有价值的细节。或许，犹太人从事货币活动的种子，是与其近亲巴比伦人的这种种子一道萌芽的。在这两个有亲缘关系的民族当中，谁率先结出金色果实，这不大重要。重要的是，后来的事件将放债强加于犹太人身上，让他们成为这一领域的行家。由于不停的流浪令他们有必要将财富随身携带，还有什么比钱和珠宝更合适此目的的？被扫地出门时，金钱是他们唯一的伴侣；被迫害者压榨时，金钱是他们唯一的保护者。因此他们学会了爱钱，发现只有通过钱的帮助，才能征服世界上的强权。金钱成为他们——以及通过他们的全人类——无须自身强大就可操纵权力的方式。一个在社会上无足轻重的民族，用放债的细线将封建巨人绑了起来，正如矮人们 319
(Lilliputians)对格列佛(Gulliver)所做的那样。

关于金钱作为犹太人发展中的一个因素，已说了太多。我现在转向另一个因素，有人认为它更加重要。我指的是隔都。

毫无疑问，隔都以一种很独特的方式影响着犹太人的社会地位：它使他们成为受人鄙视的贱民。甚至在今天，大部分隔都犹太人在社会上属于较低阶层，他们信仰上的同胞也这么认为。在他们历史上的某个时期，隔都犹太人与其获得解放的同胞之间的对比，可以从塞法尔迪人(西班牙犹太人)对待阿什肯纳兹人(德国犹

太人)的态度中得到具体表达。前者看不起后者,视他们为讨厌、难缠的乞丐。约 18 世纪中期(当时这两大群体之间的关系最紧张),一个德国犹太人写信给他葡萄牙的一位教友,字里行间透露出辛辣讥讽的语调:[24]"先生,我明白除了宗教仪式外,葡萄牙犹太人与德国犹太人之间毫无共同点;就社会生活而言,两者的教养与举止截然不同。我也明白,两者之间的亲密关系是个非常古老的传统,而高卢人弗辛杰托里克斯和日耳曼人阿尔米纽斯与希律岳父之间的关系,要比你与以法莲之子之间的关系更近。"塞法尔迪犹太人平托在其对伏尔泰将犹太人作为一个整体加以攻击的著名反击中,用了类似口吻。[25]平托急切地想表明,西班牙犹太人不应与德国犹太人等量齐观,他们是两个不同的民族。他写道,"一个伦敦犹太人之于一个君士坦丁堡犹太人,就像后者之于一个中国官吏,两者之间几乎毫不相似。一个波尔多的葡萄牙犹太人与一个梅斯的德国犹太人之间毫无共同之处"。"伏尔泰阁下不能忽视葡萄牙和西班牙犹太人不与其他国家犹太人相混合(通过婚姻或其他方式)的微妙顾虑。"平托继续说道,如果一个荷兰或英国的塞法
320 尔迪犹太人娶了德国犹太女人为妻,他的亲戚将与他断绝关系,他死后甚至不能葬入家族墓地。

这种对立常常可以找到具体表达,在塞法尔迪人那里尤其如此。他们自视为犹太人中的贵族,担心自己的社会地位会因为更东部地区犹太人的到来而受到威胁。因此,1761 年,波尔多的葡萄牙犹太人(或马兰诺)成功让一项法令生效,它规定所有外来犹太人必须在十四天内离开该市。平托与佩雷拉是此事的主要推动者,他们尽一切努力摆脱这些"流浪汉"——摆脱他们来自德国与法国的教友。[26]在汉堡,塞法尔迪人取得了高于德国犹太人的官方地位;后者必须向前者保证,不从事任何可疑的商业活动。

塞法尔迪人与阿什肯纳兹人相互嫌恶,前者尤其讨厌后者,其原因可以从他们各自所处的不同社会地位中寻找。但毫无疑问,塞法尔迪人那显著的贵族意识强化了这种厌恶感,他们认为自己比阿什肯纳兹人的来源更纯正、血统更高贵,他们的门第自豪感自

定居比利牛斯半岛以来就一直激励他们高贵地行事，由此防范一切卑下之事。[27]

在此我们可能已触及有助于评估隔都对犹太生活产生真正影响的地方。或许，西班牙与葡萄牙犹太人所秉持的“贵人行为理应高尚”（*noblesse oblige*）的观念——其目标是实现最高美德——能够解释他们当中为何没有隔都的原因，且没有必要将这种观念视为隔都生活的后果。换言之，一部分犹太人过着隔都生活，是出乎他们的本性。为什么有些人继续在隔都中生活，而另一些人很快把自己从中解放出来，这是说不清的。我们没有充足的材料说明这种选择。我们也无法毫不犹豫地断言（尽管许多证据似乎这样表 321
明），塞法尔迪人代表了犹太人中间社会选择过程的结果。但是，他们经历的不同变迁可以归咎于他们的不同本性，这并非是过分的假设。然而，一定不能过分夸大这些不同。它们几乎影响不到他们的犹太性。无论是塞法尔迪人还是阿什肯纳兹人，他们仍然是犹太人。但在阿什肯纳兹人那里，隔都生活导致了一直与隔都犹太人紧密相连的某些习性，并常常影响了他的经济活动。在某种程度上，它们属于社会下层的普遍习性，但犹太人由于其独特的气质而背负了奇怪的特征——例如小欺小骗、莽撞冒失、缺乏个人尊严、缺心眼。犹太人在攻克封建经济堡垒时，这些特征必定起了一定作用，从上文中我们已看到它们起了哪些具体作用。

但这些外部特征不能被过分夸大。在与犹太人的社会交往中，它们可能对这人或那人来得重要；但在考虑犹太经济成就时，是否应当看重它们，对此我们持怀疑态度。毫无疑问，犹太人仅仅凭这些习性是无法在世界上赢得主导地位的。

隔都生活的另一方面影响更大。我指的是它让与生俱来的犹太特性更突出、更片面。如果这些特性源自定居生活在犹太人中的缺乏，正如上文已观察到的，那么隔都显然只能强化这种缺乏。但它已经在那里了，已经内化于犹太人之中。

隔都通过突出和强调宗教与近亲繁殖这双重力量，而在另一方向上产生了同样的影响，这对力量促成了犹太特性的稳定不变。

一个民族的宗教当然是其灵魂的表达，这是本书迄今为止所一
322 直采纳的观点。尽管如此，像犹太教这种专注于形式主义的宗教，必然对其信徒产生强大影响，这在统一他们的生活并赋予他们共同的印记上尤其如此。我们已经探讨了这是如何表达的，这里我只想提醒读者注意其理性化倾向。

与宗教一样，生理因素也使犹太特性稳定不变，这两者高度类似，并强化了犹太人已经实践了数百年的近亲繁殖。

我刚刚谈到犹太人的近亲繁殖与宗教高度相似。有人会更进一步，认为它是犹太教核心观念——拣选观念——的直接后果。最近一系列研究已论证了这点，其中最好的或许是阿尔弗雷德·诺西格的研究。他这样写道：[28]“拣选观念一个惊人的生物学后果是，犹太人的存在及其繁殖能力尚未削弱。摩西关于‘一个永恒民族’的概念看来正在自我实现。”饮食法与婚姻法是延续这个种族的保障。“这些最有价值的伦理学财富，当然是用来保护犹太人，让他们不会因为与草草养大的种族通婚而招致毁灭。禁止通婚使种族文化中的至高因素——遗传——保持了其最原始的力量，并使前已提及的种种优点不仅稳定不变，而且代代增加。”“因此，近亲繁殖使犹太人的遗传特征变得如此显著与强烈，以致想要以通婚来取代它们都困难重重。因为它已证明了，遗传的强度与其他一切器官的功能一样，是通过不断实践而被强化的。”[29]

多个世纪以来，宗教与近亲繁殖是束缚犹太民族、使之联为一体的两个铁圈。这些铁圈一旦开始松弛，后果将会如何？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它也并非我为自己设定的任务。因为只要我们发现，
323 犹太人对经济生活施加了他们的特别影响——他们仍在施加影响——就可以认为这些铁圈仍然坚固。在本书中，除了考虑这种影响，除了揭示使之成为可能的犹太天赋的起源，我别无企图了；毕竟，这种影响无论在经济生活中，还是对于整个现代文化，意义都如此重大。

注　释

缩略语

Monatsschrift = *Monatsschrift für Geschichte und Wissenschaft des Judentums.*

J. Q. R. = *Jewish Quarterly Review.*

Z. D. S. J. = *Zeitschrift für Demographic und Statistik der Juden.*

R. E. J. = *Revue des Études Juives.*

第一章

1. Jakob Fromer, *Das Wesen des Judentums* (1905), p. 144. 没有给出材料来源。

2. *Zeitschrift für Demographie und Statistik der Juden* [*Z. D. S. J.*], iii., 140, 145.

3. J. Thon, "Taufbewegung der Juden in Oesterreich," in *Z. D. S. J.*, iv., 6.

4. Théophile Malvezin, *Histoire des Juifs à Bordeaux* (1875), p. 105.

5. 例如 Lucien Wolf, "Jessurun Family," in *Jewish Quarterly Review* [*J. Q. R.*], i. (1889), 439。

6. 例如 B. C. Weiss, *Histoire des réfugiés protest.*, i. (1853), pp. 164, 377, 379, 383; ii., 5。

7. Sigmund Mayer, *Die ökonomische Entwicklung der Wiener Juden*, p. 8.

第二章

1. 要给出散居在不同地区的犹太人数目，是不可能的。实际上，这方面已有一些尝试，但结果都不过是推测而已。或许其中最好的代表是 I. Loeb, "Le nombre des Juifs de Castile et d'Espagne au moyen Age," in *Revue des Études Juives*, xiv. (1887), p. 161。此文的大量数据，建立在对今天居住于不同地区的犹太人数目的估算之上。尽管如此，我将概述他的研究成果。他认为在

1492年，西班牙与葡萄牙大约有23.5万犹太人。这个数字在两百年左右的时间内保持了相对稳定。其中16万人居住在卡斯提尔（安达卢西亚、格拉纳达等地），3万人在纳瓦尔。这些犹太人后来的状况如何？Loeb认为，5万人接受了洗礼，2万人在驱逐过程中死亡，16.5万人移居到下列地区：9万人前往土耳其，2000人前往埃及与的黎波里，1万人前往阿尔及尔，2万人去了摩洛哥，3000人去了法国，9000人去了意大利，2.5万人前往荷兰、汉堡、英格兰及斯堪的纳维亚，5000人前往美洲，还有1000人去了其他地区。

在此允许我引用消息灵通的威尼斯大使的报告，来对这些数据有所补充，“来自卡斯提尔及西班牙其他省份的这些低劣的犹太人，作为马兰诺在商业领域占据了巨大的份额，从而对真正的基督徒构成了极大威胁”。Vicenzo Querini（1506）in Alberi，*Rel. degli Amb.*，Series I，vol. i.，p. 29。

2. 关于葡萄牙马兰诺的命运，参见M. Kayserling，*Geschichte der Juden in Portugal*（1876），pp. 84，167。更具体的内容，参见J. H. Gottheil，*The Jews and the Spanish Inquisition*，in *J. Q. R.*，xv.（1903），p. 182；以及Elkan Adier，*Auto da Fè and Jew*，ib.，xiii.，xiv.，xv.（最近又以单行本出版）。

3. 参见B. Sieveking，*Genueser Firanzwesen*，ii.（1899），p. 167，以及Schudt，*Jüdische Merkwürdigkeiten*，i.（1714），p. 128。

4. 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是犹太人在15、16世纪被从南德意志其他城市逐出后的目的地。但荷兰必定也吸收了一批犹太人，因为在17、18世纪，法兰克福与阿姆斯特丹有了密切的商业关系。根据P. Bothe，*Beiträge zur Wirtschafts-und Socialgeschichte der Reichsstadt Frankfurt*（1906），p. 70，法兰克福的犹太人数量增加了两倍。1612年大约为2800人，1709年据官方统计犹太人占当地总人口18000中的3019人。我们能较好了解法兰克福犹太人的起源，多亏A. Dietz在其*Stammbuch der Frankfurter Juden：Geschichtliche Mitteilungen über die Frankfurter jüdischen Familien von* 1549—1849（1907）中的辛勤研究。关于公元1500年之前的情况，参见Karl Bücher，*Bevölkerung von Frankfurt am Main*（1886），pp. 526－601。

在汉堡，第一批定居的犹太人（外表上是天主教徒）始于1577或1583年。他们来自佛兰德、意大利、荷兰、西班牙及葡萄牙，东部（特别是德国）的移民直到17世纪才开始到来。根据Galeazzo Gualdo Priorato伯爵的记述，在1663年，汉堡有40或50户的德国犹太人与120户葡萄牙犹太人毗邻而居。参见*Zeitschrift für Hamburgische Geschichte*，iii.，p. 140。关于汉堡犹太人的总体情况，参见A. Feilchenfeld，*Die älteste 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Juden in Hamburg*，in the *Monatsschrift für Geschichte und Wissenschaft des Judentums*，vol. 43（1899）；另见*M. Grunwald*，*Portugiesengräber auf deutscher Erde*（1902）；*Hamburgs deutsche Juden*（1904）。

从17世纪末开始，汉堡犹太人得到快速增长。大约在18世纪中期，我们

听到了一个“可怕的犹太群体”的说法，其人数据估计在 2 万到 3 万之间（当然是个过高的估计）。参见 C. L. von Griesheim, *Die Stadt Hamburg* (1760), p. 47。

5. Risbeck, *Briefe eines reisenden Franzosen über Deutschland an seinen Bruder in Paris* (1780). 引自 H. Scheubbe, *Aus den Tagen unserer Grossväter* (1873), pp. 382 ff。

6. Malvezin 的佳作（参见第二章）提供了大量关于波尔多犹太人的信息，价值极高。而马赛犹太人的情况，可以参见 Jonas Weyl, “Les juifs protégés français aux échelles du Levant et en Barbarie”, in *Rev. de Études Juives*, vol. xii. (1886)。关于鲁昂犹太人，参见 Gosselin, “Documents inédites pour servir à l'histoire de la marine normande et du commerce rouennais pendant les xvi et xvii siècles” (1876)。Pigeonneau 在其 *Histoire du commerce*, ii, p. 123 中引用了此书，提到的当然是“已经归化的西班牙人与葡萄牙人”。

我们还应提及 Maignial, *La Question juive en France en* 1789 (1903)，此书建立在大量史料基础之上，写作精湛，见解独到。它不仅很好分析了 1789 年法国的犹太人问题，同时也探讨了这一问题的来龙去脉。

19 世纪之前的巴黎并没有太多犹太人，尽管其中一些人非常有影响力。关于 18 世纪巴黎犹太人的大量信息，参见 Léon Kahn, *Les juifs à Paris depuis le vi siècle* (1889)、*Les juifs sous Louis XV* (1892) 与 *Les juifs à Paris au xviii siècle* (1894)。尽管这些著作很出色，但它们没有全面探讨这一问题。

关于法国犹太史，许多有用材料散见于 *Revue des Études Juives* [*R. E. J.*] (自 1880 年以来)。

7. H. J. Koenen, *Geschiedenes der Joden in Nederland* (1843) 对荷兰犹太人的历史进行了探讨，至今仍无人能够超越。以下著作也值得提及：M. Henriques Pimentel, *Geschiedkundige Aanteekeningen betreffende de Portugesche Israeliten in den Haag* (1876); S. Back, *Die Entstehungsgeschichte der portugiesischen Gemeinde in Amsterdam* (1883); E. Italie, *Geschiedenes der Israelitischen Gemeente te Rotterdam* (1907)。

8. Ranke, *Französische Geschichte*, vol. iii., p. 350.

9. Schudt, *Jüdische Merkwürdigkeiten*, i. (1714), p. 271; 另见 p. 277。

10. 除了注 6 所提及的文献外，另见 Carmoly, *Revue Orientate* (1841) i., 42, 168, 174; 以及 Graetz, *Geschichte der Juden*, vol. 9, pp. 292, 354, 490。

11. 参见 L. Guiccardino, *Totius Belgii Descriptio* (1652), p. 129, 以及 Ehrenberg, *Zeiltalter der Fugger*, ii. (1896), p. 3。

12. 参见 Macaulay, [History] iv., p. 320, 以及 Ehrenberg, *op. cit.*, ii., p. 303。

13. 英国犹太人的历史已有大量杰出研究。一个信息宝库（尽管必须谨

慎使用）来自 D'Blossiers Tovey 于 1738 年汇编的 *Anglia Judaica, or the History and Antiquities of the Jews in England*。之后的重要著作有 James Picciotto, *Sketches of Anglo-Jewish History*（1875），其不足之处在于不常给出材料来源。H. S. Q. Henriques 在其 *Return of the Jews to England*（1905）中从法律角度论述了这一主题。

关于英国犹太史的全面研究，参见 Albert M. Hyamson 的名著 *A History of the Jews in England*（1908）。作者十分娴熟地运用所掌握的专题论文与档案，为整个主题提供了丰富的研究。《犹太季评》（创刊于 1889 年）包括许多有用材料。英国犹太历史协会（Anglo-Jewish Historical Exhibition，1888 年）的出版物也是如此。

关于克伦威尔时期的情况，以下研究应被提及：Lucien Wolf, *The Middle Age of Anglo-Jewish History*, 1290—1656, in the Publications of the Anglo-Jewish Historical Exhibition, No. 1。表明 15 世纪末犹太人就已在英国具有重要地位的一个事实是，一个犹太人相当公开地从事法律诉讼，并自信能够打赢官司。一个世纪之后，英国出现了许多犹太工业企业家，参见 *Calendar of State Papers*, 1581－1590, p. 49（引自 L. Wolf 的论文）。在 17 世纪初，英国必定存在大批犹太人。一份 1625 年的出版物 *The Wandering Jew Telling Fortunes to Englishmen*（同样引自 Wolf 先生的论文）写道，“英国存在大量犹太人，一些在宫廷，许多在城市，更多在乡村”。

14. *Anglia Judaica*, p. 302，“正如我已知道得很清楚”，Tovey 写道。

15. 一个好的例子是 J. F. Richter，他写了关于纽伦堡犹太人的论文。关于纽伦堡旧犹太社团的情况，参见 *Allgemeine Judenzeitung*, 1842, No. 24。另见 Historische Verein für Mittelfranken 的第八份报告以及 M. Brann, “Eine Sammlung Fürther Grabschriften”, in *Gedenkbuch zur Erinnerung an David Kaufmann*（1900）。

16. 可供支撑的一份最有趣的文件是 D. Kaufmann, “Die Vertreibung der Marranen aus Venedig im Jahre 1550,” in the *J. Q. R.*, vol. 13（1901）, p. 520。

17. Hyamson, *History of the Jews in England*, p. 174.

18. M. Bloch, *Les juifs et la prospèritè publique à travers l'histoire*（1899）, p. 11. 这项法令包括以下引人注目的字眼：“Vous devez bien prendre garde que la jalousie du commerce portera toujours les marchands à être d'avis de les chasser.”

19. Malvezin, *Les juifs à Bordeaux*, p. 132.

20. Malvezin, p. 175.

21. S. Ullmann, *Studien zur Geschichte des Juden in Belgien bis zum* 18. *Jahrhundert*（1909）, p. 34.

22. Émile Ouverleaux, "Notes et documents sur les juifs de Belgique," in *R. E. J.*, vol. 7, p. 262.

23. Thurloe, *Collection of State Papers*, iv, p. 333. 另见 Whalley 的信件, p. 308。

24. 参见 J. Müller 的反犹著作 *Judaismus*(1644), 另见 Reils, "Beiträge zur älteren Geschichte der Juden in Hamburg", in the *Zeitschrift des Vereins für Hamburgische Geschichte*, vol. 2, p. 412。

25. Ehrenberg, *Grosse Vermögen*, p. 146.

26. M. Grunwald, *Hamburgs deutsche Juden bis zur Auflösung der Dreigemeinden*, 1811 (1904), p. 21.

27. Arnold Kiesselbach, *Die wirtschafts-und rechtsgeschichtliche Entwicklung der Seeversicherung in Hamburg* (1901), p. 24.

第三章

1. Hyamson, p. 178.

2. *Anglia Judaica*, p. 292.

3. 此处的数据采自这项研究:R. Markgraf, *Zur Geschichte der Juden auf den Messen in Leipzig vom* 1664—1839(博士论文,1894 年)。关于 1675—1699 年间的状况,参见 Max Freudenthal, "Leipziger Messgäste" in *Monatsschrift*, vol. 45 (1901), p. 460,它比 Markgraf 的研究更为出色,因为他参考了当时的集市账簿,而 Markgraf 主要依靠时间稍后的莱比锡档案馆。Freudenthal 的研究表明,在 1671—1699 年间,除去那些获得特许的犹太人之外,另有 18182 名犹太人参加了集市。然而,Markgraf 认为同一时期只有 14705 名犹太人参加了集市。Freudenthal 的研究在 1902 年以 *Die jüdischen Besucher der Leipziger Messe* 为题出版了单行本。

4. Markgraf, p. 93; Freudenthal, p. 465. 参见 R. Funke, *Die Leipziger Messen* (1897), p. 41。

5. 例如,参见 No. 21 of the *Judenreglements* of the year 1710 in C. L. von Griesheim, *Die Stadt Hamburg, Anmerkungen und Zugaben* (1759), p. 95。

6. E. Baasch, "Hamburgs Seeschiffahrt und Warenhandel" in the *Zeitschrift des Ver. für Hamburg. Geschichte*, vol. 9 (1894), pp. 316, 324. 参见 A. Feilchenfeld, "Anfang und Blutezeit der Portugiesengemeinden", in *Hambg. Ztschrift.*, vol. 10 (1899), p. 199。

7. *Encyclopédie methodique*. "Manufactures," i., 403 - 404.

8. 参见 H. J. Koenen, *Geschiedenes der Joden in Nederland* (1843), p. 176 ff. 另见 H. Sommershausen, "Die Geschichte der Niederlassung der Juden in Holland und den holländischen Kolonien", in *Monatsschrift*, vol. ii。

9. 关于首饰与珍珠的情况，参见 Hamburg Griesheim, *op. cit.*, p. 119；关于北德意志的情况，我要感谢柏林的 Bernfeld 博士提供信息；关于荷兰的情况，参见 *Jewish Encyclopoedia* 中的“Netherlands”词条；E. E. Danekamp, *Die Amsterdamer Diamantindustrie*，引自 N. W. Goldstein 在 *Z. D. S. J.*（vol. iii., p. 178）上发表的“Die Juden in der Amsterdamer Diamantindustrie”一文；关于意大利的情况，参见 D. Kaufmann 在 *J. Q. R.* 上发表的“Die Vertreibung der Marranen aus Venedig”一文。

至于丝绸，犹太人几个世纪以来一直从事这个行业，将它们从希腊运到西西里，然后又运往法国与西班牙。参见 Graetz, vol. 2, p. 244。16 世纪他们又主宰了意大利的丝绸贸易（参见 David Kaufmann, *loc. cit.*），在 18 世纪的法国也是如此。1760 年，里昂丝织业行会的会长称犹太民族是“各省此项贸易的情妇”（la maîtresse du commerce de toutes les provinces）。参见 J. Godard, *L'Ouvrier en Soie*（1899）, p. 224。巴黎在 1755 年有 14 名犹太丝绸商人，在 1759 年则有 22 人。参见 Kahn, *Juifs des Paris sous Louis XV*, p. 63. 柏林也基本如此。

10. 犹太人如何发展维也纳纺织品批发贸易的情况，可以参见 S. Mayer 在其 *Die ökonomische Entstehung der Wiener Juden*, p. 8 ff. 中记载的私人经历。

纽伦堡市议会于 1780 年 12 月 28 日颁布了一项法令，其中将丝绸、丝绒与羊毛称为“犹太商品”（Judenware）。参见 H. Barbeck, *Geschichte der Juden in Nürnberg und Fürth*（1878）, p. 71。

11. 关于与黎凡特进行的蔗糖贸易，参见 Lippmann, *Geschichte des Zuckers*（1890）, p. 206；D. Kaufmann, *loc. cit.*；关于与美洲进行的蔗糖贸易，参见 M. Grunwald, *Portugiesengräber auf deutscher Erde*（1902）, p. 6 ff.；A. Feilchenfeld, “Anfang und Blütezeit der Portugiesengemeinde in Hamburg,” in the *Zeitschrift des Vereins für Hamburg. Geschichte*, vol. 10（1899）, p. 211. 另见 Risbeck, *op. cit.*。

12. “Controlling the Cotton Trade.”参见 *Jewish Encyclopoedia* 中的“America, U. S. of,”词条（i. 495）。

13. 尤其关于汉堡的情况，参见 Feilchenfeld, *loc. cit.*。

14. 最早从事靛青贸易的犹太人主要是 Moses Lindo，他于 1756 年到达南卡罗莱纳，在靛青业中投资了 12 万英镑。在 1756—1776 年间，靛青的产量翻了五倍。参见 B. A. Elgas, *The Jews of South Carolina*（1903），另见 *Jewish Encyclopoedia* 中的“South Carolina”词条。

15. Risbeck, *op. cit.*, vol. ii., under Frankfort.

16. 引自 Bloch, *op. cit.*, p. 36。

17. 参见 Richard Markgraf, *op. cit.*, p. 93。

18. 参见 Hyamson, pp. 174, 178. 以及安特卫普的统治者发给阿拉斯主教的报告,引自 Ullmann, *op. cit.*, p. 35,"他们带着巨额财富,尤其是白银、宝石与许多金币银币"。

第四章

1. 在撰写《耶利米书》评注时(1504 年),唐·以撒·阿巴巴内尔(Don Isaac Abarbanel)看到一份葡萄牙香料商人从印度带回的文件,其中提到他们曾在印度遇到许多犹太人。引自 M. Kayserling, *Christopher Columbus* (1894), p. 105. 另见 Bloch, *op. cit.*, p. 15。

2. 正如玛拿西·本·以色列在致克伦威尔的"谦恭的呈文"(Humble Address)中提及的那样。关于这份文件,参见 *Jewish Chronicle*, November and December, 1859. 另见 de Barrios, *Hist. universal Judayca*, p. 4。

3. G. C. Klerk de Reus, *Geschichtlicher überblick der . . . niederländisch-ostindischen Compagnie* (1894), xix. 有关 Coen 的情况,参见 p. xiv。

4. J. P. J. Du Bois, *Vie des Gouverneurs généraux... ornée de leurs portraits en vignettes au naturel* (1763).

5. 例如 Francis Salvador,参见 *Jewish Encyclopædia* 中的"Salvador"词条,另见 Hyamson, p. 264。

6. 1569 年,阿姆斯特丹的犹太富人为"巴伦支海的远征"(Barentz Expedition)提供了装备。参见 M. Grunwald, *Hamburgs deutsche Juden* (1904), p. 215。

7. 参见 *Jewish Encyclopædia* 中的"South Africa"词条。

8. Dr. J. H. Hertz, *The Jew in South Africa* (1905).

9. 参见 *Jewish Encyclopædia* 中的"Commerce"词条。

10. 有关犹太人与美洲的文献相当丰富。在此我仅提及其中最重要的一些。首先是 *Jewish Encyclopædia*(美国版),其中有一些出色的词条述及美洲的状况。然后,我必须提及美国犹太历史协会的《通讯》(*Transactions*,创刊于 1895 年),它是一个有关美洲犹太(经济)史,尤其是 17、18 世纪南北美殖民地情况的真正信息宝库。另有一些重要的研究载于 *The 250th Anniversary of the Settlement of the Jews in the U. S. A.* (1905)。

另参见 Markeus, *The Hebrews in America*; C. P. Daly, *History of the Settlement of the Jews in North America* (1893); M. C. Peters, *The Jews in America* (1906)。前两本书似乎已绝版。

11. 为了纪念美洲发现四百周年,出现了一大批展示犹太人如何参与此次发现的著作。其中最好的是 M. Kayserling, *Christopher Columbus und der Anteil der Juden, etc.* (1894)。其他还有:F. Rivas Puiqcerver, *Los Judios y el nuevo mundo* (1891); L. Modona, *Gil Ebrei e la scoperta dell' America*

(1893). 另见 *Jewish Encyclopædia* 中的"Discovery of America"词条，以及 Oscar Strauss 的发言，收入 *The 250th Anniversary of the Settlement of the Jews in the U. S. A.*, p. 69。

12. M. Kayserling, *loc. cit.*, p. 112；萨拉戈萨的 Juan Sanchez 是第一位商人。另见 Kayserling, "The Colonization of America by the Jews," in the *Transactions of the Jewish Historical Society of America*, vol. 2, p. 73。

13. G. F. Knapp, "Ursprung der Sklaverei in den Colonien," in the *Archiv für Soziale Politik*, ii., p. 129.

14. Oscar Strauss, *loc. cit.*, p. 71.

15. Ritter, "Über die geographische Verbreitung des Zuckerrohrs," in the *Berichten der Berliner Akademie* (1839)，引自 Lippmann, *Geschichte des Zuckers* (1890), p. 249.

16. 根据 Max J. Kohler, "Phases of Jewish Life in New York before 1800," in the *Transactions of the Jewish Hist. Soc. of America*, vol. ii., p. 94。

17. 参见 *Jewish Encyclopædia* 中的"America"词条，另见 G. A. Kohut, "Les juifs dans les colonies hollandaises," in the *R. E. J.* (1895), vol. 31, p. 293。

18. H. Handelmann, *Geschichte von Brasilien* (1860), p. 412.

19. P. M. Netscher, *Les Hollandais au Brésil* (1853), p. 1. 关于索萨这个富有的犹太家族，参见 M. Kayserling, *Geschichte der Juden in Portugal* (1867), p. 307; M. Grunwald, *Portugiesengräber* (1902), p. 123。

20. M. J. Kohler, *op. cit.*

21. 参见 *Jewish Encyclopædia* 中的"America"词条。

22. *Transactions of Jewish Hist. Society of America*, ii. 95. 另见 Netscher, p. 103。

23. *Ibid.*

24. 驱逐其实不存在；事实上，1654 年的和约给予犹太人大赦。但其中添加了一些关键词语，"犹太人与其他非天主教徒将会受到在葡萄牙受过的那种对待"。这已经足够了。关于这份和约，参见 Aitzema, *Historia*, etc. (1626)，引自 Netscher(参见注 19), p. 163。

25. H. Handelmann, *loc. cit.*, pp. 412 - 413.

26. 关于巴巴多斯犹太人的情况，参见 John Camden Hatten, *The Original Lists, etc.* (1874), p. 449; Ligon, *History of Barbados* (1657)，引自 Lippmann, *op. cit.*, p. 301; Reed, *The History of Sugar and Sugar-yielding Plants* (1866), p. 7; M'Culloch, *Dictionary of Commerce*, ii., p. 1087. 另见 C. P. Lucas, *A Historical Geography of the British Colonies*, *e. g.* ii. (1905),

121，274，277。

27. 关于牙买加犹太人的情况，参见 M. Kayserling，“The Jews in Jamaica，” etc.，in the *J. Q. R.*，vol. 12 (1900)，708 ff.；Hyamson，*loc. cit.*，chapter xxvi。当时记录的大量摘要可参见 Kohler，“Jewish Activity in American Colonial Commerce，” in *Transactions of Jewish Hist. Society of America*，vol. 10，p. 69。另见同一作者刊于 *Transactions*，vol. 2 的文章，在第 98 页。

28. 总督致枢密大臣阿灵顿勋爵的信，引自 Kayserling in *J. Q. R.*，vol. 12，p. 710。

29. 英属西印度群岛的纪念性铭文由 J. H. Lawrence Archer 上校所收集，引自 Kohler，“Phases of Jewish Life，” *op. cit.*，p. 98。

30. 关于苏里南犹太人的最权威的著作是 *Essai sur la colonie de Surinam avec l'histoire de la Nation Juive Portugaise y établie*，etc.，2 vols.，Paramaribo (1788)。Koenen 在其 *Geschiedenes der Joden in Nederland* (1843 年)第 313 页认为这项研究“是犹太人在这些地区历史的主要著作”。我没能找到此书。对这个问题的最新研究揭示了大量新材料。我们应该提及 R. Gottheil，“Contributions to the History of the Jews in Surinam”，in *Transactions* of Jewish Hist. Society of America，vol. 9，p. 129；J. S. Roos，“Additional Notes on the History of the Jews of Surinam”，*Transactions*，vol. 13，p. 127；P. A. Hilfman，“Some Further Notes on the History of the Jews in Surinam，” *Transactions*，vol. 16，p. 7。关于苏里南与圭亚那之间的商业关系，参见 Samuel Oppenheimer，“An Early Jewish Colony in Western Guiana，1658 - 1666，and its relation to the Jews in Surinam”，in *Transactions*，vol. 16，pp. 95 - 186. 另见 Hyamson，ch. xxvi，and Lucas。

31. 关于马提尼克、瓜德罗普、圣多明各的犹太人，参见 Lippmann，*op. cit.*，p. 301；A. Cahen，“Les Juifs de la Martinique au xvii sc.”，in *R. E. J.*，vol. 2；Cahen，“Les Juifs dans les Colonies françaises au xviii sc.”，in *R. E. J.*，vols. 4 and 5；Handelmann，*Geschichte der Insel Hayti* (1856)。

32. Lucien Wolf in the *Jewish Chronicle*，Nov. 30，1894，引自 Kohler in *Transactions*，vol. 10，p. 60。

33. *The 250th Anniversary of the Settlement of the Jews in the U. S.* (1905)，p. 18.

34. *The 250th Anniversary*，etc.

35. John Moody，*The Truth about the Trusts* (1905)，pp. 45，96，etc.

36. 参见 *Jewish Encyclopædia* 中的“California”词条(它尤其出色)。

37. 另一些人认为，甚至在巴西避难者到达之前，许多来自阿姆斯特丹的犹太富商就已经定居在哈德逊河殖民地，参见 Albion Morris Dyer，“Points in

the First Chapter of New York Jewish History," in *Transactions of Jewish Hist. Soc. of America*, vol. 3, p. 41。

38. 这封信为 Kohler 全部引用，见其"Beginnings of New York Jewish History," in *Transactions*, vol. 1, p. 47。

39. 参见 *Transactions*, vol. 1, p. 41; vol. 2, p. 78; vol. 10, p. 63; Kohler, "Jews in Newport", *Transactions*, vol. 6, p. 69. Kohler 频频引用了此书：Judge Daly, *Settlement of the Jews in North America* (1893)。

40. 加利福尼亚州州长帕代尔的演讲，参见 *The 250th Anniversary*, etc., p. 173。

41. 参见 *Jewish Encyclopædia* 中的"Alabama"词条。

42. 参见 *Jewish Encyclopædia* 中的"Albany"词条。

43. B. Felsenthal, "On the History of the Jews in Chicago," in *Transactions*, vol. 2, p. 21; H. Eliassof, "The Jews of Chicago," in *Transactions*, vol. 2, p. 117.

44. Lewis N. Dembitz, "Jewish Beginnings in Kentucky," in *Transactions*, vol. 1, p. 99.

45. J. H. Hollander, "Some Unpublished Material relating to Dr. Jacob Lumbrozo of Maryland," in *Transactions*, vol. 1.

46. D. E. Heinemann, "Jewish Beginnings in Michigan before 1850," in *Transactions*, vol. 13, p. 47.

47. D. Philipson, "The Jewish Pioneers of the Ohio Valley," in *Transactions*, vol. 8, p. 53.

48. Henry Necarsulmer, "The Early Jewish Settlement at Lancaster, Pa.," in *Transactions*, vol. 3, p. 47.

49. Henry Cohen, "The Jews in Texas," in *Transactions*, vol. 4, p. 9; Henry Cohen, "Henry Castro, Pioneer and Colonist," in *Transactions*, vol. 5, p. 39. 另见 H. Friedenwald, "Some Newspaper Advertisements in the 18th Century," in *Transactions*, vol. 6。

50. "Einiges aus dem Leben der amerikanisch-jüdischen Familie Seligman aus Bayersdorf in Bayern," in Brüll's *Monatsblättem* (1906), p. 141.

51. Leon Hühner, "The Jews of Georgia in Colonial Times," in *Transactions*, vol. 10, p. 65; Hühner, "The Jews of South Carolina from the Earliest Settlement to the End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in *Transactions*, vol. 12, p. 39; Chas. C. Jones, "The Settlement of the Jews in Georgia," in *Transactions*, vol. 1, p. 12.

52. B. A. Elgas, *The Jews of South Carolina* (1903).

53. L. Hühner, "Asser Levy, a noted Jewish Burgher of New

Amsterdam," in *Transactions*, vol. 8, p. 13. 另见 Huhner, "Whence came the First Jewish Settlers of New York?" in *Transactions*, vol. 9, p. 75; M. J. Kohler, "Civil Status of the Jews in Colonial New York," in *Transactions*, vol. 6, p. 81.

54. 关于18世纪犹太人以自己的语言在纽约开展商业的情况，参见 J. A. Doyle, *The Colonies under the House of Hanover* (1907), p. 21。

55. Chas. C. Jones, "The Settlement of the Jews in Georgia," in *Transactions*, vol. 1, pp. 6, 9.

56. M. Jaffé, "Die Stadt Posen," in *Schriften des Vereins für S. P.*, vol. 119, ii. 151.

57. Simon Wolf, "The American Jew as Soldier and Patriot," in *Transactions*, vol. 3, p. 39.

58. 根据 Dr. Fischell, *Chronological Notes of the History of the Jews in America*。

第五章

1. 如果能回想起现代国家的许多要素在中世纪末期，尤其在意大利与西班牙就已开始发展，而犹太政治家在这两个国家占据了重要位置这一事实，我们或许会得出一个不同的结论。遗憾的是，现代国家的历史从未(就我所知)以这个角度被书写过；我认为这样写会是十分有益的。当然，Lindo、de los Rios、Kayserling、Mendes dos Remedies 等撰写西班牙与葡萄牙犹太史的作家之间并无多少共同之处，Ranke 与 Baumgarten 等撰写比利牛斯半岛国家兴起的作家也是如此。

2. Lucien Wolf, "The First English Jewry," in *Transactions of the Jewish Historical Society of England*, vol. 2. 参见 Hyamson, pp. 171 - 173.

3. Hyamson, p. 269; Picciotto, *Sketches of Anglo-Jewish History* (1875), p. 58.

4. "Und bedient sich Frankreich jederzeit ihrer Hülffe, bey Krieges-Zeiten seine Reuterey beritten zu machen." T. L. Lau, *Einrichtung der Intraden und Einkünfte der Souveräne*, etc. (1719), p. 258.

5. 引自 Liebe, *Das Judentum* (1903), p. 75。

6. 参见 *Jewish Encyclopædia* 中的"Banking"词条。

7. *Mémoire of the Jews of Metz of the* 24 *March*, 1733，部分来自 Bloch, *op. cit.*, p. 35。

8. 引自 Bloch, *op. cit.*, p. 23。

9. 摘自 *Lettres patentes*, in Bloch, *op. cit.*, p. 24。

10. 关于加迪斯家族的情况，参见 T. Malvezin, *op. cit.*, p. 241; Graetz,

"Die Familie Gradis," in *Monatsschrift*, vol. 24 (1875), 25 (1875)。

11. M. Capefigue, *Banquiers, fournisseurs*, etc. (1856), pp. 68, 214, etc.

12. 引自 *Revue de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1892), 16, 1。

13. *Historische Nachlese zu den Nachrichten der Stadt Leipzig*, edited by M. Heinrich Engelbert Schwartze (1744), p. 122, 引自 Alphonse Levy, *Geschichte der Juden in Sachsen* (1900), p. 58。

14. Bondy, *Zur Geschichte der Juden in Böhmen*, vol. i., p. 388.

15. 这一点我引自 Liebe, *Das Judentum* (1903), pp. 43, 70, 他虽提及这些事实, 但没有提供出处。

16. König, *Annalen der Juden in den preussischen Staaten, besonders in der Mark Brandenburg* (1790), pp. 93 - 94.

17. 1777 年 6 月 28 日的文件, 引自 A. Levy, *op. cit.*, p. 74; 另见 S. Haenle, *Geschichte der Juden im ehmaligen Fürstentum Ansbach* (1867), p. 70。

18. *Geschichte Philanders von Sittewaldt das ist Straffs-Schriften Hanss Wilhelm Moscherosch von Wilstätt* (1677), p. 779.

19. F. von Mensi, *Die Finanzen Österreichs von* 1701—1740 (1890), p. 132. 撒母耳·奥本海默是位"Kaiserlicher Kriegsoberfaktor und Jud"(这既是他的官方头衔也是其自称), 他满足了尤金王子所有军事行动的需要(第 133 页)。

20. 例如, 维也纳宫廷档案馆保存的日期为 1762 年 5 月 12 日的请愿书, 参见 Wolf, *Geschichte der Juden in Wien* (1894), p. 70; *Komitätsarchiv Neutra Iratok*, xii - 3326(根据 Jos. Reizman 先生提供的信息); *Verproviantierung der Festungen Raab, Ofen und Komorn durch Breslauer Juden* (1716), 参见 Wolf, *loc. cit.*, p. 61。

21. H. Friedenwald, "Jews mentioned in the Journal of the Continental Congress," in *Transactions of the Jewish Hist. Soc. of America*, vol. i, pp. 65 -89.

22. 我已经提及关于英国、法国、荷兰及美国犹太史(经济史也不例外)的重要著作(参见第二章注 6、7、13 及第四章注 10), 在此我将提到关于德国和西班牙同一主题的相关研究。由于还没有全面研究德国犹太人历史的著作, 因此我们不得不借助区域性的专著与学术期刊上的论文。不管怎样, 迄今为止, 对德国犹太经济史的研究很不充分, 比如在 L. Geyer 两卷本的 *Die Geschichte der Juden in Berlin* (1870—1871)专著中, 几乎找不到有用材料。最近, 我一个学生 Ludwig Davidsohn 先生为了确定犹太人的经济地位, 仔细检索了柏林国家档案馆。他的研究成果尚未付梓, 但我已经使用了其中一些内容。其他研究尚有: Grunwald, *Portugiesengräber auf deutscher Erde* 及其

Hamburgs deutsche Juden bis zur Auflösing der Dreigemeinde（1904）。此处的一些细节可参看（但需加小心）König，*op. cit.* 以及 *Die Juden in Österreich*，2 vols.（1842）。

至于学术杂志，它们对研究经济史没有太大用处。主要的有 *Monatsschrift für Geschichte und Wissenschaft des Judentums*（创刊于 1851 年）。另有 *Allgemeine Zeitung des Judentums*（创刊于 1837 年）与 Brüll 的 *Populärwissenschaftliche Monatsblätter*（创刊于 1888 年），它们在观点上都多少带有宣传目的。*Zeitschrift für Demographie und Statistik des Judentums*（创刊于 1905 年）只是偶尔论及经济史问题。

有时从一般的评论期刊与地方性杂志的文章中，偶尔也能发现不少关于犹太经济史的内容。但无法在此列出一份完整清单。

关于西班牙犹太人的历史，已有充分研究。但遗憾的是，经济方面的内容几乎完全被忽略。我认为，没有比写一部比利牛斯半岛的犹太经济史更为迫切的事情，我希望有经济史家能够投身于此项事业。它肯定会以一种极其惊人的方式照亮整个欧洲经济史。然而，目前我们只能参考西班牙犹太人的通史，其中最好的或许是：M. Kayserling，*Geschichte der Juden in Spanien und Portugal*，2 vols.（1861—1867）。关于西班牙的情况，首要的研究是：D. José Amador de Los Rios，*Historia social，politico y religiosa de los Judios de España y Portugal*，3 vols.（1875—1878），但对我们来说没什么用处。一本与众不同的著作是：E. H. Lindo，*The History of the Jews of Spain and Portugal*（1848）。它包含了有关犹太人的法律规定和西班牙议会决议的摘录，因而具有特殊的价值。

关于葡萄牙犹太人，最重要的研究是：J. Mendes dos Remedios，*Os Judeus em Portugal*，vol. i（1895），止于犹太人被驱逐出境。

同时应该提及 Graetz 的多卷本 *Geschichte der Juden*，其中探讨西班牙时期的部分（第 7 与 8 卷）非常有用，因为其中包括了大量材料。我认为它们没有被任何后来的研究超越。

至于犹太人在比利牛斯半岛经济生活中的地位的专题研究，可能由于我无知，我不知道此类研究是否存在。无论如何，在布雷斯劳与柏林的犹太图书馆，该主题下找不到任何书目。Bento Carqueja 的著作 *O capitalismo moderno e as suas origens em Portugal*（1908）仅仅在涉及犹太人的部分浅浅谈了谈这个问题。

23. H. J. Koenen，*op. cit.*，p. 206.

24. 参见 *Jewish Encyclopædia* 中的“Banking”词条。

25. 关于 17、18 世纪犹太人在英国金融界的地位，我们拥有大量记载，参见 Picciotto，p. 58；Hyamson，pp. 171，217，240，264，etc.；Lucien Wolf，*The Re-settlement of the Jews in England*（1888）；同一作者的“Crypto-Jews

under the Commonwealth," in *Transactions of the Jewish Historical Society of England*, vol. i. (1895)；以及他的"The Jewry of the Restoration (1660—1664)，"重印自 *The Jewish Chronicle* (1902)。

26. L. Wolf, *The Jewry of the Restoration*, p. 11.

27. G. Martin, *La grande industrie sous Louis XIV* (1899), p. 351.

28. Victor de Swarte, *Un banquier du Trésor royal au xviii siècle, Samuel Barnard — sa vie — sa correspondance*, 1651—1739 (1893).

29. Kahn, *Les juifs de Paris au xviii sc.* (1894), p. 60.

30. Graetz, *Geschichte der Juden*, vol. 10, p. 40.

31. Wolf, *Ferdinand II*, Appendix 4，引自 Graetz, vol. 10, p. 41。

32. 引自 *Die Juden in Österreich*, vol. 2 (1842), p. 41。

33. *Die Juden in Österreich*, vol. 2, p. 64; F. von Mensi, *op. cit.*, p. 132. 在 18 世纪，该国最重要的债权人(按先后依次)是奥本海默、韦特海默、辛茨海默；辛茨海默在 1739 年放的债不低于五百万盾。参见 F. von Mensi, p. 685。另见 David Kaufmann, *Urkundliches aus dem Leben Samson Wertheimers* (1892)。关于更早时期的情况，参见 G. Wolf, *Ferdinand II und die Juden* (1859)。

34. F. von Mensi, p. 148.

35. G. Liebe, *op. cit.*, p. 84.

36. 参见 *Jewish Encyclopædia* 中的"Abensur Daniel"词条。

37. A. Levy, "Notes sur l'histoire des Juifs en Saxe," in *R. E. J.*, vol. 26 (1898), p. 259. 关于 Berend (Behrend) Lehmann，又名 Jisachar Berman，参见 B. H. Auerbach, *Geschichte der israelitischen Gemeinde Halberstadt* (1866), p. 43；关于他的儿子 Lehmann Berend，参见 p. 85。

38. Auerbach, *loc. cit.*, p. 82(关于汉诺威)，另见 S. Haenle, *op. cit.*, pp. 64, 70, 89；关于更多宫廷犹太人(Hofjuden)的事例，参见 L. Müller, "Aus fünf Jahrhunderten," in the *Zeitschrift des historischen Vereins für Schwaben und Neuburg*, vol. 26 (1899), p. 142。

39. F. von Mensi, p. 409.

40. *Memoiren der Glückel von Hameln*(意第绪语原版由 D. Kaufmann 于 1896 年出版)，1910 年德文版(私印本)，p. 240。

41. M. Zimmermann, *Josef Süss Oppenheimer, ein Finanzmann des* 18ten *Jahrhunderts* (1874).

42. Address by Louis Marshall in *The 250th Anniversary of the Settlement of the Jews in the U. S.*, p. 102.

43. H. Friedenwald, *op. cit.*, p. 63.

44. W. Graham Sumner, *The Financiers and the Finances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2 vols. (1891).

第六章

1. 从法律角度对这一问题的考察，参见 Brunner, *Endemanns Handbuch*, vol. 2, p. 147, 以及 Goldschmidt, *Universalgeschichte des Handelsrechts* (1891), p. 386. 另见 Knies, *Der Credit* (1876), p. 190。

2. 我从最宽泛的意义上来定义“信用关系”，它是人们之间创造的义务，由一方给予另一方经济价值，而后者承诺在将来以对等物回报。

3. 参见 F. A. Biener, *Wechselrechtliche Abhandlungen* (1859), p. 145。

4. 有关 Kuntze 及其他人的观点，参见 Goldschmidt, *op. cit.*, p. 408。

5. Goldschmidt, *loc. cit.*, p. 410，他以发问方式提出这个问题，并留下模糊的答案。另见 A. Wahl, *Traité théor. et pratique des titres au porteur* (1891), vol. 1, p. 15。

6. 参见 Kuntze, “Zur Geschichte der Staatspapiere auf den Inhaber,” in the *Zeitschrift für das ges. Handelsrecht*, vol. 5, p. 198；另见同一作者的 *Inhaber Papiere* (1857), pp. 58, 63; Goldschmidt, *op. cit.*, pp. 448 - 9; Sieveking in *Schmollers Jahrbuch* (1902)；尤为重要的是 G. Schaps, *Zur Geschichte des Wechselindossaments* (1892), p. 86. 另见 Biener, *op. cit.*, pp. 121, 137。

7. Goldschmidt, p. 452; Schaps, p. 92.

8. 这个段落来自 D. Kaufmann 的文章，载于 *J. Q. R.*, vol. 13 (1901), p. 320, “Die Vertreibung der Marranen aus Venedig im Jahre 1550”。

9. Graetz, vol. 8, p. 354; vol. 9, p. 328.

10. 据我所知，这个问题从未被探讨过：犹太人在热那亚的集市中起到什么作用？对此很难给出一个满意答案，因为热那亚的犹太人被迫秘密地保持他们的认同，在 1550 年的驱逐法令后尤其如此。他们很可能还改变名字，并假装接受基督教。尽管如此，仍然值得去进行这个尝试。无论如何，我们在此拥有中世纪之后重要金融与信贷体制的发展并非明确出自犹太人影响的一个证据。当然，这也可能是由于真正的证据没有被我观察到；如果有人告诉我这种证据的话，我会很高兴。

关于热那亚集市的最好记载是 Ehrenberg, *Zeitalter der Fugger*, vol. 2, p. 222，以及 Endemann, *Studien in der römisch-kanonischen Wirtschafts-und Rechtslehre*, vol. 1 (1874), p. 156。Endemann 将其论点主要建立在 Scaccia 与 R. de Turris 的基础之上，而 Ehrenberg 更依靠富格尔家族档案馆的文献。

11. 可能时间上更早，比如在 12 世纪，就有以证券（*uchaux* 或 *saches*）形式将图卢兹磨坊转让给 Pairiers 公司的事例。参见 Edmund Guillard, *Les opérations de Bourse* (1875), p. 15。

12. 参见 K. Lehmann, *Die geschichtliche Entwickelung des Aktienrechts* (1895)。

13. J. P. Ricard, *Le Négoce d'Amsterdam* (1723), pp. 397 - 400.

14. 这个结论的得出，来自 André E. Sayous, "Le fractionnement du capital social de la Compagnie néerland des Indes orientales," in *Nouv. Rev. Historique du droit franç. et étrangers*, vol. 25 (1901), pp. 621, 625。

15. 参见 Endemann, *op. cit.*, vol. 1, p. 457。

16. 例如，1422 年的巴勒莫与 1606 年的博洛尼亚，参见 Goldschmidt, p. 322。

17. 关于威尼斯银行业史，最重要的文献集是 Elia Lattes, *La libertà delle bánche e Venezia dal secolo xiii al xvii secondo i documenti inediti del R. Archivio dei Frari ec.* (1869)。对于这一问题的研究，参见 Ferrara, "Gli antichi banchi di Venezia" in *Nuova Antologia*, vol. xvi.; E. Nasse, "Das venetianische Bankwesen in 14, 15, und 16 Jahrhundert", in the *Jahrbuch für Nationalökonomie*, vol. 34, pp. 329, 338。显示威尼斯银行业中犹太人的比重将是一项受欢迎的研究。但这极难研究，因为根据我的判断，15 世纪到达威尼斯的犹太人，绝大多数是新基督徒，他们通常占据银行的高级职位，但使用的却是基督徒名字。

18. Macleod, *Dictionary of Political Economy*, art. "Bank of Venice" (? authorities)，引自 A. Andréades, *History of the Bank of England* (1909), p. 28。

19. "Gallicioli Memorie Venete," ii., No. 874, in Graetz, vol. 6, p. 284.

20. S. Luzzato, *Dis. circa il stato degli Hebrei in Venezia* (1638), ch. 1, and pp. 9*a*, 29*a*. 这些数据经不起严格推敲，它们只是一个大概的估计。

21. 例如，参见 D. Manuel Calmeiro, *Historia de la economia politica en España*, vol. 1, p. 411; vol. 2, p. 497。

22. 参见 A. Andréades, *History of the Bank of England* (1909), p. 28. 如果充分意识到撒母耳·兰贝计划(1658 年，载于 *Somer's Tracts*, vol. vi)的重要性，结论必然如此。Andréades 真实记载了兰贝计划中关于英格兰银行的最初构想。此前还存在一个计划——它由 Balthasar Gerbier 在 1651 年提出，而从这一年到 1658 年之间，克伦威尔已允许犹太人定居英国。在我看来，我无法承认兰贝计划的"优越性"。但其他作者也同样强调犹太人在英格兰银行创建过程中的重大作用。

23. 有关公债的例子，参见 Walter Däbritz, *Die Staatsschulden Sachsens in der Zeit von* 1763 *bis* 1837, Doctoral Dissertation (1906), pp. 14, 55; E. von Philippovich, *Die Bank von England* (1885), p. 26; 另见 Ehrenberg, *Fugger* [第六章注 10], vol. 2, pp. 141, 299。

24. Ad. Beer, *Das Staatsschuldenwesen und die Ordnung de Staatshaushalts unter Maria Theresia* (1894), p. 13.

25. 参见 F. von Mensi, *op. cit.*, p. 34。

26. 我要提醒大家注意一本少为人知(甚至 Däbritz, *op. cit.* 也忽略了它)的小册子。它有一个很长的标题:"Ephraim justifié. Mémoire historique et raisonné sur l'Etat passé, présent et futur des finances de Saxe. Avec le parallèle de l'Oeconomie prussienne et de l'Oeconomie saxonne. Ouvrage utile aux Créaneiers et Correspondans, aux Amis et aux Ennemis de la Prusse et de la Saxe. Adressé par le Juif Ephraim de Berlin à son Cousin Manassés d'Amsterdam. Erlangen. A l'enseigne de 'Tout est dit.'"1785 年。

27. 参见(Luzac) *Richesse de la Hollande*, vol. 2 (1778), p. 200,以及 vol. 1, p. 366。除了 Luzac 的私人经历之外,另见 Fermin, *Tableau de Surinam* (1778)。

28. 他们中的主要代表为 Kuntze, *Die Lehre von den Inhaberpapieren* (1857), p. 48,这项研究仍是不可超越的。此外,我们必须提及 Albert Wahl, *Traité théorique et pratique des titres au porteur français et étrangers*, 2 vols. (1891)。

关于中世纪的信用票据史,最好著作是 H. Brunner, *Das französische Inhaberpapier* (1879)。另见他的"Zur Geschichte des Inhaberpapiers in Deutschland," in the *Zeitschrift für das gesammte Handelsrecht*, vols. 21 and 23. 关于荷兰的情况,参见 F. Hecht, *Geschichte der Inhaberpapier in den Niederlanden* (1869), p. 4。

顺便提一下,有趣的是,有人指出信用票据源出希腊。参见 Goldschmidt, "Inhaber-Order-und exekutorische Urkunden im Klassischen Altertum," in *Zeitschrift für Rechtsgeschichte Roms*, vol. 10 (1889), p. 352。

但是,Goldschmidt 的观点并未被普遍接受。参见 Benedict Frese, *Aus dem gräko-ägyptischen Rechtsleben* (1909), p. 26。对 Goldsehmidt 理论的另一项批评来自 H. Brunner, "Forschungen zur Geschichte des deutschen und französischen Rechts," in his *Gesammelte Aufsätze* (1894), p. 604。

Brunner 在其 *Französische Inhaberpapier*, pp. 28, 57 中也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探讨。

由 Kuntze 不经意提出的观点,遭到了 Goldschmidt 的反驳,*Zeitschrift für Rechtsgeschichte*, vol. 10, p. 355。

它还遭到 Salvioli 的反驳,*I titoli al portatore nella storia del diritto italiano* (1883)。

29. 参见 L. Auerbach, *Das judische Obligationenrecht*, vol. 1 (1871), p. 270. 来自拉比文献的其他段落,参见 Hirsch B. Fassel, *Das mosaisch-*

rabbinische Zivilrecht, vol. 2, Part 3 (1854), § 1390; Frankel, *Der gerichtliche Beweis nach mosaischem Recht* (1846), p. 386; Saalschütz, *Mosaisches Recht*, 2 vols. (1848), p. 862。

30. 关于"幔利",参见 L. L'Estocq, *Exercitatio de indole et jure instrumenti Judœis usitati cui nomen "Mamre" est* (1775), § vii; J. M. G. Besekes, *Thes. jur. Camb.*, Part II (1783), pp. 1169, 1176; P. Bloch, *Der Mamran, der judisch-polnische Wechselbrief*。

31. Ehrenberg, *op. cit.*, vol. 2, p. 141.

32. Brunner, *op. cit.*, p. 69.

33. Schaps, *op. cit.*, p. 121.

34. *Ibid.*

35. 参见 F. Hecht, *op. cit.*, p. 44。

36. Hecht, p. 96.

37. Däbritz, *op. cit.*, p. 53.

38. Kuntze, *op. cit.*, p. 85.

39. Straccha, *Tract. de assicur.* (1568).

40. A. Wahl, *op. cit.*, vol. 1, pp. 15, 84.

41. Hecht, *op. cit.*, p. 37.

42. 参见 J. H. Bender, *Der Verkehr mit Staatspapieren* (2 ed., 1830), p. 167。

43. "Ex diversis animi motibus in unum consentiunt, id est in unam sententiam decurrunt" (Ulp., L. I. § 3, *D. de pact.*, 2, 14).

44. 参见 Goldschmidt, *op. cit.*, p. 393。

45. 关于下文,我要尤其感谢 L. Auerbach, *op. cit.*, vol. 1, pp. 163, 251, 513. 此书(遗憾的是它未完成)以极富启发的方式写就,值得众所周知。它是现存关于《塔木德》律法的最重要论述之一。重要性不如前者但也十分有用的是,Saalschütz, *op. cit.*; H. B. Fassel, *op. cit.*; J. J. M. Rabbinowicz, *Législation du Talmud*, vol. 3 (1878); Frankel, *op. cit.* J. Kohler 在利用 Goldschmidt 的《塔木德》译本基础上,发表了"Darstellung des talmudischen Rechts," in *Zeitschrift für vergleichende Rechtswissenschaft*, vol. 20 (1908), pp. 161 - 264。参见 V. Aptowitzer 在 *Monatsschrift* (1908), pp. 37 - 56 中的批评。

46. Otto Stobbe, *Die Juden in Deutschland während des mittelalters* (1866), pp. 119, 242; Sachsenspiegel, III, 7, § 4.

47. Goldschmidt, *op. cit.*, p. 111.

48. (Isaac de Pinto) *Traité de la circulation du crédit* (1771), pp. 64, 67 - 68,另见 E. Guillard, *op. cit.*, p. 534 以及 Dabritz, *op. cit.*, p. 18 中的例证。

49. Ehrenberg, *Fugger*, vol. 2, p. 244. 关于证券交易所历史的情况，尤其要感谢 Ehrenberg。

50. 参见 Kaufmann, *op. cit.*。

51. Van Hemert, *Lectuur voor het ontbijt en de Theetafel*, VII[de]. Stuk, p. 118，引自 Koenen, *op. cit.*, p. 212。

52. H. Stephanus, *Francofordiense Emporium sive Francofordienses Nundinæ* (1574), p. 24.

53. 引自 Ehrenberg, *Fugger*, vol. 2, p. 248。

54. *Memoirs*, p. 297.

55. 提供自 M. Grunwald, *op. cit.*, p. 21。

56. S. Haenle, *op. cit.*, p. 173. *Die Juden in Österreich*, vol. 2 (1842), p. 41.

57. 出自一份日期为 1718 年 6 月 11 日的副长官 M. de Courson 的报告，引自 Malvezin, *op. cit.*。

58. E. Meyer, "Die Literatur für und wider die Juden in Schweden in Jahre 1815," in *Monatsschrift*, vol. 57 (1907), p. 522.

59. H. Sieveking, "Die Kapitalistische Entwickelung in den italienischen Städten des Mittelalters," in the *Vierteljahrsschrift für Soziale-und Wirtschaftsgeschichte*, vol. 7, p. 85.

60. Saravia della Calle, "Institutione de' Mercanti," in *Compendio utilissimo di quelle cose le quali a Nobili e Christiani mercanti appartengono* (1561), p. 42. 另见 art. "Börsenwesen" in *Handwörterbuch der Staatswissenshaften*。

61. H. Sieveking, *Genueser Finanzwesen*, vol. i. (1898), pp. 82, 175.

62. 有关 17 世纪最初几十年阿姆斯特丹的证券交易活动史，最可靠的材料是 Plakate of the States General，它禁止这种行业。那一时期关于这个问题的许多争论小册子也可作为参考材料，尤其是由证券和股票交易的反对者 Nicolas Muys van Holy 所写的材料。参见 Laspeyres, *Geschichte der volkswirtschaftlichen Anschauungen* (1863). 不应被忽略的还有 de la Vega 的著作，它的相关探讨更为详尽。随后出现了许多论述贸易重要性的著作，尤其是 J. P. Ricard, *Le négoce a'Amsterdam* (1723)，它频频为后来的作者引用。约瑟夫·德·平托的著作出现于 18 世纪下半期（参见注 48），同样很有用。最近关于这一问题的著作有：G. C. Klerk de Reus, *op. cit.*; S. van Brakel, *De Holland, Hand. Comp. der xvii. eeuv* (1908)。

63. In the periodical *De Koopman*, vol. 2, pp. 429, 439，引自 Ehrenberg, *Fugger*, vol. 2, p. 333.

64. Pinto, *De la Circulation*, *op. cit.*, p. 84.

65. Kohler, *op. cit.*

66. Israel, *op. cit.*

67. Ehrenberg, *Fugger*, vol. 2, p. 336,从这本非凡著作中摘选了颇长一段内容。

68. *Extrait d'un mémoire présenté en* 1692,来自法国外交部档案馆,载于 *Revue historique*, vol. 44 (1895)。我要感谢我的朋友、巴黎的 André E. Sayous 提醒我注意到这篇文章。

69. "The Anatomy of Exchange Alley, or a System of Stock-jobbing" (1719). Printed in J. Francis's *Stock Exchange* (1849), Appendix.

70. 参见 *Jewish Encyclopædia* 中的"经纪人"词条。

71. J. Piccotto, *op. cit.*, p. 58.

72. *Universal Dictionary of Trade and Commerce*, vol. 2(1755), p. 554.

73. Tovey, *Anglia Judaica*, p. 297.

74. 关于 1685 年基督徒商人的抱怨,参见 Ehrenberg, *Fugger*, vol. 2, p. 248。

75. M. Grunwald, *op. cit.*, p. 6.

76. Postlethwayt, *Dictionary*, vol. 1, p. 95.

77. Joseph Jacobs, "Typical Character of Anglo-Jewish History," in *J. Q. R.*, vol. 10 (1898), p. 230.

78. Ranke, *Französische Geschichte*, vol. 4^3, p. 399.

79. Mélon, *Essai pol. sur le commerce* (1734), éd. Davie, p. 685.

80. 参见 Ehrenberg, *Fugger*, vol. 2, p. 142。

81. (Du Hautchamp) *Histoire du système des Finances sous la minorité de Louis XV*, vol. 1 (1739), p. 184.

82. Oscar de Vallée, *Les Manieurs d'argent* (1858), p. 41.

83. P. A. Cochut, *Law, son système et son époque* (1853), p. 33.

84. E. Drumont, *La France Juive* (1904), vol. 1, p. 259.

85. 所有这些数据来自 *Von den Gilde-Dienern Friedrich Wilhelm Arendt und Abraham Charles Rousset herausgegebenen Verzeichnissen . . . der gegenwärtigen Aelter-Manner*, etc. (1801)。

86. 在 *Hamburger Münz-und Medaillenvergnügen* (1753), p. 143, No. 4 中,介绍了一种纪念证券与股票贸易的铸币。

87. Raumburger, in the preface to his *Justitia selecta Gent. Eur. In Cambiis*, etc.

88. Kiesselbech, *op. cit.*, p. 24.

89. 关于这个案件的具体情况,参见 von Gönner, *Von Staatsschulden, deren Tilgungsanstalten und vom Handel mit Staatspapieren* (1826), § 30。

90. *Dictionary*, vol. 2, p. 533. 另见富有启发性的文章"Monied Interest,"

p. 284。

91. 参见 articles "Monied Interest" and "Paper Credit" in Postlethwayt, vol. 2, pp. 284 and 404。

92. D. Hume, *Essays*, vol. 2 (1793), p. 110.

93. Adam Smith, *Wealth of Nations*, ch. 3.

94. Von Gönner, *op. cit.*, § 31.

95. Pinto, *op. cit.*, pp. 310 - 11.

96. Ehrenberg, *Fugger*, vol. 2, p. 299.

97. 我必须满足于提及以下三本在我看来最重要的著作：*Das Haus Rothschild. Seine Geschichte und seine Geschäfte*, 2 Parts (1857)；John Reeves, *The Rothschilds: the Financial Rulers of Nations* (1887)；R. Ehrenberg, *Grosse Vermögen*, etc., vol. 1, "Die Fugger-Rothschild-Krupp" (2nd ed., 1905)。

98. J. H. Bender, *Der Verkehr mit Staatspapieren* (2nd ed., 1830), p. 145.

99. 例如，von Gönner, *op. cit.*, p. 60；Bender, p. 142。

100. *Das Haus Rothschild*, vol. 2, p. 216.

101. A. Crump, *The Theory of Stock Exchange* (1873). 再版于 1903 年, p. 100。

102. Von Mensi, *op. cit.*, p. 54.

103. Ad. Beer, *op. cit.*, p. 43.

104. J. H. Bender, *op. cit.*, p. 5.

105. J. Francis, *Stock Exchange*, p. 161.

106. *Das Haus Rothschild*, vol. 2 (1857), p. 85.

107. 尽管存在偏见与片面，关于这一时期德国的最好著作是：Otto Glagau, *Der Börsen-und Gründungsschwindel in Berlin* (1876) 与 *Der Börsen-und Gründungsschwindel in Deutschland* (1877)。这些著作对于了解不同公司的历史概况尤其有用，其中提供了公司创立者与首批董事的名字。另见 the annual issues of Saling's *Börsenpapieren* 以及 Rudolf Meyer, *Die Aktiengesellschaften*, 1872 - 1873(然而它只讨论银行的情况)。正文中的数据是应我的要求由 Arthur Loewenstein 先生提供。

108. M. Wirth, *Geschichte der Handelskrisen* (3rd ed., 1883), p. 184.

109. Riesser, *Entwicklungs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Grossbanken* (1905), p. 48。

110. 对这个政策的美化，参见 J. E. Kuntze, *op. cit.*, p. 23。

111. A. Beer, *op. cit.*, p. 35.

112. C. Hegemann, *De Entwickelung des französischen Grossbankbetriebes* (1908), p. 9.

113. 详尽的参考书目，参见 J. Plenge, *Gründung und Geschichte des Crèdit mobilier* (1903)。

114. Model-Loeb, *Die Grossen Berliner Effectenbanken* (1895), p. 43, 一本出色的著作，我从中借鉴了许多有用的材料。

115. 参见 R. Ehrenberg, *Fondsspekulation* (1883) 以及 Adolf Weber, *Depositenbanken und Spekulationsbanken* (1902)。

116. 例如，参见 A. Gomoll, *Die Kapitalistische Mausefalle* (1908). 尽管这本书有着奇怪的标题，但它严肃探讨了证券交易所的投机活动，是近年出版的最好著作之一。

117. 许多事例来自地方历史，它们数量太多，无法在此一一提及。

第七章

1. König, *op. cit.*, p. 97.

2. "Zur Geschichte der Juden in Danzig," in *Monatsschrift*, vol. 6 (1857), p. 243.

3. M. Güdemann, "Zur Geschichte der Juden in Magdeburg," in *Monatsschrift*, vol. 14 (1865), p. 370.

4. 引自 Liebe, *op. cit.*, pp. 91 - 92。

5. Regesten, in Hugo Barbeck's *Geschichte der Juden in Nürnberg und Fürth* (1878), p. 68.

6. 例如，有关柏林零售商行会的经营情况，参见 Geiger, *Geschichte der Juden in Berlin*, vol. 2 (1871), pp. 24, 31。

7. Josiah Child, *Discourse on Trade*, 4th ed., p. 152. 蔡尔德记录了当时流行的观点，而没有加以任何评论。但他明确指出，犹太人获得的罪名根本不是犯罪。

8. 有关这一时期辩论小册子的摘录，参见 Hyamson, p. 274。

9. 参见 Léon Brunschvicg, "Les Juifs en Bretagne au 18 sc.," in *R. E. J.*, vol. 33 (1876), pp. 88, 111。

10. "Les Juifs et les Communautés d'Arts et Métiers," in *R. E. J.*, vol. 36, p. 75.

11. M. Maignial, *La question juive en France en* 1789 (1903), 包含了 17、18 世纪法国商人中间普遍对犹太人持敌视态度的大量材料。

12. "接纳这些商人非常危险。胡蜂奔向蜂窝，只是为了剖开小蜜蜂的肚子，以从其内脏中吸取蜂蜜——犹太人便是如此。"— Requête des marchands et négociants de Paris contre l'admission des Juifs (1777), p. 14, 引自 Maignial, *op. cit.*, p. 92。

13. 韦格林的观点来自 Ernst Meyer, *op. cit.*, pp. 513, 522。

14. Czacki, *Rosprava o Zydach*, p. 82;参见 Graetz, vol. 9, p. 443. 在罗马尼亚也听到了几乎同样的呼声,参见 Verax, *La Roumanie et les Juifs* (1903)。

15. Maignial, p. 92.

16. Philander von Sittewaldt, *op. cit.*

17. Georg Paul Hönn, *Betrugs-Lexicon, worinnen die meisten Betrügereyen in allen Ständen nebst denen darwider guten Theils aienenden Mitteln endeckt*, Dritte Edition (1724).

18. *Allgemeine Schatzkammer der Kaufmannschaft oder vollständiges Lexikon aller Handlungen und Gewerbe*, vol. 2 (1741), p. 1158.

19. *Charakteristik von Berlin. Stimme eines Kosmopoliten in der Wüste* (1784), p. 203.

20. J. Savary (Œuvre posthume, continué . . . par Phil-Louis Savary), *Dictionnaire universel de Commerce*, vol. 2 (1726), p. 447.

21. *Allgemeine Schatzkammer*, vol. 1 (1741), p. 17.

22. *Allgemeine Schatzkammer*, vol. 3 (1742), p. 1325.

23. 这是中世纪观点的唯一表达。对此问题出色的探讨,参见 R. Eberstadt, *Französische Gewerberecht* (1899), p. 378。

24. D. Defoe, *The Complete English Tradesman*, 1st ed., 1726. 我使用的是一卷本的第二版(1727 年)以及两卷本的第五版(1745 年),后者出版于作者去世之后。不过本书所引的段落来自第一版的第 82 页。

25. *Allgemeine Schatzkammer*, vol. 3, p. 148.

26. *Ibid.*, vol. 4, p. 677.

27. *Ibid.*, vol. 3, p. 1325.

28. *Ibid.*, vol. 3, p. 1326.

29. *Ibid.*, vol. 1, p. 1392 — "Sächsischen Krämer-Ordnungen" Of 1672, 1682, and 1692, § 18.

30. 参见很有启发的信件(No. 19 in the 2nd ed., corresponding to No. 22 in the 5th) "Of fine shops and fine shews"。

31. Jules de Bock, *Le Journal à travers les ages* (1907), p. 30,引自 F. Kellen, *Studien über das Zeitungswesen* (1907), p. 253。

32. 更多有用信息,尤其是英国的情况,参见 Henry Sampson, *History of Advertising from the Earliest Times* (1875), pp. 76, 83。

33. M. Postlethwayt, *A Universal Dictionary of Trade and Commerce*, 2 vols. (1741), 2nd ed. (1757), vol. 1, p. 22. 波斯特勒韦特称自己的著作是萨瓦里《词典》的译本,但实际上增补了许多原始材料。顺便说一下,它是有关 18 世纪英国经济状况价值极高的信息来源。

34. Savary, *Dict. du Commerce* (1726), Suppl. 1732.

35. P. Datz, *Histoire de la Publicité* (1894), p. 161, 其中收录了 *Les Petites Affiches* 杂志第一期的全部内容。

36. *Allgemeine Schatzkammer*, vol. 4, p. 677.

37. D. Defoe, *op. cit.*, vol. 5^2, p. 163.

38. 参见 G. Martin, *La grande industrie sous Louis XV* (1900), p. 247。

39. Josiah Child, *A New Discourse of Trade*, 4th ed., p. 159.

40. 这种教导早在 16 世纪末就已出现。我将 Saravia della Calle 视为公平价格理论史上最重要的人物，他从供求关系中推导出这个理论。他与 Venuti、Fabiano 的研究一起收录在 *Compendio utilissimo* 中。

41. (Mercier) *Tableau de Paris*, vol. 11 (1788), p. 40.

42. "A Paris on court, on se presse parce qu'on y est oisif; ici l'on marche posément, parce que l'on y est occupé."引自 J. Godard, *L'Ouvrier en Sole*, vol. 1 (1899), pp. 38 - 39。

43. Memoirs of the Rev. James Fraser, written by himself. *Selected Biographies*, vol. 2, p. 280; Durham's *Law Unsealed*, p. 324, 引自 Buckle, *History of Civilization*, vol. 2, p. 377。

44. Durham, *Exposition of the Song of Solomon*, 引自 Buckle, *loc. cit.*

45. *Allgemeine Schatzkammer*, vol. 4 (1742), p. 666.

46. 例如，参见 Mercier, *Tableau de Paris*, vol. 2, p. 71。

47. 撒母耳·兰贝在其关于国家银行的计划(参见第六章注 22)中，曾提及英国商人低下的商业道德，这与荷兰商人的可靠形成对比。

48. Owen Fellthan, *Observations* (1652), 引自 Douglas Campbell, *The Puritan in Holland, England, and America*, vol. 2 (1892), p. 327。

49. 这种针对犹太人的指控，自中世纪早期以来一直延续到今天。参见 G. Caro, *Sozial-und Wirtschaftsgeschichte der Juden*, vol. 1 (1908), p. 222; Bloch, *op. cit.*, p. 12; article "Juden," in *Allgemeine Schatzkammer*; von Justi, *Staatswirtschaft*, vol. 1 (1758), p. 150。尤其关于德国的情况，参见 Liebe, *Das Judenthum in der deutschen Vergangenheit* (1903)。

50. 根据一本关于汉堡葡萄牙人社团的记录：A. Feilchenfeld, "Die älteste 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Juden in Hamburg," in *Monatsschrift*, vol. 43 (1899), p. 279。

51. Geyler von Kaiserberg's sermon on the 93rd "Narrengeschwärm," in S. Brandt's *Narrenschiff* (收录在由 J. Scheible 出版的这个集子中 *Das Kloster*, vol. I, p. 722)。参见 Oskar Franke, *Der Jude in den deutschen Dichtungen des* 15, 16, *und* 17 *Jahrhunderts* (1905), 尤其是 section 4。

52. 引自 A. M. Dyer, *op. cit*; p. 44。

53. Will. Ussellinx,引自 Jameson, in *Transactions of the Jewish Historical Society of America*, vol. 1, p. 42. 关于 Usselinx,参见 E. Laspeyres, *Volkswirtschaftliche Ansichten der Niederlande* (1863), p. 59。

54. Savary, *op. cit.*, vol. 2, p. 449.

55. 参见 *Transactions of the Jewish Historical Society of America*, vol. 3, p. 44。

56. Josiah Child, *Discourse on Trade*, 4th ed., p. 152.

57. 参见 R. Ehrenberg, *Grosse Vermögen*, 2nd ed., p. 147。

58. *Annalen der Juden*, pp. 106 - 117.

59. Liebe, *Das Judentum*, p. 34.

60. Risbeck, *op. cit.* 另见 Scheube, *op. cit.*, p. 393。

61. *Uber das Verhältniss der Juden zu den Christen in den deutschen Handelsstädten* (1818), pp. 171, 252, 270, 272.

62. 参见 *R. E. J.*, vol. 33, p. 111。

63. H. Bodemeyer, *Die Juden. Ein Beitrag zur Hannoverschen Rechtsgeschichte* (1855), p. 68.

64. 参见 Albert Wolf, "Etwas über jüdische Kunst und ältere jüdische Künstler," in *Mitteilungen zur jüdischen Volkskunde*, edited by M. Grunwald, vol. 1 (1905), p. 34。

65. 参见 Ehrenberg, *Grosse Vermögen*, p. 147。

66. 这些文件刊行于 Kracauer, "Beiträge zur Geschichte der Frankfurter Juden im 30 jährigen Kriege," in *Zeitschrift für die Geschichte der Juden in Deutschland*, vol. 3 (1899), p. 147。参见 Schudt, *op. cit.*, vol. 2, 164。

67. *Ibid.*

68. *Ibid.*

69. *Annalen der Juden*, *op. cit.*, pp. 97, 106 - 117.

70. *Ibid.*

71. *Versuch über die jüdischen Bewohner der österreichischen Monarchie* (1804), p. 83. 其中包括许多有用的材料。

72. L. Hoist, *Judentum in allen dessen Teilen aus einem staatswissenschaftlichen Standpunkte betrachtet* (1821), pp. 293 - 294.

73. "Les fripiers de Paris qui sont à la plus part Juifs," Noel du Fail, *Contes d'Eutrapel*, xxiv,引自 G. Fagniez, *L'économie sociale de la France sous Henry IV* (1897), p. 217。

74. Mercier, *Tableau de Paris*, vol. 2, p. 253. 在布雷斯劳,这种吸引顾客的方法并不罕见,它被称作"Ärmelausreissgeschäfte"。

75. Romani, *Eines edlen Wallachen landwirtschaftliche Reise durch*

verschiedene Landschaften Europas. Zweyter Theil (1776), p. 150. 参见 Schudt, vol. 2, p. 164。

76. *Über das Verhältniss*, etc., p. 184.

77. Jules de Bock, *op. cit.*, p. 30.

78. Max J. Kohler, *op. cit.*

79. Bloch, *op. cit.*, p. 30.

80. Hyamson, *Jews in England*, p. 274.

81. S. Kahn, "Les Juifs de Montpellier au 18 siècle," in *R. E. J.*, vol. 33 (1896), p. 290.

82. Leon Brunschvicg, *op. cit.*, p. 111.

83. "Requête des marchands," etc., p. 234.

84. L. Kahn, *Les Juifs de Paris au XVIII sc.*, p. 71.

85. Justin Godard, *L'Ouvrier en Soie* (1899), p. 224.

86. 关于韦格林的观点,参见 Meyer, *op. cit.*, p. 522。

87. 参见 Czacki, *op. cit.*; Graetz, op. *cit.*;以及 Verax, *op. cit*。

88. *Annalen*, p. 97.

89. F. Bothe, *Beiträge zur Wirtschafts-und Sozial-Geschichte der Reichstadt Frankfurt* (1906), p. 74.

90. *Bericht der Kriegs-und Domänenkammer über den wirtschaftlichen Niedergang des Herzogtums Magdeburg* (1710),引自 Liebe, *Das Judentum*, p. 91。

91. Romani, *op. cit.*, p. 147.

92. In *Geschichte der Juden in der Reichstadt Augsburg* (1803), p. 42.

93. Von Mensi, *op. cit.*, p. 367.

94. *Allgemeine Schatzkammer*, vol. 2, p. 1158.

95. Will. Usselinx,引自 Jameson, in *Transactions* of the Jewish Historical Society of America, vol. 1, p. 42。关于 Ussellinx,参见 E. Laspeyres, *Volkswirtschaftliche Ansichten der Niederlande* (1863), 1. 59。

96. Mercier, *op. cit.*

97. *R. E. J.*, vol. 33, p. 111, in Kahn, *op. cit.*

98. Lambe, *op. cit.*

99. *Le cri du citoyen contre les juifs de Metz* (18 *sc.*),引自 Maignial, *op. cit*。

100. 参见 Bothe, *op. cit.*, p. 74。

101. Felltham, *op. cit.*"这个民族只制造低劣质量的次等纺织品。"

102. 引自 Liebe, *Das Judentum*, p. 91。

103. N. Roubin, "La vie commerciale des juifs contadines en Languedoc," in

R. E. J., vols. 34, 35, and 36.

104. *Uber das Verhältniss*, etc., p. 254.

105. Liebe, *op. cit.*

106. *Juden, sind sie der Handlung schädlich?* (1803), p. 25.

107. Graetz, vol. 9, p. 445.

108. Romani, *op. cit.*, p. 148.

109. 我要感谢 Josef Reizman 先生提醒我注意到这一内容。

110. Child, *Discourse on Trade*, p. 152.

111. Hyamson, p. 274.

112. *R. E. J.*, vol. 33, p. 290.

113. L. Hoist, *op. cit.*, p. 290.

114. 参见第七章注 61。

115. Hoist, *op. cit.*, p. 288.

116. *R. E. J.*, vol. 36.

117. *R. E. J.*, vol. 33, p. 289.

118. *Annalen*, p. 90.

119. 来自匈牙利宫廷档案馆 1786 年 1 月 9 日的一份记录，我要再次感谢 Josef Reizman 先生。

120. Königlichen Staatsarchiv(Ludwig Davidsohn 先生告诉了我这一点)。

121. "在美国，犹太贸易最显著的特征，就在于许多百货商店由犹太公司控制。"参见 *Jewish Encyclopædia* 中的"商业"词条(vol. 4, p. 192)。

122. 关于公司的名单，参见 J. Hirsch, *Das Warenhaus in Westdeutschland* (1910)。

123. *Juden, sind sie der Handlung schädlich?*, p. 33.

124. Henry Sampson, *A History of Advertising* (1875), p. 68.

第九章

1. 关于本章主题的更充分论述，参见我的一篇文章，"Der Kapitalistische Untemehmer," in *Archiv für soziale Wissenschaft und Soziale Politik*, vol. 29。

第十章

1. M. Kayserling, *op. cit.*, p. 708.

2. 对当时举世著名犹太公司的叙述，由玛拿西·本·以色列致克伦威尔的"谦恭的呈文"所提供。这些家族的故事可以在 *Jewish Encyclopædia* 中找到，它在传记方面尤为出色。

3. "Lettres écrites de la Suisse, d'Italie," etc., in *Encycl. mèth. Manuf.*, vol. 1, p. 407. 参见 Jovet 的观点，引自 Schudt, *Jüdische Merkwürdigkeiten*,

vol. 1, p. 228。

4. The *Spectator*, No. 495.

5. *Revue Historique*, vol. 44 (1890).

6. Graetz, vol. 5, p. 323.

7. 这些犹太外交家的例子众所周知，因而可以轻易列举。对此问题有特别兴趣者，应该参考 Graetz 的著作，从中可以找到大量材料（例如，vol. 6, pp. 85, 224; vol. 8. ch. 9, etc.）。

8. M. Kayserling, *Christopher Columbus* (1894), p. 106.

9. H. J. Koenen, *op. cit.*, p. 206.

10. Edmund Bonaffé, *Dictionnaire des amateurs français au XVII siècle* (1881), p. 191.

11. Friedländer, *Sittengeschichte Roms*, vol. 3, p. 577.

12. (v. Kortum) *Über Judentum und Juden* (1795), p. 165.

13. *Ibid.*, p. 90.

14. *R. E. J.*, vol. 23 (1891), p. 90.

15. M. de Maulde, *Les juifs dans les Etats français du Saint-Siège* (1886). 犹太人的法律地位往往被当前的犹太历史充分讨论，绝大多数这些犹太史事实上只不过是犹太人法律地位的历史。其实，许多这类作者自以为他们在撰写经济史，但他们仍在讨论法律史。关于文献记录，参考 Krünitz (vol. 31)中"Juden"的条目以及 Sehudt, *Jüdische Merkwurdigkeiten*（尤其关于法兰克福）。关于法国的情况，参见 Halphen, *Recueil des lois, etc., concernant les Israëlites* (1851)；关于普鲁士的情况，参见 L. von Rönne and Heinrich Simon, *Die früheren und gegenwärtigen Verhältnisse der Juden in den sämtlichen Landesteilen des preussischen Staates* (1843). 本书引用的所有法律都来自这个选集。A. Michaelis, *Die Rechtsverhältnisse der Juden in Preussen seit dem Beginn des 19 Jahrhunderts: Gesetze, Erlasse, Verordnungen, Entscheidungen* (1910)。

16. 参见 B. Bento Carqueja, *op. cit.*, pp. 73, 82, 91。

17. Wagenaar, *Beschrijving van Amsterdam*，引自 Koenen, *op. cit.*, p. 142. 此外，关于荷兰犹太人的财富（被过分夸大），参见 Schudt, vol. 1 (1714), p. 277; vol. 4 (1717), p. 208. 参见 M. Mission, *Reise nach Italien* (1713), p. 43。在最新的著作中，参见 M. Henriquez Pimentel, *op. cit.*, p. 34。

18. *Memoiren*, p. 134.

19. Savary, *Dict.*. vol. 2 (1726), p. 448.

20. Lucien Wolf, *The Jewry of the Restoration*, 1660 - 1664, p. 11.

21. 参见 H. Reils, "Beiträge zur ältesten Geschichte der Juden in

Hamburg," in *Zeitschrift des Vereins für hamburgische Geschichte*, vol. 2 (1847), pp. 357, 380, 405;以及 M. Grunwald, *op. cit.*, pp. 16, 26, 35。

22. 参见 M. Grunwald, *Hamburgs deutsche Juden*, pp. 20, 191。

23. F. Bothe, *Die Entwickelung der direkten Besteuerung der Reichsstadt Frankfurt* (1906), p. 166, Tables 10 and 15.

24. Kraeauer, *op. cit.*, p. 341.

25. Alexander Dietz, *Stammbuch der Frankfurter Juden* (1907), p. 408.

26. L. Geiger, *Geschichte der Juden in Berlin* (1871), vol. 1, p. 43.

第十一章

1. M. Lazarus, *Ethik des Judentums* (1904), pp. 67, 85, etc.(该书英文版已由美国犹太出版协会出版。)

2. Hermann Cohen, "Das Problem der jüdischen Sittenlehre. Eine Kritik (adverse) von Lazarus' Ethik des Judentums," in *Monatsschrift*, vol. 43, p. 385.

3. *Orach Chajim*, § 8.

4. 引自 F. Weber, *Altsynagogale Theologie* (1880), p. 273。

5. J. Wellhausen, *Israelitische und jüdische Geschichte*, p. 340.

6. Graetz, vol. 4, p. 411. Graetz 对《塔木德》及其在犹太教中的影响有出色评价(当然是片面和乐观的)。

7. J. Fromer, *Vom Ghetto zur modernen Kultur* (1906), p. 247.

8. M. Kayserling, *Columbus* (1894), ch. vi.

9. *Das Haus Rothschild*, vol. 1 (1857), p. 186.

10. 这里无法论述圣经评断学取得的成果。我在此仅提及一些,以作为这个问题的介绍:Zittel, *Die Entstehung der Bibel* (5th ed., 1891);关于《摩西五经》的历史,参见 Adalbert Merx, *Die Bücher Moses und Josua* (1907),以及 Ed. Meyer, *Die Entstehung des Judentums* (1896)。

11. W. Frankenberg, "Die Sprüche, übersetzt und erläutert," in *Handkommentar zum Alten Testament*, herausgegeben von D. W. Nowack. 在第 16 页中,有一份关于《智慧书卷》的参考书目清单。另见 Henri Traband, *La loi mosaïque, ses origines et son développement* (1903), p. 77。

12. 参见 M. Friedländer, *Geschichte der jüdischen Apologetik* (1903)。

13. 有关《塔木德》的著作已经构成了一座小型的图书馆。我只提及一两本,以作为对这一问题的介绍。最好的就是 H. L. Strack, *Einleitung in den Talmud* (4th ed., 1908),它还包括相当全面的参考文献。关于《塔木德》伦理,参见 Salo Stein, *Materialien zur Ethik des Talmud* (1904)。然而,《塔木德》学者对它的评价并不高。J. Fromer 专注于研究《塔木德》及之后的犹太文

献，他的近作是 *Die Organization des Judentums*（1908），其目的在于充当《塔木德》百科全书式词典的入门，这是 Fromer 所设想的。有关犹太宗教经典的另一本著作是 E. Schürer 三卷本的 *Geschichte des jüdischen Volkes im Zeitalter Jesu Christi*，在第一卷（1890 年第二版）第三章中包含了大量参考文献。此外，出色的犹太史，特别是 Graetz 的著作也探讨了这部犹太文献。

要想理解《塔木德》的精神，就必须去阅读它的文本。Lazarus Goldschmidt 将《塔木德》（几乎全部内容）译为德文。《塔木德》具有这个特征：尽管章节之间是以某种固定的顺序安排的，但它们都没有为其主题所严格限定。它们几乎讨论着《塔木德》所有领域里的主题。因此，通过对 63 个篇章中一个或多个的学习，能够比较容易地获得对于整个内容的清楚概念，就如同在这片茫茫大海中发现了道路一般。特别推荐的就是 *Baba Mezia* 篇及其两个姐妹篇（*Baba Kama* 与 *Baba Bathra*）。*Baba Mezia* 有个很好的版本，由 Sammter 博士作序并翻译（1876 年）。

《塔木德》文献的一个特别分支由所谓的“小篇章”构成，通常作为《塔木德》的附录出现，尽管时常独立出版。这些是 *Derech Erez Rabba*（3 世纪）、*Aboth*、*Aboth de R. Nathan*、*Derech Erez Zutta*（9 世纪，根据聪茨的研究）。聪茨将它们称为“伦理的哈加达”，因为其目的显然在于教导实用的智慧。它们对犹太民族的发展影响不小，因而让我们深感兴趣。这些篇章有着仅次于《圣经》的普及度。它们构成那些不熟悉《塔木德》的普通信徒的基本读物。它们可以在祈祷书和礼拜文中找到。它们中有些已被译成德文出版。*R. Nathan's System der Ethik und Moral* 由 Kaim Pollock（1905）翻译，*Derech Erez Zutta* 由 A. Tawrogi（1885）翻译，*Derech Erez Rabba* 由 M. Goldberg（1888）翻译。我们还必须提及《托萨夫塔》（*Tosephta*），其中包含《密释纳》中所没有的教导。它也出现于坦拿时代，并像《密释纳》那样被整理。

最后要稍稍提一下拉比评注或《米德拉西》，它们部分是哈拉哈（即律法法典）、部分是哈加达（即道德教谕）。其中最古老的，多数为哈拉哈，包括 *Mechilta*（即《出埃及记》评注）、*Siphra*（《利未记》评注）、*Siphre*（《民数记》与《申命记》的评注）。

《塔古姆》（*Targumim*）是《旧约》的阿拉米语译本。

14. 关于《布就筵席》，没有很好的译本。唯一的译本由 Löwe（1837 年）翻译，它不完整而且片面。另一方面，*Orach Chajim* 与 *Jore Deah* 已由拉比 P. Lederer 在一家德国出版社出版（1906 与 1900 年），但也不完整。

至于对《布就筵席》的研究著作，绝大多数是护教性质的小册子。反犹太主义者求助于《布就筵席》，从中收集攻击犹太人与犹太教的材料；犹太学者自然予以回击。例如，我们可以提及 A. Lewin, *Der Judenspiegel des Dr. Justus*（1884）与 D. Hoffmann, *Der Schulchan Aruch und die Rabbiner über das Verhältniss der Juden zu Andersgldäuigen*（1885）。因此，不存在对《布就筵

席》的客观研究，尽管它应当像《塔木德》一样被彻底研究。我知道的唯一严谨而科学的著作是 S. Bäck, *Die religionsgeschichtliche Literatur der Juden in dem Zeitraume vom* 15－18 *Jahrhundert* (1893)，重印自 Winter and Wünsche, *Die jüdische Literatur seit Abschluss des Kanons*, vol. 2. 但是，Bäck 著作的篇幅不大，只是概览性研究。

15. Paul Volz, *Jüdische Eschatologie von Daniel bis Akiba* (1903).

16. Fürst, *Untersuchungen über den Kanon des Alten Testaments nach den Uberlieferungen in Talmud und Midrasch* (1868).

17. L. Stern, *Die Vorschriften der Thora, welche Israel in der Zerstreuung zu beobachten hat. Ein Lehrbuch der Religion für Schule und Familie* (4th ed., 1904), p. 28. 该书可视为一个代表，表达了在严格正统派圈中流行的观点。

18. 参见 Rabbi S. Mandl, *Das Wesen des Judentums* (1904), p. 14. Mandl 依据 J. Gutmann, *Uber Dogmenbildung und Judentum* (1894)。另见 S. Schechter, "The Dogmas of Judaism," in *J. Q. R.*, vol. 1 (1889), pp. 48, 115。众所周知，摩西·门德尔松首次（在其《耶路撒冷》中）表达了犹太教没有教义的观点，并相当强调这点。

19. 我最熟知的就是 Ferdinand Weber, *System der altsynagogalen palästinensischen Theologie aus Targum, Midrash und Talmud* (1880)。

20. Stern, *op. cit.*, p. 5.

21. Döllinger, *Heidentum und Judentum* (1857), p. 634.

22. Rutilius Namatianus, "De reditu suo," in Reinach's *Textes d'auteurs grecs et romains relatifs au judaisme*, vol. 1 (1895), p. 358.

23. Stern, *op. cit.*, p. 49; S. R. Hirsch, *Versuche über Jissroëls Pflichten in der Zerstreuung* (4th ed., 1909), § 711.

24. 参见 Weber, *op. cit.*, p. 49。韦伯对犹太教契约（contract）观念的研究超出了其他任何作者。本书论述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他。我还借用了他的参考文献。关于这个特例，参见 *Sifre*, 12*b*, *Wajjikra Rabba*. c. 31。

25. *Aboth*, II, near the beginning.

26. 参见 Weber, *op. cit.*, pp. 270, 272。

27. *Ibid.*, p. 292.

28. R. Joseph Albo, *Ikkarim*，这是一本论述犹太教信条的著作，出现于 15 世纪。W. Schlesinger 与 L. Schlesinger 于 1844 年出版了它的德文译本（译自希伯来文）。这个特别问题在第 46 章中有探讨。

29. S. R. Hirsch, *op. cit.*, ch. 13, 尤其是 § § 100 and 105。

30. J. F. Schröder, *Talmudisch-rabbinisches Judentum* (1851), p. 47.

31. Graetz, vol. 2, p. 203 and note 14; J. Bergmann, *Jüdische Apologetik im neutestamentlichen Zeitalter* (1908), p. 120. 关于古代犹太教的精神，参见

Wellhausen, *op. cit.*, ch. 15。

32. H. Deutsch, *Die Sprüche Salomons nach der Auffassung in Talmud und Midrasch* (1885).

33. J. F. Bruch, *Weisheitslehre der Hebräer* (1851), p. 135.

34. Rabbi S. Schiffer, *Das Buch Kohelet. Nach der Auffassung der Weisen des Talmud und Midrasch* (1884).

35. 参见 Graetz, vol. 4, p. 233; Wellhausen, *op. cit.*, pp. 250, 339;另见 Müller、Schürer 与 Marti 的出色研究。

36. Mandl, *op. cit.*, p. 14.

37. S. R. Hirsch, *op. cit.*, § 448.

38. 许多类似的《塔木德》文献摘录可以从这里找到:S. Schaffer, *Das Recht und seine Stellung zur Moral nach talmudischer Sitten-und Rechtslehre* (1889), p. 28。

39. M. Lazarus, *op. cit.*, p. 22. Lazarus 出色论述了成为神圣就意味着克服情欲的观念,但他的方法非常接近康德的伦理体系。

40. *Kiddushin*, 30*b*, *Baba Bathra*, 16*a*.

41. 参见 Schaffer, *op. cit.*, p. 54。

42. 参见 Fassel, *Tugend-und Rechtslehre des Talmud* (1848), p. 38。

43. Albo, *Ikkarim*(注 28), ch. 24, 充分地讨论了这一点。

44. 参见 S. Bäck, *op. cit.*, Preface;另见 M. Lazarus, *op. cit.*, p. 20。

45. Stern, *op. cit.*, p. 126.

46. *Aboth de R. Nathan*, xxi. 5 (另见 *Aboth*, III, 14).

47. G. F. Oehler, *Theologie des A. T.* (3rd ed., 1891), p. 878.

48. Lazarus, *op. cit.*, p. 40.

49. *Aboth de R. Nathan*, xvi. 6.

50. 参见 Eceles. 1, 8; Prov. x. 8; x. 10; x. 31; xiv. 23; xvii. 27, 28; xviii. 7, 21; xxi. 23; Ecclus. iv. 34 (29); v. 15 (13); ix. 25 (18); xix. 20, 22。

51. Stern, *op. cit.*, No. 127*a*.

52. 另见 Prov. xii. 27; xiii. 11; xviii. 19; xxi. 20. 关于赞美劳动的更多段落,参见 L. K. Amitai, *La sociologie selon la lègislation juive* (1905), p. 90。

53. Hirsch, *op. cit.*, § 448.

54. *Ibid.*, § 463; and Stern, *op. cit.*, p. 239.

55. Hirsch, *op. cit.*, § 443, 几乎相同的表达来自 Stern, *op. cit.*, Nos. 125, 126。

56. J. Fromer, *op. cit.*, p. 25.

57. *Iggeret ha-Kodesh*,首次出版于 1556 年,由 Gaffareli 译成拉丁文,参

见 Graetz, vol. 7, p. 46。

58. Hirsch, *op. cit.*, § 263. 另见§ 264, § 267。

59. 这些数据来自 Hugo Nathansohn, "Die unehelichen Geburten bei den Juden," in *Z. D. S. J.*, vol. 6, (1910), p. 102。

60. 我们应当提及最重要的权威之一 S. Freud。参见他的 *Sammlung kleiner Schriften zur Neurosehlehre* (2nd series, 1909)。

61. 参见 Dr. Hoppe, "Die Kriminalitat der Juden und der Alkohol," in *Z. D. S. J.*, vol. 3 (1907), p. 38; H. L. Eisenstädt, "Die Renaissance der jüdischen Sozialhygiene," in *Archiv für Rassen-und Gesellschaftsbiologie*, vol. 5 (1908), p. 714; L. Cheinisse, "Die Rassenpathologie und der Alkoholismus bei den Juden," in *Z. D. S. J.*, vol. 6 (1910), p. 1。可以很有把握地证明,犹太人能摆脱酗酒(以及梅毒)的邪恶影响,是由于他的宗教。

62. Wellhausen, *op. cit.*, p. 119.

63. Cicero, *Pro Flacco*, ch. 28.

64. Mommsen, *Römische Geschichte*, vol. 5, p. 545.

65. 这些段落参见 Felix Stähelin, *Der Antisemitismus des Altertums* (1905)。参见 Reinach, *op. cit*。

66. J. Bergmann, *op. cit.*, p. 157.

67. Graetz, vol. 5, p. 73.

68. Graetz, vol. 5, p. 321.

69. Graetz, vol. 6, pp. 140, 161.

70. 关于旧有犹太律法体制对利息的全面论述,参见 J. Heici, *Das alttestamentliche Zinsverbot* (*Biblische Studien*, herausgegeben von O. Bardenhewer, vol. 12, No. 4, 1907)。

71. 参见 Hoffmann 编辑的《答问》集, in *Schmollers Forschungen*, vol. 152。

72. 参见 Fassel, *op. cit.*, p. 193; E. Grünebaum, *Die Sittenlehre der Juden andern Bekenntnissen gegenüber* (2nd ed., 1878), p. 414; 同一作者的 "Der Fremde nach rabbinischen Begriffen," in *Geigers jüdische Zeitschrift*, vols. 9 and 10; D. Hoffmann, *op. cit.*, p. 129; Lazarus, *op. cit.*, § 144. Lazarus 的观点不全面。他在他的第三章中论述了以色列人对非犹太人履行的义务,这充分表达了他内心的想法,但这难以与历史事实相符。

73. 参见 *Choshen Mishpat*, § § 188, 194, 227, 231, 259, 266, 272, 283, 348, 389, etc。

74. "一旦站在神的面前,此人被问的第一个问题是:你在商业中是否诚实坦白?"*Sabbath*, 31*a*。这段《塔木德》引文是一本讨论诚实的小书(私印本)的题词,此书是拉比 Stark 写的 *Das Biblisch-rabbinische Handelsgesetz*。

75. *Choshen Mishpat*, § 231. 书中所引的段落来自§ 227。

76. Graetz, vol. 10, pp. 62, 81.

77. *Choshen Mishpat*, § 227; *Baba Mezia*, 49*b*.

78. 此外,参见 John G. Dow, "Hebrew and Puritan," in *J. Q. R.*, vol. 3 (1891), p. 52。

79. Graetz, vol. 9, pp. 86, 213; vol. 10, p. 87; Hyamson, p. 164; *J. Q. R.*, vol. 3, p. 61.

第十二章

1. 另见 R. S. Woodworth, "Racial Differences in Mental Traits," in *Bulletin mensuel des Institut Solvay* (1910), No. 21。

2. Anatole Leroy-Beaulieu, *Israël chez les nations* (1893), p. 289;另见 H. St. Chamberlain, *Die Grundlagen des* 19 *Jahrhunderts* (3rd ed., 1901), p. 457。(该书现在已有英文版。)

3. 我在此无法对"人民"、"民族"、"民族性"等词相关的诸多意义深入研究。读者可以从 F. J. Neumann 的出色研究 *Volk und Nation* (1888)中找到需要的内容,另见 Otto Bauer, *Die Nationalitätenfrage und die Sozialdemokratie* (1907); F. Rosenblüth, *Zur Begriffsbestimmung von Volk und Nation* (1910)。

4. A. Jellinek, *Der jüdische Stamm in Sprichwörtem* (2nd series, 1882), pp. 18, 91.

5. J. Zollschan, *Das Rassenproblem unter besonderer Berücksichtigung der theoretischen Grundlagen der jüdischen Rassenfrage* (1910), p. 298.

6. Jellinek, *op. cit.*, (3rd series, 1885), p. 39.

7. Juan Huarte de San Juan, *Examen de ingenios para las Sciencias. Pomplona* (1575), (Biblioteca de autores Españoles, lxv, p. 469).

8. Jellinek, *op. cit.* 这本书由著名的维也纳拉比所写,是现有关于犹太精神的最佳著作之一。另一本很好的著作是 D. Chwolson 的小册子 *Die semitischen Völker* (1872),它批评了勒南的 *Histoire générale et système comparé de langues Sèmitique* (1855)。在我看来,第三位深入探究犹太灵魂的作者就是卡尔·马克思,见其 *Judenfrage* (1844)。在这些人(都是犹太人!)之后对犹太精神进行的研究,要么是在重复他们的话,要么是在歪曲真相。

9. 关于犹太数学家的情况,参见 M. Steinschneider in *Monatsschrift*, vols. 49-51 (1905-7)。

10. 关于犹太医生的情况,参见 M. Kayserling, "Zur Geschichte der jüdischen Aerzte," in *Monatsschrift*, vols. 8 (1859) and 17 (1868)。

11. Zollschan, *op. cit.*, p. 159.

12. C. Lassen, *Indische Altertumskunde*, vol. 1 (1847), p. 414.

13. "在这个民族身上体现出某种高贵而又傲慢的特征", Pinto, "Reflexions," etc., in the *Lettres de quelques juifs*, vol. 1, p. 19。

14. J. M. Jost, *Geschichte des Judentums und seiner Sekten*, vol. 3 (1859), p. 207.

15. *Derech Erez Zutta*, ch. viii.

16. *Megilla*, 16.

17. *Midrash Rabba* to Genesis, 1, 44.

18. 原文"Développer une chose qui existe en germe, perfectionner ce qui est, exprimer tout ce qui tient dans une idée qu'il n'aurait pas trouvée seul."— M. Murel, *L'esprit juif* (1901), p. 40。

19. K. Knies, *Credit*, vol. 1, p. 240; vol. 2, p. 169.

第十三章

1. F. Martius, "Die Bedeutung der Vererbung für Krankheitsenstehung und Rassenerhaltung," in *Archiv für Rass. und Ges. Biologie*, vol. 7 (1910), p. 477.

2. 近期关于犹太人的人种学与人类学的最重要研究如下: von Luschan, "Die anthropologische Stellung der Juden," in *Korrespondenzblatt für Anthropologie*, vol. 23 (1892); Judt, *Die Juden als Rasse* (1903)。从历史学角度来看, Ed. Meyer的 *Die Israeliten und ihre Nachbarstämme* (1906)对这个问题有许多出色见解。与这本出色著作齐名的是稍早的 A. Bertholet, *Die Stellung der Israeliten und der Juden zu den Fremden* (1896)。关于巴比伦的全部文献,这里也必须提及,它们是 Winkler、Jeremias 及其他人的著作。最近又有一本新作: W. Erbt, *Die Hebräer. Kanaan im Zeitalter der hebraischen Wanderung und hebraischen Staatengründung* (1906)。

3. H. V. Hilprecht, *The Babylonian Expedition of the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Series A, Cuneiform Texts, vol. 9 (1898), p. 28; 同一作者的 *Explorations in Bible Lands during the 19th Century* (1903), p. 409。

4. 参见 von Luschan, "Zur phys. Anthropologie der Juden," in *Z. D. S. J.*, vol. 1 (1905), p. 1。

5. 这一理论的主要解释者是 Ludwig Wilser, 他在众多论文中提出这个观点,并在著作 *Die Germanen* (1903)中详加论述。其主要反对者是 Zollschan, *op. cit.*, p. 24。

6. Mommsen, *Römische Geschichte*, vol. 5, p. 549.

7. Graetz, vol. 5, pp. 188, 330, 370.

8. Graetz, vol. 7, p. 63.

9. 所有这些例子，来自 Lindo(参见第五章注 22)，p. 10。

10. 见他对 Hoeniger 的批评，后者认为正文中的观点适用于科隆的情况。Brann 的其他支持者是 Lau, Kuessen, and A. Kober, *Studie zur mittelalterlichen Geschichte der Juden in Köln am Rhine* (1903), p. 13。

11. Maurice Fishberg, "Zur Frage der Herkunft des blonden Elements im Judentum" in *Z. D. S. J.*, vol. 3 (1907), pp. 7, 25. 与之相反的观点，参见同一杂志中的这篇文章：Elias Auerbach, "Bemerkungen zu Fishbergs Theorie," p. 92。

12. 参考 F. Sofer, "Über die Plastizität der menschlichen Rassen," in *Archiv für Rass. und Ges. Biologie*, vol. 5 (1908), p. 666; E. Auerbach, "Die jüdische Rassenfrage," in the same journal, vol. 4, p. 359; also vol. 4, p. 370, von Luschan 在这里陈述了几乎相同的观点。另见 Zollschan, *op. cit.*, pp. 125, 134, etc。

13. 关于这个结果，参见 Judt, *op. cit*。另见 A. D. Elkind, *Die Juden. Eine vergleichend-anthropologische Untersuchung* (1903)。我通过来自 Weinberg 载于 *Archiv für Rass. und Ges. Biologie*, vol. 1 (1904), p. 915 的评论知道这本书。另见 Elkind 的"Anthropologische Untersuchungen über die russ.-polnischen Juden," in *Z. D. S. J.*, vol. 2 (1906), pp. 49, 65，以及他的另一篇文章，载于 vol. 4 (1908), p. 28; Leo Sofer, "Zur Anthropologische Stellung der Juden," in *Pol. anthrop. Revue*, vol. 7(参见 *Z. D. S. J.*, vol. 4, p. 160 对此的评论)。参见 E. Auerbach, *op. cit.*, p. 332; Aron Sandier, *Anthropologie und Zionismus* (1904)，尽管他的研究并非是第一手的；Zollschan, *op. cit.*, pp. 125, 134, etc。

14. 阿什肯纳兹人与塞法尔迪人之间存在"种族差异"这一理论的支持者有：S. Weissenberg, "Das jüdische Rassenproblem," in *Z. D. S. J.*, vol. 1 (1905); M. Fishberg, "Beiträge zur phys. Anthropologie der nordafrikanischen Juden," ditto. 反对者是我在注 13 中提及的绝大多数作者。

15. 对这个问题的全面考虑，参见 Leo Sofer, "Zur Biologie und Pathologie der jüdischen Rasse," in *Z. D. S. J.*, vol. 2 (1906), p. 85. 更深入的观点，参见 *Biologie*, vol. 4 (1907), pp. 47, 149 上的论文：Siegfried Rosenfeld, "Die Sterblichkeit der Juden in Wien und die Ursachen der jüdischen Mindersterblichkeit"。

16. F. Hertz, *Moderne Rassen-Theorie* (1904), p. 56.

17. C. H. Stratz, *Was sind Juden? Eine ethnographischanthropologische Studie* (1903), p. 26.

18. 相关例证，参见 Judt, *op. cit.* 及其他，另见 L. Messerschmidt, *Die Hettiter* (1903)。

19. 参见 Hans Friedenthal, *Über einen experimentalen Nachweis von Blutsverwandtschaft*（1900）。另见他的 *Arbeiten aus dem Gebiete der experimentellen Physiologie*（1908）以及 Carl Bruck, "Die biologische Differenzierung von Affenarten und menschlichen Rassen durch spezifische Blutreaktion", 重印自 *Berliner Klinischen Wochenschrift*, vol. 4（1907）, p. 371。

20. Von Luschan, "Offener Brief an Herrn Dr. Elias Auerbach," in *Archiv für Rassen und Ges. Biologie*, vol. 4（1907）, p. 371.

21. A. Ruppin, "Die Mischehe," in *Z. D. S. J.*, vol. 4, p. 18.

22. Mommsen, *Römische Geschichte*, vol. 5, p. 529.

23. M. Braunschweiger, *Die Lehrer der Mischna*（1890）, p. 27.

24. Graetz, vol. 6, p. 22.

25. Graetz, vol. 6, 320.

26. Gregor. Ep. ix. 36, in Schipper, p. 16.

27. Herzfeld, *Handelsgeschichte der Juden des Altertums*, p. 204.

28. 或许，Herzfeld已经充分地讨论了这些问题。但是，除了存在文本解释上的许多错误之外，他在文件日期上也有错误。他仍然坚持评断学出现之前流行的年代表，因而将他使用的绝大多数材料设定在流放时代之前。

29. 关于《塔木德》时期的情况，参见 Herzfeld, *op. cit.*, p. 118，其中给出了一百多个进口到巴勒斯坦的商品。

30. A. Bertholet, *op. cit.*, p. 2.

31. 参见 Büchsenschütz, *Besitz und Erwerb im griechischen Altertum*（1869）, p. 443。

32. L. Friedländer, *Sittengeschichte Roms*, vol. 3, p. 571.

33. *Kiddushin*, 82*b*.

34. *Aboth de R. Nathan*, xxx. 6.

35. *Pesachim*, 113*a*.

36. *Pesachim*, 50*b*. 另见 J. Hamburger, *Real-Encyklopädie des Judentums*（1883, 1886），此书"Welthandel"和"Handel"这两个词条中包含了与这一主题相关的更多材料。

37. A. Bertholet, "Deuteronomium"（1899）, in Marti's *Kurz. Handkommentar zum A. T.* 关于正文引用的这个段落，Bertholet认为在它所说的那个时代中，以色列人已经作为一个商业民族散居在世界各地，并且因为他们的财富而成了世界的一个动力。Bertholet告诉我们，《申命记》第15章4—6节是后来添加进来的，因为这些句子明显指向以色列的广泛散居，他倾向于将之确定在亚历山大之后的希腊化时期。

但我无法相信犹太人在那时就是一个散居的商业民族。为了确保我没有

忽视重要的段落，我给 Bertholet 教授写信，询问他的观点之依据。在回复中，他告诉我，依据就在《箴言》7:19、12:11、13:11、20:21、23:4、24:27、28:19，20,22;《传道书》26:29—27:2。这些段落探讨了财富的危险。我已在其他地方分析了它们。然而，在我看来，它们中没有任何一处反映了大型贸易的存在。当然，《箴言》第 7 章 19 节**可能**指一个行商，但也不是必然的。当我们得知多比(Bertholet 教授也提及此人)是撒缦以色王的"采购员"(agorastes)并因此收入可观时，这难道不更有可能是指一种封建社会状况？此外，阿迪亚波纳宫中的商人亚拿尼亚(约瑟夫斯提到他)，可能是一个宫廷犹太人(Hofjude)。当然，我并不否认犹太人参与了国际贸易。但我认为，这在他们中间并不典型。放债才在他们那儿是典型的，对此有人会说(如 Bertholet 那样)，以色列在那时(即亚历山大之后的时期)就已是世上一股强大的力量。

38. 我要感谢 Bertholet 教授提醒我注意这份文件。

39. E. Renan, *Les Apôtres* (1866), p. 289.

40. J. Wellhausen, *Medina vor dem Islam* (1889), p. 4.

41. 参见 Aronius, *Regesten zur Geschichte der Juden im fränkischen und deutschen Reiche bis zum Jahre* 1273 (1902), Nos. 45, 62。

42. 参见 Lindo, *op. cit.*, p. 73。

43. 关于犹太人的法规，参见 Cunningham, *Growth of English Industry and Commerce*, vol. 1 (1905), p. 204。

44. Wassermann, "Die Entwickelung der jüdischen Bevölkerung in d. Provin. Posen," in *Z. D. S. J.*, vol. 6 (1910), p. 37.

45. F. Delitzsch, *Handel und Wandel in Altbabylon* (1910), p. 33. 参见 Heicl, *Alttestamentliches Zinsverbot* (1907), p. 32, 尤其是 p. 54。

46. Weber, article "Agrargeschichte im Altertum," in *Handwörterbuch der Staatswissenschaften*. 另见 Marquardt, *Römische Staatsverwaltung*, vol. 2, p. 55。

47. 1436 与 1437 年，许多犹太典当商受佛罗伦萨市议会邀请，来到当地为亟需现金的穷人提供帮助。参见 M. Ciardemi, *Banchieri ebrei in Firenze nel secolo XV e XVI* (1907)。

当拉文纳市准备加入威尼斯共和国时，其归附的条件之一就是犹太富人可以前往那里开办贷款银行，以减少贫困人口。参见 Graetz, vol. 8, p. 235。

"我们已经看到，截止于 1420 年，金融业在罗马犹太人的控制下逐渐得到了发展；从 1420 到 1550 年，情况变得更加有利，因此我们发现它获得了更大发展。实际上，对于意大利的市镇来说，与犹太人就放债达成正式协议已司空见惯。"参见 Theiner, Cod. dipl. 3, 335, in Paul Rieger's *Geschichte der Juden in Rom* (1895), p. 14。

48. A. Moreau de Jonnès, *Statistique des peuples de l'antiquité*, vol. 1

(1851), p. 98. 关于《圣经》中的统计情况,参见 Max Waldstein in *Statistische Monatsschrift*, Vienna (1881)。

49. A. Jeremias, *Das alte Testament im Lichte des alien Orients* (2nd ed., 1906), p. 534.

50. F. Buhl, *Die sozialen Verhältnisse der Israeliten* (1899), pp. 88, 128.

51.《塔木德》拉比的生平记载已有很多。参见 Strack, *op. cit.*; Graetz, in vol. 4; A. Sammter 在其 *Baba Mezia* 译本(1876)中的附录以及 M. Braunschweiger, *Die Lehrer der Mishna* (1890)。

52. Mommsen, *Römische Geschichte*, vol. 5, p. 529.

53. 第四次托莱多公会议(633 年)第 58 条教会法,引自 Lindo, *op. cit.*, p. 14。

54. J. Wellhausen, *op. cit.*, vol. 4, p. 14.

55. 参见 Graetz, vol. 5, p. 345。

56. 参见 Graetz, vol. 5, pp. 11, 39, 50;以及 Schipper, *op. cit.*, pp. 20, 35; Aronius, *op. cit.*, Nos. 45, 62, 173, 206, 227, etc. Caro, *op. cit.*, p. 83 是如何得出相反结论的,这不易看出来。

57. 关于直到 12 世纪的情况,参见 Schipper, *op. cit.* 的参考书目,另见我的 *Moderne Kapitalismus*, vol. 1。

58. K. F. W. Freiherr von Diebitsch, *Kosmopolitische, unparteiische Gedanken über Juden und Christen* (1804), p. 29.

59. 我无法给出生物学、人类学与人种学方面著作的完整书目,这里只列举其中一些,以引导读者。

Moritz Wagner 的著作对我而言价值很高:*Die Darwinsche Theorie und das Migrationsgesetz* (1868); *Über den Einfluss der geographischen Isolierung und Kolonienbildang auf die morphologische Veränderung der Organismen* (1871); *Die Enstehung der Arten durch räumliche Sonderung* (1889)。

Ludwig Gumplovicz, *Der Rassenkampf* (1883); *Die soziologische Staatsidee* (2nd ed., 1901); Ward, *Reine Soziologie*, vol. 1; L. Woltmann, *Politische Anthropologie* (1903)。

关于遗传问题,参见 H. E. Ziegler, *Die Vererbungslehre in der Biologie* (1905); W. Schallmeyer, *Vererbung und Auslese* (2nd ed., 1910); R. Sommer, *Familienforschung und Vererbungslehre* (1907); F. Martius, *Das pathologische Vererbungsproblem* (1909); J. Schultz, *Die Maschinentheorie des Lebens* (1909); W. Bölsche, *Das Liebesleben in der Natur* (1909)。

第十四章

1. 关于古代巴勒斯坦的社会与经济状况,没有太多书目可供列出。或许

最好的要数 F. Buhl 的著作(第十三章注 50)。近作是 Max Lohr, *Israels Kulturentwickelung* (1911)。

2. Wellhausen, *Proleg.*, p. 10;参见 Budde, *The Nomadic Ideal in the O. T.* (1895)。

3. F. Ratzel, *Völkerkunde*, vol. 3, p. 47.

4. *Kiddushin*, 71*a*. 参见 Graetz, vol. 4, p. 273。

5. Graetz, vol. 4, p. 321.

6. 可用于佐证的《圣经》段落,参见 Herzfeld, *Handelsgeschichte der Juden des Altertums*, note 9。

7. 关于这个估算,参见 Buhl, *op. cit.*, p. 52。

8. Philo, in *Flaccum*, 6 (II, 523, Mangey), in Stähelin, *op. cit.*, p. 33.

9. L. Friedländer, *Sittengeschichte Roms*, vol. 3, p. 570.

10. Cassel, in the article "Juden" in Ersch and Gruber, p. 24.

11. Tacitus, *Annal.*, II, 85;苏维托尼乌斯与约瑟夫斯仅提及犹太人。

12. 关于流散的最好叙述,参见 Graetz, vol. 3, p. 10; Frankel, "Die Diaspora zur Zeit des zweiten Tempels," in *Monatsschrift*, vol. 2, p. 309; Herzfeld, *op. cit.*, p. 200, and note 34。

13. 犹太人在某个特定国家之内迁移的好例证由波森省的犹太史提供。在 1849 年,21 个地区(总数有 131 个地区)30%—40%的人口为犹太人,4 个地区的犹太人口占 41%—50%,3 个地区超过 50%。但是在过去半个世纪,波森省的犹太人口已大大减少。参见 E. von Bergmann, *Zur 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polnischen und jüdischen Bevölkerung in der Provinz Posen* (1883); *Zwanzig Jahre deutscher Kulturarbeit* (1906); B. Breslauer, *Die Abwanderung der Juden aus der Provinz Posen* (1909)。关于 17 世纪末维也纳驱逐犹太人的情况,参见 David Kaufmann, *Die letzte Vertreibung der Juden aus Wien und Niederösterreich; ihre Vorgeschichte* (1625—1670) *und ihre Opfer* (1889)。

14. L. Neubaur, *Die Sage vom ewigen Juden* (2nd ed., 1893).

15. 根据 Gratian, *Vita Joh. Commendoni*, II, c. 15; Victor von Karben, *De Vita et Moribus Judœorum* (1504); Graetz, vol. 9, p. 62。

16. J. Ranke, *Der Mensch*, vol. 2, p. 533.

17. Ratzel, *Völkerkunde*, vol. 3, p. 743.

18. Juan Huarte de San Juan, *op. cit.*, p. 409.

19. F. Delitzsch, *op. cit.*, p. 12.

20. A. Wahrmund, *Das Gesetz des Nomadentums* (1887), p. 16.

21. Ratzel, *op. cit.*, vol. 3, p. 56.

22. *Pesachim*, 87*b*. 另见 119*b*。

23. W. Erbt, *Die Hebräer* (1906), p. 166.

24. *Ephraim justifié* (1758). L'éditeur à Mr. André de Pinto, Juif Portugais, Citoyen et négociant d'Amsterdam.

25. Pinto, "Réflex, critiques sur le premier chap. du vii tome des œuvres de M. Voltaire (1762)," in the *Lettres de quelques juifs*, (5th ed., 1781), p. 10.

26. Graetz, vol. 11, p. 54.

27. "L'idée, où ils sont généralement, d'être issus de la Tribe de Juda, dont ils tiennent que les principales families furent envoyées en Espagne du temps de la captivité de Babylone, ne peut que les porter à ces distinctions et contribuer à cette élévation de sentimens qu'on remarque en eux."— Pinto, *op. cit.*, p. 17.

28. A. Nossig, "Die Auserwähltheit der Juden im Lichte der Biologie," in *Z. D. S. J.*, vol. 1. 参见同一卷中 Curt Michaelis 的论文；另见他的"Prinzipien der natürlichen und sozialen Entwicklungsgeschichte der Menschheit" (*Natur und Staat*, vol. 5) (1904), p. 63。

29. A. Sandier, *op. cit.*, p. 24.

索　引

（页码为英译本页码，即中译本边页码）

Abensur, Daniel　但以理·阿本苏尔　75
Aboab, Jacob　雅各·阿博比　182
Abdul-Rahman III, Caliph　哈里发阿布杜-拉赫曼三世　173
Acoste, Lord d'　达·科斯塔勋爵　182
Adaptability of the Jew　犹太人的适应性　251—255, 313—314
Advertising　广告
　beginnings of　开端　130—132, 144—145
　prototype of　原型　168
Agrippa, King　阿格里帕王　173
Aguilar, Baron d'　德达圭勒男爵　101
Alaska Commericial Company　阿拉斯加商业公司　59
Albrecht, Cardinal　红衣主教阿尔布雷希特　70
Alexander, Alabarch　亚历山大长官　173
Alexandrai, Rabbi　拉比亚历山德拉　317
Alexandria, marine insurance in　亚历山大里亚的海上保险　90
Alhadib family　阿尔哈迪比家族　170
Aliens, Jew as　作为外来者的犹太人　174—176
Allgemeine Elektrizitäts-Gesellschaft　德国通用电气公司　119
Almanach perpetuum　《万年历》　51
Alphonso VI, of Spain　西班牙的阿方索六世　173
Altschul, Richard　理查德·阿尔特舒尔　59
America　美洲
　colonial settlement in　殖民地　52—66
　discovery of　发现　50—52
Americanism　美国精神　62

American Revolutionary War 美国革命战争
financiers of 金融家 75
purveyors in 供应商 70
Amschel, Mayer 迈耶·阿姆谢尔 110
Amsterdam 阿姆斯特丹
bill-broking in 证券经纪业 97—98
refuge of Jewish exiles 犹太流亡难民 37,41
Amsterdam Stock Exchange 阿姆斯特丹证券交易所 98—100,109,171
Anglia Judaica 《英国犹太志》 38
Anglo-Californian Bank 盎格鲁—加利福尼亚银行 59
Anne, Queen, of England 英国的安妮女王 72,101
Anthropological homogeneity, Jewish 犹太人的人类学同质性 269
Anthropology of the Jews 犹太人的人类学 265—271
Antiochus the Great 安条克大帝 276
Antwerp 安特卫普
Custom of 1582 1582年定例 89
refuge of Jewish exiles 犹太流亡难民 38,40—41
Apostasy, tendency to 叛教的趋势 31
Aptitude for modern capitalism, Jewish 犹太人的现代资本主义才能 157—260
capitalistic undertaker, defined 资本主义企业家的界定 162—168
characteristics, Jewish 犹太特性 238—260
objective circumstances in 客观环境 169—186
problem, the 问题 159—161
religion, significance of 宗教的重要性 187—237
Aquinas, Thomas 托马斯·阿奎那 128
Aristotle 亚里士多德 311
Arminius 阿尔米纽斯 319
Arnold 阿诺德 121
Arnstein family 阿恩施泰因家族 74
Aryans 雅利安人 308—309
Asher, Rabbenu 拉本努·亚设 87,91
Asher, Rabbi Jacob ben 拉比雅各·本·亚设 192,195,198
Ashkenazim (German) Jews 阿什肯纳兹(德国)犹太人 72,183,241,251,319,320,321
Asphalt Trust 沥青托拉斯 58
Astrolabe, discovery of 航海星盘的发明 51

Auerbach, L. L.奥尔巴赫 93
Augsburg, expulsion of Jews from 奥格斯堡的驱逐犹太人 36
Augsburger Allgemeine Zeitung 《奥格斯堡总汇报》 114
Aurelius, Marcus 马尔库斯·奥勒利乌斯 273,274
Australia, colonial settlement in 澳大利亚殖民地 50
Austria 奥地利
  bill-broking in 证券经纪业 97
  financiers of, Jews as 犹太金融家 73—75
  government loans, floating of 短期的政府贷款 112
  purveyors in 供应商 70

Baba Mezia 《中门篇》 291,292
Babylonian Exile 巴比伦之囚 265,279,303,304—305
Baierdorf family 拜尔斯多夫家族 75
Ballin 巴林 121
Bank of Amsterdam 阿姆斯特丹银行 85
Bank of England 英格兰银行 85,101
Bank of Hamburg 汉堡银行 85
Bank of St. George, Genoa 热那亚圣乔治银行 82
Bank of the United States 合众国银行 64
Bankers' Almanack 《银行家年鉴》 115
Banknotes 纸币 78,83—85
Bankruptcies, fraudulent 破产欺诈 135
Banks and banking 银行与银行业
  origin of 起源 84—85
  speculative 投机 115—117
Barbados, colonial development 巴巴多斯的殖民活动 55
Barnard's Bill, Sir John 约翰·伯纳德爵士的议案 106
Barnato, Barney 巴内·巴尔纳托 294
Basilus 巴西利乌斯 276
Bavarian State Lottery 巴伐利亚州交易所 106
Beaconsfield, Lord 比肯斯菲尔德勋爵 253,254
Bedouin tribes 贝都因部落 301
Behrend family 贝伦德家族 75
Belisarius 贝利撒留 174
Bendix, Nathan 拿单·本迪克斯 184
Benjamin of Tudela 图德拉的便雅悯 168

Berend, Meyer 迈耶·贝伦德 184
Berens, Salomon 所罗门·贝伦斯 184
Berentz, Leffmann 勒夫曼·贝伦茨 75
Berlin, wealth of Jews in 柏林犹太人的财富 184
Berliner 贝利纳 119,121
Berliner Discontogesellschaft 柏林市民贴现银行 117
Berliner Handelsgesellschaft 柏林市民商业银行 117
Berlin Stock Exchange 柏林证券交易所 104—105
Bernard, Samuel 撒母耳·伯纳德 73,104
Bertholet 贝尔托莱 282
Besançon fairs, bill of exchange in 贝桑松集市的证券交易 81
Bible, the 《圣经》 87,192—193,196,198,209,282
Bills of exchange 证券交易 78,79,80—82
Bischopfield 比朔普菲尔德 89
Bismarck, Otto von 奥托·冯·俾斯麦 254
Blackwell, Alderman 阿德曼·布莱克威尔 182
Bleichröder, S. S. 布莱希罗德 117
Boards of Directors, membership of 董事会成员 121—122
Bohemia 波希米亚 20,40,80
Böhme, Jacob 雅各·伯梅 183
Bonds, public debt, origin of 公债的起源 85—93
Bookkeeping, divine 神圣的账簿 202—205
Bordeaux 波尔多
  bill-broking in 证券经纪业 97
  refuge of Jewish exiles 犹太流亡难民 37,40
Borsig 博尔西格 121
Brann, M. M. 布兰 268
Brazil 巴西
  colonial settlement in 殖民地 53—55,62
  expulsion of Jews from 驱逐犹太人 53
Bücher, Professor 布赫教授 288
Bueno de Mesquita family 布埃诺·德·梅斯基塔家族 71
Burnus 伯努斯 275

Caesarea 凯撒利亚 275,293
Calculator, speculating 善于投机的算计者 166—167,259
Calvinische Judenspiegel, Der 《加尔文的犹太之镜》 237

Calvinism, Judaism and 犹太教与加尔文教 237
Cape Colony, colonial settlement in 开普殖民地 50
Capitalism 资本主义
definition of 定义 162
Jewish aptitude for modern 犹太人的现代资本主义才能 157—260
Jewish characteristics applied to 应用于资本主义的犹太特性 255—260
Judaism, Puritanism and 清教与犹太教 187,202,206,235—237,316
Capitalist point of view, growth of 资本主义观点的发展 124—156
Carcere family 卡塞尔家族 170
Carlyle, Thomas 托马斯·卡莱尔 254
Caro, Rabbi Joseph 拉比约瑟·卡罗 87,195,198—199,232
Carvajal, Antonio Fernandez 安东尼奥·费尔南德斯·卡瓦哈尔 68,72
Casten, Marx 马克斯·卡斯滕 184
Castro, Henry 亨利·卡斯特罗 64
Catering business 餐饮业 155
Catherine of Braganza, Queen, of England 英国王后布拉干萨的凯瑟琳 72,182
Cerfbeer family 瑟夫贝尔家族 73
Chamberlain, H. S. H. S. 张伯伦 242,245,278
Characteristics, Jewish 犹太特性 238—260
adaptability 适应性 251—255,313—314
applied to capitalism 应用于资本主义 255—260
energy 能量 251,314—315
impressionability, lack of 缺乏敏感性 246—247
intellectuality 智力 243—248,279,312—313
mobility 灵活性 250—251,254—255,313—314
personal relationships, lack of understanding of 缺乏对私人关系的理解 247—248
problem, the 问题 238—242
rationalism, practical 实用的理性主义 248—249,253—254,279,316
solution, attempt at 尝试解决 242—255
subjectivity 主观性 249—250,255
teleology 目的论 248—250,279
Charlemagne 查理曼 173,280
Charles II, of England 英国的查理二世 55,72,182
Charles V 查理五世 67
Charles Alexander, of Würtemberg 维腾堡的查理·亚历山大 75

Charlotte, Elizabeth 伊丽莎白·夏洛特 103
Cheating and falsifying 欺骗与伪造 127,134—136,279
Child, Sir Josiah 约西亚·蔡尔德爵士 126,132,140,152—153
Choshen Mishpat 《裁决的胸兜》 87
Chozars, the 卡扎尔人 267
Cicero 西塞罗 228,273,317,318
Civil War, American 美国内战
  Jewish soldiers in 犹太士兵 66
  purveyors in, Jews as 犹太供应商 70
Claudius, Emperor 皇帝克劳狄 173
Cleveland, Grover 格罗弗·克利夫兰 58
Code of Jacob ben Asher (the *Turim*) 《雅各·本·亚设法典》(《四列书》) 192,234
Code of Joseph Caro (the *Shulchan Aruch*) 《约瑟·卡罗法典》(《布就筵席》) 192,195,198—199,223,231,234,235
Code of Maimonides 《迈蒙尼德法典》 192,234
Cohen, Rabbi Shabbatai 拉比萨巴泰·柯亨 87,91
Colbert, Jean Baptiste 让·巴普蒂斯特·柯尔贝尔 39,67
Collection for the Improvement of Husbandry and Trade, The 《农业与贸易改进集》 130
Cologne, expulsion of Jews from 科隆的驱逐犹太人 36
Colonial expansion, Jews in 殖民扩张中的犹太人 49—66
Columbus, Christopher 克里斯托弗·哥伦布 36,51—52,185
Comic Lexicon of Cheating 《诈骗趣典》 127,134—135,149
Commerce in economic life, predominance of 商业在经济生活中的主导地位 77—123
Commercialization of industry 工业的商业化 117—123
Company promotion 公司创建 113—117
Competitive dealing 竞争性交易 129—130
Complete English Tradesman 《英国商绅大全》 131
Comstock Lodes 卡姆斯托克矿藏 59
Conegliano family 科内利亚诺家族 170
Confusion de confusions, etc. 《乱中之乱》 99
Conqueror, the 征服者 165
Cordova, Jacob de 雅各·德·科尔多瓦 64
Cordova, Spain 西班牙的科尔多瓦 294
Costa family 科斯塔家族 170

Council of Elovia (304) 埃洛维亚公会议(304年) 269
Council of Trade (Paris) (巴黎)贸易委员会 56
Councils of Toledo 托莱多公会议 268
Court Jews, status of 宫廷犹太人的地位 69,73,75,76,120,173
Credit 信贷
public, *see* Public credit system standardization of 公共信贷,参见公共信贷体制的标准化 78
Crédit mobilier 动产信用公司 117
Cromwell, Oliver 奥利弗·克伦威尔 38,39,67,71,98,236—237
Crump, A. A.克伦普 113
Crypto-Jew 秘密犹太人 31—33,38,54,71,275
Customers, attracting new 吸引新顾客 154

Da Costa, Moses or Anthony 摩西与安东尼·达·科斯塔 101
Da Costa family 达·科斯塔家族 72
Da Gama, Vasco 瓦斯科·达伽马 36
Dalembert family 达朗贝尔家族 73
Dangeau, Marquis de 德·当若侯爵 73
Daniel, Zacharias 扎卡利亚斯·但以理 184
Darmstädter Bank 达姆施泰特银行 117
Da Sylva, Francisco 弗朗西斯科·达·席尔瓦 182
Da Sylva Brothers 达·席尔瓦兄弟 72
David, King 大卫王 304,317
Davidson, Benjamin 便雅悯·戴维森 59
Dazevedo, Isaac 以撒·达泽维多 183
De Foe, Daniel 丹尼尔·笛福 130,131
De la Vega, Don Joseph 唐·约瑟·德拉维加 99,108
Del Banco, Simon 西蒙·德尔·班克 184
Delmonte, Baron 德尔蒙特男爵 182
Delmonte family 德尔蒙特家族 71
De Pass, Aaron and Daniel 阿隆与但以理·德帕斯 50
Deutsch, Felix 费利克斯·多伊奇 119,121
Deutsche Bank (1870) 德意志银行(1870年) 117
Discoverer, the 发现者 164—165
Dispersion of the Jews 犹太人的散居 169—174,267—278,306—308
Dormido, Solomon 所罗门·多罗米奥 100
Dühring, Eugen 于尔根·杜林 248

Dupont family 杜邦家族 73
Dutch East India Company 荷兰东印度公司 49,83,97—98
Dutch West India Company 荷兰西印度公司 61,98
Dyer, Albert 阿尔伯特·戴尔 59

East Indies, colonial settlement of 东印度殖民地 49
Eben Ha-ezer 《帮助之石》 221,223
Economic life 经济生活
  commerce in, predominance of 商业的主导地位 77—123
  shifting centre of 中心的转移 34—43
Edward I, of England 英国的爱德华一世 38,288
Egypt 埃及 300,306
Eichthal family 埃希索尔家族 114
Eisenmenger 埃森门格尔 197
Electrical industry, commercialization of 电气工业的商业化 118—119
Elias, Philip 菲利普·埃利亚斯 183
Elias, Solomon 所罗门·埃利亚斯 70
Elijah the Prophet 先知以利亚 203
Elizabeth I, of England 英国的伊丽莎白一世 38
Elkan, Moses 摩西·埃尔肯 74
Energy of the Jew 犹太人的能量 251,314—315
England 英国
  company promotion in 公司创建 115
  economic growth of 经济发展 35
  financiers of, Jews as 犹太金融家 71—73
  government loans, floating of 短期的政府贷款 112—113
  international trade in 国际贸易 44
  purveyors in 供应商 68—69
  refuge of Jewish exiles 犹太流亡难民 38,39
  stock exchange in 证券交易所 100—103
  underselling practiced in 廉价出售 146
  wealth of Jews in 犹太人的财富 182—183
English East India Company 英国东印度公司 82
Erfurt, expulsion of Jews from 埃尔福特的驱逐犹太人 36
Eskeles family 埃希科勒家族 74
Espinosa family 埃斯皮诺萨家族 82
Essenes, the 艾赛尼派 213

Ethics, Jewish 犹太伦理 188,199,214—217
Examen de ingenios 《人类智力考察》 311
Exchange 交易
  legal code regulating 规范交易的法典 93—95
  stock, *see* Stock exchanges 证券,参见证券交易所
Ezekiel, Rabbi 拉比以西结 305
Ezekiel the Prophet 先知以西结 282
Ezra the Prophet 先知以斯拉 193, 201,293,302,305

Family life, Jewish 犹太家庭生活 224—226
Farmers' and Merchants' Bank, Los Angeles 洛杉矶农商银行 59
Ferdinand, of Spain 西班牙的费迪南德 51
Ferdinand, Emperor, of Austria 奥地利的皇帝费迪南德 74
Financiers, the Jews as 犹太金融家 70—76
Finot, Jean 让·菲诺 238
Fonterosa, Suzanna 苏珊娜·丰泰罗沙 52
Fould, Benjamin 便雅悯·富尔德 117
Fould family 富尔德家族 75
France 法国
  advertising in 广告 131,132
  capitalistic competition in 资本主义竞争 126,127
  economic growth of 经济发展 35
  financiers of, Jews as 犹太金融家 73
  government loans, floating of 短期的政府贷款 113
  international trade in 国际贸易 45—46
  purveyors in 供应商 69
  refuge of Jewish exiles 犹太流亡难民 37,39—40
  stock exchange in 证券交易所 103—104
  underselling practiced in 廉价出售 146
Francia, George and Domingo 乔治与多明各·弗朗西亚 183
Francis, John 约翰·弗朗西斯 100,102
Frank, Aaron 阿隆·弗兰克 101
Frankfort-on-the-Main 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
  bill-broking in 证券经纪业 96
  insurance business in 保险业 108
  refuge of Jewish exiles 犹太流亡难民 37
  stock-jobbing in 证券经纪业 102,104,105

wealth of Jews in 犹太人的财富 184
Frankfort Stock Exchange 法兰克福证券交易所 104,105
Frederick II (the Great), of Prussia 普鲁士的弗里德里希二世(大帝) 67,75
Frederick Augustus, Elector of Saxony 萨克森的选帝侯弗里德里希·奥古斯都 70,75
Frederick William, of Prussia 普鲁士的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 67,75
French East India Company 法国东印度公司 73
Friedlaender, Moritz 莫里兹·弗里德兰德尔 59,121
Fromer, Jacob 雅各·福摩尔 31,242,252

Gambetta, Léon 莱昂·甘必大 253
Garcia dela Riega, Don Celso 唐·塞尔索·加西亚·德拉列加 52
Gemara, the 《革马拉》 194,195,196,234
Genetic method of study 起源学研究方法 28—29
Genius, Jewish, origin of 犹太天赋的起源 262—323
constancy of 稳定不变 273—297
natural or artificial? 先天的还是人为的? 297—298
race problem, the 种族问题 263—298
vicissitudes of the Jewish people 犹太民族的变迁 298—323
General Privileges of 1750, Prussian 普鲁士《1750年普通特许令》177—178
General store, the 杂货店 154—155
General Treasury for Merchants 《商人宝典》 127
Genoa, expulsion of Jews from 热那亚的驱逐犹太人 37
Genoa fairs, bill of exchange in 热那亚集市上的证券交易 81—82
Geographical Society of Madrid 马德里地理协会 52
Germanus, John Baptist 约翰·巴普蒂斯特·格尔马努斯 89
Germany 德国
advertising in 广告 131
bill-broking in 证券经纪业 96—97
capitalistic competition in 资本主义竞争 125
company promotion in 公司创建 115,116
credit instruments in 信用票据 89—90
economic growth of 经济发展 35
expulsion of Jews from 驱逐犹太人 36
financiers of, Jews as 犹太金融家 73—75
international trade in 国际贸易 44—45

public debt bonds in 公债 85
purveyors in 供应商 70
stock exchanges in 证券交易所 104—106
underselling practiced in 廉价出售 147
wealth of Jews in 犹太人的财富 181—182,183—185
Gerstle, Lewis 里维斯·格斯尔 59
Ghentsche Post-Tijdingen 《根特邮报》 130
Ghetto life 隔都生活 319,320—321
Gideon, Sampson 桑普森·吉迪恩 72,101
Gilds, merchant and craft 商业与手工业行会 126,140,141,179
Giudetti 吉迪蒂 89
Glazier family 格莱泽家族 59
Godchaux family 戈德肖家族 73
Goethe, Johann Wolfgang von 约翰·沃尔夫冈·冯·歌德 242,250
Goldschmidt, Moses 摩西·戈尔德施密特 183
Goldsmid, Abraham and Benjamin 亚伯拉罕与便雅悯·戈德斯米德 113
Gompertz, Leimann 莱曼·贡珀茨 70
Gonzales, Gaspar 加斯帕尔·冈萨雷斯 40
"Good" wares, stress on 强调商品的优质 132
Government loans, floating of 短期的政府贷款 111—113
Gradis, Abraham 亚伯拉罕·加迪斯 69
Graetz, Heinrich 海因里希·格雷兹 73,138,195,233,282
Greenbaum, Sigmund 西格蒙特·格林鲍姆 59
Guadeloupe, colonial development in 瓜德罗普的殖民活动 56
Guggenheim family 古根海姆家族 58

Hagen (of Cologne) (科隆的)哈根 121
Haggada, the 哈加达 196
Hagiographa, the 《圣文集》 196
Halevy, Jehuda 犹大·哈列维 229
Halske 哈尔斯克 119
Hamburg 汉堡
bill-broking in 证券经纪业 97
economic growth of 经济发展 35
international trade in 国际贸易 45
refuge of Jewish exciles 犹太流亡难民 37,41—42
stock-jobbing in 证券投机 102,104,105

wealth of Jews in 犹太人的财富 183—184
Hamburg Stock Exchange 汉堡证券交易所 104,105
Hamm, Moses 摩西·哈姆 183
Hanassi, Rabbi Judah (the Prince) 犹大·哈纳西(亲王) 194,203
Handbook of German Joint-Stock Companies 《德国股份公司手册》 122
Haroun al Rashid, Caliph 哈里发哈仑·拉希德 173
Harrison, General Thomas 托马斯·哈里森将军 237
Hart, Moses 摩西·哈特 101
Hausemann, David 大卫·豪泽曼 117
Hebrews, the ancient 古代希伯来人 301—302
Heine, Heinrich 海因里希·海涅 110,236,242,249,250,279
Heine, Solomon 所罗门·海涅 117
Hekateus of Abdera 阿伯德拉的赫卡泰乌斯 228
Hellenistic philosophy 希腊哲学 194
Hellman and Newmark, Los Angeles 洛杉矶的赫尔曼与纽马克 59
Helphen family 赫尔本家族 73
Henry IV 亨利五世 95
Heredity, doctrines of 遗传学说 264
Hermann, George 乔治·赫尔曼 250
Herod, King 希律王 306—307
Herschel, Mayer 迈耶·赫舍尔 70
Hertz, F. F. 赫茨 238
Hertz, Isaac 以撒·赫茨 184
Herzfeld 赫茨菲尔德 278,280
Heyman, Berend 贝伦德·海曼 183
Heymann, Mangelus 曼格努斯·海曼 184
Hillel, school of 希勒尔学派 193
Hiram, King of Tyre 推罗王希兰 281
Hirsch, Baron 赫尔施男爵 115
Hirschfeld, George 乔治·希施菲尔德 250
Hittites 赫梯人 299
Holland 荷兰
  bill of exchange in 证券交易 80
  credit instruments in 信用票据 89
  economic growth of 经济发展 34
  financiers of, Jews as 犹太金融家 71
  international trade in 国际贸易 46

public debt bonds 公债 86—87
refuge of Jewish exiles 犹太流亡难民 37,41
stock exchange in 证券交易 98—100
Holmes, Nathaniel 纳坦尼尔·霍尔梅斯 236
Homen, Manuel Lopez 曼努埃尔·洛佩斯·霍门 182
Hönn, George Paul 乔治·保罗·洪恩 127
Houghton, John 约翰·霍顿 130
Huarte de San Juan, Juan 胡安·瓦尔特·德尚·胡安 273,311—312
Huguenots 胡格诺派 32
Hume, David 大卫·休谟 107
Hyrkanus, Rabbi Dosa ben 拉比多萨·本·希尔坎 219

Illegitimate births, statistics of 非法出生的统计 225
Inbreeding of the Jews 犹太人的近亲繁殖 322
India, colonial settlement in 印度殖民地 50
Industry, commercialization of 工业的商业化 117—123
Inferior goods, trade in 劣等品贸易 149—150
Inquisition, the 宗教裁判所 36,41,54
Insurance business 保险业 90,108
Intellectuality of the Jews 犹太人的智力 243—248,279,312—313
Intermarriage, attitude toward 对通婚的态度 205
International trade, quickening of 国际贸易的加速发展 44—48
Inventor, the 发明者 164
Isaac, Alexander 亚历山大·以撒 184
Isaac, Rabbi 拉比以撒 206
Isaiah the Prophet 先知以赛亚 317
Ishmael 以实玛利 203
Islam 伊斯兰教 194,201,276
Israel 以色列 265,303,304
the nations and 以色列与诸民族 227—235
Israel, Manasseh ben 玛拿西·本·以色列 38,41,98
Isserlein, Rabbi Moses 拉比摩西·伊塞勒林 199
Italy 意大利
economic decline of 经济衰退 34
expulsion of Jews from 驱逐犹太人 37
Itzig family 埃特茨格家族 75

Jamaica, colonial development in 牙买加的殖民活动 55—56
James II, of England 英国的詹姆士二世 173
Jellinek, Adolf 阿道弗·杰利内克 242,245,249,255
Jewish law, credit instruments and 信用票据与犹太律法 87,92—93,94
Jews, the 犹太人
adaptability of 适应性 251—255,313—314
aliens 外来者 174—176
anthropology of 人类学 265—271
aptitude for modern capitalism 对于现代资本主义的才能 157—260
centre of economic life and 经济生活的中心 34—43
characteristics of 特性 238—260
cheating and falsifying of 欺骗与伪造 127,134—136,279
colonial settlement by 殖民开拓 49—66
contributions to modern economic life by 对现代经济生活的贡献 25—156
court, *see* Court Jews 宫廷,参见宫廷犹太人
crypto- 秘密犹太人 31—33,38,54,71,275
definition of 定义 30—31
dispersion of 散居 169—174,276—278,306—308
economic importance of 经济重要性 42—43
energy of 能量 251,314—315
ethics of 伦理 188,199,214—227
fair 集市 266,268—269
financiers 金融家 70—76
genius of, origins 天赋的起源 261—323
German, *see* Ashkenazim Jews 德国,参见阿什肯纳兹犹太人
impressionability, lack of 缺乏敏感性 246—247
inbreeding of 近亲繁殖 322
intellectuality of 智力 243—248,279,312—313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国际贸易 44—48
inventiveness of 创造力 29
living standard of 生活标准 152—153
mobility of 灵活性 250—251,254—255,313—314
physiognomy of 相貌 270—271
Portuguese, *see* Marannos 葡萄牙人,参见马兰诺
public life, exclusion from 从公共生活中的排斥 179—181
purveyors 供应商 68—70,174
race problem 种族问题 263—298

religion of, *see* Religion, Jewish 宗教,参见犹太宗教
rationalism of 理性主义 248—249,253—254,279,316
semi-citizens 半公民 176—181,240,273—276
Spanish, *see* Sephardim Jews 西班牙犹太人,参见塞法尔迪犹太人
subjectivity of 主观性 249—250,255
success of, causes for 成功的原因 169
teleology 目的论 248—250,279
vicissitudes of 变迁 299—323
wealth of 财富 181—186,293—297
Joachim II, of Prussia 普鲁士的约阿希姆二世 75
Joan, Queen, of Portugal 葡萄牙的乔安娜女王 52
John II, of Portugal 葡萄牙的约翰二世 51
John Philp, Bishop, of Würzburg 维腾堡的约翰·菲利普主教 74
Josephus, Flavius 弗拉维·约瑟夫斯 173,188,274,306,318
Joshia, Rabbi Achai ben 拉比阿查·本·约西亚 284
Judaea 犹地亚 300,306
Judah 犹大 302
Judaism, *see* Religion, Jewish 犹太教,参见犹太宗教
Julius, Samuel 撒母耳·尤利乌斯 70
"Just price," theory of "公平价格"理论 133
Justus, Dr. 尤斯图斯博士 197

Kabbala, the 喀巴拉 195,246
Kalonymus 卡隆缪斯 173
Kempinsky 克姆宾斯基人 155
Kinkherle, Joseph 约瑟夫·金卡赫勒 74
Koppore, Morris 莫里斯·科普勒 64
Krupp, Alfred 阿尔弗雷德·克虏伯公司 121
Kuhn, Loeb & Company 库恩·洛布公司 58

Lagi, Ptolemy 托勒密·拉吉 276,277
Laissez-faire, industrial 工业的自由放任 235
Lassalle, Ferdinand 费迪南德·拉萨尔 253,254
Law, John 约翰·劳 104
Lazard Frères 拉扎尔·弗雷尔 59
Lazarus, Abraham 亚伯拉罕·拉扎勒斯 184
Legal code regulating exchange, evolution of 规范交易法典的演进 93—95

Legal practice, Jewish influences in 犹太人对法律实践的影响 88—93
Leghorn, refuge of Jewish exiles 莱戈恩的犹太流亡难民 37
Lehmann, Berend 贝伦德·莱曼 75
Leipzig fairs, trading by Jews at 莱比锡集市的犹太贸易 44—45,48
Leopold I, Emperor, of Austria 奥地利的皇帝利奥波德一世 70,74,97
Leroy-Beaulieu, Anatole 阿纳托尔·勒鲁瓦-博利厄 227,242,252
Levantine trade 黎凡特贸易 34,45—46,170
Levi, Asser 阿塞·利未 63
Levy, Benjamin 便雅悯·利未 72
Levy, Hayman 海曼·利未 145
Liberalism, capitalism and 资本主义与自由主义 256
Liebermann, Max 马克斯·利伯曼 246
Liebmann, Gomperz and Joost 贡珀茨与约斯特·利伯曼 75
Life, rationalization of, in Judaism 犹太教中的生活理性化 214—227
Lilienthal, Philip N. 菲利普·N. 利连索尔 59
Lindo, Moses 摩西·林多 65
Lipman family 利帕曼家族 84
Lippold 利波尔德 75
London 伦敦
  advertising in 广告 130
London, Pairs and American Bank 伦敦、巴黎与美国银行 59
London *Spectator* 伦敦《观察者》 171
London Stock Exchange 伦敦证券交易所 100—103,109,113
Longobards 伦巴第人 274
Long Parliament, the 长期国会 71
Lopez, Ildefonso 伊德尔方索·洛佩斯 174
Lopez, Manasseh 玛拿西·洛佩斯 72,101
Lopez, Miguel 米格尔·洛佩斯 182
Lopez, Rodrigo 罗德里戈·洛佩斯 38
Lopez family 洛佩斯家族 170
Lost Ten Tribes of Israel 失踪的以色列十个支派 270—271
Louis XI, of France 法国的路易十一 67
Louis XIV, of France 法国的路易十四 69,73,104
Louis XV, of France 法国的路易十五 73
Ludewig, Staatskanzler 施塔茨坎茨勒·路德维希 74,97
Luxury articles, trade in 奢侈品贸易 46—47

Machado, Moses 摩西·马查多 71
Magnus Barford Saga 《马格努斯·巴尔福德传奇》 168
Mahamad, the 马哈玛德 136
Maimon, Solomon 所罗门·迈蒙 138
Maimonides 迈蒙尼德 192,195,199,276
Maine, Sir H. H. 梅因爵士 247 n.
Mallet Frères 马勒特·弗雷尔 117
Mamre (*Mamram*, *Mamran*) "幔利" 88,89,90
Managing directors, membership of 董事长 122
Mangelus, Philip 菲利普·曼格尔斯 184
Maranno, the 马兰诺 31,36,37,38,39,51,71,82,84,89,190,275,320
Marburger, Moses and Jacob 摩西与雅各·马尔堡 74
Maria Theresa, Empress, of Austria 奥地利的女王玛丽娅·特蕾莎 74
Marks, Simon 西蒙·马克斯 50
Marine insurance 海上保险 90
Marlborough, General Lord 将军马尔博罗公爵 101
Marriage, Jewish view on 犹太人对婚姻的态度 223
Marseilles, refuge of Jewish exiles 马赛的犹太流亡难民 37,39
Martinique, colonial development in 马提尼克的殖民活动 56
Marx, Carsten 卡斯滕·马克斯 184
Marx, Karl 卡尔·马克思 241,242,254
Mary, Queen, of Hungary 匈牙利的玛丽女王 40—41
Maurice of Saxony, Field Marshal 陆军元帅萨克森的莫里斯 69
May, Michel 迈克尔·迈尔 75
Mazarin, Cardinal 红衣主教马扎然 67
Medina, Sir Solomon 所罗门·梅迪纳爵士 68—69,72,101
Megalopolis, Rev. John 约翰·麦加罗波利斯神父 139,140
Mels, Francis 弗朗西斯·梅尔斯 71
Memoirs of Glückel von Hamein 《辜黎柯·冯·哈梅因自传》 137—138, 182,213—214
Mendelssohn, Felix 费利克斯·门德尔松 253
Mendelssohn & Company 门德尔松公司 117
Mendès da Costa, Ferdinando 费迪南多·门德斯·达·科斯塔 101,183
Mendès family 门德斯家族 170
Mesopotamia 美索不达米亚 300
Meyer, Isaac 以撒·迈耶 70
Meyer, J. J. 迈耶 75

Meyer, Jonas 约纳斯·迈耶 69
Millaud, Polydore 波利多尔·米勒劳 145
Mishna, the 《密释纳》 194,196,215,234
Mithridates 密特拉达提 317
Mixed marriages 混合婚姻 267—268
Mobility of the Jew 犹太人的灵活性 250—251,254—255,313—314
Model family 莫德尔家族 70,75
Modern Capitalism 《现代资本主义》 30
Modern state, foundation of 现代国家的创建 67—76
financiers, Jews as 犹太金融家 70—76
purveyors, Jews as 犹太供应商 68—70
Modyford, Thomas 托马斯·莫迪福特 55
Mohammed the Prophet 先知穆罕默德 192,201
Money and Trade Considered 《论货币和贸易》 104
Money-lending activities 借贷活动 185—186,231—232,284—293,318
Montefiore 蒙特费奥雷 50
Mordecai, Abraham 亚伯拉罕·摩迪凯 63
Morris, Robert 罗伯特·莫里斯 75
Mosenthal, Adolph 阿道弗·莫森索尔 50
Mosenthal, James 詹姆斯·莫森索尔 50
Mosenthal, Julius 尤利乌斯·莫森索尔 50
Moses 摩西 196,214,221
Moses the Mathematician 数学家摩西 51
Moyses, Lemte 勒姆特·穆瓦斯 75
Muys van Holy, Nicolas 尼古拉斯·梅斯·范·霍利 98
Myer, H. H. H. H. 迈耶 121
Myers, Joel 乔尔·梅耶斯 50

Nachman, Rabbi 拉比纳赫曼 223
Naples, expulsion of Jews from 那不勒斯的驱逐犹太人 37
Nathan, Abraham 亚伯拉罕·拿单 184
Nathan, Rabbi Eleazar ben 拉比以利亚撒·本·拿单 223
Nathan, Samson 参孙·拿单 183
Nathan family 拿单家族 75
National Bank of Texas 得克萨斯国立银行 64
Naturalization Bill of 1753 (England) (英国)1753 年的"归化法案" 126,146

Naumann, Friedrich 弗里德里希·瑙曼 246
Negrela, Ismael ibn 伊斯梅尔·伊本·内格雷拉 276
Nehemiah the Prophet 先知尼希米 286,302
Netherlands, refuge of Jewish exiles 尼德兰的犹太流亡难民 38,40—41
Neubauer 纽鲍尔 266
Nevada Bank 内华达银行 59
New Amsterdam, refuge of Jewish exiles 新阿姆斯特丹的犹太流亡难民 61,65
Newburg, Philip 菲利普·纽伯格 64
New commodities, trade in 新商品贸易 47
New York Mercury 《纽约信使报》 145
Nieuhoff 尼尔霍夫 54
Norden, Benjamin 便雅悯·诺登 50
North American Commercial Company 北美商业公司 59
Nossig, Alfred 阿尔弗雷德·诺西格 322
Nunez, Maria 马利亚·努涅斯 182
Nuremberg, expulsion of Jews from 纽伦堡的驱逐犹太人 36

Offenbach, Jacques 雅克·奥芬巴赫 253
Old Testament, the 《旧约》 192—193,196,198,209
Oppenheim (of Cologne) (科隆的)奥本海姆 117
Oppenheimer, Elias 埃利亚斯·奥本海默 183
Oppenheimer family 奥本海默家族 70,74
Organizer, the 组织者 165—166
Orthodox Jews 正统派犹太人 241
Otto II, Emperor 皇帝奥托二世 173
Oulman, Abraham 亚伯拉罕·欧勒曼 146
Oxford Papyrus 牛津纸草 286

Pakuda, Bachja ibn 巴奇贾·伊本·帕库达 213
Palestine 巴勒斯坦 300,304,306
Papenheim, Alex 亚历克斯·巴本海姆 183
Pardel, Governor, of California 加利福尼亚州州长帕代尔 63
Parente, Ventura 文图拉·帕伦特 74
Pairs Stock Exchange 巴黎证券交易所 103—104
Parta, Rabbi Eleazar ben 拉比以利亚撒·本·帕塔 276
Paul of Tarsus 大数的保罗 274

Pechmann, Baron 帕奇曼男爵 147
Pereira, Moses Lopez 摩西·洛佩斯·佩雷拉 101,321
Pereire, Isaac and Emil 以撒和埃米尔·佩雷尔 117
Pereire family 佩雷尔家族 73,170
Petites Affiches, Les 《小海报》 131
Petit Journal 《小报》 145
Pfefferkom 普弗夫科伦 197
Pharisees 法利赛人 189,268
Philip II 菲利普二世 35,36
Philo 斐洛 306
Physiognomy of the Jews 犹太人的相貌 270—271
Picciotto, J. J. 皮乔托 101,242
Pinto, Joseph de 约瑟夫·德·平托 98,107—108,182,319—320
Pinto family 平托家族 71
Plautus 普劳图斯 201
Poland 波兰
  capitalistic competition in 资本主义竞争 126
  underselling practiced in 廉价出售 147
Portugal 葡萄牙
  economic decline in 经济衰退 34
  expulsion of Jews from 驱逐犹太人 36
Possession, doctrine of 财产的教义 208
Postlethwayt, M. M. 波斯特勒韦特 102,106,130
Prester, John 约翰长老 173
Priest, Albert 阿尔伯特·普列斯特 59
Production, cost of 生产成本 151—152,153—154
Promissory notes 期票 93—94
Prophetical Books, the 《先知书》 193,196
Prussian Edicts of 1737 and 1750 1737 与 1750 年普鲁士法令 125,147,179
Public credit system, transformation in 公债体制的转变 76
  industry, commercialization of 工业的商业化 117—123
  securities, origin of 证券的起源 77—93
    banknotes 纸币 78,83—85
    bill of exchange 证券交易 78,79,80—82
    bonds, public debt 公债 85—93
    buying and selling 买进与卖出 93—111
    creation of 创造 111—117

stocks and shares 证券与股票 82—83
Public life, exclusion of Jews from 犹太人从公共生活中的排斥 179—181
Punishments, idea of, in Judaism 犹太教的惩罚观念 207—214
Puritanism, capitalism and 资本主义与清教 187,202,236—237
Purveyors, the Jewa as 犹太承包商 68—70,174
Pyrard, F. F. 皮雷亚迪 54

Rabbinic law, credit instruments and 信用票据与拉比法 87,88
Race, the Jewish 犹太种族 271—272
Race problem, the 种族问题 263—298
anthropology of the Jews 犹太人的人类学 265—271
Jewish genius 犹太天赋
constancy of 稳定不变 273—297
natural or artifical? 先天的还是人为的? 297—298
Jewish "race," the 犹太"种族" 271—272
Ranke 兰克 103
Rat, Frau 弗劳·拉特夫人 137
Rathenau 拉特瑙 121
Rationalism 理性主义
economic 经济理性主义 162,175
of the Jew 犹太人的理性主义 248—249,253—254,279,316
Ratisbon, expulsion of Jews from 累根斯堡的驱逐犹太人 36
Ready money, supply of 供应现款 48
Reccared 里卡尔德 294
Reformed Judaism 改革了的犹太教 199
Religion, Jewish, significance in economic life 犹太宗教在经济生活中的重要性 187—237,278—279,302,321—322
asceticism in 苦修主义 212—213
capitalism and 资本主义 187,202,206,235—237,316
dogmas of Judaism 犹太教的教义 197
dualism 二元主义 216—217
ideas of, fundamental 基本观念 199—206
importance of 重要性 187—192
Israel and the nations 以色列与诸民族 227—235
life, rationalization of 生活的理性化 214—227
mysteries, lack of 缺乏神秘意识 200—202
proselytes admitted into 皈依者 266—267

rewards and punishments, idea of 赏罚的观念 207—214
sources of 起源 192—199
Renan 勒南 266
Rewards, idea of, in Judaism 犹太教的奖赏观念 207—214
Richelieu, Cardinal 红衣主教黎塞留 67,174
Rodrigues, Gomez 戈梅兹·罗德里格斯 183
Röhling 勒林 197
Rome 罗马 306—307
Roosevelt, Theodore 西奥多·罗斯福 58
Rosenfeld, John 约翰·罗森菲尔德 59
Rothschild, Baron Amschel 阿姆谢尔·罗斯柴尔德男爵 191,209—210
Rothschild, Nathan 拿单·罗斯柴尔德 110,168
Rothschild, S. M. S. M. 罗斯柴尔德 117
Rothschild, William Charles 威廉·查尔斯·罗斯柴尔德 191
Rothschild, House of 罗斯柴尔德家族 73,109—111,114,117
Rothschild family 罗斯柴尔德家族 170,181
Rouen, refuge of Jewish exiles 鲁昂的犹太流亡难民 37
Rubens, Simon 西蒙·鲁本斯 79
Ruppin, Arthur 阿瑟·鲁平 272

St. Thomas, West Indies 西印度的圣托马斯岛 52,53
Salomon, Berend 贝伦德·萨洛蒙 184
Salomon, Elias 埃利亚斯·萨洛蒙 183
Salomon, Haym 海姆·萨洛蒙 75
Salvador, Francis and Joseph 弗朗西斯与约瑟夫·萨尔瓦多 72
Samuel, Rabbi 拉比撒母耳 276
San Domingo, colonial development in 圣多明各的殖民活动 65
Saniheg, Gabriel 加百列·桑赫格 51
Santangel, Louis de 路易·德·桑坦格尔 51
Sardinia 撒丁岛 307
Sassoon family 沙逊家族 170
Saul, King 扫罗王 266
Savannah, Georgia, colonial development in 佐治亚州萨凡纳的殖民活动 65
Savary 萨瓦里 127,131,140,182
Schickler Brothers 席克尔兄弟 117
Schiesser, Samuel 撒母耳·席塞尔 183
Schlesinger, Wolf 沃尔夫·施莱辛格 74

Schmieles, Jacob B. B. 雅各·B. B. 施米勒 74
Schnitzler, Arthur 阿瑟·施尼茨勒 250
Schubert, Benedict 本尼迪克特·舒伯特 64
Scribes 文士 189,193
Securities 证券
banknotes 纸币 78,83—85
bill of exchange 证券交易 80—82
bonds, public debt 公债 85—93
buying and selling 买进与卖出 93—111
legal code regulating exchange, evolution of 规范交易法典的演进 93—95
stock exchange, the 证券交易 77,86,95—111
creation of 创造 111—117
industry, commercialization of 工业的商业化 117—123
origin of 起源 77—93
stocks and shares 证券与股票 82—83
Seligman, David 大卫·塞利格曼 64
Seligman, Joseph 约瑟夫·塞利格曼 64
Seligman Brothers (William, Henry, Jesse and James) 塞利格曼兄弟(威廉、亨利、耶西、与詹姆斯) 59,64—65
Semi-citizens, Jews as 作为半公民的犹太人 176—181,240,273—276
Semite controversy 闪米特争议 265
Semities 闪米特人 265,299
Sephardim (Spanish) Jews 塞法尔迪(西班牙)犹太人 72,182,183,241,251,319,320,321
Severus, Emperor 皇帝塞维鲁斯 267
Shammai, school of 夏迈学派 193
Shaprut, Chasdai Ibn 哈斯戴·伊本·沙鲁特 173
Short measure, practice of 缺斤短两 151
Shulchan Aruch, *see* Code of Joseph Caro 《布就筵席》,参见《约瑟·卡罗法典》
Sibylline Oracle 西卜林神谕 306
Siemens, Werner von 维尔纳·冯·西门子 119,121
Sigismund, King, of Poland 波兰国王西吉斯蒙 126
Sinzheim, Lewel 莱维·辛茨海姆 74
Sloss, Louis 路易斯·斯洛斯 59
Smelters' Trust 冶铁托拉斯 58
Smith, Adam 亚当·斯密 107,108,112
Solomon, Joel 乔尔·所罗门 183

Solomon, King 所罗门王 281,293,317
Sombart 桑巴特 191 n.,213 n.,221 n.
South Africa, colonial settlement in 南非殖民地 50
South America, colonial settlement in 南美殖民地 50
South Sea Bubble 南海泡沫 72,73
Souza, Antonio de 安东尼奥·德·索萨 71
Souza, Thomé de 托梅·德·索萨 53
Spain 西班牙
  banking business in 银行业 84—85
  economic decline of 经济衰退 34
  expulsion of Jews from 驱逐犹太人 36
  international trade in 国际贸易 46
Spanish Succession, wars of the 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 69,73
Speculation 投机 167
Speculative banking 投机性银行业 115—117
Speyer, Bishop of 施派尔主教 290
Spinoza, Baruch 巴鲁赫·斯宾诺莎 246
States-General 尼德兰联合省的中央议会 174
Statesman's Year Book 《政治家年鉴》 300
Statistical method of study 统计学研究方法 27—28
Steinhart, Ignatz 伊格纳齐·斯坦哈特 59
Stevenson, Robert Louis 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 222 n.
Stock exchanges 证券交易所 77,86,95—111,112,118,124,171
Stocks and shares, origin 证券与股票的起源 82—83
Stolen property, dealing in 从事盗赃交易 136—137
Strabo 斯特拉波 306
Strassburg, expulsion of Jews from 斯特拉斯堡的驱逐犹太人 36
Strousberg, Dr. 斯特劳伯格博士 115
Studendolus, Marcus 马库斯·施图登德鲁斯 89
Stuyvesant, Peter 彼得·斯图文森 61,98
Suasso family 苏阿索家族 71,72
Subjectivity of the Jews 犹太人的主观性 249—250,255
Substitution, principle of 替代原则 150—151
Suess-Oppenheimer 苏斯·奥本海默 44
Sugar industry, development of 制糖业的发展 53—57
Surinam, colonial development in 苏里南的殖民活动 56
  mortgage-banking with 银行抵押业务 86

Sutro, Adolph 阿道弗·苏特罗 59
Sweden 瑞典
capitalistic competition in 资本主义竞争 126
underselling practiced in 廉价出售 147
Sylva, Duarte de 杜阿尔特·达·席尔瓦 182
Synhedrium 犹太教公会 189,237

Tacitus 塔西佗 228—229,273
Talmud, the 《塔木德》 87,94—95,190—191,192,194,196,197—198,206,208,209,212,221,230,232,233,234,283,286,291,298,305
Talmudic colleges 《塔木德》学院 194
Telegraph Trust 电信托拉斯 58
Teleological outlook of the Jews 犹太人的目的论 248—250,279
Textiles, trade in 纺织品贸易 47
Thirty Years War 三十年战争 73
Tiglath-Pileser 提革拉·帕拉萨 276
Tobacco Trust 烟草托拉斯 58
Torah, the (Pentateuch) 《托拉》(《摩西五经》) 188,193,196,198,201,202,209,230,232,252
Torlonia (of Rome) (罗马的)托洛尼亚 117
Torres, Louis de 路易·德·托雷斯 51
Trader, the 商人 163,164,166—168
Traité du crédit et de la circulation 《论信贷及其流通》 107—108
Transvaal, colonial settlement in 德兰士瓦殖民地 50
Turim, the 《四列书》 198
Turnover, increase in 销售额的增长 153
Twain, Mark 马克·吐温 57

Ukba, Mar 马尔·乌克巴 203
Ullmann, H. E. H. E. 乌尔曼 106
Ulm, expulsion of Jews from 乌尔姆的驱逐犹太人 36
Underselling, practice of 廉价出售 131—132,146—149
Undertaker, capitalist 资本主义企业家 162—168,259—260
Union Trust Company 联合信托公司 59
United States, growth of, Jewish factor in 犹太因素在美国的发展 57—66
Usury, practice of 高利贷 288—290

Van den Meeren, Nicholas 尼古拉斯·范登·梅伦 40
Variety in trade 贸易种类 47—48
Vecuho, Jose 约瑟·韦库胡 51
Vega, Samuel de 撒母耳·德维加 182
Venice 威尼斯
banknotes in 纸币 84
bill of exchange in 证券交易 80—81
economic decline of 经济衰退 34
expulsion of Jews from 驱逐犹太人 37,39
Vercingentorix 弗辛杰托里克斯 319
Vicissitudes of the Jewish people 犹太民族的变迁 299—323
Voltaire 伏尔泰 319
Von Halle, Abraham 亚伯拉罕·冯·哈勒 184
Von Hameln, Glückel 辜黎柯·冯·哈梅因 96,137—138,140,182,183,214,296
Von Rosheim, Joselman 约塞尔曼·冯·罗塞姆 70
Von Sittewald, Philander 菲尔兰德尔·冯·西特瓦尔德 127
Vossische Zeitung 《福斯报》 145

Walpole, Horace 霍勒斯·沃波尔 72
Warschauer Co., Robert 罗伯特·瓦尔施奥尔公司 117
Waste-product business 废品贸易 154
Wealth of Nations 《国富论》 107
Wealth of the Jews 犹太人的财富 181—186,293—297
Weber, Max 马克斯·韦伯 235
Weil, A. A. 威尔 109
Werner, Dr. 维尔纳博士 31
Wertheimer, W. Z. W. Z. 韦特海默 108
Wertheimer family 韦特海默家族 70,74
West Indies, colonial settlement in 西印度殖民地 55—57,62
Westinghouse Electric Company 威斯汀豪斯电力公司 165—166
William III, of England 英国的威廉三世 68,71,72,85,100,101
Wisdom Literature, the 智慧文学 193,211,221
Worms, Jacob 雅各·沃姆斯 69
Wormser family 沃姆泽家族 59

Yad Hachawka 《大能的手》 198

Zacuto, Abraham 亚伯拉罕·扎克托 51
Zagnonis Brothers 扎尼奥尼兄弟 89
Zevi, Sabbatti 萨巴泰·泽维 276
Zimmern, A. E. A. E. 齐默恩 289 n.

译后记

犹太人与资本主义：一个尚待破解的谜题

在犹太人如何影响与塑造现代世界的问题上，犹太人与资本主义的关系始终让人津津乐道。最近研究这种关系的学者穆勒指出，“犹太人与资本主义有一种特殊关系，因为他们对此特别擅长，当然不是所有犹太人都擅长。但只要在任何时候允许他们在公平的法律环境中参与竞争，他们当中的出类拔萃者就会多得不成比例。这既是一种祝福，也是一种诅咒”①。

的确，一方面，犹太人在资本主义环境中如鱼得水，其经济才能得以充分发挥，并获得了巨额财富与成功，但另一方面，他们同时又被视为资本主义的替罪羊，许多遭受经济失败的反犹主义者，将自身的不幸归咎于犹太人，炮制出罗斯柴尔德家族、沙逊家族等控制世界金融命脉的“犹太阴谋论”神话。在此情况下，犹太人的成就和阴谋被混为一谈，犹太人成了反犹主义者狂热攻击的靶标。有学者强调道，“一千多年来，犹太人与钱这个课题一直是人们的一个话题。犹太人的钱引起了每个人的兴趣：牧师对它加以诋毁，而帝王则觊觎它；反犹主义为之暴跳如雷，而犹太人自己则既为之自豪又讳莫如深。人们对犹太人的财富予以了异乎寻常的关注，但大多数的评论和说法是离谱的、不切实际的和贬低性的。……

---

① Jerry Z. Muller, *Capitalism and the Jew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0, p. 1.

犹太人的钱以及这些钱里面所包含的权力和影响，是流传最久的反犹主义谎言之一”①。

1911年，德国著名经济史家维尔纳·桑巴特出版名为《犹太人与经济生活》的德文著作（1913年摩迪凯·爱泼斯坦译成英文时把标题改为《犹太人与现代资本主义》）。此书堪称探讨犹太人与现代资本主义之间特殊关系的开山之作，至今仍是研究犹太经济史的经典著作。然而，其论述并不局限于经济一隅，而几乎包罗了宗教与文化、政治与社会、历史与心理等各个领域。

桑巴特在书中挑战了马克斯·韦伯的著名观点，即新教伦理塑造了资本主义精神，转而别具一格地去强调现代资本主义崛起过程中的犹太因素。他认为影响资本主义的主要清教观念在犹太教中有更充分的发展，资本主义的外部结构和内在精神其实是犹太人塑造的，犹太宗教和犹太伦理直接促成了资本主义在西方世界的兴起。这就是所谓的“桑巴特命题”（Sombart's Thesis）。

要理解这个命题，有必要记住桑巴特生活的时代。桑巴特生于1863年、卒于1941年，其一生横跨了德意志的统一、第二帝国、第一次世界大战、魏玛共和国、第三帝国乃至第二次世界大战，这恰好是近现代德国乃至整个欧洲最跌宕起伏的年代。依犹太史观之，这段时期也是“犹太人问题”在德国以及整个欧洲最尖锐激化的时期。而一般认为，现代反犹主义肇始于19世纪70年代的德国，并在20世纪40年代纳粹的“最后解决”中达到极致。

桑巴特对待犹太人的态度，与这种反犹主义走势颇有暗合之处。他的这方面态度，大致可以以1911年本书的发表为界线，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倾向于客观分析犹太人的重要作用，而后期逐渐转向夸大犹太人的负面影响。他关注犹太人，始于1902年《现代资本主义》的出版，但此书并未深入分析犹太人与资本主义的关系。在翌年出版的《十九世纪德国经济》一书中，他强调犹太

① 杰拉尔德·克雷夫茨：《犹太人和钱》，冯玮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1年，第4页。

人是德国经济的“酵母”，在推动德国经济的变迁中发挥了重要作用。[①] 到1909年，犹太人逐渐成为桑巴特研究的核心主题。这一年他举行了一系列关于犹太人在经济生活中作用的讲座，两年后正式出版本书。但仅仅过了一年，桑巴特在《犹太人的未来》(*Die Zukunft der Juden*)中，就谴责了犹太人所代表的资本主义唯利是图的特性。此后，他的态度日益靠近反犹阵营。1915年又发表了《商人与英雄》(*Händler und Helden*)，颂扬德意志民族的英雄主义精神，而被归于“商人民族”之列的犹太人成了德国的对立面。在桑巴特看来，犹太人代表着一种物质、市侩、金钱中心的资本主义力量，这与他理想中忠诚、诚实、扎根土地的“英雄民族”截然相反。实际上，桑巴特越来越走向一种反资本主义。希特勒上台后，他加入了纳粹党，并为之宣传鼓吹，认为一种“新的精神”即将统治人类，并强调纳粹(国家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才是一种“真正的社会主义”。[②]

犹太人对桑巴特此书的反应，亦耐人寻味。本书出版之初，犹太人意见分歧。桑巴特视犹太人为一个独特的种族和民族实体，认为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家园才是缓解东欧犹太人困境的唯一出路。这几乎与犹太复国主义以民族主义手段解决“犹太人问题”的想法不谋而合，因而得到一些犹太复国主义者的赞赏，桑巴特在他们看来“并非反犹主义者，而是公开同情犹太复国主义的基督教学者。他的认可被作为一个重要的例证而受到欢迎。这是非犹太学术头一次以犹太复国主义者的观点来思考犹太人问题”[③]。而且，桑巴特在当时反犹大环境中如此“抬举”犹太人，将之奉为现代资

---

① Colin Loader, “Puritans and Jews: Weber, Sombart and the Transvaluators of Modern Society,” *Canadi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 26, no. 4 (Autumn, 2001), p. 745.

② Abram L. Harris, “Sombart and German (National) Socialism,”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 50, no. 6 (1942), p. 931.

③ Ismar Schorsch, *Jewish Reactions to German Anti-Semitism*, 1870—1914,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2, pp. 196 - 197.

本主义的开创者，似乎也反映了一种“亲犹太人”（Philosemitic）的立场。著名犹太复国主义思想家阿瑟·鲁平于1911年说道：“桑巴特的观点可以作为一种普遍观点的代表：犹太种族即是资本主义商业精神的化身。”[①]尽管有这类认可，但更多的犹太人却提出尖锐批驳与诘问。这些人从书中读到了桑巴特隐藏在字里行间的“反犹主义”预设。桑巴特屡屡强调犹太人的“外来者”地位、暗示他们不可同化等等，这无疑与反犹主义的立场是一致的。因此，他们认为桑巴特本质上与那些尖锐而直接的反犹主义者并无不同，只不过代表了一种结合了亲犹与反犹的新式反犹主义罢了。另外，桑巴特过分强调了犹太人对作为现代文明精髓的资本主义的首创贡献，这很容易为反犹主义者利用，作为“犹太阴谋与威胁论”的重要证据。一言以蔽之，本书“充当了一面镜子，犹太人从中看到了令他们最赞赏和最惊恐的方面”[②]。

仅在大约一代人以后（尤其在纳粹上台后），本书在犹太人中间似乎再也没有激起多少积极响应。这种状况至今未有根本改观，一代代犹太学者从材料到立论、从观点到结论，对本书一一批驳。他们竭力弱化犹太人在资本主义兴起、发展过程中的作用，这或许与犹太人自身深刻的“他者”意识不无关系——压低姿态以避免引起反犹主义者的攻击与斥责。此外，桑巴特在书中频频强调犹太人的“种族身份”，并将推动资本主义发展的犹太特性、犹太天赋归结于此，这种大胆的推论与纳粹灭绝犹太人的理由不谋而合，后者使犹太人付出了空前惨痛的代价，本书的主题因而成了犹太人主导的犹太学研究界讳莫如深的禁忌。

就本书而论，桑巴特经常为人诟病之处，首先是他对资本主义的起源与实质采取了多因素论。他在某一时期持一种观点，而在

---

① Mitchell B. Hart, “Jews, Race, and Capitalism in the German-Jewish Context,” *Jewish History*, vol. 19, no. 1 (2005), p. 53.

② Derek Penslar, *Shylock's Children: Economics and Jewish Identity in Modern Europ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1, p. 165.

另一时期又认为另一种因素促成了资本主义发展，这往往让人难以把握他的主旨。但在他自己眼中，这与他提倡的对资本主义进行总体化、综合性的研究并不矛盾。他在《现代资本主义》序言中写道："我以一种自觉的专断，在近来的著作中对于资本主义发展的一方面加以阐扬，人们却根本否认这种方法；使一些聪明的头脑为之震动，使一个作者的理解力为人所怀疑；至于这个作者本来今天认城市地租、明天认贵金属的生产、后天认犹太人、大后天认奢侈、随后又认战争为促成现代资本主义起源的。他们丝毫没有察出这里只涉及部分的研究，殊属奇怪；他们没有看出我用这种探照灯方法的目的无非在使读者的视线每次集中于问题的一方面，因此使他在一个时期内必须深刻地去研究这个部分问题。"[①]在此综合性研究的思想指导下，除《现代资本主义》从总体上探讨资本主义以外，《犹太人与现代资本主义》、《奢侈与资本主义》、《战争与资本主义》是他分别探讨资本主义起源某个因素的代表作。[②] 然而，这种摇曳难定的学术立场，势必会削弱他的可信度与权威性。

其次，桑巴特为了解释犹太人与资本主义之间关系的由来与现状，不惜借助没有凭据的联想和猜测，从而频频受到学者质疑。在这方面，本书《美国版导言》的作者已举了不少例子，此不赘述。

再次，犹太人不仅拥有与资本主义相似的属性，更有与之不符甚至对立的特征。放眼近代以来的世界，犹太人不仅是资本主义组织与精神的先锋，而且也是反资本主义思想与运动的先知。共产主义被反犹主义者污名化为"犹太—布尔什维克主义"，就足以提供这方面的反证。犹太人的这种反资本主义特征，被著名经济学家弗里德曼归结为资本主义与犹太人之间的一个"悖论"："……在上个世纪，犹太人一直是反资本主义思想的堡垒。从卡尔·马

① 桑巴特：《现代资本主义》，第一卷，李季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58年，第x—xi页。

② 桑巴特其他被译成中文的有关资本主义的著作有：《现代资本主义》、《奢侈与资本主义》。

克思到利昂·托洛茨基，再到赫伯特·马尔库塞，犹太人撰写了相当一部分的革命性的反资本主义文章。各国的共产党，既包括苏联的已经取得革命胜利的共产党，也包括目前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的共产党，犹太人在领导成员和共产党员中所占的比例与其人口不成比例。"[①]尽管桑巴特在书中屡次提及作为激进派代表的"犹太人"——尤其是马克思与拉萨尔，但并未因此强调犹太人的反资本主义特征；实际上，反资本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张力一直贯穿于近现代犹太思想之中，而且这种紧张关系很大程度上形塑着现代犹太人在非犹太人那里的多元形象。

最后，桑巴特未免过分夸大了犹太人的作用。他一再将许多现代经济组织与经济方式的起源追溯到犹太人那里，以支撑其立论。这固然有一定合理之处，但更多的是一种猜测，没有多少可靠材料能证实；而且就算它们由犹太人开创，也未必能够必然发展为有助于资本主义成长的现代因素。正如困扰中国学界已久的"李约瑟难题"(Needham Paradox)一样，许多包含了现代因素的古代事物在后来的发展中未必能够顺利演变为现代事物。不能因为某些因素可能与现代事物有相似之处，便断言它就是现代事物的先驱。这样说，未免有以果代因之嫌。此外，就算犹太人对资本主义的发展贡献良多，但也不能过分夸大这种作用，而且资本主义对犹太人的推动作用也不可忽视。犹太人与资本主义，究竟哪个是第一动因？或许，正如本书《美国版导言》所强调的：不是过去的犹太人创造了资本主义，而是资本主义创造了现在的犹太人。

尽管桑巴特的材料与观点遭到众多质疑与批评，但本书的历史地位与学术价值却是毋庸置疑的。正如克雷夫茨评价的："桑巴特以新的眼光来看待犹太人对金融和商业的贡献。这是数百年来的第一次，也是20世纪中第一次在犹太人和钱的问题上作出的总体上肯定的论述。以前，偶尔也有犹太历史学家撰写过论述独特的

① 米尔顿·弗里德曼：《资本主义与犹太人：挑战一个悖论》，载《弗里德曼文萃》，胡雪峰等译，北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52页。

犹太商业活动的著作和论文，但公众对犹太人的活动的认识都是全盘否定的和极其幼稚的。”[①]瑕不掩瑜，围绕本书所激起的无穷争论，或许恰恰是许多灵感启迪的起点，是无数真知灼见的萌芽。批判力与生命力相伴相生，从长远看，一本缺乏批判力的著作势必丧失生命力。或许，本书最重要的价值，并非带来一种铁板钉钉的结论，而是在于它所激发的无穷思考与不懈探索。期待本书中文版的出版，能够推动中国学界去探索犹太人与资本主义的历史谜题，去廓清汉语世界在认识犹太人与世界经济关系时出现的甚嚣尘上的重重迷障……

与中国学界对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高度重视（至少有五六种不同的中译本）相比，桑巴特的《犹太人与现代资本主义》显然被长期忽视了。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个译本是根据1962年的美国版译出的。书中涉及《圣经》内容的汉译，均参照了《圣经》中文和合本；需要注意的是，犹太人用的《圣经》和基督徒用的《旧约》，字句虽然相同，但极个别经文的分节号有所不同，出现分歧时，本书采用希伯来语《圣经》的分节号。译文力有未逮之处，敬祈方家不吝赐正。

本译著由宋立宏教授组织翻译。我译出初稿，再由他审读校订。宋老师是我的良师益友，在合作翻译此书的过程中，从他那里受益匪浅。我们要特别感谢陈恒教授，他为此书的出版贡献最多。我的导师张倩红教授，一直关注着本书的翻译，她从我大学本科以来从未间断的关爱与提携，让我感激在怀。徐新教授、张礼刚博士、孟振华博士、郑阳博士等人在翻译过程中也给我提供了各种帮助，在此一并致谢。

艾仁贵

2014年8月28日

① 杰拉尔德·克雷夫茨：《犹太人和钱》，第51页。

犹太人与现代资本主义

THE JEWS
AND
MODERN CAPITALISM

上架建议：经济

ISBN 978-7-5426-5425-0





定价：48.00元